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宗志文 主编
朱信泉
李新 校阅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宗志文 主编
朱信泉

李新 校阅

中华书局

1981年·北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宗志文 主编
朱信泉

李 新 校阅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12 7/8 印张·253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2,5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975 定价: 1.00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

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实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务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实，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务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有重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六、初稿后面，要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哪个行业的人由哪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哪个地方的人由哪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

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

目 录

邓 铿.....	严如平 (1)
彭家珍.....	吕适澄 (7)
刘道一.....	李静之 (13)
张 榕.....	武育文 (16) 黎 光
白毓昆.....	徐辉琪 (21)
范筑先.....	姜克夫 (25)
程璧光.....	郭 烙 (33)
陈少白.....	姜献阁 (41)
刘揆一.....	李静之 (47)
田 桐.....	徐辉琪 (53)
张凤翔.....	张应超 (61)
张 澜.....	宗志文 (66)
李鼎铭.....	李敬谦 (75) 熊宇良
井勿幕.....	张应超 (80)
寇 遐.....	张应超 (86)
唐生智.....	李静之 (90)
黄琪翔.....	李静之 (100)

马占山	陈宁生	(108)
赵寿山	徐乃杰	(116)
孙蔚如	靳英辉	(125)
吴奇伟	戴仰明 林熙敦	(132)
龙 云	邵献书	(137)
卢 汉	邵献书	(145)

唐继尧	谢本书 孙代兴	(152)
陈炯明	丁身尊	(161)
刘显世	李德芳	(169)
章宗祥	郑则民	(174)
陆宗輿	郑则民	(179)
刘镇华	林炯如	(184)
陈济棠	李静之	(191)
何 键	李静之	(199)
左舜生	李义彬	(208)
刘桂棠	刘述和	(215)
陶克陶胡	卢明辉	(220)

陈蝶仙	江绍贞	(225)
陆费逵	熊尚厚	(230)
张嘉璈	江绍贞	(237)
钱新之	江绍贞	(246)

张振勋	熊尚厚	(253)
黄仲涵	温广益	(259)
鲁 迅	陈漱渝	(263)
闻一多	王子光	(278)
严 复	罗耀九	(286)
许广平	张小曼	(292)
李仪祉	姜献阁	(300)
黄乃裳	陈 民	(306)
林白水	钟碧容	(310)
李叔同	熊尚厚	(317)
陈三立	杨天石	(323)
王光祈	李义彬	(326)
刘半农	姜献阁	(333)
欧阳予倩	张小曼 杨光莹	(340)
许地山	徐斯年	(346)
徐志摩	孙玉石	(353)
林砺儒	郭 熔	(360)
汤用彤	宗志文	(366)
马约翰	王维屏 黄廷复	(370)
萧龙友	寿祝衡	(375)
施今墨	寿祝衡	(378)
太 虚	韩廷杰	(381)

林文庆.....	陈 民 (387)
劳乃宣.....	朱宗震 (391)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	(396)

邓 铿

严如平

邓铿，名士元，字仲元。1886年1月31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父邓薰玉，父邓丽川，世在归善（今惠阳）淡水行商，邓铿从七岁起随父住在淡水。

邓铿九岁就学于归善，稍长肄业于崇雅学堂。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愤懑不平，亲见亲闻孙中山领导的1900年惠州起义，为之慨叹不已，与友人辄以革命相勉励。1905年，他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列步兵科第三班肄业。翌年春卒業，留学堂充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法政学堂体操教习。1907年充学兵营排长，代理左队队官。1909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常以革命思想教人。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同盟会筹划再举。是年冬，邓铿去香港见赵声等人，拥赞再在广州举义。不久，同盟会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为在广州先期赁屋设立秘密机关，邓铿慨然以其父所营米店署保，表示：即有不虞，毁家不顾。不幸1911年4月27日的起义没有成功，邓铿出走匿居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决定广东迅速响应。除由胡汉民、朱执信负责在广州起义外，另于各江成

立四个军分别行动。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第一军担负攻略清陆路提督所在地惠州的任务，邓铿任第一军参谋长。10月30日，陈、邓等潜入淡水，以民团发难，收缴巡防营的枪械，进攻归善城。当时第一军面临敌众我寡、枪械不足的形势，激战数日，几濒于危。邓铿身先士卒，率众冲锋，在民团配合下，终于击溃清军，进驻归善城。清提督秦炳直投降，所属巡防营洪兆麟等四营被收编为一团。惠州之捷先声夺人，北江、西江、韩江诸路义军亦起，全省大震，11月9日广州即告光复。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当时各路民军云集广州，秩序很乱。陈炯明被举为副都督，任邓铿为陆军混成协协统，负广州卫戍之责。12月下旬，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京，旋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以副督代理都督职，邓铿任都督府陆军司司长兼稽勋局局长。他协助陈炯明编遣民军，建立正规的陆军两个师和一个旅以及警卫军数十营。1912年5月，胡汉民自南京回任，邓铿仍任都督府陆军司长，整军除盗，多所擘划。不久，都督府改制，裁陆军司，邓改任都督府参谋长。他斡旋于胡汉民、陈炯明之间，调解他们的矛盾，成为胡陈合作的纽带。

海南岛为我国防要地，帝国主义多方觊觎。胡汉民特派邓铿为琼崖镇守使兼办琼崖民政事宜。1913年3月邓到海南岛后，鼎新革故，遣散旧防营、师船，致力于交通垦殖、开发利源、移兵为工、建设国防。当时有贩卖人口出洋的“猪仔头”，在帝国主义领事唆使下拐骗了五百多人，邓将四个“猪仔头”捕获枪决，受到民众赞扬。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赣、苏先后宣告独立。这

时陈炯明已任广东都督，奉孙中山命于7月18日宣告独立。龙济光受袁世凯命为广东都督，率部自西江入粤，迫近三水河口，广州危急。邓铿奉命回省，即赴三水督战。但因驻广州燕塘的炮兵团突然炮击都督府，8月4日，陈炯明仓惶出走，局势急转直下，广州被龙济光占据，讨袁军事失败。邓铿被褫职通缉，避往香港。

是年冬，邓铿经上海去东京，谒见孙中山。1914年春，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党，严格吸收党员，立誓约，按指模，严密组织纪律，要求绝对服从总理领导。当时，袁世凯四处捕杀革命党人，革命处于低潮。邓铿置身家于不顾，坚决信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孙因此而对邓倍加亲信，任为军务部副部长，佐许崇智筹划军事。邓即赴香港，负责开展广东方面的讨袁军事活动。同年夏，率陈可钰、李杰夫、罗翼群等策动陆军团长邓承昉在饶平、黄冈举义，另命洪兆麟在惠阳发难，并遣布耀庭到广州运动龙济光军某部，但均未成功。继以军费无着，无力再举。在此期间，邓曾遣怡保归侨鍾明光刺龙济光，未中而鍾牺牲。1915年10月，邓奉孙中山命赴新加坡筹募讨袁军费。次年4月，从香港潜入广东增城，策动旧部防军统领徐连胜反正，因受徐部下阻挠未果。5月中，再入增城，促徐连胜部反正，旋攻占石龙、博罗。邓出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与广州、惠州、东莞三面来敌苦战月余，以机智勇敢击溃敌人。6月袁世凯死，讨袁军事结束。邓铿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被留下赞划党务和军务。

1917年春，邓铿赴日本养病，考察军事政治。夏，奔父丧，经沪回粤。7月，孙中山率驻沪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召

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邓铿葬父毕，即应命到广州参与护法。冬，军政府成立粤军，准备援闽。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邓深感护法不止援闽，还要问鼎中原，直捣北洋军阀巢穴。他征得孙中山、陈炯明同意，广招军事人才，电邀蒋介石、吴忠信等来粤参赞军机，任为粤军总部参谋等职。粤军当时为二十营，仅有枪五千，器械窳败，糈饷支绌。经过在潮汕增募和集训，扩得十营，力量渐见充实。1918年5月17日，粤军全线向福建进攻，进展顺利，连克闽西南二十余县，8月，粤军总部进驻漳州。邓铿进一步协助陈炯明整顿扩充队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粤军发展到二万余人，正式编为两个军，陈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仍任总部参谋长。

1920年6月，孙中山电令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铿坚决响应，并敦促犹豫观望的陈炯明服从命令，挥戈返粤。邓亲赴福州与福建督军李厚基接洽合作办法，商定将闽南交李，由李接济粤军军费，并巩固粤军后方。8月，邓铿统率第一军的洪兆麟、熊略、梁鸿楷等部为左翼，直趋韩江下游，从云霄、诏安攻汕头。不旬日即克黄冈、澄海而攻潮安。接着与右翼许崇智等各路会攻惠州，邓由龙门、平湖直攻石龙进取广州。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桂系军阀败走。

11月，孙中山自沪返粤，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决定建立粤军第一师，任命邓铿兼任师长。粤军这时已扩充达八九万人，品类复杂；又因援闽、回粤接连胜利而渐渐骄悍与腐化。孙中山嘱咐邓铿选择素质较优者编建第一师，严格训练，以为全军模范。邓励精图治，对

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培养成具有政治觉悟、坚强意志、英勇善战的部队。邓重视军官的选拔和训练，设军官教育班、军士教导班，予以严格训练。尝谓“有强将无弱兵”，“要强兵必先强将”。他选配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叶挺、李章达、陈铭枢、蔡廷锴、薛岳、蒋光鼐、陈济棠、缪培南、余汉谋等人分任第一师的团长、参谋长、参谋处长、营、连长等职。

邓铿治军严谨，廉正不阿，嫉恶如仇。对军中不肖分子包庇烟赌的行径，毫不徇情，迭次派出宪兵，缉拿偷运烟土者。一次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烟土两百多担，查明系陈炯明部属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伙同所为。邓不予宽容，召集各界代表和各国驻穗领事共同监视烧毁。时人赞颂为林则徐后第二次焚烧鸦片。自此陈炯明亲旧对邓畏惮，含恨在心。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统一全国。6月，桂系军阀在直系支持下集重兵分三路窥粤，孙中山决定组成援桂军予以讨伐。邓铿率第一师奉命留驻广州坐镇，击溃突由北江来袭之沈鸿英部，收复连阳等县。援桂军于6月25日占梧州后长驱直入，三个多月即底定广西。孙中山拥有两广后，决心全力北伐，12月10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邓铿由第一师抽调叶挺、薛岳、张发奎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派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率领前往。陈炯明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伐，拒不参加大本营会议。孙中山约他到梧州、肇州会晤，他也不理会。邓铿虽多次说服、催促，他只敷衍。邓为弥合孙陈嫌隙，多年来斡旋转圜不遗余力。遇有分歧矛盾，纵或一时未能解决，亦必善为延待；若受令转达，每每

婉转其词以曲达其意。他曾对人说过：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1922年3月，前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周善培来广州“观光粤政”，邓铿以师礼亲赴香港迎接。21日傍晚回到大沙头广九车站，突遭奸徒手枪袭击，腹中两弹。邓负创奋力追踵凶手，不获；急登车回省长公署，随入韬美医院救治，23日凌晨逝世，年仅三十八岁。广州及桂林“袍泽”闻讯，无不恸哭。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追赠邓铿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为他亲书墓碣。

主要参考资料：

胡汉民：《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

邹 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邓德传》。

《邓仲元先生革命史事节略》，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先烈先进传》。

罗翼群：《追忆邓仲元先生事略》。

王宇高：《邓铿传》，《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

黄任潮：《邓仲元》。

彭 家 珍

吕迺澄

彭家珍，字席儒，1888年4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四川省金堂县。^①其父彭士勋任清朝主事，曾一度到日本考察，颇有志革新，在四川省首倡新学，常念中国积弱，非武力不足以救亡。彭家珍一岁多时，其母因病不能抚育，由其父兼任鞠养。五岁时，父亲教他学习文天祥的“正气歌”，背诵如流。稍长，又教他读黄宗羲等人的书，因此，他自幼就对清廷高压汉人的反动政策不满。

彭家珍于1903年2月，从父命考入四川成都陆军武备学堂炮科，1905年冬毕业。因考试成绩列入最优等，为四川省总督锡良所赏识，派他赴日本考察军事，并委他从日本购买一批军火。这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很多，他常与进步同学交游，从此遂抱保种救亡的决心。回国后，充任四川新军第六十六标第一营左队排长，后又升任该营左队队官。1906年夏，革命党人谢奉琦等在四川叙州府一带起义，未成。清吏大捕革命党人，彭家珍表面上戒备森严，暗中通知革命党人逃避，因而党人被捕的很少。这事后来被协统朱庆澜发现了，彭被迫于1909年5月离开四川入云南，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练官。同年9月，又升任本堂提调。1910年4月，彭家珍随锡良入东三省，充任奉天讲武堂学兵营队官兼教习。

新军第二十镇内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这时清廷政治更加腐败，全国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他秘密联络奉天军界同志，准备武装起义，未遂。1911年9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彭家珍为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副官。他负责从奉天解送军米、手枪、马匹到天津，有机会与京津的革命党人经常接触，便由赵铁桥、黄以镛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经常到国光新闻社参加革命活动。他还把陆军部发给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军用免票、半价票、输送军用物品票等私赠党人使用。这样，不仅革命同志往来自如，而且各种物资得以源源接济。

1911年10月上旬，第二十镇从新民府调往滦州参加永平秋操。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秋操停止。清廷随即下令调第二十镇南下攻打武汉革命军。该镇统制张绍曾据守滦州，按兵不动，并联合蓝天蔚等人签名，盖用了第二十镇统制的关防，于10月29日向清廷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求速开国会、制订宪法，组织责任内阁，释放国事犯等等。同一天，山西省宣布独立，准备组织民军进攻北京。恰在这时，清廷由欧洲购买的一批军火（枪五千枝，弹五百万发）^②，从俄国运入关内。东督赵尔巽特派彭家珍、刘其达、张允仁等三人负责押运。彭家珍利用机会先和他的学生商震、程起陆等商定扣留方法，乃密电张绍曾，请他派兵截留。电云：“自鄂变以来，我军驰赴前方应敌，近日战事最为激烈。我军以军火缺乏，难挫顽凶，兹特购买大批军火，由西伯利亚铁道运经滦州，直赴前线援救。闻公等奏请立宪，原系崇尚和平，此旨正大，薄海钦迟。惟朝廷无立宪之意，不惜购买军火自相残杀。珍等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

是荷。”^③张绍曾得电，将军火扣留，并电迫清廷停战。同时，又电告鄂军政府，告以扣留军火的真情，示意及时进攻。清廷得电后，迫于形势，不得不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并特赦革命党人，图以此缓和革命。同时，又阴下毒手，由良弼与袁世凯派人合谋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又撤掉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削去他的兵权。因此，吴禄贞、张绍曾相约进攻北京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彭家珍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仍然极力策动第二十镇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秘密组织武装起义。

1911年11月6日，清廷释放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黄复生、罗伟章等人。他们出狱以后，乃赴天津组织秘密机关。12月1日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于天津义租界寓所成立。汪精卫任正会长，李石曾任副会长，分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交通等部，彭家珍在军事部任事。^④会后他和黄复生、赵铁桥、罗世勋等四人，被派往上海联络南方革命党人，请求接济北方革命运动。彭家珍、黄复生因此留沪研究制造炸弹的方法。接着，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彭为北方招讨使，革命党人复推他为北方暗杀部部长。当自制炸弹试验成功后，他运炸弹由上海到天津。这时军事部经济困难，彭暗中把天津兵站司令部的军饷二百金，献入同盟会，以作购买炸药之用。后来这事被赵尔巽发现，以盗饷罪由陆军部出令通缉。他被迫改名朋嘉桢，号锡三，仍然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专门从事暗杀工作。当时被袁世凯暗中收买而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以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的身份，阻挠和破坏北方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1911年12月27日，汪精卫暗中接受袁世凯的任务，以议和代表参赞的名义，自北京南下到上海，劝孙

中山让出大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为袁效劳。

自汪离京后，北方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2日，在滦州举行武装起义。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大批捕杀革命党人。京津党人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清臣如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洵、载涛等皆可杀，而袁世凯宜先诛之。彭家珍与陈宪民昼夜赶装炸弹，不到十天，便装成了一百多枚。侦察清楚了袁世凯的行动路线以后，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投弹袭击袁世凯于东华门，未中。三人被捕殉难。事后，清吏大肆搜索党人，彭家珍居住的四川营董宅，被军警搜查，仆人张顺被捕去。他又迁寓中西旅馆四十三号，经常打听良弼、铁良、那桐、载洵、载涛等诸亲贵的活动情况，准备一网打尽。1月19日，清资政院开会，王公大臣都到，彭探悉赶来，而院会已散，未能下手。

同年1月中旬，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极力反对。他们组织三十余人，于1月18日齐赴庆王府，包围主张清帝退位的奕劻。次日便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成立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破坏共和。当时担任军諮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奋然曰：“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⑤他便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可是他并不认识良弼。他从四川同乡徐某的家中，找到良弼的照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他了解到四川同乡张敬三、罗春山与良弼友好，便冒张的名义诱良弼来而杀之，未果。他想直接刺杀良弼，然而良弼出入陈兵自卫，无法接近。他又想起了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

至亲密，他在讲武堂工作时曾经保存了崇恭的名片。于是派他的学生熊斌和刘升之赴奉天，用崇恭的名义发了一个假电报给良弼，假称东督赵尔巽愤宗社将亡，举崇恭来北京，共图挽救。至1912年1月24日（阴历辛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彭家珍探知清室内廷将于腊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他决定在腊八宴行刺。初七日辰刻，他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书中有云：“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⑥他写完了绝命书以后，便叫他的仆人伍焕章，交给他银票百元，并对伍说：“我有事他往，能否回京，尚不能定，明晨早车将余衣服用器运往天津交民意报馆，你也暂住在报馆。如果陈宪民诸先生来，请他不要住宿在我房里。”^⑦腊八傍晚（即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穿着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马车到金台旅馆，说他是从奉天来的，因军事来京，从怀中取出崇恭名片，因得开十三号房居住。休息一会，他说有紧要公事入城，命馆人快替他备马车。他上车入前门，先到军谘府，没有碰见良弼。再往红罗厂入良弼私宅，门房告诉他良弼到摄政王府未归，引彭入坐客房，久候弼未至。他复出门，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良弼。刚上车行至大街，恰好碰见良弼驱车归家。彭复引车回，下车立于门的左侧。良弼下车进门，门丁持崇恭名片给他。良弼说：“夤夜至此，胡勿迫乃尔！”^⑧彭家珍乘其不备，掷一炸弹，轰然一声，阶石炸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奄奄一息，过几天便死了。弹片触石反射，伤彭家珍头部，立刻牺牲。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死后，清廷王公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出北京，赴天津、大连、青岛等地

逃命。

这时，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特追赠彭家珍为大将军衔，谥曰义烈公。北京西郊万牲园烈士墓道建成时，他的遗体已由其家属运回四川省金堂县安葬，所以西郊烈士墓仅是他的衣冠冢。

注：

- ① 《彭大将军家珍墓志铭》，见《金堂县续志》卷十，第37页。
- ② 《京津同盟会纪事》，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各省光复”，第179—183页，台北市中央文物供应社1962年10月出版。
- ③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40页。
- ④ 邹鲁、胡鄂公、陆云章等人的著作中都说彭家珍任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长。但“中国同盟会京津分部章程”中说蓝天蔚任军事部长（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二册，第333页），彭家珍为部员。因此，本文未写肯定的职务。
- ⑤⑥ 《烈士彭家珍绝命书》，见《金堂县续志》卷十，第24页。
- ⑦ 陆云章：《彭家珍刺杀清臣良弼案》，见《中华民国开国记》第510页，台北市中央文物供应社1968年7月出版。
- ⑧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5页。

刘 道 一

李静之

刘道一，字炳生，原籍湖南衡山，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湘潭县。父亲刘方尧原是农民，太平天国时被征募为湘军乡勇，因激于民族大义放走一个太平军俘虏，触犯军法，逃至湘潭乡间匿居，改名明远。后在湘潭县衙门担任差役，称籍湘潭^①。刘道一早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入湘潭的一所教会中学，英语学得很好。由于受革命潮流和哥哥刘揆一的影响，思想激进。读《汉书·朱虚侯传》，中有“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的句子，便自号“锄非”。

1904年2月，黄兴、刘揆一等组织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刘道一随哥哥参加。华兴会决定这年冬天发动长沙起义，刘道一曾参与起义的准备活动^②。3月，他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③。由于反清的共同革命志趣，他结识了秋瑾，并与秋瑾、刘复权、王时泽等十人，组织秘密团体“十人会”，以反抗清政府、光复中华为宗旨。秋天，又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草鞋”（将军）^④。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刘道一参加，被推任书记、干事等职^⑤。他长于口才，又精通英语，同盟会对外交涉方面的事务，他很尽力，被黄兴认为是“将来外交绝好人物”^⑥。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留日会员纷纷被派回国运动新军和

会党，酝酿武装起义。刘道一因父亲年老多病，请求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秋，他和蔡绍南等被派回湖南“运动湘军，重振会党”^⑦，在湘赣边境开展活动，准备武装起义。他抵达长沙时，曾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在水陆洲的一只木船上秘密开会，传达黄兴意见：这次武装起义，应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动为上策。如若会党首先发难，军队立即响应。会议认为，为攻取省城长沙，须将会党集合在萍、浏、醴各县，和运动成熟的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如果这个方案实现不了，则由会党在浏、醴发难，直扑长沙，军队反戈相应，占领省城，会党再组织便衣敢死队，阻止敌人的后援部队。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联系，蔡绍南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计划待军队运动成熟，在阴历年底清吏封印时举事。

同年12月4日，蔡绍南、龚春台、姜守旦等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了。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者包括萍乡、醴陵、浏阳的会党、防营兵士和工人共三万余人。起义队伍很快占领了浏阳的高家头、金刚头及萍乡的高家台，进据萍乡上栗市，以及宜春、万载各县的一些地方，屡败清军。清政府急调湘、鄂、赣、苏等省驻军四、五万人前往会剿，相持一月余，起义被镇压下去。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长沙作起事的最后部署，新军还没有运动成熟。他听到萍、浏、醴已经举事的消息，日夜加紧准备，以便起义队伍攻取长沙时，新军及防营能开城响应。不幸他的活动为清政府发觉而遭逮捕，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

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刘道一牺牲后，其亲友被株连者很多，其父被捕，瘐死狱中。

萍、浏、醴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牺牲的凶耗传到日本后，留日同盟会会员痛心疾首，纷纷请缨归国杀敌。黄兴悲愤不已，作诗哀悼：“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土，万方多难立苍茫。”^⑧孙中山对刘道一的牺牲，也深为悲痛，曾作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⑨

刘道一就义后，遗体运回湘潭。1912年3月南京临时革命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迁葬于长沙岳麓山。

注：

- ① 刘安湘：《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
- ② 《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第六集，台北1971年2月版，第436页。
- ③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第127页。
-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77页。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第225页。徐双韵《记秋瑾》，同上书第209页。
- ⑤ 同②，第437页。
- ⑥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287页。
- ⑦ 同⑥，第284页。
- ⑧ 同⑤。
- ⑨ 同②，第435页。

张 榕

武育文 黎 光

张榕原名张焕榕，字阴华，是辛亥革命时期在奉天府（今沈阳市）从事同盟会革命活动而牺牲的著名烈士。1884年（清光绪十年）生于奉天。先世济南，徙居奉天抚顺，遂籍抚顺人。他父亲张钦善，做过清广宁府（今北镇县）仓官，职位不高，却颇有积蓄，任满后，定居沈阳。

张榕青少年时，目睹沙俄在东北的侵略暴行，受业师张振声“洗刷国耻，振兴民族”^①的教导，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逐渐萌芽。他勤读文史，“兼耽骑射”，以图益世救国。那时，甲午、庚子屡败之后，国势一蹶不振，大好河山，任人宰割。1903年张榕到北京，学俄文于译学馆。为了结交同志，他住在沙滩附近一座庙里。庙里住有许多学生，他常常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倾心吐胆地交谈。又结识一个朋友黄中慧，是候补道台，做过驻美国旧金山的总领事，醉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皇帝。黄年龄比张大得多，他们结成忘年之交。

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张榕弃学回乡。目睹两个强盗军队在奉天城外决战时，炮弹纷飞，雄伟壮丽的八王寺，被炮弹所摧毁，这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便和丁开璋等人到兴京（今新宾县）、海龙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公开名称是东三省保卫公所，发表宣言称：“国土存亡，端

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②。他们又联络当地人士王阁臣组织乡团，“先从兴京、海龙府属实行倡办，内则训练乡军，捍御侮患；外则折冲樽俎挽回主权”^③。并将章程条文在报刊上发表，还呈清政府备案，拟进行合法活动。岂知清廷在朝阳已被乡团弄得焦头烂额，不容张榕等再启事端，便屡电盛京将军增祺查办，勒令其解散。

张榕被迫回到奉天，当局很注意他的行动。1905年7月下旬，张榕又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沙滩附近那个庙里，并开始创办秘密刊物，用以鼓吹革命。又结识吴樾，成为生死之交。张榕设秘密机关于天津大丰巷某歇业典肆内，常往来其间，以通京奉消息。9月24日，吴樾、张榕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当时以身殉，张榕逃走。后来警察在吴樾衣服里搜到一张张榕的像片，缉查追索十日，将张榕逮捕。黄中慧得知张榕被捕的消息后，电直督以全家性命担保，又联络张的亲友联名保释，都未得到回答。后清廷以叛逆罪，科张榕以永远监禁。张榕“在狱中四年，益刻意为学，博通群籍，而于兵符、政法尤宣，究得其精奥”^④。

张榕下狱不久，就和典狱长王璋结成莫逆之交。王璋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豪侠之士，素有改革之志，曾经当过义和团的首领。1908年夏，王璋领着张榕越狱逃亡到日本东京。到东京后，张榕为了不忘黄中慧的救命之恩，易名为黄仁葆。不久，见到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与在奉天的革命机关时常通信联络，准备发动东北的武装起义。

1910年秋，张榕由东京返回大连，联络革命党人和关外民军，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8月，他与同盟会员陈干策划乘清

军大操时，带领民军从锦州入关，乘势直捣北京。未及实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张榕立即从大连转入奉天，与咨议局长吴景濂商议联合革命志士，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反正，宣告独立。但吴景濂害怕革命，借口“事关重大”，没有同意张榕的要求。不久，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在北大营召集秘密会议准备起义的机密泄露。赵尔巽感到新军不可靠，异常惊恐，调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进驻省城，监视新军，镇压革命派，维护反动秩序，并合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张榕、蓝天蔚对赵尔巽等人的阴谋丝毫未发觉，也准备成立保安会，随时宣布独立。11月11日晚，军阀官僚和立宪派要人召开保安会筹备会，草拟章程，决定推举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伍祥桢为副会长。12日下午在咨议局召开奉天军、政、工、农、商、学各界和各自治团体代表大会。会上保守派利用张作霖实行武力威胁，“公举”赵尔巽为保安会长，吴景濂、袁金铠、伍祥桢、张榕为副会长。因保安会被保守势力所操纵，张榕未到任。

11月14日，赵尔巽解除蓝天蔚的兵权，迫令出走，以保安会军事部长聂汝清兼第二混成协协统，加强对新军的控制。赵尔巽并以保安会长名义对奉天驻军下达命令说：“倘发见暴动之事，则以敌人对待”^⑤。

张榕看到吴禄贞被刺，蓝天蔚被迫离奉，“各党竞立机关，多于毛羽”，“其势涣散，多不得力”^⑥，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推动革命继续进行，把东北的革命力量联成一气，和保安会进行斗争，他积极联络同盟会会员柳大年、张根仁等，于11月17日在奉天成立“联合急进会”。会上推举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为副会长，吴景濂、钱拯、左拯之为

参议。张榕在宣布“联合急进会”的政治主张时说：联合急进会“尊重人道主义”，“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至于清帝退位，“尤为吾党所赞成”^⑦。

“联合急进会”成立后，发展很快。“四方豪杰，入会者十余万人”^⑧，在东北各地力量很大。但张榕没有乘奉天城内反动势力空虚之时发动武装起义，而是首先与赵尔巽进行谈判。张榕要求赵尔巽“速悬白旗，以静民心”。赵“始则含糊，终竟拒绝”^⑨。谈判决裂后，奉天城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革命派很难继续在省城进行活动。张榕等人决定先在各地举行起义，引诱省城军队出动“讨伐”，再乘虚占领省城^⑩。因此，只留下张榕等少数人居省调护，掌握中枢工作，其余人员分赴庄河、宁远（今兴城县）、辽阳、安东（今丹东）、凤城等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策划武装起义。

12月18日南方革命军代表与清廷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议和。又有召开国会的消息。赵尔巽与张榕相约，东三省的事情，静俟国会解决，在这期间彼此不得开战。张榕遵守南北谈判的停战条约，并允许在停战期内，不搞军事举动。当时“联合急进会”交通部长洪东毅已组织四千余人准备在抚顺一带起义，因奉张榕电令而停止^⑪。赵尔巽却背信弃义，撕毁协约，乘停战期间镇压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联合急进会”。并在宁远逮捕了该会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等重要人物。又面谕张作霖“随时访查首要人等，捕拿送案，以遏乱萌”^⑫。张作霖在赵尔巽的指使下，磨刀霍霍，准备暗杀张榕。

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有意邀张榕、张作霖到德义楼吃饭。宴毕，袁金铠兴辞而去。张榕与张作霖同出德义楼，张

作霖的便衣特务尾随其后，用手枪将张榕击毙。张榕中弹后，大声叱骂赵尔巽等。“至死，怒眦尽裂，露尸一昼夜，目未瞑也”^⑧。时年二十九岁。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给张榕举行了追悼会。

张榕好诗文，尝以辽鹤二字署其诗。他的朋友搜集印刻了他的诗集，题曰《辽鹤集》。他的诗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

注：

① 《张振声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③④⑧⑬ 《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⑤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14日。

⑥ 《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3页。

⑦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4日。

⑧ 《盛京时报》，1912年3月16日。

⑩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28日。

⑪ 《洪东毅事略》，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⑫ “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等人的呈文”，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白毓昆

徐辉琪

白毓昆字雅雨，号铎玉，辛亥革命时期滦州起义烈士。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1868年4月17日（清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祖父和父亲都是教师，祖父且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白童年进塾读书，十八岁补县学生。同年被江苏学政王先谦选拔到江阴南菁书院研读旧学及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

白毓昆于南菁书院结业后，“绝意仕途”。以后到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和澄衷学堂任教席。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白逐渐受到革命思想影响，觉得“不可不革命”^①。他以“地理学救国”为志愿，专注中国地理学研究，并“以阐发民族观念为主旨”，自编教科书，由震东书局公开出版发行。由于白毓昆在地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力求贯穿革命宗旨，成为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爱国地理学者。

1908年秋，白毓昆接受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北洋法政学堂聘请，携家到了天津。

白毓昆到津后，继续以地理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1909年9月27日，他邀约张相文等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并亲任编辑部长，于次年1月编辑出版《地学杂志》。该杂志通过对祖国地理山川的介绍，隐喻清政府的丧权卖国。又配合边

界交涉事件绘制相应地图,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同时,白毓昆对清王朝“预备立宪”的欺骗宣传和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不满,开始直接投入革命斗争。1910年,天津学界准备向清政府发起请愿,他认为是“与虎谋皮”,力加劝阻。随后,他结合志士,“谋革命益急”^②。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白毓昆认为京师是“清室的根本”,如果“京师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③。因此,积极主张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以加速清王朝的灭亡。他先组织了“红十字会”,借以集众演说,进行革命宣传。接着,于10、11月间同胡宪、凌钺等组成“天津共和会”,自任会长,作为密谋起义的“总机关”。在此期间,白毓昆在女会员的掩护下,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参与策画,输送炸弹,并广派会员分赴各地联络民团。“共和会”很快成为活跃在北方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

这时,驻防滦州的清军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由于统制张绍曾截留南运军火和通电要求“立宪”,被清政府逼迫离职,广大官兵极为愤懑,开始倾向革命。白毓昆立即把争取滦军起义作为“共和会”的主要活动目标,派会员凌钺等前去鼓动。凌等到滦后,“日夜宣传,不少休息”,还专门组织了“敢死队”^④。

11月24日,湖北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为组织北方响应起义,来到天津。白毓昆当晚与胡取得联系,次日即偕孙谏声等到胡处讨论滦军“响应革命事”。同时,白还向胡表示了他对汪精卫的愤慨,说汪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就是与袁世凯“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⑤。随后,积极参加了胡鄂公发动起义的组织活动。12月2日,京津地区各革命

团体代表在天津组成总指挥处，他被举为交通部长兼滦州指挥之一。14日，又与胡鄂公作为同盟会代表^⑤，同其他革命团体正式组成“北方革命协会”，宣布“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⑥。

由于清政府和袁世凯的疯狂镇压，加之汪精卫又“使人四出阻止”，甚至诬蔑起义群众为“匪类”，革命党人这时在北方的起义、暴动计划迭告失败。白毓昆悲愤交加。为挽救革命，他决意策动滦军迅速起义，遂令其妻、子南归，于31日只身到了滦州。

白毓昆在妻、子离津时，把发动滦州起义的“密函”亲手缝入其子内衣，让他面交沪军都督府钮永建。其计划是：革命军即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断绝京奉铁路，然后会同滦州义军直捣北京。白到滦后，首先说服军警赞同起义，然后与二十镇七十九标一、二两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会商，并向下级官佐和士兵反复陈说利害。时王、施已倾向共和。1912年1月2日，滦军遂宣布独立，随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

滦州起义发生后，袁世凯急调军队前往镇压。白毓昆不顾胡鄂公的阻拦，“必欲与清军一战”。4日晚，他同王金铭、施从云率军向天津进发。次晨三时与清军激战于雷庄。清军伪示停战议和，王、施不听部下劝阻，前往谈判，遂遭杀害。白毓昆带七、八人乘间从小道冲出，走到古冶不幸被俘。

白毓昆被捕后，在反动派面前，直言不讳自己是北方革命军参谋长，并慷慨陈词说：“吾为国充兵，吾自当为国死，今被逮，吾何讳为！”“我死不足惜，惟诸君今为满奴，异日且为外人

牛马，痛何如之！”^⑧受刑时，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令他跪下，他怒目瞪视，坚不下跪，说：“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之，何迫辱为！”^⑨7日，壮烈牺牲。白毓昆就义前曾赋诗一首，最后四句为：“希望后起者，同气志相连。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

民国成立后，白毓昆烈士的遗骸归葬家乡狼山，参加葬仪者数千人^⑩。

注：

- ① 吉乐：《白毓昆》，《中华民报》1913年2月25日。
- ② 罗正绅：《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367页。
- ③ 同②。
- ④ 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第426页。
- ⑤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8月版，第82页。
- ⑥ 关于白毓昆参加同盟会的时间，无文字记载，经多方查证，亦难确定。
- ⑦ 同⑤。
- ⑧ 同②，第368页。
- ⑨ 同⑧。
- ⑩ 江谦：《南通白烈士墓铭》。

范 筑 先

姜克夫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夺魁。1881年12月12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山东馆陶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九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父病故，辍学在家务农。壮年曾为脚夫，推独轮车为地主家运粮，来往于鲁西及直南各县。

1904年卫河泛滥，无法谋生，适清朝扩编北洋军来鲁西招兵，范遂弃农到马厂投军，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备补兵”。不久升为“副兵”。由于他有一定文化，被选拔入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回队后升为正目。以后又选调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深造，结业后回部队升为哨官。民国成立后，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范任炮兵连长，仍驻防马厂一带。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杨善德率第四师进驻沪杭铁路沿线。以后范筑先在这个部队中逐步提升为炮兵营长、补充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第四师隶属于浙江督军卢永祥。孙传芳出兵抄袭了沪浙联军后路，卢永祥失败下野。孙传芳拟收编第四师，范拒绝收编，尽发军中公积金给士兵，将部队遣散，改名为“竹仙”隐居，后遂以“筑先”为名。

1926年冯玉祥配合北伐，师出潼关。范受冯部第十三军

军长张维玺(范的同村人)的邀请参加西北军,任参赞。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范任张维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赞,协助张指挥本军与蒋军何成济第三军团激战于京汉路漯河、北舞渡一线。后阎、冯失败。张维玺率南路军六七万人集结在新郑,正待往陕甘退却,不料孙良诚第二路军的梁冠英、吉鸿昌两个军被蒋收买倒戈,蒋军通过梁、吉两军阵地,直插张维玺军后方,将张部包围缴械。张和范遂离军去天津。

1931年范筑先由张维玺介绍回山东,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县长。由于范为官清廉,断狱公平,为地方所称颂。1936年冬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我东北,范目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为愤懑,积极寻找救亡图存道路。一度寄希望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但很快发现“乡建”并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正在苦闷彷徨之际,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给范思想上很大震动。西安事变后,彭雪枫奉周恩来命到华北联络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共同抗日。1937年春彭到了聊城,利用原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同学的关系,与范的亲信张维翰、牛连文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向范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与范建立了统战关系。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大批中共党员和抗日救亡团体成员流亡到济南。为了开展山东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以华北救国会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在济南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爱国青年,办了个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作动员民众准备。10月初,日军进入山东境。范筑

先希望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通过原在专署任职的共产党员的联系，从训练班中挑选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学员二百四十名为政训服务员，到聊城开展工作。但当这批青年于16日傍晚到达聊城时，范筑先已接到了韩复榘要他率部向黄河南撤退的命令。他决定遵令撤退。当时有张承先、陈中民等四十二名服务员坚持要求留下抗战，范表示同意，发给他们枪枝和生活费，于17日拂晓撤出了聊城。范在撤退途中目睹自己家乡遭受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惨景象，内心深为痛苦。经过跟随撤退的中共党员的争取，范决定暂停齐河官庄一带观望形势。这时，南京统帅部命令宋哲元率第一集团军渡河配合太原会战反攻邢台。范又返回聊城。

范筑先10月21日从官庄回师，他一面命令政训处长张维翰和参谋长王金祥率政训处与专署人员回聊城安民，一面自率保安营追剿裹走服务员、抢劫聊城的溃兵齐子修部，在武城将齐部包围，收编为保安第三营。随后，范回到聊城，逐步恢复各县政权。同时在中共山东省委驻聊城代表张霖之和鲁西特委协助下，派政训干事率服务员去各县设立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办事处，作动员民众工作。

11月中旬，宋哲元军反攻邢台失利，经鲁西北南撤，日军跟踪追抵临清、馆陶，人心惶惶。韩复榘又令范筑先退守黄河南岸。范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于19日在博平韩官屯发出了“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拒绝了韩的乱命。

当年冬天，日军即分别由临清、高唐向聊城进攻。范筑先亲率部队截击于梁水、柳林、南镇等地，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委派的旧县长纷纷携款潜逃，CC派和乡建

派的一些官僚、政客，携家带眷逃向黄河南；国民党反动统治顿告瓦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此危急时期，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组建游击队；绿林武装乘机蜂起，打着义勇军旗号围攻地主围砦；地主民团为保护财产也纷起自卫。范筑先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把这些力量集聚在抗日旗帜下，收编为抗日游击支队。同时，委派坚决抗日的政训处驻县干事为县长和支队司令，以建设抗日政权和武装。

1938年春夏之交，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雏形。当年春，鲁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三次对濮县、范县的进攻，驱逐了堂邑、高唐的伪军。6月间，范筑先与率部东来的徐向前、宋任穷在威县会晤，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从此，范部获得了八路军的援助，不再是孤军抗战了。这时范的抗日武装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计五万余人，控制了鲁西黄河两岸，建立起二十多个抗日县政权。

当年夏，日军溯长江西上，开始围攻武汉。范筑先积极执行武汉统帅部命令，亲率十几个游击支队，于8月13日和9月18日两度进攻济南，破击宁阳至德州的津浦铁路。范之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8月28日于齐河坡赵庄之战牺牲。

正当鲁西北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也日益加剧。继韩复榘之后，沈鸿烈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设省政府于曹县，不断寻找借口，撤换范委派的进步青年县长。当时，中共地方党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未能支持范对沈的反动措施坚决予以抵制。徐州失守后，沈鸿烈把省政府迁到东阿。6月间日军陷东阿，沈

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共产党人从团结抗战出发，建议迎沈来黄河北。范亲率部渡河，在东阿黄庄打败日军，迎接沈来聊城。沈将省政府设于寿、阳、阿三县交界的张秋镇。他凭借其省主席的地位，向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如要求范取消“游击司令”名义，要求改组政治部，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支队、政治干部学校等等，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沈成立以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为首的鲁西部队整编委员会，妄图将范的部队改编为省属保安旅，遭到范的拒绝。在公开要求碰壁后，沈通过他的参谋长廖安邦和李树椿施展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收买了王金祥。王背着范于10月初在鄄城解散了中共直南特委组建的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枪杀了中共党员十三支队副司令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中共鲁西特委为此提出抗议。范本已决定撤销王的参谋长职务，但由于李树椿出面向范请求，范一时犹豫，准许王立功赎罪，在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民智未开，野心家愚弄农民组织红枪会等封建迷信武装，名为防匪，实则背后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操纵。沈鸿烈和李树椿也利用这类组织，串通敌伪破坏抗战。8月初旬发生长清县巨镇黄沙会暴动，10月中旬发生阳谷七级镇“忠孝团”暴动。虽经范亲自去当地说服平息，但10月下旬长清赵官镇又发生了以邱作成为首的黄沙会大暴动。邱自称九县剿共司令，公开提出“打倒范筑先，驱逐共产党”口号，范派了四个支队进剿，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力量坚持冀鲁两省敌后的抗战，派朱瑞来南宫，于9月23日举行冀鲁两省联席会议。会上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企图制造分裂，

联合反共。范筑先义正词严地抨击了他们破坏抗战的滥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他抛开沈、鹿，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北两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为了贯彻南宫会议精神，他回聊城后于10月4日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鲁西特委以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提出的《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作为今后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上决定把三十多个支队整编为四个纵队，除齐子修部编为第一纵队，范自兼第四纵队外，另由袁仲贤、张维翰分任二、三纵队司令。

军政联席会议的成功，表明范筑先公开和国民党顽固派摊牌。沈鸿烈等气急败坏，竟不惜勾结日伪，准备对范下毒手。他们派兼任鲁西行辕参议的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长衡去济南，与日本驻济南特务机关联系，商定了发动会道门暴动、配合日军进攻聊城的计划。赵回阳谷后，由李树椿亲自召开“忠孝团”长会议，于11月中旬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掀起了数万人的“忠孝团”大暴动。他们阴谋请范筑先前往安乐镇对会徒作宣抚讲话，就地将范刺死。恰巧范由于部署军务，临时派曾任四区专员的韩多峰代他前去，结果韩替范挨了一枪，范侥幸免遭毒手。

差不多在寿、阳、阿会道门暴动的同时，驻济南日军末松师团派平田大队发动了对聊城的进攻，驻禹城、大名的敌人也配合进攻。11月13日下午，平田大队步、骑、炮兵三百余人从东阿鱼山渡过了黄河，由于沿途未遭到驻军的抵抗，14日上午九时即到达距聊城十八里的明王官屯。范正要出城指挥作战，李树椿突然坐汽车来到聊城，借口谈问题把范缠住。延

至中午，敌机来聊城上空侦察。不一会，城外枪炮声大作，敌人已经来到。原来部署防守东关和运河渡口的王来贤民军一路放弃阵地逃走了。王金祥趁机提出由他出城追赶部队，溜出了聊城。接着，李树椿也上汽车从北门溜走。这时已是下午三时，范要出城，四门已被敌军封锁。他不得不亲自指挥守城，以待黄昏后再设法突围。黄昏前，敌人对东、南两门猛烈攻击。由于范亲自指挥，守城部队勇敢抵抗，敌均被击退。但守军力量毕竟单薄，必须突围方可脱险。如城外有部队接应，突围还是有希望的。无奈范部的主力第二支队去东平扩军，特委的主力第十支队在汶上、宁阳协助地方党开辟工作，均赶不回来；济南前线和黄河各口的十几个支队又被红枪会暴动所阻拦；鲁北驻军也被日军攻击；而堂邑、博平的两个支队系民团改编，不敢对日军开仗。王金祥出城后也不积极组织城外部队反攻。这样，破城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15日黎明，日军对聊城东门守军发起了猛攻，并以飞机沿城墙扫射。范筑先和姚第鸿率执法队亲自督战，范左臂负伤。上午九时东城门被炮火击毁，敌人蜂拥入城。范裹创退至市中心光岳楼，继续抵抗。但被日机扫射，打断腿骨。在抬送天主堂医院路上，范不愿被敌人俘获，勇敢地举枪自戕。随后守城部队即陷入混乱状态。一部分部队散在城内和敌人巷战；大部分部队退聚西城门外瓮城，企图夺路突围不得，均跳河而死，没有人投降。

1938年11月15日下午四时，敌人完全占领了聊城。范筑先和僚属张郁光、赵佩川、崔芳德、姚第鸿及守城军民七百人壮烈殉国。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企程:《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8月13日。
- ② 姜克夫:《我所知道的范筑先将军》,武汉《全民抗战》1938年8月27日。
- ③ 李士钊:《范筑先将军血战聊城》,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1月11日。
- ④ 姜克夫:《抗日根据地鲁西北地区》,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7月版。
- ⑤ 齐鲁(燕铭):《纪念鲁西北的大星——范筑先先生》,重庆《反攻》半月刊,1940年11月30日。
- ⑥ 高衡:《鲁西北抗日英雄是谁谋杀的》,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
- ⑦ 徐运北:《国民党如何破坏鲁西北根据地》,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3日。
- ⑧ 张维翰:《回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鲁西北革命斗争回忆录》,聊城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1980年编印。
- ⑨ 宋哲元:《西北军志》,《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
- ⑩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程 璧 光

郭 烙

程璧光，字恒启，号玉堂，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父亲程培芳在美洲经商，1871年歿于檀香山，程璧光扶柩归里。营葬后，迫于生计，往福建依靠姐夫陆云山生活。陆时任靖远舰管带，命习航海术。程璧光十五岁入马江船政局的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当扬武舰见习生，后历任超武舰帮带、元凯舰管带、福建水师学堂教习、广甲舰帮带、广丙舰管带等职。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属广东水师。1894年，广东水师派程璧光为粤舰领队，率领三舰北上会操。会操毕，中日战争将爆发，粤舰被留作后备力量。程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率领粤舰赴前线作战。李鸿章许之，于是三舰编入北洋舰队参战。程璧光奉命率舰护陆军东行，在大东沟洋面与敌舰接仗。一次，立广丙舰上指挥作战，腹部受伤。

黄海大战后，李鸿章即采取“保船避战”的方针，命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港内，不准出海作战。1895年1月，日军进犯威海卫，月底，威海卫南北炮台均沦入敌手。日海军堵塞威海卫东西港口，由海陆发炮夹攻，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遂陷于绝境。提督丁汝昌下令各舰管带沉船殉国，或冒死突围，士兵哗噪抗命，各管带亦拒绝执行。丁汝昌不得已，2月11日服

毒自杀。丁死后，海军副提督英人马格禄(Melure)，伙同美国顾问浩威(Howie)^①，借丁汝昌名义作降书，派程璧光向日本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投递。这是他一生对人讳言的事。

甲午战争后，程璧光被解除官职返里。

在这以前，孙中山在广州策划革命时，经常与陆皓东、郑士良等聚谈时事，程璧光与其弟奎光因与孙中山同乡关系，时常参加聚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春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时任镇涛舰管带)入会为会员。程璧光解职返里后，孙中山着奎光约他见面，劝他入会。程璧光初表现犹豫，经其弟力劝，才答应入会。同年10月，兴中会起义的计划泄露，孙中山出走，程奎光与陆皓东等被捕牺牲。程璧光惧牵连，逃到南洋槟榔屿，久久不与革命党人发生关系。

1896年春，李鸿章出使赴欧，路过槟榔屿，程璧光请见。李问程何故南来，程答：“甲午之役全军覆没，朝廷方降罪矣。”李说：“此大事于一人何尤，且归，吾当为君电解之。”^②于是程璧光回国，复职于海军衙门。

同年5月，李鸿章推荐程璧光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1899年，程璧光率海天、海圻二舰回国，担任海容、海圻等舰管带。以后又调任北洋营务处会办。1907年，陆军部内设海军处，程被任为船政司司长。1909年，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南北洋海军统一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1910年冬，清廷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程璧光任第二司司长。载洵对程相当倚重。

1911年6月，英皇乔治第五行加冕礼，清庭派贝子载振

为大使，程璧光为副使聘英致贺。事毕，程又奉命率舰前往墨西哥、古巴慰问华侨，道经美国，曾入谒美总统。这时，清廷在英订造的肇和、应瑞两舰造成，程奉命从古巴再到英国，率领两舰回国。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程璧光尚在英未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使其主持海军之议。伍廷芳等电促他速回。但他延宕到1912年夏才回到上海，袁世凯早已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了。程见此情况，遂辞去一切职务，闲住在上海。但袁对他住在南方很不放心。1913年春，派员邀他入京，聘为海军高等顾问。继又任他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议。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迹渐显露，程璧光内心很郁闷。1915年秋，他曾给朋友写信说：“惟时势不佳，实足令人厌世，恨不得早死为快也。”^③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黎元洪早年供职水师时，曾在广甲舰任管轮，为程璧光属下。此时，极力推荐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得国会通过。程在以后的“府院相争”中，站在“府”的一边，成为黎元洪的支持者。

1917年4月，在对德宣战问题上，黎、段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施加压力，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入京，于25日举行军事会议。海军总长程璧光与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被邀出席。段宣布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后，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张“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签名单塞给出席者，让大家签名。各省区督军或代表，皆仰承段的意旨，签署“赞成”。惟程璧光写：“如国会一致，当服从多数民意”^④，使段很不高

兴。其后，参战案经国务院提交众议院审查时，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演出“公民团”包围议会，殴辱议员的闹剧。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大哗。程璧光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等向段建议内阁引咎总辞职，被段拒绝。于是当天晚上，程璧光等四人分别向总统提出辞呈，使原来就残缺不全的段内阁只剩下“总理”一人。到5月23日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总理职务后，北洋系各省督军在段的唆使下，纷纷宣布独立，并准备以武力逐黎。程璧光见事机危迫，即电飭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舰驻扎大沽，表示对黎的支持。6月初，程曾请黎离京南下，愿率舰队护送，黎不同意。程不得已先行出京，9日抵沪。当日即召集各舰舰长开会，研究对付叛督办法。

自段祺瑞当国，挟督军团乱政以来，西南各省及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都站在同情黎的方面。程到沪后，与当时在沪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三人有所接触，研究共同拥黎反段的办法。孙中山曾为海军筹措军费，鼓励程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6月，张勋北上，国会被迫解散。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程璧光在沪闻讯，派军舰三艘北上秦皇岛，想迎接黎元洪南下，未成功。3日，程与松沪护军使卢永祥联衔发表了声讨复辟、拥护共和的檄文。

当段祺瑞在北方布置圈套，引张勋上钩，又以讨逆英雄自居，拒绝恢复约法时，孙中山在南方酝酿的护法局面略有头绪。7月上旬，孙中山、章太炎等乘海军军舰先行赴粤。21日，程璧光与林葆懌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州，翌日，海军自主宣言

自沪发出。宣言否认国会解散后的非法政府，提出三项主张：（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三）惩办祸首。这是程璧光在孙中山示意下发出护法的第一声。当时海军第一舰队拥有较大的巡洋舰，是海军主力。南下护法的第一舰队军舰先后有海琛、海圻、永丰等八舰，连同原驻广州的楚豫、永翔二舰共计十舰。舰队南下途中，段祺瑞着萨镇冰、刘冠雄来电劝诱北归，程、林未予理会。海军的这一行动，使护法声势加大，也使北洋军阀大为震惊。

第一舰队抵粤后，受到各界的欢迎。同时国会议员即纷纷南下。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0日，军政府宣告成立，程璧光任海军总长。

广东当时是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炯明为广东督军。但又有李耀汉、李福林、魏邦平等广东地方势力。桂系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不干涉，实际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在这几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程璧光由于兼有广东人、国民党元老和桂系的朋友三种身份，受到各方面的拉拢，成为调和派。

先是，广东省长朱庆澜（当时倾向孙中山）有警卫军二十营，称“省长亲军”，由陈炯明任“亲军”司令。8月中旬（海军抵粤不久），朱庆澜忿桂系排挤，邀请程璧光、李烈钧、陈炯明密谈，打算把“亲军”改编为由程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免为桂系吞并。8月26日，朱被排斥下台，“亲军”二十营被陈炯明强行接收了去。与此同时，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义派傅良佐代谭延闿为湖南督军。9月9日傅良佐到长沙，湖南形势日急。到这时，陆荣廷才感到北军南犯，有侵犯桂系地盘的危险，必须调

整与孙中山军政府的关系。10月2日，陆邀请程璧光到南宁举行会谈。决定了两广当局联名讨段、援湘的计划。由程璧光、陈炯明、谭浩明、李耀汉通电声讨段祺瑞的罪行，提出迎黎复职、恢复国会等主张，并任谭浩明为援湘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通过程璧光这条渠道，11月陆荣廷又邀军政府大元帅代表举行梧州军事会议。陆同意了把二十营省长亲军交由程璧光节制、陈炯明指挥，去福建开辟进攻北洋政府的第二战场。

两次会议后，桂系表面与军政府合作，暗中却玩弄联冯制段的花招，向北方伸手求和，并处处与孙中山为难。孙中山气极了，想用海军驱逐粤督陈炯明。因程璧光不主张与桂系决裂而未实现。1918年1月3日，孙中山直接密令豫章、同安二舰舰长炮击观音山督军署。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电请程璧光调处。程急忙命令两舰停止炮击，并将两舰舰长撤职。

军政府与桂系之间的矛盾，虽到了几乎决裂的程度，但1月下旬，湖南方面的桂湘联军进攻北军，收复了岳州；同时在广东方面，桂军林虎、沈鸿英等部对受段祺瑞驱使的龙济光也展开了进攻，这是孙中山系国民党人所欢迎的，于是矛盾又暂时缓和。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进驻汕头，方声涛率滇军进驻潮州，准备开辟福建战场，以与湖南战场相配合。程璧光原决定率各舰出发，协助征闽，及闻讨龙战争开始，遂调遣军舰游弋北海、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海军的活动，使从琼崖登陆的龙军与其根据地失去联系而败退。

孙中山的军政府在法理上应是护法各省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事实上两广、滇、黔、湘皆是自主的独立王国，各省军阀

自行其是，使军政府形同虚设。而程璧光虽名义上为军政府海军总长，但他更多地迁就地方军阀，与孙中山精神很不协调。1917年冬，唐继尧、岑春煊、李烈钧等有组织西南各省联合会以谋护法各省之统一的倡议。岑、唐以及陆荣廷是想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职权，并准备与北京政府妥协谋和。1918年1月，公布了条例，并开了成立会。对此会的成立，程璧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条例一经宣布，就遭到国民党人的反对和章太炎的痛骂，被称之为“李完用第二”。

联合会议搁浅，滇、桂军阀又与政学系议员、益友社员相勾结，策动以联合会与军政府合并，把军政府改组为合议制，以削弱大元帅的权力。程璧光为此向孙中山疏通，并于2月2日邀请孙中山、莫荣新等在海珠开会商讨，使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同意。

当军政府酝酿改组期间，广东军人李福林、魏邦平、翟汪等人，借口龙济光部尚未荡平，电请陆荣廷以莫荣新专任讨龙军总司令，而以程璧光兼任粤督。这是广东地方势力以“粤人治粤”的口号，排斥桂系势力的表示。正当酝酿改组军政府及呼吁广东易督之际，2月26日下午八时，程璧光被人刺杀于广州海珠（海军办事处所在地）对岸，弹中胸部，即时殒命。当时一般疑此案系桂系军阀所为，实则刺客肖觉民、李汉斌系朱执信所派遣。^⑥军政府大元帅追念程璧光护法之功，在广州海珠公园建立铜像，以资纪念。遗体于1919年1月葬于江苏宝山。

注：

- ① 参谋本部编：《甲午中日战争纪要》说浩威为英国人。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张荫麟译《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所载，浩威为美国人。
- ② 章炳麟：《程璧光》及附录《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人物志》第六集，台北1969年1月版，第234页。
- ③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二章第2页。
- ④ 同上，第三章第1页。
- ⑤ 据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中记载：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有些同志仍主张在革命低潮时期采取暗杀手段。1918年1月3日，孙中山直接密令程章，同安二舰舰长炮击观音山督军署后，程璧光曾将二舰长撤职查办。中华革命党同志对程此举极为不满，且怀疑程与陆荣廷已有默契，不久即将叛变护法政府，故朱执信派人将程暗杀。

陈 少 白

姜献阁

陈少白，原名闻韶，号夔石。1869年8月27日（清同治八年七月二十日）生于广东新会县。其父陈子桥是个乡绅，晚年加入基督教。四叔梦南亦为基督教徒，曾翻译西书供陈少白阅读，对他的影响较大。

陈少白六岁起在家课读，1884年以后从族兄心夔、翰周及陈源泉等人读经书，学做八股文。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因度量偏狭，出语尖刻，往往不易与人共事。

1889年底，陈少白因事赴香港，得区凤墀介绍，结识孙中山，时孙肄业于雅丽士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翌年1月，孙推荐陈亦入该书院学习。此后两人经常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交谊甚深，曾拜盟为兄弟。孙居长，写信给陈时皆以“吾弟”称呼。1892年孙中山毕业离校，陈因不喜医术也辍学。当时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四人常在一起谈论反清革命，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为“四大寇”。

陈少白辍学离校后，随同孙中山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孙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和开设药局，陈奔走其间，助孙维持店务。他们寻找救国道路，有民族民主思想，但也受了当时风行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1894年1月，孙中山写了《上

李鸿章书》，经与陈少白商酌修改后，于6月携至天津求见李鸿章，想对朝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李不予理睬。孙失望之余，便出走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陈少白帮助结束了孙中山遗留下来的药局事务。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革命团体兴中会。随即致书陈少白，要他在香港开展革命活动。翌年初，孙抵香港，陈少白及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均入兴中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①。同时吸收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参加。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掩人耳目。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孙中山赴广州担任军务，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等佐之，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济及财政。孙、陈等在广州以农学会的名义设总机关，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决定在10月26日（阴历九月初九）起义。结果因谋事不密，走漏了消息，致使这次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陈少白脱险，与孙中山、郑士良等东渡日本。

在日本横滨，孙、陈、郑结识侨商冯镜如等，成为同志；并建立起兴中会分会，以冯为分会长。不久孙、郑离日，陈少白在日本剪辫易服，取日名服部次郎，助冯镜如编纂英华字典及办理兴中会分会事务。同时先后活动于横滨、东京等地，与日本志士曾根俊虎、宫崎寅藏等相识。

1897年秋孙中山复至日本，陈少白与孙中山、尤列、杨衢云等人常以横滨三余轩和修竹寄庐为游息议事之所，商议扩大革命力量。陈少白曾赴台湾活动，组织兴中会分会，但会员

不多。翌年他再去台湾，筹得了一些捐款。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至日本。日本志士热心促进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康梁改良派的合作，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与康梁等人多次会谈。陈指出：“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②，劝康等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但因康有为坚持保皇的顽固立场而未果。

1899年秋，陈少白奉孙中山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他在香港租定报馆发行所，由日本购来机器、铅字，经过数月筹备，于年底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陈为报社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影响较大；针对保皇派报刊上的一些谬论进行批驳，在理论上展开了交锋。该报首次改变从前中文报纸直排长行的惯例，采用横排短行的版式，后来为国内报纸效法。陈少白还主持出版十日刊《中国旬报》。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对兴中会初期的革命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陈少白还积极从事联络会党工作，为革命积聚力量。他首先加入粤三合会，被封为白扇^③；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④。同年冬，陈少白促成哥老会首领杨洪钧、张尧卿、李云彪等到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领导人会晤。并于翌年春在港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共同组成兴汉会，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陈为实际主持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东南各省督抚谋求互保。英国政府香港当局有意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主”，派人与陈少白秘商，希望孙中山的革命党与李

合作组织“独立”政府。孙、陈等赞同此策，致函港督提出平治章程。结果因李鸿章北上，合作尝试落空。此后，革命党便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同年夏，孙中山两次乘船至港，召集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人在船上开军事会议，决定在惠州和广州同时发难，由陈等在港负责接济。《中国日报》社遂成为起义的大本营，党人出入络绎不绝。后起义失败，不少义士逃到香港，陈设法予以安置。

由于起义和善后用款较多，《中国日报》社的开支十分困窘。1903年《中国日报》并入李纪堂办的文裕堂印务公司，陈为公司经理之一，仍负责报务。1904年，陈针对保皇派徐勤在香港出版《商报》散布的保皇扶清谬论，以《中国日报》为阵地与之斗争，发论十数篇进行批判。

陈少白在主持《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的同时，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彩南歌戏班，招收青少年学员加以训练，排演《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此后，陈同戏剧界继续保持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帮助黄咏台等组成香港振天声白话剧社，亲自为剧社编写《自由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演出。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共同商量组织香港同盟会分会。他们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吸收新同志参加，于秋冬间正式成立，会所设于《中国日报》社。众举陈少白为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香港分会一向兼管西南各省党务军务以及联系海外交通等，分会长一职责任重大。

这一时期，陈少白的革命活动相当广泛。他在反对美国

取缔华工苛约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任香港各界拒约会的顾问和谈判代表。他支持港商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等人组织的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反对粤督岑春煊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的决定，在《中国日报》上仗义执言。并常常亲自为该会撰写计划、文电，倍受赞佩。

1906年8月，文裕堂印务公司破产，《中国日报》社改组，陈少白辞社长职，由新股东推冯自由为社长，陈仍负监督之责。陈同时辞同盟会分会长职，亦由冯继任。

陈少白此后热衷于经营企业。1908年他因维护粤汉路权获得酬金九千元，便以此款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产十余亩建农场，并筑房屋移家居住。1910年他又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1911年武昌首义，广东独立，胡汉民为都督，任陈少白为外交司长，但他几个月后即辞去。不久，他发起组织粤航公司，被推为总司理，收回外人所租码头一座，购买法轮两艘，航行于广州香港之间。1915年他又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19年粤航公司停办，他买下了该公司联兴街口之大码头。后来他到广州时，多居于码头事务所。

孙中山于1921年5月重返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聘陈少白为总统府顾问，同时应聘的还有尤列、杨鹤龄。孙中山令广东当局重修广州越秀山文澜阁，供陈、尤、杨居住，称“三老楼”。同年10月，孙赴广西准备督师北伐，陈随行襄助有关事务，但不久即辞职回乡。

1922年以后，陈少白在故乡新会县外海乡任民团保甲局长、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兼新会第四区区长等职，热心于整

理乡政、兴修公路、筹办中小学等乡事建设。他曾遍游南北各地名胜,吟诗撰文,1929年著述《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1934年秋因病至北平休养,12月23日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注:

- ① 郑东梦主编:《檀山华侨》第30页,檀香山1929年出版。
-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第86页。
- ③ 白扇是三合会要职之一,为该会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 ④ 龙头是哥老会山堂的首领,龙头之龙头即首领的首领。

刘 揆 一

李静之

刘揆一，字霖生，原籍湖南衡山，1878年12月3日（清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十）生。其父刘方尧务农，太平天国时被征募为湘军乡勇，后充湘潭县知事公署刑房差役，称籍湘潭。由于职务关系，他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刘揆一也因此和哥老会中人早有交往。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湘潭附近活动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遭清政府搜捕。刘揆一奉父命向马报信，马得免于难，二人从此建立了友谊。刘也因此而成为以后华兴会、同盟会和会党之间的一个联系人。

刘揆一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清政府开放留学后，他于1903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他与黄兴结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进行反清活动，并一起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同年6月，“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①并且介绍了马福益的情况。当即决定由刘揆一与马联

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不久，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11月4日，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了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了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1904年春，刘揆一、黄兴与马福益在湘潭秘密会晤，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的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起义主力为省城武备学堂学生中的华兴会员及其联络的军队。同时发动各地会党分五路响应，并派同志分别到湖北、江西、四川进行联系，在宁、沪策应联络。会后，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活动的经费。他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浏阳普集市例开牛马交易大会，参加者达数万人，半数是哥老会员。哥老会把这天作为拜盟宣誓的日子。同仇会选定这一天为马福益举行少将授与仪式，由刘揆一代表黄兴给马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并监督宣誓。“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②，革命声势大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元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11月初相继逃亡上海，马福益亦逃往广西。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黄、刘抵

沪后，在英租界余庆里十二号华兴会秘密联络机关，重新聚集党人，共谋再举。不料11月19日在上海发生了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余庆里机关遭破坏，黄、刘又被迫离沪，亡命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与黄兴会晤。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但东京的华兴会成员对合并有不同看法，黄兴在7月29日邀集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商谈，刘“主张不入孙会”。由于意见不能统一，最后决定入会与否，听任个人自由^③。刘揆一因持异议，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参加，直到1907年1月，他才加入。2月，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刘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留驻东京，直到辛亥革命。其主要工作是筹划会务，发展会员，为前方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等。

这时，同盟会领导涣散，内部几次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作了一些排难解纷的工作。1907年6月，章炳麟、张继等在东京就孙中山离日前接受日人赠款及潮、惠起义失败等事攻击孙，要求刘召开会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刘揆一认为，孙中山“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而且孙、黄当时正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④。因而力排众议，没有同意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接着刘师培又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援引日本社会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

郎充本部干事，刘揆一又予以制止^⑤。面对同盟会东京本部日益严重的混乱状况和倒孙风潮，刘揆一曾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请他们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孙拒绝^⑥。这时，黄兴也给刘揆一等写信，解释经费的用途，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同时拒任同盟会总理，倒孙风潮才暂平息。1909年9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发表“七省同盟会员匿名书”，列举孙中山“罪状”，进行攻击。11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申辩，又以同盟会庶务名义，发表致各报社通函，否认陶等函件的效力，使陶等谋划未能得逞。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回国。清政府为镇压革命军的起义，起用袁世凯，调北洋军猛攻汉口。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赶到汉口，亲赴前线督师，刘也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的任务已完成。刘揆一也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主张把同盟会和各立宪派组织的名义“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⑦。1912年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刘为十干事之一。同盟会阁员与袁系阁员一起，组成了民国第一任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内阁”。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后，公然违背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宋教仁为了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辞去农林总长职，同盟会其他阁员也一齐退出内阁。刘揆一不同意这种做法。8月2日，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当了陆征祥内阁的工商总长。为了不受同盟会关于

⑤

会员不得参加非政党内阁的决定约束，他在8月8日报脱同盟会。启事称：“此次置身国务员中，虽实行个人主张，亦以国势所趋，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只得自请脱党。”^⑧25日，同盟会改名国民党。9月，陆征祥辞职。国民党推举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总长。他又表示：“我本系老同盟，若全体加入，我自然复党。”^⑨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刘揆一南下上海吊唁，遭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员冷遇。返京后他另组“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⑩。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总长职。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全国纷起讨袁，刘揆一也响应参加。1916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刊登反对帝制的言论。3月，报馆因此被查封。^⑪

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一度担任国会议员，到1918年国会解散。此后便没有固定职务。

五四运动前后，刘揆一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前夕，他曾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徬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1929年出版了《黄兴传记》，记述了黄兴革命活动的历史。1932年他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

1933年，蒋介石邀请一些名流、学者参加政府工作，刘揆

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九一八”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从此，他隐退家园，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绝少往来。

解放后，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1950年11月1日，刘揆一在湘潭病故。

注：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页。
-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民国十七年版，第165—166页。
- ③ 《宋渔父遗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9页。
- ④ 同①，第289页。同②，第201—202页。
- ⑤ 同②，第202页。
- ⑥ 同①，第289页。
- ⑦ 荣朝申辑，《缔造共和之英雄尺牍》卷二，中华民国元年上海朝记书庄印行，第3页。
- ⑧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8日。
- ⑨ 《远生遗著》卷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第156页。
- ⑩ 谢彬，《民国政党史》，《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3—594页。
- ⑪ 《民国日报》，1916年3月12日。

田 桐

徐辉琪

田桐字梓琴，笔名恨海，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县人。1879年12月25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田士莲是个穷秀才，在本地设塾教书。田九岁从父入塾，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但不喜八股文章。二十二岁补县学生。是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同学。田目睹外国侵略和清王朝丧权辱国，开始“肆谈革命”。1903年冬，他在考卷上“鼓吹革命”，被教员告密，巡抚端方认为“大逆不道”，责令“从严惩办”，被学校开除。随后，他离国赴日求学。

在日本，田桐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人。在留日学界高昂的革命情绪鼓舞下，更加自觉地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904年夏秋之交，他邀约白逾桓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杂志后在宋教仁等人参与下，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于促进各革命团体的联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田桐热烈拥护，并积极动员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百余人加入，成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他被举为评议部议员。不久黄兴荐其任书

记部书记，负责会内机要。

同盟会成立后，田桐抱着“不灭清胡死不休”的决心，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他为激发人们的“覆清之心”，搜集明末遗老有关抗清记述，编辑出版了《亡国惨记》。是书“字字悲哀，字字泪血”，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徇清政府之请，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他愤激异常，四出联络，以谋抵制，并在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斗争。1906年5月，又与柳亚子等创办《复报》，与《民报》相呼应。由于田桐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活跃，是年被清政府下令缉捕。直到1909年，宣统即位颁布赦免“上谕”，他还被宣布为不能“开复”。

但在此期间，田桐对思想战线上反对立宪派的斗争缺乏应有认识。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①。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发动潮州、黄冈起义，令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欣然而往，于7月抵达香港。但这时黄冈之役已经失败。11月，他与何克夫等携革命军债券前往参加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不幸为法吏拘捕。年底被迫令出境，孙中山派他去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他与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文战经年”，使《中兴日报》成为南洋革命党人反对改良派和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次年，应荷属侨商邀请，到泗水创办《泗滨日报》。其间，曾一度参与陶成章等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后因披露荷兰殖民者虐待华侨

罪状，被强令离境。田桐鉴于南部边省举义连遭失败，决意实行“中央革命”，遂于1909年下半年隐姓埋名潜入北京。到京后，他一面创办《国光新闻》报，“倡导民权立宪”；一面密与景定成、井勿幕等联络北方革命志士，伺机起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田桐经上海随黄兴到武昌，任参战员。在保卫汉阳的战斗中，他临危不惧，受到黄兴“智计亦大过人”的赞誉^②。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黄兴派他与时功玖代表武昌一地的同盟会员前往上海“接待”。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田被任为内务部参事。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又被举为参议员。

田桐对袁世凯的窃权极为愤懑。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到北京继续办《国光新闻》，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猛烈抨击。袁曾派田的旧友农林部次长张昉持重金收买田，他断然拒绝，致险遭暗害。6月，共和党机关报《国民公报》诬称南京政府为“假政府”，他忿然不平，与白逾桓、仇亮等将该报馆砸毁，曾轰动一时。

此时，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田桐时任同盟会总务部干事，力加反对。在7月14日讨论改组会上，他“拍案痛骂”，声言“以性命拥护同盟会三字，与民国同休”，致使会议无法继续进行。后见孙、黄亦表示同意，才不再坚持。此后，田桐变成了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③。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党徒暗杀宋教仁。田桐由湖北赶到上海，坚请孙中山兴师讨袁，斥责法律解决“不足有为”。孙中山大为赞赏，令他随张汇滔去安徽举兵讨袁。田偕张到安徽寿州后，与张旧部加紧联络，秘密策划。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张军历战月余，因孤立无援而失败。田桐再度亡命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鉴于国民党涣散无力，坚决主张另组中华革命党。田桐积极响应，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针对某些国民党要员的变节和动摇，在《民国》杂志上撰文强调“名誉”、“人格”的重要。他还远涉日本各地，说服动员党人拥护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田参加本部领导工作。10月7日又被委为湖北支部长。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进行卖国称帝活动。10月，田桐与居正等以国会议员名义发表通电，表示“誓与共和同休戚”的决心^④。并多次参加留日各界反对帝制大会，发表演说，对袁世凯大加抨击。年底，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离日归国。田到汉口后，依照孙中山“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的指示，联合当地各派反袁力量，积极发动武装讨袁。

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8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会重新召开。田桐作为众议员到北京与会，声称“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⑤。在国会中张继等原国民党议员组织“宪政商榷会”，与原进步党议员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对立。商榷会主张地方分

权,省长民选,研究会则主张集权中央,拥护段内阁。田桐与马君武等以中华革命党议员为中心,组织“丙辰俱乐部”,隶属商榷会,反对段内阁最力。当时段祺瑞企图以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极力主张对德宣战。田桐“持绝对反对态度”,在众议院提出“质问”^⑥,并为“外交商榷会”起草宣言,对此大加指责。

1917年6月12日,张勋胁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图谋复辟。田桐当晚离京赴沪,发表演说,称:“即令稍有破坏”,也要“除此奸贼”^⑦。

张勋复辟失败后,7月5日,段祺瑞复称总理。田桐与孙洪伊等致电西南各省,痛斥段为“非法伪造之总理”,请“即日出师,檄布叛徒隐蒂”^⑧。

是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田桐于月底赶到广州,9月19日被委任大元帅府参议。在非常国会内,田维护孙中山,主张出师北伐,同西南军阀、政学系排斥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田桐对爱国学生罢课斗争持反对态度,发表《告罢课学生》一文,说“罢课抗师之举动,按之生理上哲学上,非未冠者之所为”^⑨。

1920年11月,孙中山再返广州护法。田桐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韶关大本营宣传处长,直接协助孙中山从事党务和宣传活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田在韶关大本营任内,被指名索捕。就捕时,毫无惧色,厉声应道:“老子即是田桐!”^⑩

不久,田桐被陈炯明释放回到上海,适逢孙中山准备改组

中国国民党，9月6日指定他为修改党章起草委员。而这时，旧国会已经复会，正围绕制宪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田桐对国会依然抱有幻想，随即到了北京。1923年6月，曹锟开始以重金贿选总统，田拒绝贿赂，愤然离京。回到上海后，他打算组织赴沪议员自行集会，以为对抗。后因经费无着而作罢。

同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面对国民党的这一重大转变，积极追随孙中山多年的田桐，却认为“此事不可行”，起而反对。他专程跑到广州，向孙中山接连“抗争三次”。后见孙中山“改组之意终不可回”，乃将所有各职通通辞去。回到上海后，他与章太炎、居正等联名发表所谓“护党救国公函”，与孙中山公开对抗^⑩。同时，他还发表了《社会主义华北论》一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田桐致电冯等，称这次事变为“我辈谋之内阁、谋之国会十年不足者，竟以一日之工行而有余”，并提出应“专心于过渡内阁及总统、宪法问题”，以建“千载之大业”^⑪。随后他到了北京。不久，胡景翼南下就任督办河南军务，他又到了开封。

田桐在京期间，继续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元旦，他串联冯自由、刘揆一等乘孙中山卧病之际，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起“民前同盟旧友新年慰亲会”，对孙中山发泄不满。

田桐到开封原想通过胡景翼在政治上有所施展，但胡不

久病亡，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之后，他曾去陕、晋等地“漫游”，去张家口为冯玉祥讲学。1926年3月，吴佩孚率旧部向河南进攻，田桐随岳维峻部北退，为晋军俘虏。获释后到了天津。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联名谭延闿、张静江函召田桐南下。旋任为江汉宣抚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对田加意笼络。田桐接受委任，于汉口就职后，为配合北伐军事行动，募人将孙传芳运载枪械弹药的江永轮船炸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田桐看到蒋肆意排除异己，加紧军事独裁，开始对蒋产生不满。是年6、7月间，他便以劝说阎锡山与蒋合作为名，走避于山西五台山。一年后回到上海，主办《太平杂志》和从事著述。

田桐晚年在政治活动中，对蒋介石党同伐异的横暴行为日益不满。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委员、中央党史史料编纂，他一概拒之不受。并于1929年春参加了居正、许崇智等人组织的反蒋同盟。但同时，他又仇视中国共产党，拥护蒋介石“清党”，污蔑共产党实行“扰民主义”、“事必致败”^⑬。

1930年7月2日，田桐病死于上海。

田桐一生著述甚多，死后有《玄玄遗著》刊行。

注：

① 《民报》第5号。

② 田桐：《先兄梓琴先生行状》，《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31页。

③ 《中华民国名人传》（卷二），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版，第29页。

④ 《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6日。

- ⑤ 《中华新报》，1916 年 7 月 29 日。
- ⑥ 《民国日报》，1917 年 2 月 11 日。
- ⑦ 《民国日报》，1917 年 6 月 26 日。
- ⑧ 《民国日报》，1917 年 7 月 18 日。
- ⑨ 田桐：《玄玄遗著》，第 115 页。
- ⑩ 同②，第 132 页。
- ⑪ 《逸经》第 11 期。
- ⑫ 同⑨，第 123—124 页。
- ⑬ 田桐：《书清党实录后》、《共产党成败论》，《太平杂志》第 1 卷第 1 号、第 3 号。

张 凤 翔

张应超

张凤翔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2月5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初七）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菊花园（今属西安市）。其父由河南逃荒到陕西，以打铁为生，后来在西安广济街开了一家小铁器店。

张凤翔早年中过秀才，名列咸宁县同榜第一。1902年考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秋毕业，即由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考入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升入士官学校骑科，为该校第六期学生。他在振武学校上学时加入过同盟会，但他并未下定决心献身于反清事业，入会第二天又烧毁了同盟会会员证书，也没有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当时陕西留日学生有渭北派和咸长派之分，渭北派政治上比较激进；咸长派比较保守，张凤翔是咸长派的中坚人物。他能写诗做文章，但却不愿意给留日学生办的进步刊物写稿，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他写稿，他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①，一笑了之。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方设法抄录日本的军事机密转送到清政府陆军部。因有一份重要情报经陆军学生监督李士锐之手转送时，李士锐却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的名义送

回国内。张凤翔本来就对李士锐压制中国留学生的行为深为不满,得知此消息后更加愤怒,就借故打了李士锐。李士锐心中有鬼,当时虽未敢发作,却在张凤翔的毕业成绩报告中报复,致使张凤翔毕业回国后清政府不准他参加留学生考试,并给了他一年内不准录用的处分。

1909年,张凤翔回到西安家中住闲,经人推荐,在西安府衙门作缮写。1910年春被委任为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同年冬升任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接着又改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他在新军任职期间,虽未直接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但和新军中同盟会的骨干张钫交往甚密,常在一起谈论革命。西安起义前夕,他和协统刘鸿恩、二标标统周殿奎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个人处境也很危险,这也是他参加西安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以后,陕西反动当局非常恐慌,阴谋调新军离开西安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新军中同盟会负责人钱鼎和张钫得知消息,遂于10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提前起义。在商定起义总指挥人选时,钱鼎提议张凤翔任总指挥,得到大家赞同。这时,张凤翔还率部在临潼野操,钱鼎和张钫立即派人请他速回西安共商大计。10月21日下午,张凤翔率部回西安。当晚,钱鼎和张钫告知他开会经过,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各要点,即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二君共之”^②。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一举成功。张凤翔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陕西军政府随即成立。

陕西起义以后,清政府先后派遣大军从东西两路向陕西进攻,妄图剿灭陕西革命。张凤翔亲赴东西战场,为保卫陕西

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

1911年12月9日，张凤翔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

陕西新军中的会党曾在西安起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起义后张凤翔却打击排斥会党。1912年1月他致函黎元洪，请湖北派军队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2月陕西东路议和以后，赵倜所部奉袁世凯命令进入陕西增援西路民军，他又想借此力量对付哥老会。4月13日他在西安亲手枪杀了哥老会重要首领、“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万炳南，陕西各地大规模地镇压会党即从此开始。

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张凤翔为陕西都督。袁世凯窃国以后，张凤翔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向北洋政府妥协。他派人通过旧官僚江朝宗和袁世凯拉关系，排挤在陕西的民党左派人物，致使井勿幕、曹印侯、杨叔吉、胡景翼等人都先后被迫离开陕西。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各省讨袁军纷纷急电陕西，要求张凤翔起兵响应。张凤翔却坚决反对起兵讨袁，并秉承袁氏旨意通电声讨孙中山和黄兴；还电令张钫执行袁世凯的命令，率部入川镇压熊克武领导的反袁斗争。8月28日，陕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讨袁，他又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根据袁世凯指令枪杀了积极反袁的民党左派人物邹子良、马开臣，以取得袁氏信任。但袁世凯却因1913年6月孙中山和黄兴曾派人和他联络反袁（送信人杨体锐、于化卿在河南被刘镇华杀害，未到陕西），还是对张凤翔不信任，并准备伺机派亲信取而代之。

1914年白朗起义军入陕，张凤翔奉袁世凯令并亲率大军

在兰田、商县一带堵截，并枪决了进攻白朗义军失败的陕军团长岳翰林示众。7月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率大军以追剿白朗军为名入陕，随后调张凤翔入京，封为扬威将军，免去他在陕西的职务。袁世凯称帝前，授意爪牙联络知名人士上表劝进，张凤翔也名列其中。

袁世凯垮台后，他的思想有较大的转变。1917年张勋复辟，他只身赶回陕西准备组织力量反对，因陕西督军陈树藩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勋失败，他才回到北京。1924年，胡景翼派李可亭去北京请张凤翔回陕西组织力量驱除刘镇华在陕西的势力，他再次回陕。途经山西时被阎锡山发现，告知刘镇华驻山西代表，因此，他一到陕西就被刘镇华软禁，经崔云松等人奔走活动后始被释放回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闲住，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

“七·七”事变前夕，他目睹日寇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的企图与日俱增，北平危在旦夕，不愿留在北平作亡国奴，遂于1937年7月8日只身乘飞机回到西安。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和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他六十岁生日时，曾在自书的对联中写道：“少年头等闲白了，叹三十功名尘与土，人思鹏举”^③，其爱国思想可见一斑。1943年，张凤翔到重庆参加参政会，周恩来特地到他下榻的地方去看望他^④。1945年，他率领“陕西各界慰问豫西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亲赴豫西各地慰问抗日军队。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以“保护安全”为名，把张凤翔和寇遐、马彦翀等人裹胁到汉中，接着下令送往台湾，张凤翔等人坚决拒绝去台，又被送往兰州。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曾派专人

慰问他和寇、马二人。8月下旬，三人返回西安，受到陕西党政领导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翔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1958年7月29日，他因病在西安逝世，遗体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注：

- ① 党松年：《回忆辛亥革命秦陇复汉军东西路战斗始末记》。（手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 ②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回忆》。（油印本，存处同上）
- ③ 笔者访问郑自毅先生笔记。（存处同上）
- ④ 笔者访问张月昭笔记。（存处同上）

张 澜

宗志文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0年父亲病故后，继其父主持塾馆馆务。1902年被选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这时，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主张，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1906年回南充，创办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及南充端明女学。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他推辞未就；但与咨议局正、副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是至交，常跟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

1905年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名曰官商合办，实则一切由官方把持。1906年末，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实权则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清政府于5月9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的

上谕，20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在成都开会，张澜作为南充的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各府县的代表，张澜上台致答辞，鼓励群众同心协力，为保路废约而斗争。次日开股东会成立大会，张澜被推为副会长。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课，进而实行抗粮抗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借口谈判，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领蒲殿俊、张澜等人诱入督署加以逮捕。张澜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筑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①赵尔丰无言以对，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张澜凛然不屈。随后，由于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四川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清政府下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前往镇压。端方入川，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张澜等被释出狱。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张澜出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成立了护卫营，刘湘任护卫营营长。张澜到南充设立了川北宣慰使署，先后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还创办了南充皋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到北京出席会议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6月，进步党四川支部开临时大会，张澜被选为常务员。袁世凯上台后，大搞专制独裁，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张澜失望之余，重返四川，接任南充中学堂校长。护国战争打响后，张澜联合驻防川北的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大部武装民团通电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赶走当地驻防的北洋军。

讨袁战争结束以后，川军形成两个军事系统：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拥护西南方面的熊克武为首。1916年张澜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张澜为四川省长。12月刘存厚任四川督军。1918年初，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占领重庆，赶走北洋军。2月，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张澜出走。不久，到北京居住。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澜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留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开展时，他积极鼓励和支持青年出国留学。

1920年春，张澜因奔母丧回到四川。随后几年，他在故乡南充大力兴办教育，联合地方人士成立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报》，鼓吹地方自治。当时川北一带苛捐杂税很多，张澜曾公开出面号召市民和学生罢市、罢课，抵制捐税，并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对军阀官吏的贪污横行进行揭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过一些人的不法行为。

1925年7月，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督办，成为四川军政的中心人物。同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在刘湘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大学，并任张澜为校长。

成都大学设文、理、法三院共十二个系和文、理两个预科，学生一度达二千余人。张澜就任校长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方针。学校除网罗四川各方面有学识的专家来校讲课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地聘请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外语、物理等系先后请有外籍教师二十余人。在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张澜主张学习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榜样，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各党各派兼收并蓄。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1927年四川各军先后投归国民党，和蒋介石一起公开反共。此后，四川各学校一律要进行党化教育。张澜不以为然。7月24日，学校出了一张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②。

当时成都大学社团林立，但主要是三大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二是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三是国民党的健行社。张澜说，他主张各派争鸣。在他的支持下，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1928年2月，成都反动军警借口学生闹事，制造了二·一六惨案，屠杀学生十四人。其中有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六人。张澜愤而辞职，经全校师生挽留才复职。复职后，他立即派人通知一些离校的进步学生暂缓到校，以免被害。另一方面，他又限定学生在校内只能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不能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国民党特务却连这种研究活动也不许可。他们用各种方法打

击张澜所主张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终于迫使张澜不得不于1930年下半年离开学校。

张澜回到南充后，继续办中小学教育。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居杂感》中描述当时教师的境遇说：“乡村学校尽萧然，旧款犹亏新款悬！多少教师饥欲死，还须忍苦待来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土沦亡，他满怀忧国忧民的感情，又写诗说：“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奉蒋介石之命进行阻击。与此同时，刘湘成立了安抚委员会，聘请张澜任委员长。红军长征离开川北后，张澜率调查组前往川北一带进行调查。当地农民有口皆碑，无不称颂共产党和红军，使张澜受到很大教育。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卢子鹤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提倡推广乡村建设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与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接触较多，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为了促进统一团结，共同抗日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张澜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

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③要求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这期间,张澜常常在公开场合指摘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措施。有的特务分子记录他的讲话后,要他签名,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1941年3月中旬,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执行委员有黄炎培、张澜等十三人,主席为黄炎培。不久黄辞职,张任主席。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出版;10月10日,公告同盟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张澜代表同盟在重庆招待记者,宣布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纲,说同盟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严正立场,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的报告言行不一,戳穿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结果被禁止发行。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取消“政团”二字,以便吸收个人会员;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推选张澜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要民主。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张澜在会上提出争

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主张。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主席。12月,他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问题、民主问题、军事问题及国家建设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1月,张澜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极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中旬,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声泪俱下。散会时,遭特务凶殴,打伤头部。会后记者访问他时,他说:“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④11月中旬,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张澜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民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⑤后来,民盟拒绝参加这次伪“国民大会”,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清除出盟。12月,张澜由重庆抵上海。在民主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他阐明了民盟不参加伪“国民大会”的理由,强调和平、团结,反对分裂、独裁,并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以达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

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张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

己的立场。”在闭幕词中，他又号召民盟成员“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时，国民党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蔑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因国民党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愈加分歧，有些人倾向妥协。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包围了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声明解散。7日，张澜发出呼吁，吁请民盟盟员在合法范围内，继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8年1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发表的解散声明，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⑤。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央常委轮流代理。这时张澜在上海也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同年冬，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1949年3月间，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疗养院劝诱张澜追随蒋介石，张澜严辞拒绝。国民党武装特务一度冲进疗养院，意欲挟持张澜逃往台湾。张假装病重不走。但从此被软禁在病房里，失去行动自由。直至5月上海解放前，经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张澜始脱险出院。6月，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0日，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54年，张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澜的著作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注：

- ① 《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第2页。
- ② 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 ③ 《中国民主同盟大事记》第1页。
- ④ 沈自强：《民盟在成都的一些情况》，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编印《盟史资料》。
- ⑤ 同①第3页。

李 鼎 铭

李敬谦 熊宇良

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县桃镇人。1881年9月28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

李鼎铭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住舅父家中读书，学习勤奋，还兼习医学。1903年，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

1904年，李鼎铭在本地教私塾，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曾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等。1913年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期间，他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在家乡一带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他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颇有成绩，在教学中主张给学生讲些科学知识，受到群众的欢迎。

自1923年起，李鼎铭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例如当群众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榨勒索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并打死了一名坏头目时，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奔赴榆林找井岳秀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

他还为维护本乡群众某些利益，经常与官府及城内豪绅据理相争。1930年后，李鼎铭一直住米脂县城内，继续行医。尽管在这期间，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要他做总管家的邀请。李鼎铭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围剿。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米脂县长及反动军官孙绍山趁机镇压、破坏米脂县米东区共产党的组织，李鼎铭担任了米东区所谓“肃反”委员会主任。1936年他继续行医，还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由于中共政策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李鼎铭的思想开始转变。同时，由于他的学生共产党员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曹力如等对他多次争取，以及他的二儿子李力果^①早年参加革命的影响，使他的思想继续有较大的转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鼎铭就逐步接受中共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②一文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自我解剖。1944年12月边区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及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均再次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勇于负责，敢于大胆提出建设性的政见。1941年正当陕甘宁边区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封锁，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非常重视，说这个办法很好，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中共中央还把它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因而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

1942年至1943年，李鼎铭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陕北的特点，提倡精耕细作，多种洋芋，推广养蚕，移民开荒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李鼎铭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不疑。”^③1943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④及同年7月在《七七专刊》上发表文章^⑤，热情帮助和盛赞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同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⑥1944年1月，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兴奋地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⑦同年12

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他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⑧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李鼎铭对全国政局的变化也十分关心，每当重要时刻，他都发表文章或谈话。1943年，当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⑨。严正地痛斥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同年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⑩，有力地揭穿了敌人妄图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鬼蜮伎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发动全面内战，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能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3月在接见记者谈到关于中苏友谊问题时^⑪，以及同年4月在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作的《关于选举工作报告》^⑫中，他斥责蒋介石指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参加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当蒋介石、胡宗南的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⑬。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患脑溢血症病故。边区政府举行追悼会表示

哀悼。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都送了挽词。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将米脂县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学校”，以资纪念。

注：

- ① 李力果是李鼎铭的二儿子，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于北京病故。
- ②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 ③ 同②，1942年7月12日。
- ④ 同②，1943年2月3日。
- ⑤ 同②，1943年7月7日。
- ⑥ 同②，1943年12月19日。
- ⑦ 同②，1944年1月28日。
- ⑧ 同②，1944年12月10日。
- ⑨ 同②，1943年7月10日。
- ⑩ 同②，1943年9月9日。
- ⑪ 同②，1946年3月14日。
- ⑫ 同②，1946年4月12日。
- ⑬ 李鼎铭治丧委员会讣告。

井 勿 幕

张 应 超

井勿幕字文渊，1888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一）生于陕西蒲城县。父亲井永汲，开明地主兼商人，1891年逝世。井勿幕少年时代在家中读书，同时随其胞兄井岳秀练武，长于拳术和击剑。甲午战争以后，他的家庭经济日趋衰败，社会的黑暗尤使他深为不满，常和井岳秀“纵论天下大势，对于清政多所斥议”^①。

1902年，分家时分给井勿幕以为生计来源的“义源永”杂货店破产。为了摆脱债务，继续求学，他到重庆去依附父亲的朋友川东道张铎。得张铎帮助，入重庆正蒙公塾读书，在这里结识了杨庶堪、朱之洪等进步青年。1903年冬，他不顾张铎反对，“以数金冒险从蜀人士赴日本”^②，入东京大成中学读书，是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井勿幕立即加入。同年冬，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同盟会组织，任支部长。他克服各种困难，奔走于西安及渭北各县，数月之间，就发展会员三十多人。

1906年春，井勿幕在三原县召开的陕西支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联络会党、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等重要意见。但因同盟会会员多系读书人，对会党持有偏见，对此

坚决反对，使井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会后，井勿幕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子良、王守身等人赴宜君、黄陵等地勘察地形，筹备建立根据地。并指示负责当地实际工作的同盟会员注意“与一般工农人联络”^③。

1906年夏，井勿幕二次赴日本，和赵世钰等人积极活动，筹备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同年秋，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1907年，井勿幕又回陕西。他针对陕西同盟会员多属文人，缺乏武装力量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孙中山、黄兴联络会党的经验，决心联合会党、刀客。他经同盟会员高又明介绍，结识了会党首领吴虚白，而且结合陕西实际情况，把会党的某些组织形式用于同盟会员中。1907年10月15日，井勿幕、吴虚白等二十余人在祭黄陵的誓文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④的奋斗纲领。不久，井勿幕第三次赴日本。

从1906年到1908年几年间，由于孙中山和黄兴不常在日本，同盟会总部出现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⑤的情况。井勿幕和吴玉章等同盟会中的积极分子经常联系，不断集会，坚持工作。同时，井勿幕又学制炸药，为在国内进行武装斗争作准备。1908年2月，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井勿幕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侠魔”的笔名，在《夏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阴谋。孙中山和黄兴对井勿幕十分器重，“呼为后起之英，招为指臂之助”^⑥，“誉为西北革命巨柱”^⑦。

1908年10月，井勿幕第三次由日本回陕，立即参加并领导了席卷全省的反清学生运动——蒲案^⑧。又组织陕西支部

的骨干多次集会，学习讨论同盟会的纲领，肃清康、梁君主立宪主张的流毒，使会员的思想认识逐渐统一。同年冬，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本地成立，并通过了联合会党、刀客和新军中的进步力量，共同进行反清斗争的决议。因井勿幕奔走各地，行踪不定，故选李仲特为陕西分会会长，而实际仍以井勿幕为领袖^⑨。

1910年4月，井勿幕奉孙中山命令从上海回陕西，在泾阳县召集同盟会领导人和会党、刀客代表会议，传达了总部对陕西起义的指示，详细讨论了在陕西起义的进行方法，会议历时二十余天。会后，立即紧张行动，购制军火、制造炸弹，并大大加速了和会党、刀客的联络行动。7月9日，井勿幕、钱鼎等同盟会领导人和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⑩。从此，陕西同盟会员和会党的全面联合正式形成，使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斗争走上新的阶段。为了更好地联合会党，井勿幕加入了哥老会。同年秋，井勿幕和吴玉章、熊克武等人赴香港，与黄兴共同筹划广州起义。不久返陕。

1911年4月广州起义爆发，井勿幕“由陕赴之不及，故得免于难”^⑪。乃返回陕西，立即布置陕西同盟会员分头行动，准备起义。不久，井勿幕得到同盟会总部决定于农历八、九月间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义的通知，遂决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在西安起义。但因西安清军得知消息，防范甚严，难以举事。又改定由井勿幕、胡景翼率刀客在渭北发难，钱鼎等人策动新军在西安响应^⑫。议定井勿幕赶赴渭北布置，并在黄龙山组织骑兵。武昌起义后，陕西当局密谋把新军调离西

安后逮捕其中的革命党人。新军乃于10月22日提前起义。井勿幕在渭北得知起义消息，立即赴三原招集武装十余营响应西安起义，自任陕西北路安抚招讨使，负责渭北各县军务^④。12月，他奉陕西军政府命令赴山西增援，攻克运城，解山西革命军之围。不久，陕西西路告急，又率部增援西路，并和宋元愷、王一山等组织炸弹队，在西路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委任井勿幕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他因陕西战事紧张辞未赴任。

陕西起义成功以后，陕西都督张凤翔打击哥老会，井勿幕也支持了张凤翔的错误作法。1912年2月，井勿幕亲自致函黄兴和黎元洪，请求湖北派兵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因湖北无兵可派而未实现。

袁世凯窃国以后，张凤翔向北洋政府妥协，打击革命派势力。1912年4月井勿幕所部军队绝大部分被解散。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井勿幕被选为陕西支部长。但因张凤翔阻挠，遂改张凤翔为支部长，井为副支部长。9月，井勿幕被迫离开陕西，赴上海随章太炎读书。“二次革命”爆发，井勿幕约刘允臣赴汉口和曹印侯共谋讨袁，因曹被捕入狱，计划未能实现。“二次革命”失败后，井勿幕避居日本。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井勿幕在上海和康宝忠、李根源、但懋辛等密谋反袁。11月，井勿幕和熊克武等人经越南赴云南参加护国反袁斗争，先后任刘一峰部参谋和熊克武部参谋长，奔走于蔡锷和熊克武军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再称大总统。井勿幕又联合民党进步人士，以十九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宣言中尖锐地指出“袁逆不

死，大祸不止”^④，并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扑杀此獠”^⑤。为了策动陕西民党反袁，他于同年4月从四川步行回陕西。

井勿幕回陕西后，袁世凯已死。督军陈树藩背叛民党，投靠皖系。井勿幕又离陕去上海读书。1916年7月李根源任陕西省长，力请井勿幕协助。井勿幕希图借李根源的力量来对付陈树藩，遂于次年3月回陕就任关中道尹。在任职期间，“以禁烟闻于军民，财政、教育各端屡有建议”^⑥，均因陈树藩阻挠而难以实施。5月，李根源被迫辞职；8月，井勿幕亦去职在西安住闲。

1917年12月，郭坚、耿直等在周至县树靖国军旗帜，反段倒陈。不久，张义安亦在三原县起义，民党人士遂云集靖国军大旗之下。陈树藩惧井勿幕投奔靖国军，乃软禁井于西安。井勿幕表面“以篇籍自娱，研图注篆”^⑦，暗中却和靖国军秘密联络。1918年9月，陈树藩诱捕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11月派井勿幕去三原，“欲借井之声望收拢胡各部，使靖国军解体”^⑧。但因井勿幕在陕西民党中素孚众望，因而一到三原县，即被举为靖国军总指挥，反使靖国军声势大振。

井勿幕任总指挥后，以靖国军各部行动自由，军纪不严为虑，随即着手整顿。因第一路郭坚部军纪最差，所以尤对郭部“多所箴规”^⑨。不料郭坚的参谋长马凌甫却从小集团的私利出发，错误地认为井勿幕意在排除异己，加上辛亥革命后马凌甫和井勿幕因政见分歧曾发生过冲突，已怀夙怨，“因起害井之心”^⑩。乃于井勿幕赴凤翔县慰问援陕滇军叶荃部返三原路过兴平县时，设谋以郭坚名义致函井勿幕，请他于12月23日（一说为30日）赴兴平县南仁村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虽知

赴会可能有危险,但为了顾全大局,仍以“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②的气概如期前往,但到后即被杀害。

注:

- ① 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载《井勿幕公葬纪念册》。
- ②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事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57页。
- ③ 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53页。
- ④ 《陕西辛亥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85页。
- ⑤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92页。
- ⑥ 宋哲元、焦子静、李仲特等:《井先生纪念碑铭》(拓片存陕西省博物馆)。
- ⑦ 同①。
- ⑧ 1908年10月,蒲城县知事李休仁为了镇压学生的革命活动,逮捕蒲县教育分会职员和县立高小学堂师生七十余人,酷刑审讯,致使学生原新建伤重身死,造成轰动一时的惨案。
- ⑨ 王儒卿、刘依仁等编:《陕西乡贤事略·井勿幕事略》。
- ⑩ 《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32页。
- ⑪ 同②。
- ⑫ 《胡军长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立生将军事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59页。
- ⑬ 章炳麟:《井勿幕墓志铭》,《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85页。
- ⑭、⑮ 《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重印,1973年10月版,第37—38页。
- ⑯ 同③。
- ⑰ 同②。
- ⑱ 茹欲立:《陕西靖国军始末》,《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8页。
- ⑲ 景梅九:《井勿幕先生事略》,载《西京平报》1810号。
- ⑳ 孙翰青:《井勿幕被害真象》,手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 ㉑ 熊克武:《我与井勿幕的交往》,手稿存处同㉑。

寇 遐

张应超

寇遐，字胜孚，号玄疵，1884年11月18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一）生于陕西蒲城县。父亲早逝，由寡母抚养长大，家境贫寒。1906年考入西安师范学堂选科。在师范学堂读书时即加入同盟会，是当时西安进步青年中的积极分子。

1908年10月，蒲城县知县李体仁为了镇压当地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在陕西提学使余堃的直接指使下，捣毁县教育分会、县立高小学堂和学生自办的“自治公学”，逮捕了县教育分会职员和县立高小学堂师生七十余人，酷刑审讯，致使年仅十七岁的学生同盟会员原斯建伤重身死，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即“蒲案”）。“蒲案”发生以后，省城西安及陕西所属八十余州、县的青年学生掀起罢课斗争高潮，寇遐被选为西安师范学堂总代表和西安各界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起草了陕西各校学生请愿书，并到巡抚衙门交涉。在陕西各校学生的共同努力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援下，这场坚持了长达五个多月的学生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1909年，寇遐由师范学堂毕业，任同州中学堂监学。他和该校监督、同盟会员尚镇圭一起领导陕西东部各县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州中学遂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之一。1910年

秋到1911年春,同盟会员李仲三曾多次去朝邑县联络渭北著名刀客严飞龙,寇遐曾给李仲三多方帮助。后来严飞龙所率领的刀客成为陕西辛亥革命中一支重要力量。

1912年4月,陕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寇遐当选为副议长。8月,井勿幕改组同盟会陕西分会为国民党陕西支部,寇遐任评议员。12月,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反袁护国斗争中,他奔走各地,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1917年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寇遐跟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1923年曹锟贿选,勾结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以重金收买议员。寇遐坚决反对贿选,并再次南下。1924年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寇遐积极参与政变活动,因而在新政府中担任过短期农商总长职务,卸任后即在北京住闲。

1931年,寇遐应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邀请回到西安,任省政府委员、高等顾问等职。他擅长书法,尤精隶书。1934年在邵力子、杨虎城的支持下,寇遐等人在西安组织《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寇遐任会长,编辑出版《西京金石书画集》。同年冬,根据他的建议,杨虎城命进步人士成柏仁创办《秦风周报》(后改名为《秦风日报》),寇遐为之书报头和报社牌匾,并参与其中工作。1935年夏,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率部入陕“剿共”,蒋介石分别密令张、杨互相监视。后来杨虎城有所觉察。因寇遐和张学良也有交往,他受杨虎城委托,居间联络。在张、杨的合作中,他曾起过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寇遐担任过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深为不满,主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他和陕西的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王菊人、武梦名等人关

系密切，并掩护过地下党员杨晓初。1947年，陕西反动头子胡宗南、祝绍周杀害了杜斌丞，王菊人、武梦名等人也先后被捕。寇遐对胡宗南杀害杜斌丞的罪行非常愤慨，当面怒斥胡宗南，对在狱中的王菊人、武梦名也赠送衣物，并照顾其家属。还多方设法，保护成柏仁的安全。

1948年冬，伪国大代表竞选时，陕西反动政府中有人为了利用寇遐声望，请他参加竞选，并愿承担竞选活动经费，遭到寇遐严词拒绝。由于寇遐思想进步、敢于直言，胡宗南之流曾在他家门外安插特务监视他的活动。

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以“保护安全”为名，把寇遐、张凤翔、马骧等人裹胁到汉中，准备经四川送往台湾。寇遐等人坚决拒绝去台，又被送往兰州。8月，兰州解放，彭德怀司令员特派专人慰问他和张、马二人。8月下旬，寇遐等三人返回西安，受到西安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寇遐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出卖墨迹，把所得收入捐献国家作为抗美援朝经费。1953年9月6日，他因脑溢血逝世。

寇遐对书法、金石很有造诣，喜画兰草，但手迹很少。他在古书收藏方面也下过功夫。此外，他对秦腔也有一定的研究，曾修改过《辕门斩子》、《周仁回府》、《葫芦峪》等秦腔剧本。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王陆一主编：《西北革命史征稿·寇遐传》。
- ② 原清月辑：《“蒲案”纪念册》。

- ③ 寇妙言：《我父回西安后的片断回忆》。（手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 ④ 段绍岩：《省临时议会成立》。（手稿存处同上）
- ⑤ 尚重十：《尚镇圭事略》。（手稿存处同上）
- ⑥ 《群众日报》，1953年9月10日。
- ⑦ 笔者访问李宗祥、胡景通、寇若英笔记。

唐 生 智

李 静 之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县人。1889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生。祖父唐本有曾任广西提督。父亲唐承绪，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在湘西管过盐卡。唐生智1907年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接着进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入伍生队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离校参加革命，先后在上海都督府及烟台都督府担任科员、参谋。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任见习军官、代理排长、代理连长。参加过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赶下台后，唐在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任营长。经过湘南独立战争和援鄂之役，他次第升为第三团团、第二旅旅长。当时，湖南内部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明争暗斗。1920年11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当了湘军总司令，唐旅虽编在倾向谭方面的宋鹤庚师，却属于赵派。1923年8月谭、赵战争发生，唐参加赵的“护宪军”，击败了谭派蔡巨猷部。11月底，谭、赵战争结束，谭延闿率领一部分队伍退往广东，赵把留在湖南的湘军整编成四个师，唐升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移驻衡阳。

从1923年底到1926年初，唐生智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将队伍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

的一支部队。此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向他学佛。并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令官兵一律摩顶受戒为佛教徒，佩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广东的革命浪潮迅速波及湖南。唐生智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亲去洛阳会见吴佩孚，了解吴对湖南的意图，请吴支援。同时，又派人前往广西和广东联系，窥测南方形势。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驱赵运动。唐生智想利用时机取代赵恒惕，加入了驱赵行列。但他的态度并不坚定，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一面派代表见吴佩孚，请吴谅解他去赵的“苦衷”。赵恒惕于3月12日通电辞职，委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唐于25日在长沙就代省长职。接着，诱捕了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钊，免去了第三师师长叶开鑫职务，并派兵占领了叶部所据的岳州。

唐生智进入长沙后，广州国民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同他联系，共产党湖南省委也对他作争取工作。他表示拥护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

4月，吴佩孚以援赵为名，驱军南下，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向唐军反击。唐军在湘北失利，5月1日放弃长沙，退守衡阳。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师贺耀组部与二师刘钊残部也组织“护湘军”，与叶开鑫相呼应。吴佩孚又调赣军唐福山、鄂军余荫森等助叶攻唐，占领了湘潭、宁乡、醴陵等地。衡阳处在包围之中。唐急电请广西派兵入湘。李宗仁令钟祖培旅兼程于5月初赶到衡阳，与唐部合力反攻。这时，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北伐，援助唐军反攻长沙。5月下旬派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李宗仁部进入湘南增援,唐部转取攻势。唐、叶之战遂成为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主席职务。7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以第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迅速占领了长沙。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成立省政府,率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鉴于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对北伐战争的有力支持,为了巩固在湖南的统治,他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开展工农运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8月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唐被选为执行委员。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然后向长沙下游发展。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统率第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进。8月底先后突破汀泗桥、贺胜桥。9月上旬攻占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第四、第七两军随即转入江西战场。第八军则留驻两湖整训。1927年初,唐生智担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负责巩固武汉,俟机进攻河南。辖有由第四军扩编的第十一军、第四军及由第八军扩编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军,实际上控制了武汉的军事大权。这时,他向各方进行拉拢,对共产党表示友善,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早在1926年11月9日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就在这里安下了他的总司令部,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分庭抗礼。12月13日,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武汉成立了“中国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唐生智站在武汉反蒋阵线一边，以军事实力支持武汉革命政权，被推为“临时联席会议”的成员。1927年2月，一度被增选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唐生智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所辖之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局面。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下令通缉。唐生智为扩大地盘，极力主张东征讨蒋。但因奉系张学良进兵河南，武汉政府决定先进行北伐。唐生智率领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六军及贺龙独立第十五师等部约六万人，在河南境内与奉军作战。奉军大败，于5月底全部撤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10月，唐参加了汪精卫与冯玉祥等举行的郑州会议，策划南下反共和东征讨蒋。

正当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时候，两湖境内的右派势力在蒋介石策动下，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事变。5月17日，驻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企图袭取武汉。21日，驻长沙的何键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进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部、省党校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时两湖地区的反动气焰极其嚣张。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伪装，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准备“分共”。冯玉祥也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武

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这时，唐生智因他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怕激起两湖人民暴动，无法控制局面，于24日从河南前线电代理湖南省主席张翼鹏，指示驻湖南各军不许再有任何行动，要他们发还收缴工农武装的枪枝。他还公开演说，表示拥共反蒋，电请武汉国民党中央对马日事变“派员查明处理”^①，并因许克祥是他的部下而自请处分^②。但是，25日，他又电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严惩“侵扰”军人家属财产的“暴徒”；派副军长叶琪、周斓回湘“镇慑”^③。

6月26日，唐生智奉武汉政府之命回湘处理许克祥反革命事件。他一面继续表示遵守三大政策，解散了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的“救党委员会”；一面又指责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应即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以“激于义愤”，从轻处理^④。不久，唐返回武汉，仍遥领湘政，以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行省主席职权。

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回师武汉。武汉政府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任命唐为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军），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及暂编第二十军），准备东征讨蒋。接着，唐下令进攻南京。蒋介石则将鲁南前方的第七军调到安庆、芜湖间迎堵。宁汉交兵迫在眉睫。就在这时，卫戍武汉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三十五军占领了总工会和重要行业工会的房屋，其势汹汹。6月29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⑤，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共产党东征”^⑥。唐则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

但又说：“无奈这些纠纠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⑦。暗示共产党自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以免武人动手。他又公开提出，愿送在武汉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出洋考察”^⑧。由于汪精卫等在武汉加紧准备“分共”，东征被搁置起来。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唐生智也背弃“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和共产党分了手。7月29日，出席庐山“分共”会议。8月13日，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东征讨蒋失去借口，宁汉对立局面表面有所缓和。但是，这时的宁汉之争实际上已是国民党新军阀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战斗。唐生智坐拥重兵，以两湖为根据地，仍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想通过东征吞并东南。8月中旬，派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进窥南京。南京方面李宗仁、何应钦等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下之师，迎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南京，协商宁汉“统一”。

8月下旬，汪等到南京进行政治分赃。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取得暂时妥协，在南京组织“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唐生智被推为特委会委员。但是，由于分赃不均，汪精卫、唐生智等未能取得党政实权，乃借口特别委员会为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于9月21日返回武汉，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峙。10月初，南京方面再派代表与汪精卫磋商合作。但宁方所提条件为唐生智所拒。南京政府于20日以“通敌叛党”

罪名免唐生智本兼各职。24日，特委会又决议永远开除唐的党籍，解除其党内一切职务。11月初，南京政府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别为三、四、五路总指挥，率领西征军进行讨伐。同时，冯玉祥部樊钟秀、方振武等由鄂北挺进，鲁涤平由宜昌顺流东下，李福林、方鼎英、范石生等从广东进兵湖南。唐部四面受敌。为了保存实力，唐生智在11月12日通电下野，当晚离开武汉前往日本。唐军大部被改编归桂系统辖，由白崇禧率领进驻唐山、开平一带。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年冬，唐生智从日本到香港，表示服从蒋的领导。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收买李品仙等倒戈，一面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要他接长旧部。3月20日，李品仙等领衔通电拥蒋驱白。唐生智亦到开平回到他的部队。4月5日，唐在北平通电就蒋所委的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职。

5月，冯玉祥亲赴山西拉阎锡山反蒋介石。李宗仁也在广西打出“护党救国军”旗号，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反蒋。蒋介石对唐生智很不放心，遂于6月1日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兼编遣会议编组部主任，要他到南京任职。唐见形势不利，随即通电讨冯。10月，蒋冯战争正式爆发。蒋介石由于在河南接连失败，不得不派唐亲赴前线指挥。为了消除蒋的疑心，唐指挥作战非常卖力，替蒋扭转了整个战局，受到蒋的传令嘉奖。11月，冯军败退，蒋亲到郑州车站慰问唐生智，对他礼遇极隆，并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归他指挥。

尽管如此，唐生智仍在暗中与各方进行反蒋洽谈。12月3

日与冯军达成一致倒蒋的谅解^⑨。同日，安徽省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在浦口异动，图进攻南京。唐随即在郑州通电反蒋，沿平汉路南下，将主力集结在驻马店一带。12月20日，唐电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索让武汉。蒋介石下令褫唐本兼各职，通缉法办，调刘峙北上讨唐。27日，唐对蒋军发起总攻，被阻于遂平、确山间。蒋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杨虎城又袭击和占领了驻马店，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唐同时酝酿反蒋的阎锡山，这时为蒋收买，赴郑州以陆海空军副司令指挥讨唐军事，南下夹击唐军。唐的反蒋战争不到一月，便遭惨败。他只好在1930年1月9日通电下野，化装逃到天津，流亡香港、澳门、新加坡。

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借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发表通电公开弹劾蒋介石。唐生智通电响应。5月27日，各派反蒋力量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织了反蒋的国民党政府。唐被推为广州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协议统一，于1932年元旦组织了“统一合作”政府，唐生智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但已没有兵权。1934年12月，唐被调任训练总监部总监，留居南京。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陆军上将。以后，他又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第一厅主任，仍兼训练总监部总监。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他以执行部主任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等事宜。

11月，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危急。蒋介石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⑩。12月

初，日军兵临城下，他奉蒋介石的命令仓皇撤退，军民损失惨重。

南京撤退后，唐生智避居湖南，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耀祥中学），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等。1939年，蒋介石派他做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不久，他辞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唐挂着军事委员会委员头衔，闲居于重庆、东安两地。由于他两次反蒋，蒋对他颇有戒心，在东安和重庆都派有宪兵“保护”。他对蒋也小心戒备，怕遭暗害。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思想彷徨，带领全家仍回东安办学。这时，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乡居期间，对人民的疾苦有所感触，促使他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

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唐生智看到反人民的内战没有出路，曾于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停战言和，予民休息。还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在野各党派人士和学者名流中，做了一些谋求和平的工作，并和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人员有过接触。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程潜迎唐生智到长沙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唐于月末到达后，发出湖南人民应该团结自救的呼吁，担任湖南各界人士组织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团结湖南地方势力，争取湖南和平解放，作了有益的工作。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白崇禧窜湘，疯狂镇压湖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运动。唐生智于5月24日返回东安原籍。这时，共产党湖南地下组织也派人到东安，继续对唐进行争取教育

工作。唐联络道县、零陵等地的地方部队，袭扰湘桂路，阻拦白崇禧部队退守广西，并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白崇禧派李品仙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他未为所动，坚持到解放军进入东安。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高级将领三十八人的起义通电。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响应通电，并吁请西南、西北迅采一致行动。5日，长沙和平解放，唐生智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后，唐生智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肠癌在长沙逝世。

注：

- ① 《湖南军农工冲突事件》，《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二十三期。
- ②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出版，第346—347页。
- ③ 《湖南军农工冲突事件》，《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二十三期；《申报》1927年6月4日。
- ④ 1927年6月26日唐生智致武汉中央“宥电”，见《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351页。
- ⑤ 《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二十九期。
- ⑥⑦⑧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30年版，第87—88页。
- ⑨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卷，第146页。
- ⑩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黄 琪 翔

李静之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人，生于1898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家中世代务农，父亲黄富霖因家计困难，远赴南洋经商，以后家庭经济逐渐好转。

黄琪翔童年在私塾就读。1910至1911年，入梅县务本中学、广州优级师范附中学习。1912至1919年，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1919年毕业后，任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排长。1920年调回保定军校任炮兵队队长。陈诚是他队上的学生。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22年，黄琪翔辞去保定军校职务，回广东参加革命。到广州时，正值孙中山率师北伐，他在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任参谋。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黄改任第一师第一团副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之战。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黄加入国民党。次年任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战后，第一团扩编为独立旅，黄任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琪翔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张

发奎)第三十六团团长。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同时又进行南征,一直打到琼崖,统一了广东根据地。战后,十二师留驻琼崖。

1926年5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湖南支援唐生智作战,7月正式誓师北伐。黄琪翔随第四军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平江、汀泗桥、马迴岭等战役中,击败直系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颇有战功。

第四军于8月中旬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19日开始攻打平江城。黄琪翔的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负责中路进攻。黄率第三十六团在当地农民的支援和引导下,绕道城东,攻入北门,直捣直军指挥部。吴佩孚严令死守粤汉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并亲率主力刘玉春等部南下增援。27日,第四军向汀泗桥发动进攻,叶挺独立团在最前面。直军凭借地形,居险顽抗。吴亲自督战,并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大刀队连砍阵前退缩的旅团营长九人,阻止官兵退却。北伐军英勇进击,反复争夺,双方伤亡很大,战争一时处于胶着状态。黄琪翔建议采取迂回战术。他在附近港湾找到渔船数十艘,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拂晓时,配合正面部队进攻,自敌后发动攻击,一举而克汀泗桥。

9月,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打败,十二师又奉命赴援。黄琪翔采用声东击西、出敌不意的战术,在马迴岭全歼孙部谢鸿勋师。又协同第七军击溃了德安之敌。11月,北伐军占领了九江、南昌。

江西战役后,十二师回武汉休整。1927年1月,扩编成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黄琪翔以战功卓著,升任第十二师师

长，旋又任第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率领第四军为前锋。5月21日，与奉军接触于上蔡，一战而击败富双英师。接着直趋临颖，配合兄弟部队，和奉军主力激战。28日克临颖。6月5日，打下了开封。不久奉命回师武汉。武汉政府升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

第四军回到武汉时，武汉政府已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冯玉祥在取得河南地盘后，公开倒向蒋介石，反对共产党。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府解体。张发奎、黄琪翔仍继续拥汪。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移驻江西南昌（第十一、第二十军）、九江（第四军）一带，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29日，张、黄参加了汪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严令贺龙（二十军军长）、叶挺（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8月1日，贺龙、叶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9月初，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中没有掌握实权，企图据有广州，另组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对抗。于是勾结张发奎，命黄琪翔带领第四军回粤。这时，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八一起义军入粤威胁下，表示欢迎第四军回广东。9月中旬，黄琪翔部到达广东。李要黄出兵协助打贺、叶。黄提出交换条件是李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四次中执监委全会。李济深不同意，黄便不肯

出兵。李因与贺、叶作战将广州的兵力抽调一空，广州便为黄琪翔所控制。

在汪精卫的策动下，11月17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政变，以“护党”为名，骗走李济深，计划捕捉桂系首领黄绍竑，将驻广州的桂军和李济深留守广州部队包围缴械。18日，张、黄接收了军事委员会，以张发奎为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李济深亦调动两广和福建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

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到东江和西江布防。12月11日晨，共产党发动了广州起义。张、黄逃到广州河南李福林第五军军部，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调东江和西江的部队全部回师广州。13日拂晓，薛岳、黄镇球、李福林等部配合第四军进攻广州，起义被镇压下去。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铭枢为东路军总指挥，黄绍竑为西路军总指挥，由李济深率领会攻广州。并下令查办张、黄。张发奎为保存实力，决定将部队撤出广东，自己出国游历。黄琪翔也避往香港。1928年春到日本。7月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

这时，邓演达、叶挺、宋庆龄均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赞助邓在中国组织新党，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1929年5月，黄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8月，行动委员会举行结党式，成立中央干事会。

黄被选参加干事会，并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为蒋介石杀害。黄主持该党中央工作，负起与各地联系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防京沪一带。黄琪翔同蔡时相过从，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获得默契。1932年“一二八”事变，黄曾到前线参加作战，并发动上海行动委员会的同志支援战争。淞沪抗战失败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攻打苏区，被红军击败。黄琪翔认识到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才有生存立足的可能。曾在上海奔走，推动十九路军与苏区发生联系。

1933年9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酝酿组织福建人民政府，联共抗日反蒋。黄琪翔应邀参与其事。11月中旬，他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担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会议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黄琪翔是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下设参谋团主任。他为了协调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矛盾，表示第三党政纲与中华共和国的人民权利宣言之基本原则相同，无单独成立组织的必要，于12月11日宣布解散。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大规模军事进攻下失败。黄琪翔于月底逃到香港。6月，再度赴德国。次年初，在柏林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与蒋介石派遣的留德学生展开斗争。

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散在国内外各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成员，决定恢复组织，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1月10日，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以抗日为中心任务的《临时行动纲领》，推选当时在德国的黄琪翔为总书记。并发表宣言，要求团结、民主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官僚政治和对日妥协政策。1936年以后，国内团结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10月，黄接陈诚电报要他迅速回国参加抗日。年底，回到香港，与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会晤。

1937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由陈诚引荐和蒋介石见了面。不久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炮兵监。同年爆发上海“八一三”抗战，他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和右翼军副总司令参加作战指挥。11月，上海抗战失败，全军西撤。冬，黄到达武汉。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蒋介石为了点缀“团结抗日”，又任命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但是，政治部中反共势力日益嚣张。8月间，黄、周先后去职。之后，黄被调到军训部任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

1939年秋，黄琪翔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湖南邵阳，准备应付日本侵略军进攻长沙。不久又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设指挥所于湖北枣阳，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防守随、枣地区。1940年5月，日军向大洪山区进犯，图占领宜昌。第五战区在随、枣、当阳、荆门一带布防，由黄琪翔和汤恩伯、张自忠分别担任正面和左右翼作战。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黄不得不撤至襄

樊。张自忠被包围，在激战中牺牲。黄琪翔满腔悲愤，撤退时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在办公室黑板上。撤退后他沉着指挥，积极反攻，7月收复了枣阳。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

同年冬，黄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第六战区辖长江南岸鄂西、湘西地区。为了把湘西的粮食抢运到鄂西供应部队，战区成立了湘谷转运处，黄兼处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

太平洋战争在这年12月爆发。1942年，中国组成远征军，准备协同盟军进攻缅甸日军的基地。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昆明，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黄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负责油管警卫。1946年司令部撤消，黄回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黄琪翔不愿参加，又无挽救办法，便回避现实，主动要求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于1947年6月起程赴德。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阶段。蒋介石政权濒临复灭，寄希望于美苏冲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8月，由于西柏林换新货币问题引起美苏矛盾扩大，形势颇为紧张。10月，黄琪翔接到蒋介石要他回国报告美苏关系的电报。黄到南京见蒋，分析大战不可能发生的因素，劝蒋停止反共内战。蒋大为失望。黄又劝他恢复和谈，蒋更为不满。这次会见，使黄对蒋的幻想最后破灭，便不愿再去柏林。年底，由上海转广州，潜赴香港，决心归附人民。

1949年8月，黄琪翔以特邀代表名义到北平出席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参加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10日，黄琪翔病逝于北京。

附记：

本文曾参考杨逸棠所写《黄琪翔传略》。

马 占 山

陈宇生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省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辽宁省怀德县（今属吉林）。父亲务农，家境贫寒。马占山稍长，即为地主放马。1903年，因放牧时丢失地主家的一匹马，被迫逃亡在外，沦为胡匪。他好骑射，娴于枪法。后为官军收编。1905年怀德县衙门游击委为哨官。

1911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充任四营中哨哨长。1913年，吴部改为中央骑兵第二旅，马充任三团二连连长。1918年，因剿匪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长，驻防黑省东部。1925年，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吴俊升被日军炸毙。17日，张学良任命第八军军长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不久，马被任命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长。同年冬马占山改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10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吉两省，进而侵入黑龙江。日军以大批军械武

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唆使他进攻齐齐哈尔。此时，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万福麟正在北平，当地群龙无首，人心慌乱，形势危急。万福麟为了卸却责任，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0月10日任命正式发布。13日，张海鹏派其少将徐景隆率伪军三个团沿洮昂（洮南至昂昂溪）路向江桥（嫩江铁桥）进犯。16日拂晓，进抵江桥南端，当即遭到军署卫队团徐宝珍部的坚决阻击，伪军被击溃，徐景隆被击毙。日军利用张海鹏部进窥黑龙江的企图受挫。

19日，马占山经由哈尔滨抵达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在爱国军民抗日热情的鼓励下，马占山当众宣称：“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①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亲自视察防地，进行布防，准备抵御敌人的袭击。此时，以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劝马向日军投降，迎张海鹏入省。马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②

27日，日本关东军以所谓洮昂路系用满铁借款修筑，日方负有护桥责任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桥人员的安全，当即遭到马占山的拒绝。

11月4日晨，在七架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千三百余名以保护修桥为名，直趋江桥我军驻地大兴站，驱赶我方修桥人员，迫令守军后撤，并强行抓去我方哨兵三名。是日午间，又悍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我方将士立即英勇战斗，迅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

战，也是中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奋起抗战的先声。

江桥首战告捷后，士气大振，马占山当即赶赴前线犒赏官兵，阵地上同仇敌忾，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热烈。

日军进攻受阻，乃于5日晨尽驱张海鹏部打头阵，日军殿后，复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我方将士奋勇抵抗，激战竟日，坚守阵地。6日晨，日军自为前锋，向我军发动总攻。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双方在江桥进行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敌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轮番轰击，阵地难以坚守，马遂下令退守大兴站以北的三间房阵地。

日军一面依仗军事优势步步进逼，一面又采取政治攻势，多次电迫马占山辞职下野。对此，马向全国民众保证：“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于异族。”^③同时明令本省大小文武官吏，不问客籍省籍，一律不得擅离职守。

12日，日军将朝鲜驻屯军的多门第二师团铃木旅团调至江桥，再次发动进攻。16日，更向我全线猛攻。至18日，我部队伤亡很重，又无援军。马不得不下令全军退出齐齐哈尔，沿齐克路（齐齐哈尔至克山）撤退。日军遂于19日占领齐齐哈尔。

在国民党将领一片恐日声中，马占山敢于奋起抗战，深受全国人民的称赞。各地人士纷纷发来函电，赞扬他“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国民之表率”^④。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抗战。上海、哈尔滨等市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织了“援马抗日团”，赶赴黑龙江。

21日，马占山在海伦县设立省政府，将队伍分驻于克山、拜泉等处，积极整顿军备，编练新军。军民爱国热情十分高涨。12月，马占山经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和政治中心后，纠合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策划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他们认为马占山拥有实力，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不断地对马进行诱降活动。还在江桥抗战时，溥仪就以封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做诱饵，劝其归顺日本。及马占山退至海伦，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劝马停止抗日。之后，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的身份，亲自出面，向马占山提出，只要变更抗日举动，仍将黑省军权交授于马。本来，马占山的抗日，一方面是由于爱国军民的推动；另方面是为报答上司的“知遇之恩”，思想并不十分坚定。此时，由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在一群汉奸、卖国贼的怂恿下，幻想以妥协投降求得苟安。1932年2月28日马重返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3月8日，赴长春迎接溥仪。9日，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并当了伪满的军政部长。

马占山的背叛行为激怒了全国民众，爱国群众团体纷纷向马索还捐款；上海烟商愤怒地停止出售“马占山牌”香烟；他的部属中坚决抗日的军官如苑崇谷、金奎壁、徐宝珍等均不辞而去；黑河驻军、马占山的卫队和学生军等甚至抄了他的家。其实，日本侵略者也只不过视马占山为傀儡，对其防范甚严，控制很紧。在马占山就任伪省长的次日，日方即发出公函，要

求马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凡是重要法令、规章制度、用人、预算等等事项，必须取得日本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方进而要求各省设立之总务、警务两厅长必须由日本人充任。马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为此，日本顾问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马占山甚感日本主子咄咄逼人，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求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马占山处此名誉、地位、权力、财产均将失去的境况下，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反正之心。适在此时，张学良派前黑龙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许仍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遂下决心挣脱日方羁绊。3月底，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的时机，一面向调查团揭露伪满内幕，暴露日本侵略者的无耻嘴脸；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准备再战。4月1日，他带领亲信随从二百余人离齐齐哈尔。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再揭抗日旗帜。

马占山随即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自称总司令；又传令各县组织义勇军，集中于黑龙江东部各县，配合作战。初期，抗日联合军转战于黑、吉北部铁路线上，与日伪军相周旋，虽间或取得小胜，但由于指挥不统一，力量分散，不能有效地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7月中旬被迫离开铁路沿线，退入山林作战。28日，马占山率部至庆城罗圈店南森林附近，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时被日军射杀，血肉模糊，日军误认为马之尸体，立即拍照登报，大肆宣传。马于混战中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奔入大山，辗转四十余日，至

9月9日始出山至龙门。接着奔赴讷河，设立义勇军总指挥部，筹组三路义勇军围攻省城。10月20日，马占山发出总攻命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各路义勇军终因势单力弱，于11月28日退至拜泉。12月1日撤离拜泉。4日，苏炳文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7日，马占山亦相继退入苏境。

马占山、苏炳文一行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后，于1933年6月6日，经香港回到上海。蒋介石对马明捧暗压，表面上责成国民党中常会于23日委任马占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对马占山统率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的要求，置之不理。马占山在南京、上海作短期逗留后，即北上寓居天津英租界。

马占山在天津闲居期间，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栗又文等交往甚密。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曾承诺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马占山由沪去西安，赞助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联署。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派兵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防。马占山表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从中斡旋，不使双方发生冲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8月，在大同正式成立司令部。不久大同失守，司令部移至丰镇。9月，日军沿平绥线进犯。晋绥骑兵司令赵承绶和绥远国民兵司令袁庆曾守绥远，但两部在敌人尚未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东部要塞卓资山之前，即相偕离去。绥局顿形混乱，马占山等部苦战绥东，孤军无

援。9日12日，敌进占兴和，袭击孤山车站，经马占山挺进军之冲杀，将敌人逐出绥境。随后，马率部布防于归绥城东大黑河一线。10月13日，马部被敌军三面包围，仍奋勇抵抗。激战至下午五时，马占山险被敌擒，遂放弃绥垣，退至包头。16日，包头陷落。马部退守五原。

1938年初，敌伪拟在东胜成立自治政府，于3月初分三路包围挺进军。马占山亲率所部，以夜袭方式于16日进占河口镇。又于17日晚克复托克托县城，乘胜击退三路来犯之敌。4月1日，马部由高隆渡口渡河，进至绥北敌之后方。中旬，敌伪军将挺进军四面包围于大青山，鏖战七、八昼夜。20日夜，马部突围至固阳黄油干子。22日与敌遭遇，骑六师师长刘桂五阵亡。马占山率余部转至安北。5月中旬，总部移至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

马占山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委曾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东北大学学生参加挺进军。共产党员邹大鹏任挺进军司令部中校军械官，栗又文任上校秘书主任。他们帮助马占山抵制国民党特务刘广英制造的反共磨擦罪恶活动。

1940年5月3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命令改组辽、吉、黑、热四省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8月4日，黑龙江省政府在陕西榆林成立。此后，马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马占山被任为委员。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团在楚溪春统率下为蒋介石死守大同，并于9月21日突围至得胜堡与傅作义部会师，接着又进攻张家口。9月23日，马占山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公开表示将他的两个骑兵团交由傅作义指挥。

国民党为了利用马占山收编胡匪，扰乱东北解放区，又任命马为松北挺进军司令，但马长期避居北平未去长春就职。军统特务机关借用马的名义滥发委任状，收编胡匪，进行所谓策反活动。

1948年底，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形势下，马占山认识到和平解放北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为此进行工作。北平中共地下党通过马占山，邀请邓宝珊来平，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1949年1月上旬，马、邓、傅三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11月29日，因患肺癌去世。

注：

① 徐奎编：《马占山将军抗日战》第10页。

② 《申报》1931年11月18日。

③④ 同①。

⑤ 属第二战区，1944年后属第八战区。

赵 寿 山

徐乃杰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17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陕西省郿县（今户县）。自幼家贫，以务农为生。九岁时因得私塾老师魏鹿候的资助才能读完私塾。少年时，听到列强谋瓜分中国，遂有捐洋枪打洋鬼，富国强兵等救国思想。1909年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三中），以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读书。1913年秋在陕西陆军测量局任测量员。1917年秋在陕西靖国军司令部任科员。1919年到冯玉祥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1921年升任少校参谋。^①

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失败后，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帜退至陕北三边地区，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步兵团进行整训。赵寿山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接受杨虎城邀请，于1924年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教导队排长、队副、军事教官等职，讲授地形学，训练部队。他在陕北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及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1924年10月，冯玉祥推翻了直系曹錕的北京政府，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被委任为国民军第三军所属陕北国民军前

敌总指挥。同年冬由陕北出师南下关中耀县、岐山、宝鸡等地与陕督吴新田部作战。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驻耀县，赵寿山任第二中队长、教导营营长等职。在这期间，教导营曾请三民军官学校教官魏野畴、邹均、屈武、董汝城等为该营学生讲话，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

1926年1月，北洋军阀指使河南刘镇华的镇嵩军进攻陕西国民军，围攻西安。赵寿山随杨虎城部在西安守城八个月，进行了艰苦战斗。11月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军，赵寿山任该军第二师混成团团长。1927年5月，杨虎城部随冯玉祥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赵寿山留在陕西渭北地区任补充团团长。

随着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的激化，杨虎城部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利用这个矛盾，1928年秋，赵寿山率领全部留陕部队脱离冯系控制，离开陕西向山东进发，在单县与杨部在前方的部队会合，改编为暂编二十一师，赵寿山任第七团团长。

1929年4月，杨虎城率部投蒋。部队调至河南，击溃了唐生智所部，占领了南阳、驻马店。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杨虎城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参加了对冯、阎作战。杨虎城率部自豫西转战入陕。赵寿山任南阳后方留守司令，后又随军先后攻占洛阳龙门。在进军陕西潼关时，赵部绕道潼关南太峪镇，继出潼关西十里的吊桥，迫使驻守潼关的冯系宋哲元部仓皇北撤朝邑，从而占领了陕西大门潼关，保证了杨部向西安进军。赵寿山部还在渭北收编了宋哲元余部八千余人，继之又在蒲城地区收编冯系刘郁芬余部八千余人。10月杨虎城受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率部驻三原，升任第十

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

同年12月，赵寿山旅奉命进驻汉中。赵任汉中绥靖区司令达四年之久。在这期间收编了冯系王志远旅为独立旅；击退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田頌尧侵占汉中的部队；消灭了陕南土匪王三春、李纲五、罗也辉等部，统一了汉中地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转移至川陕途中路经陕西，11月27日进逼长安，击溃杨虎城部十七师及警卫团。12月10日红军越秦岭，在汉中城固升仙村击溃了赵寿山旅，缴枪六百余支。汉中震惊，闭门固守。与此同时，蒋介石以追击红军为名，派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进驻陕西汉中，企图夺取陕西地盘，消灭地方势力。

赵寿山为了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作战。经过孙蔚如、杨虎城同意，他通过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关系，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在这个基础上，赵寿山经常为红军在西安采购和运送电讯及医药卫生等器材，支援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军用物资。1935年2月，这种合作为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破坏，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合作局面破裂。

3月，红四方面军由汉中地区转移，开始长征。当时在安康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也向陕北转移。赵寿山旅奉命调往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分驻在陕北黄陵、洛川、白水等地。

当时赵寿山一方面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猖狂；另一方面看到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他的部队被调到陕北前线与红军直接作战，感到非常苦闷与矛盾。他向杨虎城请假去外地看病，借此观察形势，寻找出路。10月离开陕

西，首先到达北平。刚好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看到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卖国政策。通过“一二九”，看到了广大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切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他曾经企图说服冯玉祥部下宋哲元、韩复榘共同合作，从泰安迎回冯玉祥，建立北方政府，抗日反蒋，挽救国家危亡。但由于冯系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实现。不久，他由北平至南京，随即转到上海。在上海半年多时间内，他与抗日救国会的进步人士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人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影响。又读了一些进步书报杂志，分析了形势，自称“知识一天一天的增加，思想也就因之明朗化”^②。从此，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基本上形成了抗日、反蒋、联共等主张，思想上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1936年10月，赵寿山回到陕西，向杨虎城作了多次汇报，并上了“抗日建议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共产党与红军，联合东北军，加强十七路军内部团结。赵寿山激动地向杨建议：“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③这些建议对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作了大量工作，保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赵寿山接受中国共

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当时他任省会公安局局长，负责治安。他号召全体警士“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保护爱国青年，拥护救国团体。我们要作革命的警士，爱国家救民族的警士，不要做那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的工具”^④。为了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杨虎城又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城，将十七路军主力集结到泾阳、三原一带。这时，红军为了配合作战，主力也开到关中一带，驻三原云阳镇和富平庄里镇一带。在这期间，赵寿山多次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罗瑞卿等面谈，他的司令部也成为红军南下的联络站，十七路军因此广泛地受到了抗日教育。他公开向共产党表示“准备上山入伙”^⑤（意思是参加红军、参加共产党）。他接受了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工作的建议。1937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委派申敬之为特派员到十七师工作，派蒙定军、胡振家负责领导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杨晓初、崔仲远等相继来十七师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回国即被蒋介石逮捕。赵寿山对此极为不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说“赵寿山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

的化身”^⑥。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开拔，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10月，赵部十七师一万三千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夺取井陉车站，退守砭驴岭战斗中，日军两面夹击，飞机、炮火猛烈，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赵寿山临危不惧，亲自带领官兵与日军血战十三昼夜，始终坚守了娘子关正面阵地。但由于指挥不统一，参战各军有的企图保存实力，在激战中右翼溃退，十七师后方受到敌威胁，不能不撤出战斗。部队经苦战后仅存二千七百余人。这次战斗对十七师来说是一曲悲壮的凯歌，曾给日军以重创。

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逃。十七师这时已疲惫不堪。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寿山接受了建议，率部经太原以南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在八路军河防部队萧劲光旅帮助下进行了整训。赵寿山先后至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年底至1938年，十七师先后在洪洞、赵城及晋东南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等地开展游击战，直接受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指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被任命为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背靠黄河、面向日军，开展了长期的斗争。同年冬，赵

寿山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茅津渡举办了训练班，自任班主任，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训练班提出四大口号：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三大禁令：禁烟（禁吸大烟）、禁赌、禁嫖^⑦。训练班进行了国际时事和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教育，明确指出蒋介石如果抗战就拥护他，不抗战就反对他，教育官兵要团结奋斗，抗战到底。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师、旅、团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了两年四个月的战斗，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扫荡，保住了原有阵地。日军由于大量被杀伤，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称中条山是他们军事侵华的盲肠炎^⑧。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也称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⑨。

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的这种变化和赵寿山的“赤化”极为恼怒，于1941年1月下令南调至黄河以南，在河南巩县、汜水、荥阳一带集结。不久中条山即为日军占领。赵部三十八军作为河防大军一部，驻守黄河铁桥南端邛山头桥头堡阵地二年多。

这时国民党已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入党。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1944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蒋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军长，实行其“抽梁换柱”“分编遣散”阴谋。赵寿山临走前向旧

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作了布置。三十八军一部二千三百余人，遂于1945年7月17日在河南洛宁之故县镇起义，投奔解放区。以后以这一部分队伍为基础，成立了西北抗日民主联军三十八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寿山决定脱离国民党奔赴解放区。他借口去美国考察水利，于1946年11月卸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到达南京、上海。然后在共产党的秘密护送下，由上海经北平、天津，于1947年3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6日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告起义。

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为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赵寿山转到政府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过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4、1959和1964年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和1964年先后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赵寿山于1965年6月20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注：

- ① 赵寿山：《自传简历》，未刊稿。
- ②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未刊稿。
- ③ 同上。
- ④ 《公安局长赵寿山告诫部属阐述一二·一二意义》，西安《解放日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⑤ 同②。

⑥ 张严佛：《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⑦ 范明：访问记录。

⑧ 孙蔚如：《回忆录》，未刊稿。

⑨ 同②。

孙 蔚 如

靳英辉

孙蔚如，1896年1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出生于所谓“耕读传家的诗书门第”。祖父、父亲务农，伯父、叔父均有功名，居乡课读，兼务农事。孙蔚如自幼随父辈读书，1910年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后入长安高等小学校。1913年入西北大学预科（旋改为省立第三中学）。是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5年夏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班员。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反对北洋军阀。在讨袁战争时，经友人李桂棠、杨景震介绍，于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底，在陕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号召，组成陕西靖国军，反对段祺瑞政府及陕督陈树藩。孙蔚如入靖国军第三路第二支队第一营任连长，在反对北洋军阀军队围攻陕西靖国军的战斗中，初立战功。以后，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直系改编。孙蔚如于1922年初转入继续坚持靖国军旗帜的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任第五营营副，旋任营长。这是孙蔚如和杨虎城长期共事的开始。4月，靖国军在武功、马嵬坡附近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半月余，孙蔚如两臂负伤，部队也因众寡悬殊，处于不利地位。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和杨虎城商定：“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① 部队遂转移陕北，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此时井尚未投靠北洋军阀），保存实力，以待后命。

1923年初，孙蔚如伤愈后，返回陕北。这时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孙任中校团附。他负责招考进步青年学生，成立安边军事教导队，兼任队长，为部队训练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吴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这时的学员，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基干力量；不少人在抗战前后反蒋起义，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军事干部。

1924年冬，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推翻了曹錕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建立起国民军。杨虎城的部队即出山响应，回师关中，对北洋军阀部队作战。孙蔚如任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兼教导营营长、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在陕西省汧阳（今千阳）、陇县地区击败甘军孔繁锦部，并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重创吴军，使关中西部的北洋军阀无力东犯。1926年初，吴佩孚指使军阀刘镇华等拼凑十万之众，在陕西土匪武装的内应下，侵入潼关，围攻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孙蔚如率部参加了坚守西安的斗争。这一长期斗争，拖住了北洋军阀的十万部队，从侧背上威胁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军队，遥相援应了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1926年冬冯玉祥率国民联军解西安之围后，翌年春率军东出潼关。杨虎城就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孙蔚如任第十军参谋长、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师长等职。10月率部出关参加北伐战争，协同

友军在豫东与北洋军阀张宗昌部队会战。年底攻克徐州。战后移防皖北、豫东一带训练。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孙蔚如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②的主张，力求保持中间立场。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孙就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有密切接触，并涉猎共产主义书籍。但他不信仰共产主义，只信仰三民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分子，共产党活动很困难，很多共产党人到孙蔚如部队中工作。孙蔚如师部的政治处长曹力如就是共产党员。孙蔚如在一次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对于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严加指斥，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③1928年春，杨虎城赴日本，由孙蔚如代行军务。这时，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孙蔚如给共产党人发路费送出部队，没有伤害一个。1929年孙部在南阳驻防时，部队内的共产党组织曾有兵暴计划。事情败露后，孙蔚如即将这些暴露的共产党员送出部队。^④对“时而容纳共产党人，时而送走共产党人”的这种作法，他自己说：“我既反对右倾的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的暴动政策。”^⑤他也很注意军民关系的处理。1929年驻防山东时，部队在蒋、冯的斗争夹缝中争取生存，粮饷困难，常以杂粮果腹，“而军纪整饬，为时所称”。^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东北，而对内则加强反共独裁。11月，被打倒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辗转到达兰州，由甘肃、四川、青海、宁夏等地方军阀拥戴为中国国防军总司令。自称甘肃省保安司令的雷中田，也

在甘肃打出独立旗号。孙蔚如当即奉杨虎城之命，带领所部两个旅入甘，在静宁、会宁、定西等地击败雷中田部，驱逐了吴佩孚，慑服了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军阀，稳定了西北局势。12月，孙进入兰州，主持甘肃省政，起用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等，安抚流民，整顿经济。杨虎城曾数电蒋介石，要求以孙蔚如为甘肃省主席，均遭拒绝，仅委以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曾建议杨虎城弃陕西，经营甘、宁、青、新四省，与苏联取得联系，形成一个进退有据的基地，以在未来时局中应付蒋介石的压力和外患日深的局面，时人称为“大西北主义”^①。以后，由于蒋介石的排挤打击，孙部被迫撤出甘肃，移防陕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卖国和排斥异己的行为，加深了孙蔚如的反蒋抗日情绪。在1933年至1935年驻防陕南期间，孙采取了与革命力量联络，反蒋抗日的立场。他在路过张良庙时，曾刻石“借君之椎，以椎暴日”八字，借申其志。从1933年开始，他奉杨虎城的指示，派参谋武志平（地下共产党员）赴川陕苏区与川北红四方面军秘密联系十数次。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商谈互不侵犯及共同反蒋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形成停战合作的局面。孙蔚如曾送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陕南各县、甘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讯器材、医药器械等物^②。这种合作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为止。

1935年秋后，孙蔚如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杨虎城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蔚如执行了与红军停战合作的方针，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掩护红军人员和物资过境。在被蒋介石逼迫

无法时，即遵照杨虎城的指示，用打假仗的办法迷惑蒋介石。1936年西安事变时，孙蔚如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他赞同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结束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其部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第十七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孙蔚如历任第三十八军军长、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战区受降长官等职。他对日作战积极，曾派出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进展。日军逼近黄河时，盛传将有西进陕甘的行动，飞机也频频侦察、轰炸关中和西安地区。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放弃关中，并已遣送其眷属及高级人员分乘飞机、火车逃亡成都、宝鸡等地。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一次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坚决表示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守土抗战”的通令：“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⑨。使主张撤退逃走的人惭愧缄默，人心也安定下来。

1938年7月以后，孙蔚如长期在华北地区率部抗击日军。直至1940年奉命守备晋南中条山地区，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保住了原有阵地。日军由于被大量杀伤，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称中条山是他们军事侵华的盲肠炎^⑩。以

后孙蔚如部移防河南，曾于1941年从日军手中收复郑州。

孙蔚如的司令部和属下部队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他的部队一度曾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⑩他曾邀请中共和八路军派人代为训练干部，在茅津渡办了训练班。在孙部特别是第三十八军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军长赵寿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部队政治工作按着人民军队的办法开展起来，提出了“不嫖、不赌、不吸烟（鸦片烟）”的三大纪律和“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⑪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演出革命戏剧。当时国民党中流传着“这支部队赤化了”的说法。蒋介石极为恼怒，派遣特务进行监视、分化、挑拨等活动，企图削弱、拆散这支革命力量。并曾数电孙蔚如，勒令交出第四集团军中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但都为孙搪塞过去，没有交出一人。1944年，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将孙部主力三十八军的军长赵寿山调任第三集团军司令，而将其嫡系张耀明调任三十八军军长，赶走三十八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军官。并借口战局紧张，将孙部三十八军拨归其嫡系刘戡指挥，九十六军拨归川军李家钰指挥，调孙蔚如到重庆将官班受训。1945年6月，又以假提升的伎俩调孙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至此，孙的实权被蒋介石剥夺净尽。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蔚如兼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曾连电辞职，未获准。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旋改行轍，孙蔚如为副主任，是蒋军系统中完全没有权力的一名备员。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加紧逃台的准备工作，并威逼孙蔚如逃往台湾。孙蔚如乃于7月携家避

居杭州，并将原带之警卫团扩编为旅，后改为二三二师，随程潜驻长沙。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孙派秘书王子义前往长沙，授意该师相机起义。后程潜起义，就是以该师为警备进行的。1949年春，解放军向上海挺进。孙蔚如以经沪赴台为名，至沪潜居，与共产党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迎接了全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孙蔚如于1950年8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第一、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因病逝世。

注：

- ① 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革命旗帜》。
- ② 米哲沅：《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8页。
孙蔚如：《自传》，未刊稿。
- ③⑤⑦ 孙蔚如：《自传》。
- ④ 杨虎城的许多老部下，都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两件事。实际上，孙蔚如这种立场为十七路军所共知，直到解放后，还为人们所称道。
- ⑧⑩ 《中国名将录》，第45、46页。
- ⑨ 中共汉中地委党史调查室访问徐向前、傅钟的记录。另据武志平的回忆。
- ⑪ 《西北文化报》，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八日。
- ⑫ 《在孙蔚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陕西日报》1979年8月2日。
- ⑬ 赵寿山：《与蒋介石廿年武装斗争史》。另据蒙定军的材料《回忆三十八军党的地下工作》。蒙当时为三十八军中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

吴 奇 伟

戴仰明 林熙敦

吴奇伟，字晴云，别号梧生，广东大埔县人。1890年1月28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八）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岁时在龙川县城伯父开设的一间店铺里打杂，勤恳苦干，为伯父所喜爱，资助入学读书。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转入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后，回到广东在陈炯明部见习，逐步提升为排长、连长和营副等职。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吴奇伟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属下的第三十六团任中校参谋长。汀泗桥之役，第四军叶挺的独立团和黄琪翔、吴奇伟指挥的第三十六团，攻破了吴佩孚坚守的据点，战功卓著，使北伐军得以乘胜进攻武昌。1927年春，吴奇伟以战功升任第三十四团团长。随即在河南上蔡、东、西洪桥对增援吴佩孚的张作霖部作战。北伐军进军河南胜利，不久即与由陕西向东出兵的冯玉祥部配合，击败奉军，占领郑州、开封。吴在这次战役中作战勇猛，腿部受伤。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后，吴奇伟团随张发奎部进驻南昌。9月，张发奎率部回粤，吴奇伟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四团团长。

张发奎部回到广州后，在汪精卫的策划下，11月和黄琪翔搞了个“张黄事变”。李济深、黄绍竑被迫离开广州，桂系部队沿西江败退。吴奇伟奉命赴西江追击。12月中旬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张发奎急命吴奇伟率部集中惠州，防备驻在东江一带的李济深部队回师广州。广州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广州复为李济深所得。张发奎、黄琪翔逃往香港。缪培南接替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任第十二师师长，驻兵惠州。1928年1月，第四军在五华县双头圩、岐岭一线，以两天时间迅速击溃了陈铭枢指挥的李济深东路军四个师。吴奇伟率其全师精锐向连平方向穷追，远离主力。缪培南指挥第四军其余四个师在潭下圩一带迎击李济深的西路军四个师，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吴奇伟率部赶回时，第四军已弹尽不支，因此被赶出广东，退到江西的安远、会昌地区集结。投靠了蒋介石。

5月，蒋介石把第四军调到徐州集训。然后命其沿津浦路北上，进攻张宗昌的部队。攻下了济南、德州，进驻沧州。同年夏编遣会议后，蒋介石把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原第十二师缩编为第十二旅，吴奇伟任旅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四师由山东调回江西九江。旋即赴湖北沙市、宜昌间，与驻在该地的桂系部队作战。4月桂系战败，第四师收编了桂军的一部分。不久，蒋介石命第四师乘船东下，阴谋在该师经过武汉时缴械。张发奎在香港获悉蒋的阴谋，秘密赶赴宜昌。9月，通电反蒋。并将第四师的番号恢复为第四军，经湘西开往广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组织“张桂联军”，企图夺取广东地盘。1930年2月第四军为陈济棠所败，绕道广东南

路退却，损失很大。只得将三个师并为一个师，恢复第四师名称。张发奎为师长，吴奇伟任三十四团团长。

5月，蒋、冯、阎争权的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又乘机而起，进兵湖南。6月攻到长沙，赶走了何键。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命，派兵入湘增援何键。第四师腹背受敌，又退回广西。这时第四师已不足两个团，白崇禧给它补充了一个团，凑成一个师。张发奎于年底离开第四师，由吴奇伟任师长，驻防柳州。

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和西山会议派集中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后，宁粤两个“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不久，蒋汪合流，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汪唆使张发奎以开赴黑龙江支援马占山抗日为名，把吴奇伟部调离广西。吴部开拔后，经湖南醴陵时，蒋介石曾密令何键将吴部就地解决。吴利用蒋何之间的矛盾，顺利通过湖南。抵达江西樟树镇后，陈诚派罗卓英（与吴同乡）诱吴投蒋，并给吴军费五万元。

吴奇伟投蒋后，第四师又改为第四军，吴任军长。蒋介石随即派其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吴为了保存实力，不肯卖力。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蒋命吴部归薛岳指挥，开往湖南衡阳、祁阳一带堵击红军。红军进入湘西南向贵州前进途中，吴部隔河并行，互不开枪。吴部经湘西芷江到达贵州镇远时，见红军已进入川贵边境，遂回贵阳附近整训。红军三渡赤水，回师遵义，吴奉命驰援遵义。吴渡过乌江后，获知遵义已被围困。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已从遵义逃出，却要吴部火速前往。吴部进抵遵义以南四十余里的大托铺附近，停止不前。

旋红军突然回击大托铺，吴军惨败，漏夜退回乌江南岸。蒋介石得知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赶到贵阳，召见薛岳和吴奇伟。吴自知尾随红军又不救遵义之急，将受到蒋介石的谴责，立即向蒋请罪。此后吴部撤至贵阳附近整训。红军南渡乌江，远离贵阳西进后，吴部又尾随红军经安顺、盘县，一路“送行”到雅安。吴部在雅安整训后东调。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吴奇伟奉命率第四军到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作战数天，伤亡很大。上海沦陷后，由南京撤至芜湖、九江一带。1938年吴升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南浔线上与日军作战。10月广州沦陷后，吴部调到广东兴宁、潮汕一带驻防。1940年春，吴率其一部防守广西柳州。不久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驻湖北三斗坪。同年6月，陈诚弃守宜昌后，吴指挥所属在湘北、鄂西的澧县、安乡一带作战，击退日军进攻。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奇伟任湖南省主席。这时他已成为“无兵司令”。一年后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为薛岳）。他们指挥所部进犯苏北、鲁南解放区，屡吃败仗。吴对抗战胜利之后再打内战，意态消沉，内心矛盾。1947年春托病住进南京汤山疗养院。

不久，吴奇伟又听从张发奎的安排，同张一起回广州，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吴感到蒋介石的覆灭已指日可待。1948年8月，在中共地下党和旧部的帮助下，思想上有很大转变。1949年2月，秘密离开广州赴香港，通电起义。吴驻在东江一带的旧部两个保安团和其他若干部队，也举行了“东江起义”。从而加速了广东的解放。

解放后，吴奇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年7月10日，吴奇伟因病在北京逝世。

龙 云

邵献书

龙云，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燕山人。祖籍四川金阳。1884年11月27日（清光绪十年十月初十）生于彝族统治等级黑彝纳吉家族中一个保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地主家庭。排行第四，小名毛老四，彝名纳吉岬岬。幼年丧父，在家乡读私塾，年青时拜师学武术、打拳摔跤，在当地黑彝家族中以械斗英勇著称。1911年，龙因与四川金阳黑彝黑家的一次冤家械斗中失败，遂带了卢汉等离乡外出投军。

他们先去永善，后裹胁了些人、带了些枪，自称“同志会”，逃到四川宜宾。适值辛亥革命后滇军入川，龙率众投靠了滇军梯团长谢汝翼。不久随军回滇，龙以少尉军衔与卢汉一起被保送考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1914年毕业后，龙被分发到昭通独立营任中尉排长。未几，云南都督唐继尧听说龙在拳脚上颇有两下，调他回昆明任中尉侍从副官。以后由于获得唐的信任，先后任唐的近卫军二大队中队长、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附、依飞军大队长等职。

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逼迫下台，龙云以依飞军大队长护送唐从昆明去滇南。唐旋即由蒙自出走香港，临行改委龙为近卫第十一团团长，与拥唐的第二卫戍区司令兼蒙自道尹李友勋同驻蒙自地区。同年秋天，李、龙恐不容

于顾，借响应孙中山讨陆荣廷桂军之名进兵广西，龙被委为李友勋旅的梯团长，攻下柳州后任柳州警备司令。1922年1月，李、龙及在桂拥唐的滇军，在唐的策动下，抗拒随同孙中山北伐，拥唐反戈回滇讨伐顾品珍。时李任唐的靖国军第一军军长，龙为该军前敌司令。回滇途中李友勋为广西自治军击毙，唐委龙为该军代理军长。3月，讨顾胜利，唐再度统治云南。此后龙被委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1925年初，唐借口讨伐顾在广东之余部，企图染指两广，出兵广西。龙为一路，任总指挥。2月25日龙部占领南宁，但后因其他各路滇军战事失利，龙等入桂滇军于是年秋撤兵回滇。1926年秋后，唐撤销了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龙任昆明镇守使。

1927年2月6日，龙云与唐继尧部下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因不满唐任用亲信、排斥异己，趁北伐战争胜利进展之机，发动了倒唐政变。政变后四镇守使成立了云南省务委员会，推胡为主席兼军政厅长，龙为委员兼云南讲武学堂校长，唐则为有名无实的总裁。5月23日唐病死，四镇守使间矛盾加剧。先是胡、张等联合攻龙，6月14日扣龙于昆明。由于胡、龙前此曾分别派人到当时广州国民政府活动，同日，蒋介石任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为第三十九军军长。7月1日，云南正式易帜。7月中下旬，因龙部卢汉由滇西反攻获胜，胡等劫持龙退出昆明。后因胡得悉唐之余部拟勾结其内部将领趁虚占领昆明，在途中释放了龙云。月底，龙重占昆明。8月，代理省主席。1928年1月，在龙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蒋介石指定龙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

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后又改委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至1929年秋,龙先后击败了胡、张及支持他们的黔军和川军,同时也击败了唐的余部,统一了云南。

1930年夏,龙为扩张势力,就任蒋介石所委的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出兵广西,派卢汉为前敌总指挥。事先蒋许以攻下南宁后,广西地盘归龙统治,省政府主席由卢充任,后因卢久攻南宁不下而罢。1931年3月,卢汉等四师长,因对龙在用人和安置遣散编余官兵等方面不满,向龙进行兵谏,为龙所瓦解。

龙云在逐步统一云南期间,曾对省内中共党人进行过捕杀。为进一步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从1931年起,逐步整顿军队,设立军官学校,并通过法国商人向法、比、捷等国购买大批武器。到抗日战争前,已培植了一支完全由他指挥,给养也都由地方自给的正规滇军三万多人。在经济上,龙除直接通过省财政厅、富滇银行等机构榨取各族人民外,还以“官商”和个人或集股名义在云南大力发展地方官僚资本。他极力扶植云南等地彝族中的统治阶级充当党、政、军各种要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龙、卢、陇、禄、陆、安彝族六姓家族为主体的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集团。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黔滇时,蒋介石委龙云为中央“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龙既怕红军长驱直入,又恐蒋驱兵“假途灭虢”。他组织以孙渡为司令的第三纵队,在黔滇川边境极力阻堵红军;又组织兵力加强云南境内的防守。1936年3月,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黔滇时,蒋委任龙云为黔滇绥靖公署主任,龙仍派孙渡率第三纵队开往贵

州尾随追击过滇红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命龙云将云南军队编为第六十军，派卢汉为军长开赴前线。六十军将士抗战士气旺盛，对日作战英勇。1938年3、4月间，参加鲁南台儿庄对日战役，颇著战功。同年7月，龙请准了蒋，由云南补充士兵将第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卢任军团长。年底，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三个军。初由龙兼总司令，卢为副并代总司令职，后由卢任总司令。在龙云趁抗日之机扩大自己实力的同时，蒋介石对抗日前线的滇军进行了多方拉拢与分化。

龙云对汪精卫一向很推崇。1938年12月18日，汪以“赴滇讲学”为名，逃离重庆。汪路过昆明时，曾与龙云密谈所谓“和平运动”，龙赞成汪的主张。19日，龙亲往机场送汪去越南河内。汪在河内被蒋介石特务暗杀未遂，龙曾派人前往慰问。1939年5月6日汪抵上海，不久即在《中华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登出了汪的《感谢云南龙主席》的谈话。在此前后，龙汪之间密使往来不断。1940年5月，第一集团军代理总司令高荫槐回滇述职，龙曾要高将部队秘密由赣北前线移驻湘西，拟伺机通电对日主和，但大部队秘密调动既不可能，对日议和亦为前线将领所反对。这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河内。龙云为避免其第一集团军为蒋介石吞并，以防守滇南为由，要求蒋把其中的两个军调回云南。蒋只准调回第六十军，成立滇南作战军，派卢汉为总司令。同时借机陆续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而原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以后这部分滇军，在蒋的进一

步拉拢与分化下逐渐脱离了龙、卢的控制。1944年底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时，龙的投降活动又有所抬头，他曾指示当时省民政厅长丁兆冠授意省议会通电拥护汪伪政权，但为省议会反对而罢。1945年初，云南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卢为总司令，名义上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但龙、卢只能控制第一集团军，后者系蒋的嫡系关麟征部，实际上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给龙云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衔。名义上在滇的国民党中央部队统归龙云节制，事实上是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加紧控制。龙、蒋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此时，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蓬勃开展。龙也有意开放一些民主运动，并与民盟等一些民主人士以至中共党人往来结交，借以自重。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当时昆明有“民主堡垒”之称。龙、蒋之间的矛盾也就更为加剧。

这时，蒋介石已决心要解决龙云，并作了些准备。抗战胜利后，蒋为全力投入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遂加快了倒龙的步伐以解除后顾之忧。1945年8月，蒋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全部离滇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又命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和在滇蒋的嫡系部队为倒龙作了周密布署。9月底，蒋亲自坐镇西昌，就近指挥。10月1日，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去越南河内，利用龙卢之间的矛盾，对卢进行威胁利诱。3日，蒋命杜聿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云南省政府主席由卢汉继

任，在卢未到任之前由新任省民政厅长蒋的亲信李宗黄代理。同日，蒋以同样的内容向卢宣布。6日，在兵临城下和入越滇军又不返滇“勤王”的形势下，龙云满怀愤懑被迫去重庆接任新职，从而结束了他对云南十八年的统治。

然而，龙云并不甘心这次失败。同年12月，滇军将领去重庆开会，龙曾秘密策动他们抛弃卢汉，反对蒋介石要调全部入越滇军去东北参加内战的决定。要他们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返回云南，公开反蒋。1946年春，入越滇军被迫全部开往东北，龙最终失去了他企图赖以东山再起的武装力量。5月下旬，龙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6月中旬，龙以祭谭延闿墓为名，去被炸平的汪精卫墓地凭吊。不久，军事参议院裁撤，成立战略顾问委员会，龙任副主任，代行何应钦的主任职。这年秋天，龙要去杭州游览，为蒋所拒。翌年夏天，他欲赴上海为其独女出国留学送行，蒋亦不许。龙实际上过着软禁生活。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他风闻蒋要挟持他去台湾，在“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大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于12月8日逃离南京飞往香港。

龙云在重庆时，曾继续与民盟人士保持联系。当时罗隆基等曾有让龙担任民盟主席之议。打算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号召。龙表示可在幕后支持。以后龙在南京和香港时，与民盟、三民主义同志会、民革都有广泛的接触，并曾出巨款予以资助。龙在香港参加了民革。1949年1月，当民革负责人李济深离港北上后，他曾主持过香港民革的工作。其间，他与共产党人也有联系。

龙云抵港后，先后通过旧部和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尽早

反蒋起义，并表示“滇事由弟（指卢汉）主持，外面接头由兄（龙自称）负责”。但由于他们都想以云南作为各自的政治资本，而当时卢对时局还存观望之心，两人步调始终难以一致。与此同时，龙还先后派其亲属、旧部等返滇直接组织武装队伍。当时滇东的所谓“西南人民革命军”、滇南的“中国人民自卫军”、滇西的“共革盟”军（即所谓中共、民革、民盟）等，都是在他直接或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打着“革命”、“自卫”等旗号，招兵买马，危害地方，并未起到龙原期的扰乱国民党武装、促使卢汉起义的作用。3月底，龙为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企图利用桂系与蒋、卢之间的矛盾，派其次子到广州找广东省主席薛岳，托薛转告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希望他们能让他重返云南任滇康绥靖公署主任。4月初，他又派其长子到南京找李等作进一步活动。但不久南京解放，龙终未如愿。

是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二十多年来，龙从拥蒋到反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此时公开表示彻底与蒋介石决裂，受到了中共和人民的欢迎。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龙被列为特邀代表。1950年1月龙由香港来到北京。

解放后，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及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等职。1957年，龙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龙云因病在北京去世。28日，摘去右派分子帽子。1980年7月，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

卢 汉

邵献书

卢汉，字永衡，原名邦汉，彝族，云南昭通燕山人。1895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生于彝族统治等级黑彝古迪家族中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曾捐过一个游击，父亲在乡间靠剥削为生。卢汉排行居长，清末曾在昭通“考棚”读书。1911年十六岁时，跟随龙云离乡外出投军。

龙、卢等先去永善，后裹胁了些人和枪，自称“同志会”，逃到四川宜宾，投靠了辛亥革命后入川的滇军梯团长谢汝翼。旋即随军返滇，以准尉军衔与龙云一起被保送考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1914年毕业后，卢随滇军入川，历任排、连长，至1917年任成都兵工厂营副营长。1920年滇军在川失败，1921年初卢随军返滇。2月，云南滇军总司令唐继尧被部下顾品珍逼迫下台，时卢任近卫第十一团（团长龙云）营长，驻蒙自地区。秋天，龙、卢等恐不能立足于滇，乃借响应孙中山讨陆荣廷桂军之名，进兵广西柳州。1922年1月，卢随龙等拥唐回滇讨顾。3月，唐再度统治云南，卢任唐的近卫第三团团长。1925年初，唐借讨伐顾在广东之余部，企图染指两广，卢团调属第五军军长龙云部进兵广西。2月，龙、卢等攻下南宁，但因其他滇军在桂战事不利而撤回云南。卢

回滇后任龙部的第七旅旅长(当时无师的编制)。

1927年2月6日,唐继尧部下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发动倒唐政变。5月,唐病死。6月,胡、张等联合攻龙,并扣龙于昆明。卢汉等乃将龙的大部分部队带往滇西整编扩充。7月,卢等率部反攻昆明获胜,迫使胡等退出昆明并释放了龙。龙重占昆明,蒋介石遂即任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此后,在云南二年的混战中,卢为龙部的骨干第九十八师师长,帮助龙当上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击败了各个反对势力,统一了云南。

1929年底,卢汉以军人身份兼省财政厅长,对云南财政有所整顿。1930年夏,蒋介石委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讨桂,龙派卢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进兵广西。事前蒋曾许龙于滇军攻下南宁后,即发表卢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地盘亦归龙统治。但卢久攻南宁不下,乃于1931年2月撤兵回滇。在由桂返滇途中,卢秉承龙的旨意,对庞杂腐败的滇军进行裁并。但龙对编余官兵不予安置,加之长时期来龙在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卢等四师长的不满。四人于3月在宜良举行会议,以“清君侧、去金壬”为名,向龙进行兵谏。但因内部发生分裂,被龙反过来扣押了他们。龙撤去了四人的职务,并废师改旅。未几卢等获释,以后他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统兵。但云南的军政大计还是与闻,并曾任全省团务督办。省内的财政整顿,向法、比等国购买武器等,亦由卢主其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借“抗日”之名,命龙云将云南军队编为陆军第六十军,派卢汉为军长。卢于9月率部开赴前线,官兵抗战士气旺盛,长途跋涉四千余里,步行

四十八日抵长沙。1938年春，第六十军驻武汉时，蒋曾调团长以上军官到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派卢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并多方对该军进行拉拢与分化。这时卢亦乘机活动，第六十军破格获得特种军的编制。3、4月间，卢率部参加了鲁南台儿庄对日战役。全军将士作战甚勇，重创敌军，颇著战功。7月，由云南补充士兵，第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辖三个军，卢为军团长。10月，卢因病离开部队，先后在长沙、贵阳、昆明就医。12月，第三十军团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仍辖三个军，初由龙云兼总司令，卢为副，并代总司令职，后由卢任总司令。1939年间，蒋介石名为酬卢，许充贵州省政府主席，但当卢去重庆商谈就职事时，蒋又只允他带一个秘书长到任。他不愿当光杆主席，适值旧病复发而罢。卢的第二次省主席职又成画饼。

1940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占越南河内。蒋介石为敷衍龙云提出的防守滇南要求，准将第一集团军的第六十军调回云南，成立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驻昆明。此后蒋亦借机派自己的嫡系部队陆续开进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而湖南前线的原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这部分滇军，以后在蒋介石的进一步拉拢与分化下，逐步脱离了龙、卢在云南的遥控。1945年初，在滇的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卢为总司令，移驻开远。第一方面军名义上辖第一、第九两集团军，但龙、卢只能控制前者，后者关麟征部系蒋的嫡系，实际上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全力投入反共反人

民的内战，解除云南后顾之忧，必欲调空在云南的滇军，即命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开赴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受降。在此前后，蒋为解决龙云作了一系列的准备。10月1日，蒋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去越南河内坐镇，并利用龙、卢矛盾，对卢进行威胁利诱。3日，蒋命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宣布免除龙的云南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持蒋给卢的亲笔信见卢，宣布由卢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未接任前由蒋的亲信新任省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这时，卢在越按兵未动，不久还对滇军进行整顿，撤换了一批亲龙的将领。11月，卢去重庆参加蒋的复员整军会议，同意蒋命令入越滇军全部开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的决定，并回云南接任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等职。12月1日，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等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屠杀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和教员。就在这一天，卢宣布任省主席职，并提出一个“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

1946年春，入越滇军被迫分两路先后开赴东北。5月31日，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给卢汉以很大震动。6月，卢开始在昆明组成省保安总司令部。但蒋介石仍保留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由其亲信霍揆彰充任。霍用保安总部的名称和经费，以警备总部的人员编成保安总队，由霍指挥，卢不得过问，只给卢留一个警卫营。这又一次刺激了卢。7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霍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8月，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云南警备总司令以何绍周继任，名义上归卢节制。但何依仗蒋势，气焰嚣张，卢无可奈何。与此同时，蒋

介石安插在云南的其他亲信，亦多方与卢为难。1947年6月，在卢的主持下，把省经济委员会和省企业局等单位改组为“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卢任董事长，以抵制蒋介石攫取云南资财。10月，卢受蒋命去东北第六十军进行抚慰，见军心涣散，东北已难支撑，感前途险恶，更加增进了他对蒋的离心力。

自1948年冬起，尤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卢汉趁蒋介石欲借重云南之机，先后向蒋请准了保安总队归保安总部建制、撤销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等要求。又继续鼓吹其“保境安民”、“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同时，利用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等资财，大事扩充保安总队，极力增强地方实力。这时由南京逃往香港的龙云先后派人与卢汉联络，策动他尽早反蒋起义。但卢此时对时局尚存观望之心，两人步调始终难以一致。1949年2月12日，昆明市民传闻部分金元券为伪票，纷纷前往中央银行挤兑。卢不问青红皂白命宪警就地枪决了无辜市民二十一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惨案。

5月，云南绥靖公署成立，卢为主任。

1949年秋初，卢汉眼看蒋介石政权朝不保夕，便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自谋出路。曾向美国请求帮助云南独立，遭到拒绝。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他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的联络，又派人由香港到北平向中共联系。8月，卢还派人联络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并通过刘联络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约同他们在适当时机共同反蒋起义。与此同时，卢在不损害其统治地位的原则下，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展开了反压制斗争，如拒绝桂军入滇、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

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卢汉的这些自谋出路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注意。这年秋天，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极力主张采用武力把云南纳入其势力范围，并派遣军队兼程入滇。但蒋介石集团不让桂系独占云南，抬出“和平解决”予以对抗。卢与桂系夙怨很深，自忖实力尚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远在湘鄂一带；在蒋与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再三催迫下，卢乃于9月6日去重庆就范。蒋允许云南的保安团编为两个军，卢也答应回云南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整肃”。9日，在大批特务挟持下，卢在云南开始了全面的“整肃”：先后逮捕进步人士八百多人；布署“围剿”边纵；解散省参议会和部分进步大中学校；查封一些进步报刊；部分改组省政府；发布反共文件和进行反共宣传等。

不久，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向桂、黔、川等省进军，云南革命形势发展亦很快，“边纵”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蒋介石在云南的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已处于战略包围之中。这就促使卢汉认清了形势，决心投向人民，走上反蒋起义的道路。11月3日，李宗仁为实现桂系残部在桂滇一带继续负隅顽抗的图谋，以代总统名义来到昆明巡视，对卢进行游说拉拢。此时卢已决心起义。李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被卢利用他和蒋的矛盾，经他同意于是月中下旬先后全部释放了在“整肃”中被逮捕的进步人士。“整肃”工作无形停止。与此同时，卢宣布请病假两周，在家专心筹划起义。他先后派人去广州联系中共领导，又联络“边纵”牵制蒋军；拒绝蒋派张群来昆明建立反共基地；调整兵力部署，并成立昆明警备司

令部,具体执行起义任务等。为适应新的环境,卢下决心戒除了多年的鸦片烟嗜好。12月9日,正当人民解放军三面包围成都,蒋介石将对云南实行新的反共阴谋时,卢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11日,正如卢后来所说的,为给自己留有后路,他私自放走了在起义时被扣押的张群。16日到21日,在中共地下党和全市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以兼程援滇的人民解放军为后盾,卢主持了昆明保卫战,击退了蒋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对昆明的进攻。

解放后,卢汉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多年来,他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对促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病在北京逝世。

唐 继 尧

谢本书 孙代兴

唐继尧，字蓂赧，云南会泽县人。1883年8月14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生于地主家庭。他家“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他六岁入私塾，十五岁中秀才^①。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军事，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唐继尧不久即加入。同时，唐与少数人另组“陆军团”和“武学社”^②。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活动，引起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起程回国。唐继尧不同意罢课，甚至号召留日学生安心学习。1906年，唐继尧在振武学校毕业，入金泽第九师团炮兵联队见习。见习期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

1908年4月，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消息传至东京，留日云南人士开会庆祝，而唐继尧却持消极态度。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有人怀疑为唐继尧“稟揭”^③。同年唐继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9年，唐继尧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提调，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等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同盟会员闻讯密议于李鸿祥、唐继尧宅，准备响应。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在蔡锷、李根源等领导下，云南起义爆发，唐继尧协同进攻督

署。第二日昆明起义成功。全省迅速光复。起义官兵组织了“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军都督，唐继尧被任命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讲武学堂总办，后又兼陆军干部学校校长。

1912年1月，蔡锷派韩国铄、李鸿祥等率部“援川”。继又派唐继尧以“北伐军”司令名义率师与援川滇军会合，出师武汉。师未出，唐继尧又奉蔡锷之命，假道贵州，代平“黔乱”。时贵州已于1911年11月初光复，由同盟会支持的“自治学社”革命党人掌权，组成了贵州军政府。贵州立宪派为了夺取政权，由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周沆等人请求蔡锷命北伐滇军取道贵州，戡平“公口”（哥老会）之“乱”。唐率师行至平彝（今富源），蔡锷又急电唐终止入黔，援川“北伐”。但唐不受命，继续东进。蔡无可奈何，只好以“先其所急”，听之任之。^④唐军于1912年3月初，袭占贵阳。对战败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之东郊，悉数坑杀”^⑤。大屠杀后，立宪派控制的省议会推唐继尧为临时都督。5月，袁世凯政府正式委任唐继尧为贵州都督。立宪党人戴戡、任可澄做了都督府的左、右参赞，刘显世出任军务部长。

1913年，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7月，赣督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响应。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命他出兵打熊克武。^⑥唐派贵州第三师师长叶荃及混成旅长黄毓成等率部入川进攻重庆，声称要“奋其武力，剪此奸凶”^⑦。叶荃等率部入川，打败了熊克武，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⑧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云南都督蔡锷入京，另有任用。蔡乃电请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很快批准。唐继尧回滇不久，便发生了杨春魁攻占大理的事件。唐派兵镇压，“未逾月而乱平”^⑨，逼死了杨春魁，还趁机杀害了著名革命党人、辛亥起义时的滇西都督张文光。

1914年，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开武将军”兼云南巡按使，不久复以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令唐专任督理军务。1915年10月，唐继尧又以开武将军受爵一等开武侯，并接受袁世凯每月津贴三万元^⑩。

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中下级军官先后召开三次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反对袁氏帝制。唐继尧却认为，滇逼强邻，“黔则汤芑铭扼驻于湘”，川则“陈宦逼己”，因而“迟疑久不决”^⑪。但是，滇军对袁氏“愤慨异常”^⑫，唐继尧深感军心不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又闻蔡锷即将来滇，冯国璋也表示“滇发难，当继踵而起”^⑬，乃被迫同意参加反袁，并迎接蔡锷和李烈钧、熊克武、程潜、方声涛等人来昆明，共同策划。

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到昆明。21、22日，滇军将领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举行了两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袁世凯已于12月13日宣布接受帝制）。23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⑭。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同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以都督名义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反袁

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运动发展迅速。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把住大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要求袁世凯下台。同时，起义的滇、黔、粤、桂、浙五省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处理“军国重事”，唐继尧遥领军务院抚军长职，岑春煊以抚军副长代行职权。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护国战争不了了之。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人以黎元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于7月14日宣布撤销军务院。

在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时，唐继尧却将原护国军三个军扩大为八个军，继续派往四川。这件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在给唐继尧的电报中说：“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⑮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破坏《临时约法》，掀起了“护法运动”。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也宣布响应“护法”。8月2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但是，唐、陆都拒不就职。唐继尧在一个密电上写道：“中山举动，本嫌唐突”，但“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⑯。而且，唐继尧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分化瓦解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驻粤滇军，囚禁了驻粤滇军将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

1918年5月18日，广州非常国会在唐继尧、陆荣廷的支持和政学系政客的把持下，议决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

改为总裁制，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后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而实权却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孙中山很失望，还在军政府改组前夕，他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大元帅的咨文，并通电斥责滇、桂军阀，“态度暧昧，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明白地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唐继尧在孙中山的电文上批“无耻已极”，唐的秘书长周钟嶽也在电文上批“一片胡说”^⑩。而唐继尧在收到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的电报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并表示“军府改组，同深庆慰”^⑪。

唐继尧利用护法、靖国之名，出师击败四川军阀刘存厚，赶走段祺瑞派到重庆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1918年5月，亲赴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号称“联帅”）。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军相号召，唐继尧俨然又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⑫。

同年下半年开始，唐继尧利用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议，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秘密勾结。1919年11月23日，他们的代表会于衡阳，在吴佩孚提出的军事密约《救国同盟》修改稿上正式签字。在密约上先后签字的还有粤、湘、桂、川系军阀的代表。密约的附件规定：“同盟军遇有危迫时，近者以实力援助，远者以函电响应，或转托他军协助。”而且条约“永久发生效力”^⑬。

1920年6月1日，唐继尧在“废督裁兵”声中，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声言要“闭关自治”^⑭。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唐继尧连年出兵川、黔，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滇省连年兴师，民生凋蔽”^②。而滇军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③，使滇军处境十分不利。1920年爆发的川滇战争，滇军先胜后败。在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乃以“士兵厌战”为由，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大军压境，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乘滇越车出亡香港。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

1922年春，唐继尧以重金收买正在孙中山组织和指挥下准备北伐的驻桂滇军，折回云南，同时收买了滇南大土匪吴学显，从内部配合，向顾品珍发动突然袭击。顾品珍在路南天生关指挥部中弹身死。3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次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

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以后，参与“联省自治”的合唱，于同年8月1日改组省政府，实行“民治”，颁布《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并被推举为云南省长。同时，扩编所部滇军五个军为“建国军”，自号川、滇、黔、鄂、赣、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北伐。9月，孙中山为促唐继尧参加北伐，在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提议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但是唐继尧又拒不接受。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粤军陈炯明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也在1、2月间，派胡若愚、龙云率

军三万余人，进攻广西，占领南宁；又派唐继禹、张汝骥、吴学显率兵四万，进逼柳州。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即通电说，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②。广州革命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于3月19日通电讨伐唐继尧。5月，唐继尧派代表与杨希闵、刘震寰等人以及英帝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政府。6月，广州政府先发制人，击溃在粤的滇、桂军数万人。8月，在南宁、柳州的滇军亦先后败退回云南。

唐继尧为了连年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纵容匪患，并用增加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强售公债，统运大烟等手段，加紧搜括民财，过着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而滇军从广西败归后，唐继尧集团内部矛盾又尖锐化起来。1926年8月，维西镇守使罗树昌起兵永北，进攻大理；杨振寰、徐进占据保山；刘正伦亦响应于腾冲，联合声讨唐继尧。^③

1926年下半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唐继尧深感恐惧，加紧了与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并以“反共”、“讨赤”相号召，组织所谓“民治党”。1927年初，北伐军席卷了半个中国，眼看着滇系军阀唐继尧的统治行将崩溃时，唐继尧的老部下，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突于2月6日举行“兵谏”，联合发出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制”。四镇守使联合举兵，进逼昆明。唐继尧见大势已去，被迫允诺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这就是昆明“二六”政变。四镇守使推胡若愚为重新组织的省务委员会的主席，“拥戴”唐继尧为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

裁^⑩。

“二六”政变后，唐继尧“愤懑吐血，偃卧月余”，于1927年5月23日在昆明不治身死。

注：

- ① 据唐继尧的亲属说，唐继尧中秀才时十八岁，但有关唐继尧的各种传记均记为十五岁。
- ② 《唐继尧》，东南编译社编述，民国十四年一月版，第1—2页。
- ③ 庾恩扬：《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民国六年二月版，第11页。
- ④ 《援黔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章）。
- ⑤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69页。
- ⑥ 庾恩扬：《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民国六年云南图书馆发行，上册第8页。
- ⑦ 唐继尧派兵入川的《誓师词》，见《会泽督黔文牍》杂文第28页。
- ⑧ 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云南大学历史系油印稿。据叶荃的儿子叶苍绿说，二次革命结束以后，叶荃以攻熊之役虽系奉唐继尧之命令，但终以违反二次革命的宗旨，耿耿于怀。
- ⑨ 《唐继尧》，第20页。
- ⑩ 吴乾就：《从政治立场评价唐继尧》，（云南）《学术研究》1981年第五期，第14页。
- ⑪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民国三十五年版，第30页。
- ⑫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
- ⑬ 邓之诚：《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二卷二期（民国二十四年）。
- ⑭ 原电稿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卷宗号四三九（2）560。原件底稿批注：“此电已于23日午后十一时拍去”。后来报刊记载，说是限二十四时答复，实应是限25日上午十时答复。又《会泽首义文牍》（民国六年六月版）所收的这个电报，也是说限25日上午十时答复。
- ⑮ 蔡锷：《致唐继尧等靖戎电》（1916年7月19日），《松坡军中遗墨》。
- ⑯ 唐继尧在徐之琛密电（1917年9月12日）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764，第70—75页。
- ⑰ 唐继尧、周钟嶽在孙中山电文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1311，第250—261页。

- ⑳ 《承领军府总裁电》，《会泽靖国文牍》，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厅编，民国十二年昆明版，卷五，第9页。
- ㉑ 唐继尧以七省、八省或十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说法不一。这里根据《唐继尧》一书第二十二章记载归纳。
- ㉒ 谢本书：《“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谈新发现的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军事密约》，《光明日报》1954年3月12日。
- ㉓ 魏家猷：《唐会泽言行录》，云南官印局印，民国十二年五月版，第14—15页。
- ㉔ 唐继尧在向文甲函（1917年11月19日）上的批语，见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3—762，第135页。
- ㉕ 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6日）上的批语，同上，第124—125页。
- ㉖ 《唐继尧就副元帅之皓电》（1925年3月19日）。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下册。
- ㉗ 吴乾就：《再论唐继尧的政治立场》，（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三期，第37页。
- ㉘ 张若谷、李表东：《1926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3年第三期。龚自知：《龙云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

陈 炯 明

丁身尊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父亲名曦廷，是商业资本家。

陈炯明于1898年中戊戌科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就读。1908年以成绩优等毕业。1909年被海丰县推选为省咨议局议员。在咨议局的会议上，陈炯明以“仗义执言”，“建议独多”，博得一些社会声誉。

陈炯明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在同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中参加了一些联络工作。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参加党人刘思复等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陈担任统筹部（起义领导机关）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负责率领一路敢死队进攻巡警教练所。在筹备起义过程中，他借口改变起义日期，妄图取消起义。起义那天，黄兴等人率领一路敢死队冲进两广总督署，同敌人浴血搏斗时，他竟置众于不顾，单独逃跑出城。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决定在东江、西江、北江和韩江等地区，组织四路武装起义。陈炯明和邓铿被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叫“循军”。旬日之内，参加者达数千人。另外，同盟会员王和顺也在东江组织民军“惠军”，拥众数千人。起义民军直扑惠州城，声势浩大。仅半

月间，惠州所属各县即先后光复。

11月9日广州光复。胡汉民任广东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旋胡随孙中山赴南京，陈炯明即为代理都督。他以“裁减”民军为名，强行解散和镇压当时光复广州的其他民军，枪决了老同盟会员、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和民军首领石锦泉等，然后把自己所属民军改编为两师一旅的正规军。又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但对清廷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龙济光所统率的“济军”，则“优礼有加”，并委任龙为副绥靖经略。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策划反袁，密电陈炯明作好出兵准备。陈回电以“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出兵。袁世凯因广东鞭长莫及，不便直接用兵，利用陈炯明和胡汉民不和，改用分化瓦解的手段。6月14日宣布撤销胡汉民的都督职务，任命陈炯明继任都督。孙中山和黄兴主张陈炯明乘此把就任都督和讨袁结合起来，在广东举起讨袁旗帜。陈炯明就任广东都督后，致电孙中山说：“广东兵力薄弱，不能首先发难”。实则仍采取拖延之计。

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讨袁。15日，黄兴跟着在南京举兵讨袁。这一天，陈炯明还致电袁世凯，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要袁“使赣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①。直至18日，他才被迫宣布广东独立。8月4日，他手下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他一闻炮声，立即携带巨款乘法国炮艇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

命党，继续举起讨袁的革命旗帜。陈炯明这时在南洋。孙中山再三去信劝其入党，他都加以拒绝。以后，他联合了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人，在新加坡组织所谓“中华水利促进社”，拥前清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在南洋一带与孙中山唱对台戏。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各省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陈炯明见袁世凯大势已去，回到广东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活动。1916年春在惠州附近的马鞍成立了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6月6日袁世凯暴卒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派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炯明任广东督军。陈炯明随即宣布拥护北京政府，声明“军人拥兵自重为国之弊”，自愿把他的军队交中央派员改编。北京政府立即对他的声明表示“欢迎”，并派张天骥来惠州改编军队，编为二十营。以后这二十营军队又编入朱庆澜的省长亲军。

陈炯明交出军队后，即上北京谒见黎元洪和段祺瑞，深得黎、段的嘉许。黎元洪授予他“定威将军”的称号。但这只是一个空衔头，没有什么实际职权。陈炯明失望之余，转而拟竞选粤省或华侨议员，但均为他人捷足先登。1917年夏天到上海，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回到广东。

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但当时统治两广的桂系军阀，并不真心拥护护法运动。对孙中山的活动，遇事加以掣肘。孙中山极想建立一支陆军。值北洋军阀主战派派兵从福建进攻潮汕，粤省告急。孙中山派人同朱庆澜商量，要他拨

还上年陈炯明被改编为省长亲军的二十营粤军、由陈炯明率领“援闽”。朱同意拨出。

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并派许崇智、邓铿等相助。1918年1月下旬，陈炯明率部屯驻粤东，兼任惠潮梅军务督办。他把部队扩充至五个支队和两个预备队，约一万人左右。但徘徊不敢前进。为此，孙中山曾多次电（函）陈炯明，催促他从速援闽。

在孙中山的多次催促和全党人力物力的支持下，陈炯明始决心“援闽”。全军举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将士用命，勇敢作战。经过十个月的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了闽西南二十多个县，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并利用北洋军阀中的直皖矛盾，与皖系的李厚基达成停战协定。

粤军利用停战机会，在漳州扩编整训，发展至二万余人，编成两个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为总部参谋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标榜“刷新政治”。如创办《闽星报》，鼓吹所谓“建设新社会”，提倡“新文化”，以附会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还派遣留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又开公路，辟公园，办学校，设书局，革除一些陈规陋习，等等。漳州一时出现了某些新气象，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

1920年6月，孙中山从上海派朱执信、廖仲恺到漳州，力促陈炯明回师广东。同时，许崇智、邓铿等也主张粤军回粤。陈炯明一直犹豫不决。8月11日，桂系通过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陈炯明才最后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粤军发出的回粤通电中宣称：“粤军今日是为家为国而战，凡一切

党派及其他问题，均非所知。”^②表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的暧昧态度。8月16日，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这时粤桂两方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桂军占优势。但粤军举着孙中山的旗帜，士气高昂。陈炯明又以“粤人治粤”和“实行民主政治”相号召，因而得到广东人民的拥护。桂系军阀处于政治上十分不利而且四面受敌的地位，士无斗志。10月28日，粤军攻克广州。陈炯明随即回到广州。孙中山在上海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1月下旬，孙中山再到广州组织护法政府。陈炯明曾以种种借口阻止孙中山返粤。如说粤省财政困难，不能负担国会经费，等等。后因迫于舆论，孙中山又坚决表示要返粤，他才不得不表示“欢迎”。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时，反对孙中山任大总统的，除南北军阀和各种反动势力外，陈炯明则是从内部反对最力的一人。未选举前，他恐吓说，孙中山想当总统，会树敌于全国，连广东这块地盘也将保不住。后来他连就职典礼也不参加。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这样，连同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二职，陈炯明便一身兼四要职了。从而他就更加飞扬跋扈，政治野心越发膨胀。当时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北伐，统一全国。首先是要肃清桂系军阀，以免它为患广东。而陈炯明则以高唱“保境息民”、“联省自治”来同孙中山相对抗。他派出代表，联系了南北各实力派军阀，很快发展成为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联盟。他还在省内挂出“民治”的招牌，于1921年4月公布所谓《广东自治条例》，并举行所谓“民选”县长。之后，又进一步炮制

了《广东省宪法草案》，威迫利诱省议会通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广东为中国的普鲁士，把中国变成德意志式的联邦。”^⑤这个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廖仲恺等人的反对。同时，叫嚷“联省自治”的几个军阀，也存在着不同利害的矛盾，所以始终没能达成协议。《广东省宪法》因而未能施行。

桂系军阀自退出广东后，无时不思卷土重来。同年6月，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分兵三路攻粤。至此，原想与桂系“各守边防，毋相侵犯”的陈炯明，才被迫进行反击。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分兵三路进攻桂军。当时粤桂双方在力量对比上，粤方占优势。粤军于6月25日攻占梧州，长驱直入，仅三个多月，大获全胜。

粤军攻下广西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陈认为是“调虎离山”之计，拒不接受。孙中山因据有两广，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2月在桂林设立北伐军大本营，拟于明年春天取道湖南，大举北伐。这时，陈炯明已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1922年3月，又派人暗杀了坚定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4月，孙中山决定改道北伐，大本营迁粤。回师途中，孙中山曾于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会晤，想促他表明态度。他不但不来，反以辞去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于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广州政府内务部长三职，仍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希望他能醒悟。陈炯明被迫宣布“遵令卸职”，离开广州赴惠州。同时又令其在广州的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叶举率兵迅速回师广州，对抗孙中山。

孙中山于6月初回到广州。为避免引起内战，派人到惠

州劝陈炯明返回广州。陈炯明则积极策划武装叛乱，并暗中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反孙协议：由陈破坏孙中山北伐，吴则畀陈以两广巡阅使之职。陈公开对孙中山表示，愿意留任陆军部长之职，并一再声称：“已催促叶举等部迅速回防，叶等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担保。”云云。

6月14日，陈炯明密令叶举等布置武装叛乱。16日凌晨，以大炮轰击总统府，妄图一举置孙中山于死地。幸好孙中山于事先得到消息脱险，避于楚豫舰，后转永丰舰。陈见孙中山威武不屈，乃大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派兵阻击北伐军回师广东；一面又托人送亲笔信给孙中山，称：“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还要孙中山“恳开示一途，俾得遵行”^④。当即遭到孙中山的严词痛斥。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立即回师广东，援救孙中山。8月9日，孙中山经香港赴上海。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自任粤军总司令。他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彻底破产，从此一步步走向失败和灭亡。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陈，组成西路讨贼军和东路讨贼军。粤军第一、三两师及第四师一部起义响应。陈炯明叛军迅速土崩瓦解。16日，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逃到惠州。叛军三、四万人退到东江、潮梅一带。不久，陈炯明住到香港，继续进行反对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切齿痛恨。盘踞东江、潮梅一带的叛军，后来又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进行多次进

攻，均遭失败。1925年2月和10月，革命军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叛军。

陈炯明蛰居香港，鼓吹反共反革命。他拉拢一些人组织致公党，自任总理，提出建国、建亚、建世的所谓“三建主义”，对抗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敬告国人书》，说：“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共产党遍布南方各省，随时皆可乘机爆发。”^⑤他还向国民党建议：“宁（南京政府）任外交，收复失地；粤任剿共，巩固后方”^⑥，和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互相呼应。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死于香港。

注：

- ①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32年第一期。
- ② 吴幼彭：《陈炯明率粤军回粤、援桂及叛孙》。
- ③ 林志钧等：《陈炯明叛孙、联省自治及民选县长》。
- ④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前后的片断回忆》。
- ⑤ 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有关陈炯明资料》。
- ⑥ 同⑤。

刘 显 世

李德芳

刘显世，字如周，别号经硕，贵州兴义县下五屯人。1870年5月8日（清同治九年四月初八）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祖父刘燕山，参加镇压1858年贵州回民起义，为当地有名的团绅。父亲刘官礼，因率团丁夺回被起义军攻陷的兴义县城，以功保“同知”，总办兴义府五属县的团务。

刘显世幼读私塾，十四岁进县学，十五岁考取廪生。1898年，因广西会党起义军有入黔之举，“遂弃举业，助其父办理团务”，当上了兴义县团防总局局董^①。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分三路攻进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世得其父保荐为靖边正营管带，参加镇压起义军。1904年，起义军退回广西。贵州巡抚林绍年统一全省巡防编制，撤销了靖边营，成立五路巡防营，刘显世得任西路巡防二营管带。

在清朝统治者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中，贵州巡抚林绍年1905年在黔赶办“新政”。刘显世得其父的支持，当上了兴义县劝学所总董，开办学校，设立阅报所，成立“天足会”劝说妇女不缠足等，还延聘贵阳知识界一些所谓名流到兴义执教，选送一些乡绅子弟入学肄业和出国留学。1908年，刘显世又在兴义组织预备地方自治会，和一些宪政党人联上因缘，其弟刘显治此时留学日本，也和梁启超攀上关系。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高涨，川督赵尔丰急电贵州派兵“助剿”。贵州巡抚沈瑜庆命董福开、鲁为禧率驻筑（今贵阳）防军入川。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贵州政局也有一触即发之势。沈瑜庆感到贵阳空虚，于是急调刘显世带兵五百兼程来筑，保卫面临垮台的贵州封建政权。

武昌首义，特别是云南光复后，贵州的革命党人大受鼓舞。11月3日晚，自治学社联合陆军小学堂学生、新军官兵和哥老会员发动起义。11月4日占领了贵阳，推新军教练官杨蔭诚为都督，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此时，刘显世正行军至安顺，听到贵阳光复，遂表示赞成共和。由于革命党人失去警惕，军政府不仅准其拥兵进驻贵阳，而且擢升为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和陆军第四标标统。刘显世进驻贵阳后，密结宪政党人熊范舆、任可澄、戴戡，勾结封建官僚郭重光，盗用民意，派人去云南乞师，请蔡锷派兵“援黔”。

蔡锷派唐继尧以假道北伐为借口，率滇军入黔。唐1912年2月27日抵筑，分兵进驻螺丝山、照壁山、东山、观风台等制高点。3月3日观风台滇军炮队炮击南厂新军，打响了武装颠覆贵州革命政权的第一炮，刘显世也率兵士进攻都督府。5月，唐继尧当上了贵州都督^②，刘显世被任命为贵州省军务部长。

1913年10月，蔡锷奉调入京，唐继尧离黔回滇任云南都督。时值袁世凯改定省制，戴戡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当上了贵州护军使。此后，刘积极扩充实力，把全省陆军编为六个团。除任其甥王文华为第一团团团长外，其余各团分别以前清绿营的军官和唐继尧督黔时的旧部充任。

1913年底，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拟帝制自为。刘显世对袁唯命是从，对袁的每一倒行逆施，如解散国会、召开政治会议、废除约法等，都表示赞成；并和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一起导演了所谓“国体投票”的丑剧^③，向袁发出“拥戴书”。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21日赐勋，刘显世以拥戴有功，得授一等子爵。

年底，蔡锷秘密回到云南，策动唐继尧反袁。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起。刘显世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他一方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时不假道贵州，另一方面又派人赴滇阻止护国军过境。

不久，在全国人民讨袁声中，刘显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转而反袁，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同时自任都督。他派王文华率三个团的兵力入湘，熊其勋率两个团的兵力北进，归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指挥戴戡节制，参加讨袁。另一面他又密令其从兄刘显潜（时任黔西道尹）通电拥袁，为自己留条后路。

在讨袁护国的革命浪潮面前，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6月6日忧悒而死。讨袁护国就此结束。刘显世因此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当上了贵州督军兼省长。他总揽全省军政大权，改组贵州政府，同时扩编贵州军队，把全省陆军编为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又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进而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因而于1917年7月率舰南下，揭起“护法”大旗。唐继尧、刘显世为了扩大势力，也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

张。刘并任命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率六个团的兵力入川。黔军配合滇军和熊克武部川军，很快就大败北军吴光新部，进占了重庆。次年3月，又赶走了川军周道刚、刘存厚，攻克了成都。5月，唐继尧称滇黔川鄂豫靖国联军总司令，刘显世就任副总司令。他们置孙中山一再劝告于不顾^④，与北洋直系军阀停战言和，破坏“护法”；并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怒斥他们和北洋军阀“如一丘之貉”。

刘显世此时虽为贵州督军、省长，又是滇黔川鄂豫靖国联军副总司令，但黔省军权实为王文华掌握。刘显世不愿作空头司令，一方面离间王文华与其部将袁祖铭的关系，一方面和唐继尧勾结，密谋用唐的部将韩凤楼代替王文华。1920年11月，王文华从四川回师南下，派部将卢焘、谷正伦、孙剑峰、何应钦，以“清君侧”的名义，在贵阳发动了“民九事变”，杀了刘显世的亲信党羽郭重光、熊范舆，夺了刘显世的权，送他回兴义老家“养病”。

刘显世不甘被逐，回兴义后即刻逃往昆明，投奔唐继尧，希图东山再起。但此时云南政局也发生了变化，顾品珍赶走了唐继尧。刘显世于是漫游武汉、上海，召集旧部策划倒王。1921年3月，王文华在沪被袁祖铭派人刺死。王的部将卢焘、谷正伦、何应钦等互不统属，黔局混乱。袁祖铭依靠北洋军阀靳云鹏、吴佩孚的支持，于1922年3月率“定黔军”回筑，被靳云鹏内阁任命为贵州省长。这时唐继尧也回滇赶走了顾品珍。刘显世得知袁祖铭不欢迎他回黔，再度入滇。1923年2月，唐继尧派其弟继虞偕刘显世拥兵入黔，赶走了袁祖铭。唐继虞自任贵州善后督办，刘显世才又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

1924年,孙中山联合段祺瑞、张作霖讨伐曹錕贿选。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表示愿与广东政府一致行动,承担出兵湘西进攻鄂西、与北伐军会师武汉的任务,再一次借孙中山的名声组成了滇黔川建国联军,唐任总司令,刘任副总司令,熊为前敌司令兼川军总司令。刘显世想借唐、熊的力量消除袁祖铭的威胁,然而,这时的贵州已是滇军的天下,刘显世已无左右黔省之力,仅一傀儡而已。相反,袁祖铭离黔后,帮助杨森、刘湘打败熊克武,势力大增。唐继尧怕袁回师南下于己不利,主动和袁修好,自请交还贵州,以袁军同滇军联合进攻鄂西为交换条件。1925年1月5日,唐继尧发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通电,声言“黔省内政,概由黔人自理”。23日,袁派部将彭汉章以贵州清乡总司令的名义回黔接收政权,并任命卢焘为行政委员长代行省长职权。刘显世自知众叛亲离,不得已引退家居。1927年10月14日病死。

注:

- ① 《兴义县志》。
- ② 《云南光复纪要》“援黔篇”,蔡锷审订,郭燮熙遗稿。
- ③ 《贵州公报》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一号。
- ④ 孙中山1918年2月13日复刘显世电:“南方自不可误于和议之说,致懈战备”。

章宗祥

郑则民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父章菊生，是清朝拔贡。

章宗祥幼年进私塾及当地书院读书。1899年赴日本留学，初入第一高等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曹汝霖当时也留学日本，他“与曹汝霖最相契”。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章和曹都以留学生代表身分“极力逢迎之，大得载振欢心”^①。

1903年章宗祥毕业归国，在北京进士馆当教习。不久，由肃亲王善耆“专折特保，得赐进士”^②，继任法律馆纂修官。1905年他与董康合译《日本刑法》。接着，辅助商部尚书载振编纂商法，并任农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则例局提调、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出任第一任总督，章宗祥曾受派陪同徐往奉天视察。1909年，调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次年4月，章参加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向清朝统治者献策：对汪精卫实行软化，以收买人心。随后赴德国参加“万国卫生会议”。回国后在北京任法律编纂局编修。不久被任命为清内阁法制院副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章宗祥受袁派遣随唐绍仪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

判。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章宗祥任总统府秘书和法制局长。1912年7月，陆征祥在袁操纵下组织所谓“超然内阁”，曾向参议院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其中拟任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后来这个阁员名单遭到否决，章改任大理院长。1914年2月，孙宝琦任国务总理，章宗祥终于得到了司法总长的职位。4月袁世凯还命他兼代农商总长。他主持制订了《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同年5月，袁取消国务院，设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章宗祥仍任司法总长。1915年秋，袁世凯利用筹安会鼓吹帝制，引起人民不满，并牵涉法律争议。章宗祥以司法总长身分宣布，筹安会“于刑法立法丝毫不涉，无所谓违法也”^③，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力。1916年3月，袁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不得不撤销帝制。4月段祺瑞任国务卿，不久组织“责任内阁”，章宗祥留任司法总长。他与曹汝霖等四人，成为段宠信的“阁员中所谓新派”，“凡有新设施，皆归四人协议而定”^④。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同年6月30日，段任命章宗祥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此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稍稍改变了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用强力胁迫中国的侵略办法，而用收买的办法，以借款等方式支持新的傀儡。日本政府派西原龟三首先在东京同章宗祥密谈。然后由章介绍西原多次到中国活动，与曹汝霖、陆宗輿等密议借款和建立收支机关问题^⑤，为段祺瑞政府取得大量借款。

1917年初，日本政府经过秘密外交，使英、法、俄、意四国

承认它从德国手中所夺到的山东权益。此后，又通过章宗祥和陆宗輿多次催促段祺瑞政府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为了进攻苏俄和控制中国，诱迫北京政府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章宗祥按照段祺瑞的旨意，经与日本帝国主义多次密谈后，于1918年3月25日，和日本外相本野互致《共同防敌换文》^⑥。同年5月16日双方在换文的基础上，正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这些协定的实施，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共同防敌”为名，大批开入我国内蒙和东北，控制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

1918年秋，徐世昌在安福国会的支持下，窃据总统职位。他和段祺瑞一起指使章宗祥再次向日本借债。9月下旬，章宗祥在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借款，即“满蒙四路借款”、“山东二路（济顺、高徐）借款”、“参战借款”，共计六千万日元^⑦。其中，山东二路的借款与山东问题的中日换文是相关联的。寺内正毅内阁害怕日本1914年出兵山东抢到手利益，到战后有所丧失，除以两千万日元借款取得控制山东二路的权利外，又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中说：“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⑧。这说明，中国虽然参战了，但日本军队可以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还要以换文方式，使其占领合法化。按照换文规定，日本要继续占领胶济路，仅在形式上由日本驻军改为日人指挥下的“中国巡警队”而已。此外，胶济路归所谓“中日合办”，实际上是要由日本独占。这就严重地损害我山东的主权。但北京反动政府急于取得金钱，通过曹汝霖电告章宗祥，授权他以政府名义，

于1918年9月24日,在复照上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

1919年初,“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坚决要求归还在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上夺去的有关山东的权利。日本竟以中日两国早有“欣然同意”的换文等为借口,坚持夺走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在与会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日本夺取到的山东权益明文列入对德和约。这样就激起了我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成为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和会”上以章宗祥等的卖国换文为侵略借口,引起全国人民对章的极大义愤。4月中旬,章宗祥从日本回国时,就有中国留学生数百人,赶到东京车站,质问其订约卖国之罪。《每周评论》报道说:“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路尽断送外国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上掷去”^①。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三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帝国主义驻华使馆阻止前进后,转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此时章宗祥正在曹汝霖家中。当爱国学生冲入曹宅时,曹躲藏起来,章宗祥遭到一顿痛打^②。接着,在我国工人阶级、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将他们三人免职。

此后,章宗祥曾于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理。从1928年以后,长

期居住在青岛。1942年3月,汉奸王揖唐通过曹汝霖邀他到北平,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⑩。不久,还担任了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电力公司董事长。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

1962年10月1日章宗祥在上海病死。

注:

①②③ 《大中华国民,章宗祥》,上海爱国社1919年版,第1—4页。

④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6页。

⑤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36—143页。

⑥ 《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册,第1352—1354页。

⑦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卷上,1936年版,第336页。

⑧ 同⑤,第188页。

⑨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⑩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95—198页。

⑪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陆宗舆

郑则民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县人，生于1876年7月5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四日）。其父早年经营商业，至陆宗舆幼年时，家道逐渐破落。

陆宗舆幼年进私塾，1896年到南京文正书院“从南通张（謇）先生读书学文，旋赴武昌习方言理化者年余”^①。1899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1902年回国，被派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继任进士馆和警官学堂教习。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陆宗舆受调任巡警部主事。同年冬，陆随清朝大臣载泽等出国考察宪政，任参赞，经历日、美、英、法、德、俄等国。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为首任总督，陆被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采用疏通运道等措施，同时加强搜刮，盐课收入激增，每年课银从五十余万两（1906年）增至一百六十余万两（1909年）。清廷特意召见陆宗舆，表示对他的赏识。1908年秋升为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徐世昌内调入京，陆随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陆宗舆于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陆宗舆任

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陆一度担任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

1914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在龙口等地登陆。陆宗輿奉袁世凯政府之命，向日本表示中国守中立，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②，给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了便利。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派陆征祥和曹汝霖在北京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进行谈判，同时又命陆宗輿于东京同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等多次密谈，探听日方的意图和动向。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最后通牒，5月2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③。并于同年6月8日由陆宗輿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④。这一条约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随后，陆宗輿奉袁世凯之命，企图争取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为此，陆宗輿曾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秘密召见，“乘机授意”，大隈并向陆宗輿耳语说：“吾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其成，君试密告之。”^⑤次日，陆果然致密电告袁世凯。其后，日本看到中国内外形势不利于袁，见风使舵，又抢先“劝告”袁不要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死去。陆宗輿也很快卸任归国。

1916年秋，陆宗輿就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次年1月，曹汝霖任交通银行总理，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得五百万日

元。此时，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派陆宗輿利用赴日兑款的机会，与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会见，秘密勾结。寺内通过陆宗輿和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唆使段祺瑞对德宣战。后来陆宗輿透露说：“前年参战实系发源于合肥致日本之一电，时适輿在东京，为参战事往来电报甚多，因彼国之赞助，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乃始定见。归国后，弟复奉东海命往徐州说少轩（张勋），輿当时与仲和（章宗祥）、润田（曹汝霖）外内奔走颇力，日本因此而援助段内阁，其大原因实由于此”^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决定用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派西原龟三多次来华活动。1917年8月10日，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家银行名义上是经营两国间的汇兑事业，而实际上是日本借款给北洋军阀政府的收支机关。“汇业银行者，不啻贩卖中华民国捐客总会”^⑦。陆宗輿任该行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

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出卖国家主权，大借日债，扩充军备，妄图“武力统一”全国。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輿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⑧。这种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连陆宗輿自己也无法否认，曾说：“若所谓卖国者，实际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⑨

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段在离职前夕，给陆宗輿安排了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肥缺。徐世昌当上北洋政府大总统之后，钱能训任总理，陆宗輿留任币制局总裁。

1919年初，察哈尔龙烟铁矿（今属河北省）公司成立，为当时北方最大之铁矿公司。4月19日徐世昌派陆宗輿任该公司督办。30日陆往天津迎接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来北京。5月4日徐世昌设午宴招待章，陆在座作陪。当天下午章在曹汝霖住宅遭到爱国学生痛打，陆宗輿躲藏在家，未被学生揪住。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輿被迫于5月9日提出辞呈，但仍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随后徐世昌指令慰留，并颠倒是非，为其卖国行径开脱。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义愤。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免职。随后，陆宗輿家乡浙江海宁县召开公民大会，决定建立卖国贼陆宗輿石碑。“当场由众踊跃输金，伤匠赶办，……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书‘卖国贼陆宗輿’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⑩陆闻讯后，重贿海宁县知事为其毁碑，北京政府内务部也令浙江督军卢永祥为陆撑腰，因而引起海宁县民众不服，奋起护碑。最后徐世昌亲自下令拆碑，但人民群众痛恨卖国贼的爱国心是压抑不住的。

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庇护，陆宗輿留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年段祺瑞再次上台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时，陆宗輿一度出任临时参议院参政。其后继续担任龙烟煤矿和

铁矿公司督办，长期住在天津日租界。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后，陆宗輿移居北平。1940年3月日本侵略者所扶植的南北傀儡政权合流，在南京成立以汉奸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陆宗輿被聘为伪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陆病死于北平。

注：

- ① 陆宗輿：《五十自述记》。
-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天津大公报社印行，第6卷，第53—58页。
- ③ 《中外旧约章汇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册，第1100—1114页。
- ④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年版，卷上，第230页。
- ⑤ 同①。
- ⑥ 《陆宗輿密函》（1920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78—179页。
- ⑦ 《大中华国民：章宗祥》，上海爱国社1919年版，第4页。
- ⑧ 同②，第7卷，第117—181页。
- ⑨ 同①。
- ⑩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内务部查办浙江海宁县人民竖立“卖国贼陆宗輿”石碑咨文》。（1919年7月23日）

刘 镇 华

林炯如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清末附生，后在直隶省（今河北省）保定府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学习，毕业后，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辛亥革命时，他以河南省视学的身份奔走豫西一带，参加反清活动，结识了许多豫西地方帮会头目和所谓“游侠之士”。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陕西响应，成立了军政府。清政府派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陕西军政府派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与清军在陕豫边境交战，刘镇华率领豫西一带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参加了张钫的秦陇复汉军。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鉴于军队太多，系统复杂，地方财力不堪负担，同时认为清朝既已推翻，革命已经成功，用不着这么多的军队，因此决定裁兵减政。张钫部队需要裁减三、四千人，他们多是豫西一带人，如果不给出路，势必影响到地方的治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把裁减下来的这些人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分驻豫西二十二个县，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所以命名为镇嵩军。刘镇华和这些部队有历史渊源，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他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兼镇嵩军的统领。部

队编为三个标，一个炮兵营，全部共计三千余人。他竭力整饬和扩充部队，加强实力，不久就成了一个小的军事集团，称霸豫西。

刘镇华善于投机钻营，谁的力量大他就投靠谁。当时袁世凯权重势大，他就竭力巴结袁。“二次革命”时，黄兴派杨体锐前往豫陕联络民党，策划反袁。杨带了黄兴致刘镇华和张钫等人的信件，先见刘镇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转往陕西。刘镇华竟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杨，把杨带给张钫等人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凯告密，从而取得袁的信任。袁世凯败亡之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依附皖系军阀。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陕西国民党人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了靖国军，与安福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相对抗。1918年2月，靖国军围攻西安，陈树藩岌岌可危，急电刘镇华入陕相助。刘接到告急电后按兵不动，复电说豫西部队入陕是师出无名，暗示要有交换条件。陈知其意，表示可以把陕西省长位置让他。刘镇华这才率部经潼关入陕，解西安之围。3月23日被任命为省长。不久段祺瑞政府又调动八省的军队到陕西，向靖国军发动攻击，使陕西长期陷入混战状态。刘镇华就在这连年混战中，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扩大个人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皖系段祺瑞。曹、吴为了扩大直系势力，派遣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率部入陕，驱逐皖系残余势力陈树藩。刘镇华感到他的省长地位很不牢靠，一面对陈树藩虚与委蛇，表示支持；另一面又派人与阎相文接洽，表示愿意协助直军解决

陈树藩的残余势力，为阎进陕扫清道路。在刘镇华的协助下，直军迅速占领了西安，陈树藩被赶下了台。刘镇华不但保住了省长地位，而且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军队。

阎相文当陕西督军不久即服毒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继任督军。刘镇华为了取得冯的信任，在冯面前尽力逢迎阿谀。如冯标榜艰苦朴素，刘也穿起布衣布鞋，一早就起来跟着部队上操。冯信仰基督教，刘就经常出入礼拜堂，甚至邀请一些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到他的部队讲话。因而逐渐获得冯的好感和信任，两个人成为互换兰谱的结拜兄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军赴豫与赵倜作战，把督军的职务交给刘镇华。从此刘镇华成为陕西督军兼省长，集军权、政权于一身。

刘镇华掌握陕西省军政大权后，搜刮民脂民膏，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除了把镇嵩军扩编为三个师外，又把其他杂牌队伍和靖国军残部编为六路镇嵩军及陕西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刘镇华认为又是一个发展机会，即派第二师张治公部出陕对奉军作战，同时派憨玉琨为剿匪总司令驻潼关。憨玉琨就以潼关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河南陕州，待机而动。不料直奉战争一开始，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失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一、二、三军，拥皖系头子段祺瑞为执政。段任执政后即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率领国民第二军进攻河南。吴佩孚战败，由海道绕回洛阳，企图凭借控制在直系军阀手中的豫、鄂、苏、陕四省力量，东山再起。刘镇华鉴于上述情况，指示憨玉琨“冯、胡要讨，段可捧，吴不能背”。憨玉琨颇感为难，认为“捧段就是背吴，

讨冯、胡就不能捧段。”他与幕僚一起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认为吴佩孚大势已去，决不能为吴出力。于是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佯令军队开赴郑州，突在洛阳下车，逼走吴佩孚，占据洛阳。刘镇华也通电拥护段祺瑞，表示与国民军合作。憨玉琨占领洛阳后，因争夺河南地盘，与胡景翼发生尖锐矛盾，1925年4月初爆发了胡憨战争。打了半个月，憨玉琨所收的杂牌军发生内变，形势极为不利。刘镇华为支援憨玉琨，就把陕西督军职务交给陕西军务帮办吴新田，以出巡为名，亲到洛阳督战。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战事很快以刘、憨失败而结束。憨玉琨服毒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运城，投靠阎锡山，充当阎锡山反对国民军的工具。

1925年秋，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北方国民军，刘镇华通过阎锡山向张作霖、吴佩孚疏通，又回到了直系。吴佩孚给他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让他去兴安重整旗鼓。刘镇华招集散在各地的镇嵩军旧部、土匪、红枪会、大刀会，很快编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大军，以阎锡山供给的枪枝和弹药把这些乌合之众装备起来。此时，岳维峻率领的国民二军在河南受到直奉联军的攻击，退往陕西。经过豫西的时候，被刘镇华打得大败，岳维峻只身逃山西。与此同时，出关支援岳维峻的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和国民二军驻在洛阳的师长田玉洁也被刘镇华打垮。在此形势下，刘镇华派柴云升为前敌总指挥，乘胜西入潼关，演出了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惨剧。

1926年4月初，刘镇华部兵临西安城下。守城部队是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部分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卫

定一部的两个团，兵力不到五千人。4月16日，国民军第三师杨虎城部进城。城内部队合计也不足一万人，而刘镇华包围西安的兵力约七万人，双方力量十分悬殊。5月中旬以后，西安与外县一切联系均被切断，成为孤城。

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县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即日率师援陕，策应当时正在两湖和江西等省胜利发展的北伐战争。冯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经平凉东下。10月初，前锋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也于10月12日随军到三原，组国民军第一、二、三联军总司令部。10月15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西军开始向刘镇华占领的咸阳地区发动总攻。经过四十余日的激烈战斗，到11月27日晚，刘镇华的大本营十里铺受到援陕军的抄袭和城内守军的袭击，被迫撤围，沿着西安至潼关大道向东溃退。途中又受到民间武装的袭击。刘镇华一气退到河南的陕州，才着手收容残部，分别驻在陕州、灵宝一带，从事休整。

1927年2月，冯玉祥到达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整顿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此时，刘镇华眼看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得一蹶不振，奉军已到郑州，于是又脱离直系，改投奉军。及至奉军也节节败退，刘镇华又决定脱离奉系，通过张钫的关系投向冯玉祥。1927年夏，刘到开封见冯，又施展其逢迎拍马的本领，对冯部将领大肆拉拢。

刘镇华投归冯玉祥后，冯把刘部编为第八方面军，归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指挥，驻开封以东的柳河。蒋、冯、阎联合进攻张作霖的所谓北伐胜利后，刘部改驻杨村。当时蒋介石采取

联阎制冯的政策，把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划给阎锡山。刘的驻地成为阎的势力范围。为了削弱冯的力量，蒋又把第八方面军改为第十一路军，序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实际上归阎锡山指挥。不久阎、冯酝酿联合反蒋，刘镇华采取观望态度。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刘镇华有意避开，出国游历，先到日本，后到德国。当时刘部尚有两个师，师长是万选才和刘茂恩（刘镇华的胞弟）。刘镇华临走时，把十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让给刘茂恩，万选才对此甚为愤慨。蒋介石乘势拉拢万选才，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以加深刘、万之间的矛盾，并扩大刘茂恩对阎、冯的距离。当豫东战事激烈展开时，刘茂恩诱捕万选才，把他献给蒋介石，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刘茂恩这一举动，使阎、冯在军事上受到重大的打击。

刘镇华在柏林得知刘茂恩投靠蒋介石的消息后马上回国。抵达上海时，受到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等的隆重招待。刘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发表他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驻新乡，军队分布在怀庆、卫辉各县，以防备阎锡山南进。

1932年，蒋介石对豫鄂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刘镇华被调任为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年5月，刘镇华通过政学系杨永泰的关系，当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蒋又任命他为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到河南潢川就职，充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1934年秋，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遣队，由赣东北苏区北上，进入浙西、皖南，震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杭州一带。蒋介石赶忙纠集了在赣、浙、皖、闽边区的反动军队进行阻击。刘镇华也率其基本部队第十五军和安徽的保安团

队进驻皖南屯溪。他深怕红军入皖，大肆构筑碉堡，加强封锁，严密保甲组织，进行政治控制，竭力与红军为敌。方志敏被俘后，刘镇华的军队由刘茂恩率领沿江入川，追击红军。

1936年10月，刘镇华神经失常。1937年5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改组，刘尚清接任省主席。刘镇华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刘镇华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1952年3月死于台湾。

主要参考资料：

- 米哲沅：《刘镇华的一生》。
- 马浚甫：《我所知道的刘镇华》。
- 文直公：《最近卅年中国军事史》。
-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
-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陈 济 棠

李静之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890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生。父亲陈谦受，务农为业。

陈济棠幼年在私塾读书，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成立广东陆军速成学校，陈入该校学习。1913年毕业，在广东军队充任下级军官。1915年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活动失败，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林虎部，任连、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期间，脱离了林虎部。11月，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政府，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应邓邀在该师任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第一营营长。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陈济棠继陈铭枢任第四团团团长，曾表示支持孙中山。年底，孙中山联络杨希闵、刘震寰率滇桂军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与邓演达（第一师工兵营长）、张发奎（第一师第二团营长）等配合滇桂军于1923年1月重新占领广州。不久，陈升任第二旅旅长。

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这时，广西青年军官黄绍竑从旧桂系分裂出来，与第一师合作，夹击沈军，攻下了梧州。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

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任善后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应李宗仁、黄绍竑之请，陈的第二旅由李济深派驻梧州，协助李、黄统一了广西。1925年5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陈旅参加了解决驻西江刘部桂军的战斗。

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升为第十一师师长。这年秋冬，他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一直打到海南岛。1926年北伐时，陈师留粤，负责南路绥靖工作，驻防高、雷、钦、廉地区，陈并兼钦廉警备司令。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很有抵触，曾建议蒋介石举行清党。因时机未到，蒋没有采纳。陈利用权势，支持其兄陈维周在钦廉地区承办各项捐税，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人士的不满。因此，陈济棠不得不暂时引退，于1927年春到苏联考察。入夏，他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呈报反苏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宁汉分裂后，他回到广州，继续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还促李济深、黄绍竑通电讨伐武汉政府。不久，复任第十一师师长。

同年9月，由贺龙、叶挺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陈济棠积极参加阻击，在汤坑与贺、叶主力激战。11月，发生张发奎和李济深（时任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争夺广东地盘的事变。陈济棠站在李济深一边，对张部作战。1928年1月，李济深重回广州，将驻粤各军整编为三个军，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兼西区（包括广州市及西区等地）绥靖委员，移驻广州。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建设

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派新军阀强烈不满。3月，蒋桂酝酿战争。李济深因亲桂系，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陈济棠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古应芬、胡汉民向蒋介石推荐，被任命为广东编遣特派员。陈就职后，立刻通电拥蒋，并下令裁撤第八路军总部，限驻粤桂军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不久，蒋介石又加委他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了广东的军权，与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了表示拥蒋，他以九千五百元购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同年4月，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不久，和驻粤东拥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秘密联系，声言讨蒋，进兵广东，5月上旬席卷了西江各县。陈济棠全力迎击，在花县赤坭、白坭将桂军击败，乘胜追至广西边境；6月，又在东江打败了徐景唐的军队，从而博得蒋介石的信任。他乘机将广东部队改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分任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师师长，成为他的嫡系部队。又将陈铭枢的旧部编为六十、六十一两师，以蔡廷锴、蒋光鼐为师长。

同年秋，张发奎在湖北宜昌举兵反蒋，并转入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会合，进攻广东。张桂军连陷三水、花县，广州岌岌可危。陈济棠受蒋命迎击，12月中旬在花县一带激战，击败了张桂军。又长驱直追，占领了广西梧州，向广西腹地进攻。

1930年5月初中原大战爆发。张桂军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倾巢入湘，于5月下旬攻下衡阳、宝庆（今邵阳）。6

月初占领长沙、岳阳，拟乘胜直下武汉。蒋介石急调粤军救援，陈济棠将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个师从梧州船运至广州，再沿粤汉路进入湘南，从桂军手里夺取了衡州（阳）。桂军怕后路被截断，放弃长沙、岳阳，于7月初退回广西。接着，蒋介石又令粤军北上增援。陈济棠乘机将陈铭枢的嫡系蒋、蔡两师调往津浦线，参加对阎、冯作战，以削弱陈铭枢在粤实力，使广东的军队成为他独家的势力。

陈济棠掌握广东军事大权以后，不断扩充军事实力。他借攻打广西为名，增加了两个独立旅、三个独立团、五个师属教导团、十个旅属特务营。他又秘密向德国、捷克购买了大批军火，但他自知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吃掉。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使他控制广东的野心受到牵制。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陈济棠裁减军队，削减军费，更引起陈的不满。

1931年2月，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被蒋软禁在南京汤山。国民党粤系中央委员及西南实力派议论纷纷。亲胡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秘密跑到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济棠一向受到胡、古支持，正欲乘机独霸一方，当即答应，并与古联合驱走了陈铭枢，把广东政权也拿到手中，树起了反蒋旗帜。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迅速和桂系军阀达成妥协，把粤军撤回广东，组成粤桂联合阵线。又以巨款供给古应芬联络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企图在西南组织反蒋政府。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以陈济棠领衔的广东将领十人通电表示拥护。25日，陈济棠等二十余人又联衔通电请蒋介石在

四十八小时内下野。国民党各派政客、粤桂军阀麇集广州，于27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党政府。粤桂军改编为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济棠担任广州国民党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事实上，他和古应芬是非常会议的真正主持人。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举行谈判。通过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调停，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11月，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增选中央执监委，进行政治分赃。1932年元旦成立了以林森为主席的“统一”政府。非常会议撤消后，根据粤方四全大会的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仍维持半独立局面。表面上拥戴胡汉民为西南领袖，实际上是陈济棠、李宗仁分掌实权，陈济棠则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首先着手扩编军队，使兵力达到十五万人以上。又将西南政务委员会所属的空海军用武力接受过来，独揽了广东陆海空军大权。他把军官教导队扩充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自成系统。在政治方面，他利用元老派林云陔为省主席，派其亲信林翼中等分别控制省党部和民、财、教各厅，掌握实权。在财政上，陈济棠拚命搜刮民财，开放烟赌禁，大肆征收苛捐杂税，用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1933年广东颁布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后，

兴办蔗糖、纺织、造纸、水泥等工业，又获取了巨额利润。为了便利军事行动，他还扩展全省交通网，修建海港，发展广州市政建设。在文化思想上，陈济棠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四维八德”，要求部下对他举行效忠宣誓。他迷信星相风水，任命重要部属时，有的先要由术士相面。他还不惜耗费大量钱财，设法把他母亲的坟墓迁到花县洪秀全祖坟处。说那里风水好，子孙可永享荣华富贵。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暂时对西南半独立状态采取了容忍的态度。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陈派余汉谋负责赣南“清剿”。1933年10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陈又担任南路军总司令。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的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陈济棠获悉后，便和桂系联合起来，以抗日为名，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

5月27日，两广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领导抗日。2日，通电全国。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三十名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

这时西南方面兵力共约三十万，并有飞机一百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们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陈、李

分任总司令和副司令，声称要北上抗日。6月8日进入湘南，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蒋介石一面电陈济棠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并分化和收买陈济棠的部下。7月6日，陈济棠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离职赴港。9日，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径飞南京。13日，国民党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同时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派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二中全会决议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及一、四集团军名义。18日，被陈济棠视为王牌的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投蒋而去。这对陈是个沉重打击。他当日逃往香港。8月30日出国到欧洲。

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发起为蒋介石“献机祝寿”。陈济棠当时在国外，为了与蒋修好，特献金购机。1937年9月陈济棠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蒋又提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任命他担任农林部长。他意态消沉，于次年辞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济棠受任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1946年后，回广东从事教育事业，同一些旧部一起创办了珠海大学，后来迁到香港改为珠海学院。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4月，改海南岛为特区，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南京解放后，他

反对议和，建议蒋介石复出，一度在广州奔走斡旋。6月赴海南岛，极力强化统治，想把它造成为反共根据地。他命各县市编练保安部队，“进剿”人民游击队。又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州解放前夕，伪广东绥靖公署、广东省政府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总司令和副司令，陈大权旁落。年底，李宗仁赴美，陈又与薛、余联电请蒋介石复职。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海南岛，陈济棠逃往台湾，任伪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

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在台北病死。

附记：

本文曾参考李洁之所写《陈济棠》。

何 键

李静之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3月11日（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生。父亲何其善，务农为业。何键幼时读私塾，1903年入县立朱子祠小学，后入渌江书院。1906年起，就读于王先谦主办的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法政学堂。

辛亥革命后，何键一度在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做办事员。不久弃职进培养下级军官的湖南将校养成所。以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分配到湘军第一师第一旅见习。旋补少尉排长。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后，段祺瑞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企图占领湖南以征服西南，1918年3月，派北洋军大举犯湘，湘桂联军败退湘南。何键回到醴陵，与滞留家乡的第一师排长张国威收集溃兵散枪，分别拉起了游击队，不断袭扰北军后方。不久北军张怀芝部在湘东溃败。游击队在当地农民配合下，缴获了数百支枪，又屡次挫败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进剿。游击队的活动引起湘军总部的注意，湘军总司令程潜分别委任何、张为游击队的正副司令。

1919年春夏间，湘军总司令部将游击队调住湘南，准备扩编成独立旅。这时，湘军发生内变，在桂系支持下重任湖南

督军的谭延闿联合赵恒惕赶走了程潜，继任湘军总司令。何键被认为是程派，不受倚重，队伍留资兴待命。不久，张国威从游击队分化出去。何键实力大为削弱，由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改编为该部骑兵团，何任营长。1920年湖南军民驱逐张敬尧成功后，何部进驻岳阳、桃源等地。

驱张后，湘军内部又发生权力斗争。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接任湘军总司令、省长。为缓和内争，赵于1921年7月率领湘军援鄂。何键的骑兵团奉令开到湘鄂西，在沙市对岸沿江警戒。援鄂之役结束后，何得唐生智（时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保举，升任骑兵团长，从此他便追随唐生智。1923年8月，谭延闿就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职，入湘讨赵，爆发了谭赵战争。何随唐部参加赵的“护宪军”，击溃了谭派蔡巨猷。谭赵战争结束后，唐生智升第四师师长，何键亦升任该师第九旅旅长。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何键随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并加入了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湖南后继续向武汉进攻，第八军担任沿长江两岸前进的任务。何键被委江左军司令，率部直趋汉阳，占领了龟山和汉阳兵工厂。武汉攻克后，第八军扩编为第八、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军，留驻两湖，何键因功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驻汉口。1927年4月，武汉政府继续北伐，三十五军进兵河南。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两湖工农运动蓬勃高涨。被革命潮流卷入的一些旧军官，逐渐露出了他们反对革命的本来面目。何键是这些反动军官中首举逆旗的中心人物。同年4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何键在会上

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搞得不象样子”^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何又利用驻武汉反共军官的反动情绪，推波助澜，在汉口召集部分高级将领会议，密谋策划发动两湖反共的军事叛变^②。在何幕后策动下，5月21日（马日）晚，许克祥、王东原、陶柳等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猖狂进攻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③。从此，湖南进入反革命恐怖时期。

6月中旬，何键又和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紧密配合，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组织开刀。6月28日，李品仙收缴了湖北省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枝，何键的三十五军则占据了汉阳、汉口一些重要行业工会的房屋。29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④，为汪蒋反革命合流充当急先锋。

汪蒋合流后，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统治权，很快又对立起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依仗实力，企图占有东南。8月中旬派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分别率领三十五、三十六军夹长江东下，占领了芜湖、安庆，进窥南京。唐并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下令何键兼代安徽省主席。

11月，桂系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派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唐因战事失利，于11月12日通电下野，令何键、刘兴退入湖南，以保存实力。15日，西征军占领武汉。1928年1月占领长沙，组织了以程潜为主席的“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持湘政。3月4日，何键发出求和通电，表示“谨率所部，集结湘西，听候命令，移师北伐”^⑤。6日，双方停火，宁汉战争结束，

唐部大部被桂系改编。何键由于多方向桂系靠拢，改编时该部得以保留三十五军建制。从此何脱离唐生智，开创自己的局面。桂系军阀入湘后，为了镇压工农运动，成立了“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清乡督办，何键兼任会办。

5月，鲁涤平担任湖南省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仍兼会办。鲁对何以会办掌握“清乡督办署”的实权十分不满，乘南京政府设立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会剿”湘赣边区红军）之机，请准蒋介石任命何代他为“会剿”总指挥，把何挤出了湖南。从此，何、鲁矛盾日益加深。何便进一步勾结桂系，策划倒鲁。1929年2月，桂系操纵的武汉政治分会以“铲共不力”等由，免去鲁涤平的省主席职务，以何键继任。蒋介石对桂系擅自任免湘省主席、控制湖南政权十分不满，调动军队西上。何键一面对桂系表示感恩，一面暗中派人向蒋疏通，想取得蒋的谅解和承认。蒋为了分化对方，表示只要何接受改编，受命讨桂，许他归顺效力。2月27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代理湖南省主席，他于3月2日就职。

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键见形势对桂系不利，改变了两面周旋的态度，表示拥蒋反桂。蒋委何为讨逆军第四军军长和湖南编遣特派员。4月初，桂系败回广西，蒋军占领武汉。何键亲到武汉见蒋，表示竭诚拥戴。蒋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接着，又任命他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辖三师两旅，约四万多人，南下讨桂。4月末，他分兵三路入桂。直到7月李宗仁、白崇禧宣告下野，湘军才陆续退回湖南。

9月，张发奎在宜昌举兵反对蒋介石，拟取道湘西入桂，与桂系合作。何键奉蒋令集中湘军堵击，亲赴宝庆督师。10

月底，张部突破了蒋军和湘军的截击，进到湘粤桂边境，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络，组织张桂联军，占领了广西。12月唐生智也在郑州通电反蒋，电文上并列有何键的名字。因此，蒋很注意何的动向。何原想中立于蒋唐之间，曾通电全国主张双方息兵。蒋派武汉市长刘文岛到长沙当面诘责。何只好补发通电，声言“拥护中央，维持统一”^⑥。唐生智反蒋迅速失败。1930年1月底，蒋介石命何键的第四路军入桂讨伐张桂联军。

同年春，西北、西南军阀和国民党反蒋派别酝酿反蒋大联合。湖南枢纽南北，有举足轻重之势。蒋介石对何键极不放心，派刘文岛往来湘汉之间，观察何的动静。何虽表示拥蒋，但仍想保持同桂系的联系。这时，江西的红军日益发展壮大，有进攻长沙之势。何键便将讨桂的四路军撤回湖南，集中湘东以防御红军的袭击。5月，中原大战爆发。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军事行动，张桂联军趁何分防湘赣边区之机，倾巢进攻湖南。6月5日，长沙被张桂军占领，何率文武官员逃至岳阳。8日桂军攻占平江，何键又退到常德。不久援湘粤军进入湘南，何键督师反攻，于17日收复长沙，并亲率主力追赶张桂军至湘桂边境。这时，从赣南进入平、浏一带活动的红三军团乘虚占领了平江，进攻长沙。何键又急忙赶回长沙坐镇，从衡、永急调部队回来增援。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在27日攻入长沙，何键狼狈逃窜到沅江。

长沙在两月之内两度失守，不满何键的人纷纷指责，要求惩办他。蒋介石既需要利用湖南作为同两广之间的缓冲地带，又需要何键这支坚决反共的武力牵制红军。因此，替何

承担责任，声明长沙失守，“中正应负其咎”^②。何键感激涕零，从此便完全倒向蒋介石了。

8月5日，何键部向据守长沙的红军反扑，红三军团失利撤离长沙。月末红军再次进攻，旋又撤退。此后何键在长沙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早在1928年12月，何键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代总指挥时，曾率二十个团左右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何部在修水、铜鼓一带协助“进剿”。1931年4、5月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何部在湘东南堵击红军。自1930年冬至1932年间，何部还参加了对湘赣、湘鄂赣红军根据地的反复扫荡。1933年5月，何键被任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又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7月，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从江西永新、遂川进入湖南。蒋介石急调何键部追击，何的西路军基本队伍十九师（原三十五军改编）一直尾追至贵州石阡。10月，中央红军撤离瑞金，突围到赣、湘、粤边。蒋把何键的西路军主力调湖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11月上旬，蒋任命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率五路“追剿”军，妄图把红军主力消灭在湖南。12月，红军突破封锁线，击败何键部阻击，进入贵州。何键继续尾追。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滇东，蒋介石撤销了“追剿”军总司令部，以何键为“剿匪”军第一路司令，专任对红二方面军的反复“围剿”。11月，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突围北上，何键部继续尾追到贵州、云南。

何键不仅参加了反革命“围剿”，还把“铲共”“清乡”作为全省的中心任务，自兼清乡司令部司令。他把原叫“挨户团”的地方团队改名为“铲共义勇队”，说“用这个响亮名词，可以大大激发民众铲共的决心”。他又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⑧他在全省严密保甲组织，办理“十家联结”，清乡队、挨户团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靠近苏区的地方更是血洗火烧，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竭力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侈谈“八德”、五经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⑨，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开办银行，滥发纸币，操纵金融；用各种名义发行公债；苛征田赋，恢复厘金，加征盐税；和贵州军阀勾结贩运鸦片；将湖南所产锰砂盗卖给日本。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长沙、汉口、庐山、上海、香港等地购置了大量房地产。

何键取得湖南政权后，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兵力最盛时达到十万人左右。红军北上抗日，“剿共”局面缓和后，蒋介石不再允许他依仗实力进行地方割据，逼他辞去四路军总指挥职务，将该部主力调赴江、浙。以后又以抗日为名，将该部（包括地方保安队）陆续调离湖南，使何的军事实力彻底瓦解。1936年6月，粤桂军阀联合反蒋。事变前夕，陈济棠、李

宗仁派代表到湖南与何密商合作。何大耍两面手法，一面作出响应西南的姿态；一面却派人向蒋告密，使蒋抢先控制了衡阳，桂粤进军湖南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想两面讨好，结果既招怨桂粤，也得罪了蒋介石，成为蒋想拔除他的一个因素。“西安事变”时，何键企图乘机将四路军主力从浙江调回湖南，没有成功。又企图把保安团扩编为正规军，也落了空。这加深了蒋对他的猜疑。1937年11月，调他为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统治湖南九年的历史。

1938年夏，湖南政界倒何分子组织“湖南各界清算委员会”，对何九年囊括湖南财政进行清算，拥何派将主持最力的国民党监察委员罗介夫刺死，清算风波遂停。

1939年春，何键调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任主任委员。抗战胜利时因病辞职。以后长期住南岳休养。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沙，他迁居香港。1950年夏到台湾，被聘为伪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6年4月25日，何键因脑溢血死于台北。

注：

- ①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 ②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
- ③ 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卷，第154页。
- ④ 何键反共宣言见《武汉反共之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四卷第29期。
- ⑤ 《湖南省志》第一卷第549页。
- ⑥ 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省志》第一卷第595页。

- ⑦ 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
- ⑧ 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
- ⑨ 何键：《请命令学校读经以发扬民族精神而实现总理遗教案》，《月报》第一卷第5期。

左 舜 生

李义彬

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首领之一。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生于1893年10月13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四日）。祖父莘农，前清举人。父子立，为家馆塾师，兼业中医。

左舜生七岁入塾，随父读《三字经》和“四书”之类。1911年冬小学毕业。不久，入长沙新成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兼习日文。1914年秋，由于得到其长兄的资助，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语，与曾琦、李璜等同学。他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因其长兄失业，失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1917年秋到南京，在同学黄仲苏家任家庭教师。

五四前夜的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觉醒，奋起救国。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为团结青年，在科学精神指导下，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即实业和教育），把衰败腐朽的中国改造成青春年少的中国。不久，学会筹备处主任王光祈到南京，介绍左舜生加入了这个学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北京学生代表黄日葵、许德珩（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到南京策动学生罢课，左舜生曾与他们一起到金陵大学作发动工作。年末，左到上海中华书

局编辑所任职，不久任该所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左舜生被推选为学会评议部评议员。翌年评议部主任曾琦出国留学，左接任评议部主任职务，一直到1924年7月为止。

在新文化运动中，左舜生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思想对他颇有影响。1919年夏，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主张由少数青年组织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参加这个“集合体”的成员必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归集体分配和使用，子女也由集体负责教养。他企图用这种乌托邦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开始分化，左与曾琦、李璜、陈启天等成为学会中的右翼代表，他们站在一起，与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代表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相对立。当时，李大钊等极力要把这个宗旨笼统、成份复杂、组织松散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左舜生等右翼分子竭力阻挠和反对。左唆使上海的会员写信给北京的会员，主张学会“多研究些学理，少叙述些主义”^①。在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召开的南京大会和1922年召开的杭州大会上，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辩。高君宇在杭州大会上明确表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②左在会上坚持只从事“社会活动”，反对“争辩规定共同主义”^③。可是他却利用长期把持会务、编辑《少年中国》月刊的权力，伙同陈

启天等人，从1923年下半年起，接连刊载贩卖国家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学会“规定共同主义”，只是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学会改造成社会主义团体的通词而已。

学会中的右翼分子在贩卖国家主义谬论的同时，开始网罗党羽，筹建反动组织。1923年12月2日，留学法国的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宣称主张实行“全民政治”，反对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左舜生、陈启天等乘李大钊等忙于革命事业、无暇顾及会务的机会，篡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权。

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国内。左舜生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身份伙同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左任该报总经理，负责发行工作。他经常在《醒狮》上发表文章，进行反苏、反共、反革命的宣传，叫嚣：“吾人反对苏俄在华宣传共产；对所谓中国共产党之行动，更绝对不赞成”^④。他还说，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是列强想共管中国的唯一原因。”^⑤他把当时以平等待我之苏联与英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恶毒地进行攻击和诬蔑。

1925年春，左舜生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1926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他得到中华书局资助，去法国游学。1927年9月回到上海，仍回中华书局任职。四·一二政变后，青年党与蒋介石在反共、反革命这一点上虽然已经完全一致，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因之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没有合流起来。这时青年党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党治”，同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1930年

7月红军攻占长沙，反动势力大为震惊。左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登载各地的所谓“匪情调查”，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毁灭文化”。还在这个反动刊物上登载《曾、左、李平乱要旨》，详细介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经验”，以资国民党反动派参考，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出谋献策。四川军阀刘湘就曾大量翻印这篇文章，作为军事学校的教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这时，青年党想借机取得合法地位，实现与蒋介石“合作”。为此，左舜生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主张青年党与国民党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革命政策，左叫嚷“在共产党未解除其武装以前，全国人不应有反对剿共之举”^⑥。1932年，左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到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尽管青年党一再向国民党靠拢，在一段时间里仍未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们又设法与反蒋势力接近，进行投机。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举起反蒋旗帜，左带领一批青年党员到福州，后见形势对陈铭枢等不利，又悄悄地溜回上海。

1933年5月，根据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派人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骂。左舜生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时事诤言》，替国民党反动派开脱罪责，说什么：在抗战还没有准备的条件下，主持签订协定的人，处在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已经不大容易。黄郛见到此文，喜出望

外，立即邀左到莫干山长谈。同年5月，蒋介石又电邀左到庐山见面。左在上海与曾琦密谋后，于7月上庐山见蒋，陪同前往的还有青年党的重要骨干分子何鲁之。这是青年党头目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1935年春夏之交，左应邀到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时间长达七个学期之久。由于左舜生对沟通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功，在当年7月召开的青年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搞所谓“华北自治”，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左舜生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对“一二·九”运动进行攻击诬蔑，说学生“结队游行，请愿，喊口号，发传单”的爱国行动，“等于痴人说梦”^⑦。

1936年夏，左舜生由青年党骨干分子崔万秋（曾留学日本）陪同去日本十余天。行前，曾到北平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密谈。此行名为参观访问，实为观察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左舜生接连发表了《彻底反对容共联俄》和《写在西安事变之后》等文章，攻击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把张、杨对蒋实行“兵谏”诬为“突然叛变，动摇国本”。说他们“显然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麻醉”。他还污蔑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威胁民众”，再次为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革命政策辩护。说什么“先解决共产党的红军而后能积极对日”的政策“是没有错的”。他竭力阻挠和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叫嚷“今后任何人敢于主张容共，即任何人将为全国国民的众矢之的。”^⑧

1937年初，左舜生陪同曾琦前往奉化面见蒋介石，长谈两次，进一步讨论了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设立国防参议院时，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聘为参议员。1938年4月21日，左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表示竭诚拥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4月24日，蒋、汪复函左舜生，称：“本党念职责之艰巨，尤望集中全国贤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日之艰危，而谋国家久远之福利。”^⑩至此，青年党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同年，国民党政府迁至武汉，废国防参议院，成立国民参政会，左亦以青年党代表资格被指定为参政员。在武汉期间，左还创办了青年党的报纸《新中国日报》，一度任经理。

抗日战争期间，青年党仍坚持其反共立场，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义行动。左舜生在一届三次参政会上就曾发表过攻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言论。这时候，青年党虽然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仍未得到官职，因之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有所不满，声言要求“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进一步强化其一党专政，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时，青年党参加，左舜生任秘书长。1945年7月，左随黄炎培、章伯钧等到延安参观访问，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及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青年党与国民党秘密勾结，在名额分配上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以此来分裂和破坏民盟，结果被赶出民

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青年党于1945年11月在重庆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左舜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6年1月，左作为青年党的“东南党务复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飞往上海，恢复东南地区的青年党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青年党的报纸《中华时报》。11月16日，左以宣传部长名义，代表青年党宣布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伪国民大会，左本人亦作为青年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伪国大。1947年4月，青年党终于撕下“在野”和“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国民党反动政府，左出任农林部长。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全国胜利前夕，左舜生于1949年4月逃离祖国大陆，在香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并先后在香港新亚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年9月到台湾调解青年党的内部矛盾，同年10月16日病死于台湾。

注：

- ① 《会员通讯》，《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 ② 《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
- ③ 《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 ④ 《醒狮》周报第48号，1925年9月5日。
- ⑤ 《醒狮》周报第8号，1924年11月29日。
- ⑥ 左舜生：《废止内战与武力统一》，《民声周报》第32期，1932年7月20日。
- ⑦ 左舜生：《非常时青年自处与指导》，《国论》一卷七期。
- ⑧ 《写在西安事变之后》，《国论》二卷五期。
- ⑨ 左宏禹编：《抗战建国中之中国青年党》，国魂书店1939年4月版，第15页。

刘 桂 棠

刘述和

刘桂棠，山东巨匪，平邑县南锅泉村人。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其父刘相云，冬春打更巡夜，夏秋看护田禾。其母是本村地主孙安常家的佣人。刘桂棠十二岁便做了孙家的羊倌，干了八年。在这期间，他已有盗窃和抢劫行为。1912年他跑到青岛扛大个^①，干了一年之后又跑回本村，仍到孙家扛活。1915年，他约伙本村两个恶少，弄了一把鬼头刀、一支马冲子^②，潜入山中，正式干起土匪勾当。不久，他们又联合当地流氓、地痞夏兴德、李满、苏四等，八人烧香结盟。刘桂棠行七，肤色又黑，因而得了“刘黑七”的诨号。从此八匪以“刘黑七”为首，抢劫绑票、打家劫舍，日益猖獗。

民国以来，土匪蜂起，鲁南山区久已是土匪出没的场所，抱犊崮以悍匪巢穴闻名中外^③。刘桂棠正是活动于这一带。自从袁世凯称帝复辟失败以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更加以天灾频仍，广大人民日不聊生。刘桂棠乘机扩大势力。1919年匪部发展到三百多人，武器换上了钢枪。1925年发展到一千多人，匪部有了“刘团”之称。

1925年张宗昌派一个团到鲁南山区剿匪。这支腐败不堪的军阀部队，以剿匪之名行资匪之实。当时刘桂棠匪部在蒙

山上。部队打上山去，土匪一个反击，大批武器弹药丢在山上。土匪收缴了这些武器后，留下许多银元。部队再上山，发现了银元，便胡乱对空打一阵枪，放下武器，带上银元，自动下山。土匪再收武器，也再留银元。结果是这个团发财而归，而刘桂棠得以用军阀部队送来的武器大大装备了自己的部队。

随着匪部势力的扩大，活动方式逐步发生了变化。起初，主要是抢劫绑票，后来发展为以烧杀虏掠手段进行勒索为主。刘桂棠匪部向农村要钱、要粮、要枪，那一处抗拒缴纳，即凶悍残忍地进行烧杀。1925年至1928年，蒙山前怀百里之内被匪部烧杀的有一千多村庄，烧毁房屋二十多万间，杀害群众一万二千多人。在匪部严重摧残下，蒙山地区村落凋敝，田园荒芜，许多村庄绝了人烟。邹、滕、泗水、蒙阴、莱芜、新太、淄博等县，也无不遭其蹂躏。1927年3月，刘桂棠率匪数千窜到莱芜，仅在红山寨一处就杀了一千三百多口^④，还有一批男女被虏。所虏男女如愿从匪，可以入伙，如不从匪，难免一死。匪部一切人，奸淫虏掠从便，酣饮、豪赌各随所好。因此，匪部势力急剧地膨胀，到1928年发展到一万多人，连同“吃潮水”^⑤的，达到一万五千多人。

刘桂棠人多势大，引起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重视。1928年初，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以银元一万七千元、面粉二千袋相赠，意欲收买这股势力。刘收其礼而不从其愿。这年春，国民党开始了争夺地盘的所谓“北伐”。何应钦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鲁南，也看上了刘桂棠。刘羡慕国民党、蒋介石的招牌，于是投靠何应钦，被编为“新四师”，做了师长。随后匪部以“北伐先遣军”名义，从鲁南开往胶东。济南惨案以后，又开往河

南禹县一带。

1929年10月，蒋、冯混战爆发。何应钦命刘桂棠向冯玉祥部进攻。刘率部在禹县一带击溃了冯军一部，获得蒋介石电贺，电称匪部为“铁四师”。这年冬奉命开往临汝一带。这期间锡山派人以高官厚禄拉刘。刘在禹县战斗后，对于未得升官发财本已不满，1930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经阎一拉，便倒蒋投阎。阎以大炮四门、重机枪十二挺、冲锋枪一四四支、现金二百万元为欢迎礼，把匪部编为二十六军，刘做了军长。10月阎冯失败后，阎锡山怕东北军占其老巢，命所属各部开回山西。刘不从调动，脱离了阎锡山，带兵北上。1931年7月到达河北大名，即派人与东北军联系。张学良将匪部编为第六混成旅，刘任旅长，仍驻大名。

刘桂棠的朝秦暮楚，使蒋介石又恼又恨。匪部驻大名以后，蒋命刘峙指挥三个师、一个旅围攻。血战多日，匪部大部被消灭。刘带残匪二千突围跑回山东，驻高唐一带。这时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派幕僚陈席之进行拉拢。陈、刘是同乡，老相识。经陈关说，刘投韩。同年12月，韩委刘桂棠为“山东警备司令”，所部编为四个警备旅，仍驻高唐一带。但是，由于匪部不听调遣，不到半年就磨擦起来。韩停止了对匪部的供给，并密谋解除其武装。刘侦悉了韩的意图，1932年6月从高唐一带撤出，再次北上。到河北霸县，挖了韩复榘的祖坟，即跨过河北，打败汤玉麟的防军，进入热河，并迫汤让出开鲁、林西一带地盘给匪部驻扎。1933年春，适当日本帝国主义叫嚷长城是伪满国界的时候，刘派部下去东北联系投靠日伪，讨得了伪满“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下设三个军。刘部曾积极配

合日军茂木骑兵旅团侵占沾源等地。5月下旬，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宋哲元的幕僚田家斌与刘桂棠联系，刘于6月26日通电参加同盟军。8月同盟军失败后，刘部为何（应钦）、宋（哲元）改编。刘任察东剿匪司令。不久，由于与汤玉麟部冲突，刘又率部南窜，一直窜到河南南阳地区。次年2月窜回山东。韩复榘派重兵袭击，曹州一战，大汶口又一战，匪部大败。刘带残匪四千东窜，在诸城县境被包围。激战二十昼夜，残匪基本被消灭。刘只身逃亡天津，在日租界潜居下来。

刘寓天津一年。这时他的旧部刘德胜带残匪少许逃在宣化活动。1935年秋，刘从天津到了宣化，指挥残匪大力扩充，不到半年，有了三千多人。1936年初，刘匪窜到保定、石家庄等地活动。2月，窜到东光县境，遭宋哲元、商震两部袭击，三千土匪基本就歼。3月，刘再回天津，投靠日本侵略者。“七七”事变爆发，刘桂棠联络潜居各地的散匪，积极准备为日军效劳。1937年底，他向日军讨得了“皇协军前进总司令”的头衔，带上喽罗，跟上日军到了山东。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他从鲁北辗转到了胶东。1938年他在掖县、即墨等地扩充队伍，到年底，匪部又有了三千多人。刘扩大了势力，对其日本主子的调遣便不那么顺从了，日军因而要解除其武装，主奴之间动了干戈。年底刘率部撤出胶东，打着“反正抗日”的旗号开进鲁中山区，与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取得联系。于将匪部收编为“新编三十六师”，刘重新做了国民党的师长。1939年春，匪部移驻平邑县——刘的老巢。

平邑广大地区自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建成抗日根据地。刘桂棠这时以“反正抗日”的名义进入鲁南，共

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欢迎态度。但是刘的所谓“反正抗日”，不过是骗取时间、创造条件，以便站住脚跟而已。1940年春，匪部脚跟站稳以后，便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当年的柘沟战斗，匪部袭击八路军津浦支队三团，二百多指战员牺牲。1941年5月，匪部勾结日伪袭击费南^⑥二区，区中队和工作干部五十多人牺牲。同年秋，匪部配合日伪袭击抗日根据地一千校，鲁南三团为保卫千校安全转移，一百多人牺牲。匪部对抗日人员和人民群众极其残忍，凡被认为有共产党、八路军嫌疑的人，捉到必定活埋，仅大井村一处就活埋了二百多人。1940年冬，匪部纵火把费南六十多个村庄烧成灰烬，制造了蒙山无人区。

刘桂棠匪部的疯狂进攻和烧杀，受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和严正惩处。1943年，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刘桂棠。这年秋，刘见势不妙，破坏了老巢的一切军事设施，把家眷秘密送往天津，开始了流窜活动。八路军跟踪追击，不断削弱其有生力量。11月，匪部窜到上下柱子（两个山村），八路军鲁南部队发起了歼灭刘桂棠的战斗，全歼残匪，并击毙了刘桂棠^⑦。

注：

- ① “扛大个”，在车站、码头装卸车、船扛包的一种劳动。
- ② “马冲子”，一种打火药的短小土枪。
- ③ 1923年引起中外交涉的临城劫车案，作案悍匪孙美璠，即据峄县抱犊崮。
- ④ 见《续修莱芜县志》卷三十八“大事记”。
- ⑤ 对没有正式入伙参加匪部，但随同匪部活动作案的人，称“吃潮水”。
- ⑥ 辖区属平邑县，解放后合并费南、费北两县为平邑。
- ⑦ 详见《红旗飘飘》第六集：《奔袭刘黑七》。刘桂棠又作刘桂堂。

陶克陶胡

卢明辉

陶克陶胡，姓包，绰号天照应。1863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的父亲恩和毕勒格图，是该旗世袭四等台吉。陶克陶胡出生后，他的家里虽已变为没有随丁家奴的“豪格”台吉（即没落贵族），但家境仍很富裕。

陶克陶胡从小就是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同周围蒙旗的许多豪强恶绅结成叩头拜把的帮兄弟，经常寻机聚伙外出，欺良凌弱，为非作歹。

1900年秋，沙俄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调集重兵十余万人，从黑龙江和关东州（今旅大市）南北两路入侵东三省，对义和团和抗击他们的清兵，进行残酷的镇压。陶克陶胡趁火打劫，组织他本家族亲戚数名，扼松花江岸口阻击被沙俄击溃渡江的散兵游勇，曾一次打死十余人，夺获大枪十二枝。从1900年秋至1901年春，陶克陶胡率领帮伙二十余人，多次打死溃逃散兵，夺下许多鸦片烟、银钱等财物和数十枝枪械^①。还经常窜到江东各地进行抢劫。成为郭尔罗斯前旗有势力的豪绅头目，连本旗王爷也知道他有势不驯，不敢管他。

沙俄侵略军为了利用陶克陶胡进行民族分裂的阴谋活

动，便通过其间谍布利雅特(蒙古人)、森勃勒与陶克陶胡认作义兄弟，进行勾结。1903年，沙俄与日本为争夺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加紧备战，积极准备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动战争。这时，陶克陶胡为了替沙俄侵略者效劳，帮助俄军购买了上万头战备菜牛。有时，沙俄拿来的银子不够，陶克陶胡就先拿出自己的银子或鸦片烟垫上。从此，陶克陶胡便和沙俄侵略军勾结起来。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三省境内爆发后，陶克陶胡趁机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和伙众，与白音达赖等“红胡子”帮伙相互勾结，前后出没于郭尔罗斯、达尔罕、图什业图、扎萨克图、扎赉特、巴林左旗等东蒙地区，大肆绑票勒索，掳掠财物。陶克陶胡更利用沙俄的掩护和军火接济，兼并一些小股匪伙，使自己的武装势力很快发展起来。

1905年，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广大蒙古族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和蒙古封建王公强行开垦出卖蒙古的牧场土地，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反垦斗争”。此时，陶克陶胡便利用反垦斗争的声势，依仗他已掌握的数十骑武装势力，打起“武装反垦”的旗号。并提出驱汉排汉的所谓“斗争纲领”：“驱逐移入蒙地的汉族农民，保持蒙古领土完整；没收汉族商店财产”^②等。

从1906年至1908年间，陶克陶胡以索伦山为根据地，与白音达赖、牙什留根、那僧梦克等“马贼”巨魁，合伙连帮，汇聚成近二百人左右的帮伙。他们时分时合，肆无忌惮地抢劫掳掠，对广大蒙古牧民群众任意打骂欺辱，甚至枪毙杀害。由于陶克陶胡越来越疯狂的暴行，广大蒙汉群众对他深恶痛绝；同时因他经常多占掠获得来的财物，也使他的帮伙内部分崩离

析。1907年后，那僧梦克、白音达赖等先后率众与陶克陶胡分伙。到1908年4月，陶克陶胡只剩下他的儿子、侄子和本家族兄弟等四十人，在清兵追剿下重返索伦山区老巢。山区牧民为避其抢劫骚扰，扶老携幼，闻风而逃。陶等入山后，食物断绝，无处容身，沿途抢掠许多蒙汉商民后，溜入沙俄国境。先是，1907年9月16日，陶克陶胡曾率领他的人马在郭尔罗斯前旗哈拉乌苏地方，打死测绘地图的日本人孙尚钱代吉，抢去保护这些日本人的奉天府官兵的毛瑟枪五枝，子弹五百发，号衣四、五件。陶克陶胡的这个行动博得了沙俄的赏识，因而他率领人马逃入俄境后，沙俄间谍森勃勒即与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联系，签发准他率众长期留居俄国的护照。

1910年4月，陶克陶胡在沙俄赤塔军事当局的唆使下，又率党羽潜窜外蒙古车臣汗部桑贝子旗等地。并与该旗王府的印官旺丹多尔计、台吉珠克都尔拉木扎布等相互勾结，抢劫庆昌玉等六家汉商，在沙俄赤塔州派来三百余名俄军的接应掩护下，复入俄境。同年7月，沙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派遣俄军乘一艘轮船到郭尔罗斯前旗，把陶克陶胡的家眷接送到俄国^③，与陶居住在一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沙俄的直接策动下，以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为首的一小撮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宣称外蒙古“独立”。这时，经沙俄豢养多年的忠实帮凶陶克陶胡，前往彼得堡拜谒沙皇，并奉沙皇旨意“前去外蒙古援助新建立的蒙古政府”。陶克陶胡到达库伦（今乌兰巴托）后，刚刚爬上外蒙古傀儡皇帝宝座的哲布尊丹巴，便赏封他“一品顶戴花翎卓里克图巴特尔（即“刚毅英雄”）的封号”，任命为兵部侍郎兼

“皇帝”的“亲卫队队长”等要职，并加封“镇国公”世袭爵位。

1912年秋，陶克陶胡上书给哲布尊丹巴，要求任命他为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并请由他统率军队，返回内蒙古“推翻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的政权，把郭尔罗斯前旗拉到外蒙古方面”^④，由他管辖。1913年，哲布尊丹巴颁发给他以扎萨克印信，管辖该旗，后又委为挺进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第二路远征军司令官等职。陶克陶胡正兴高采烈地秣马厉兵，同沙俄侵略军并肩向内蒙古“合兵南犯”时，沙俄欧洲形势吃紧，不遑东顾。同时，沙皇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声明”规定了取消外蒙古“独立”，在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前提下，实行“自治”。这使陶克陶胡进兵内蒙古东部地区称王的迷梦，变成了泡影。

陶克陶胡妄图分裂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阴谋虽未能实现，但他在外蒙古却负有沙俄赋予的一项特殊使命，即监视和控制不愿屈服于沙俄而仍倾向于中国政府的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活动。陶克陶胡的这项间谍任务，不但使他的同僚们生畏，就连哲布尊丹巴这个傀儡政府的皇帝，“对于他所统辖的远比喀尔喀人还要凶猛好战的喀喇沁人部队，似乎也抱有一种恐怖心理。”^⑤当时，任满的沙俄驻中国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在库伦会见陶克陶胡，曾说：“从他已往放荡不羁的强盗生活，已经堕落成为专以豪言壮语为能的无耻之徒”，但是，从他胸前佩戴着沙皇授予他的“斯塔尼斯勋章”，“还表明了他对俄国的深厚同情及永不忘记沙皇陛下对他的好意”。^⑥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的反动统治被推翻。1919年秋，外蒙古神权傀儡政府因难以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向北

京政府要求“仍复前清旧制”。同年11月17日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当哲布尊丹巴率其王公、大臣举行返回中国的仪式时,陶克陶胡对这一失败的厄运怀着悲愤的心情,没有参加典礼。

1920年秋,以谢米诺夫为首的俄国白匪,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窜扰我国东北边境地区,其余党头目巴伦·恩琴与外蒙古土谢图部一等台吉罗布苍·策旺等人勾结,率蒙兵四千余人,进攻库伦。这时,陶克陶胡因终日吸食鸦片,卧病在库伦,便派他的亲族奈丹扎布、扎木苏等人和罗布苍·策旺等一同支持白匪攻击驻库伦的北京政府边防军。

1921年2月初,白匪巴伦·恩琴再次勾结“外蒙匪首择毕特拉公”,“领带蒙兵三千多人,内有日人五、六十名,专任指挥之职”,二次围攻库伦。陶克陶胡又派他的胞侄领带蒙兵二百余人^⑦,伙同择毕特拉公充当巴伦·恩琴的帮凶。

1922年4月,陶克陶胡在库伦病亡。

注:

① 《关于陶克陶胡的一些情况——图们乌力吉回忆访问录》稿。图们乌力吉从小就随陶克陶胡住在一起,从1900年起,他跟随陶克陶胡当“红胡子”,后随陶一同到俄国,1911年冬由赤塔同陶一起去外蒙古库伦。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返回内蒙古。

②④ 嘎·纳旺纳穆吉勒:《刚毅英雄陶克陶胡传略》,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46年蒙文版。

③ 东北档案馆:《黑龙江省公署档案》“俄人派轮船接取陶克陶胡等人家眷”,第127袋、22519号。

⑤⑥ (俄)科罗斯托维茨:《蒙古近世史》。

⑦ “蒙古活佛在日帝支持的白俄恩琴操纵下于库伦宣布独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十二册。

陈 蝶 仙

江绍贞

陈蝶仙，原名寿嵩，字昆叔；后改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人，生于1879年7月22日（清光绪五年六月初四）。他的父亲陈福元，以行医和相命为业，并擅长音律。蝶仙为庶出，七岁丧母。其嫡母喜爱说部弹词，常让蝶仙为之诵读。加之塾师也经常教蝶仙作五七言诗，因此他少年时对小说诗词以及音律等非常爱好。十余岁时已能吟咏，曾将自己的习作刊印，题名《惜红精舍诗》。后又将所著辑为《一粟园丛书》。他原来也想以科举进身，曾得优附贡生。后放弃科举，悉心著述，以惜红生笔名写一些诗词在上海《同文沪报》副刊《消闲录》上发表。1895年主杭州《大观报》笔政，曾著《潇湘影弹词》等作品印行出版。当时写情小说兴起，他受其影响，于1898年著长篇写情小说《泪珠缘》，在文坛上初露头角。

1901年，陈在杭州开设萃利公司，次年又开设石印局，规模都不大。萃利公司主要销售书籍文具纸张，偶而贩卖一些欧美的化学仪器以及留声机、无声影片等，曾引起守旧亲友们的笑和反对。不久，萃利公司收歇，石印局亦因火灾被焚。1907年，陈前往上海办著作林社，出版文艺杂志《著作林》，至二十余期停刊。他曾自撰了一些传奇小说在该刊发表。

1909年起，陈在江浙一带的绍兴、靖江、淮安等县当幕僚和小官吏。民国元年，代理镇海县知事时，往邻县慈溪访友，见遍地乌贼骨，认为用来制作牙粉原料，可不费分文，而取给无穷。便与其四弟蓉轩（名华同，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商议，由研艺所制造牙粉，并呈文上司要求拨款二千元作制造经费。结果遭到训斥，遂愤而辞职，寓居上海，再度文字生涯。

当时，正是鸳鸯蝴蝶派兴盛时期，陈蝶仙是代表人物之一。1913年主编《游戏杂志》，次年又主编《女子世界》，同时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申报》副刊《自由谈》作特约撰述。1916年任该副刊的主编。他先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玉田恨史》、《黄金崇》等长篇小说。还在鸳鸯蝴蝶派所主编的《礼拜六》等许多杂志上大量投稿，先后发表了《琼花劫》、《井底鸳鸯》等长篇小说。此外还与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外国小说。他前后所著小说数量达百余篇之多，内容大半都是描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所说“良家女子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①。陈蝶仙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当作游戏和消闲，他主编的《游戏杂志》，即以游戏文字著称。他的人生观充满了颓废思想，曾说：“人生于世，实在梦中”，“李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实虚诞耳”^②。他署名天虚我生，号蝶仙，其意皆源于此。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鸳、蝶等取名，也自陈氏始。1916年5月陈加入“南社”。

陈蝶仙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却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在

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特辟“常识”栏，撰文介绍小工艺日用品制造法，后汇集为《家庭常识》八集，印行出版。同时，亲自试制牙粉，由其子小蝶和时任中学教员的李常觉（字新甫，鸳鸯蝴蝶派作家）协助，以他们共同的稿费收入为试制费用。此时他发现乌贼骨作牙粉原料有伤牙齿，便往舟山群岛之岱山一带，向盐场收购制盐中废弃的苦卤，提炼制作牙粉的基本原料炭酸镁。试制成功，每百斤炭酸镁的成本不过十二元左右，仅及日货炭酸镁售价的一半。1917年制成牙粉，定名“无敌牙粉”（蝴蝶之谐音，并以蝴蝶为其商标图案），在农商部登记立案。开始时没有正规的厂房，雇工很少，家人亲友也参加制作，产品委托烟纸店代售，是为家庭工业社之伊始。

自无敌牙粉问世后，销路很好，获利丰厚。1918年7月，正式成立家庭工业社股份公司，资本一万元，陈蝶仙自任经理，小蝶任副理。这时，盐商们见苦卤制粉有利可图，遂趁机抬高卤价，由原来的一元八担，抬价到一元一担。陈为保持廉价的原料，便转而向散户盐民收购，同时将无敌牙粉批给这些盐民销售。这样，既保持了廉价的原料，又扩大了产品的销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充斥中国市场的日制牙粉大受打击，家庭工业社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这年增资五万元，次年又增资十万元，并建厂房于上海江阴街。1922年资本额达到二十万元，在梅雪路购地十一亩建总厂，附设印刷、玻璃、制盒等辅助厂。为了取得原料的方便和廉价的劳力，又在无锡、宁波、海宁设制镁厂，在镇江设蛤油、蚊香厂，在太仓设薄荷油厂等。为解决产品包装所

需要的用纸，1929年陈蝶仙让李常觉担任经理，自己改任监理，脱身到无锡研究造纸，建成利用造纸厂。之后，又到杭州创建浙江改良手工造纸厂。这样，形成了一个以制粉为中心的包括原料、包装和副产品制造在内的生产体系。陈蝶仙虽然对现代科学技术很热心，但各厂的机器设备能力都很低，他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手工操作来取得高额利润。截至抗日战争前，家庭工业社的资本已达五十万元，工人达二千人，产品四百多种。开办二十年间，资本增长五十倍。

陈蝶仙自创办家庭工业社后，创作活动大为减少，但仍然在《半月》、《红玫瑰》等杂志上投稿，多系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1924年，将他十三岁以来所著诗词曲稿等汇集为《栩园丛稿》刊行。1930年，他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并主编《机联会刊》，宣传提倡国货，并自撰一些介绍化学日用品制造法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杂文。该刊于抗战前停刊。

1937年“七七”全国抗战开始，陈时在杭州。他考虑到上海必遭袭击，便派小蝶向上海市商会提出组织迁厂的建议，并具体安排家庭工业社的迁移。由于李常觉不以为然，只将上海厂的半数资财运往汉口。陈由杭到汉，以汉口为中心，暂行总社业务。“八一三”后，上海总厂和无锡利用造纸厂均遭日机炸毁。年底，国民党政府西迁，陈亦溯江西上，将汉口厂分别迁设于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后亦遭日机炸毁）。他还到四川铜梁作改良川纸的试验，生产了四川连纸。又到自流井，利用盐井的便利，制造碳酸镁，到巫陵制造炭酸钙。之后，前往云南昆明，筹建制粉厂。1939年冬，陈蝶仙在昆明得病，由小

蝶护送回上海，于次年3月24日去世。

注：

- ①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 ② 转引自《浙江商务》第1卷第3期，1936年3月。

陆 费 逵

熊尚厚

陆费逵字伯鸿，幼名沧生。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9月17日（清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生于陕西汉中。其父陆费芷沧曾在直隶、山东、河南、汉中等地做幕僚。陆费逵六岁时，父亲改入江西南昌府幕，遂移家南昌。其母是李鸿章的侄女，颇识诗书。陆费逵从小由母亲教读。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阅读《时务报》等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即弃旧学，改为自学史地、算术等新书。并入南昌英语学塾学英文，更常阅读新书新报。1902年，陆费逵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八个月后因经费不继停办。次年春，他随老师吕星如去武汉。临行时向母亲表示：“蓬矢四方，男儿之志”^①，决心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武昌后，他任塾师，同时继续从吕星如学日文。1904年，陆费逵在武昌与黄镇盘等伙设新学界书店，他担任经理。在店中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和其他新书。他自著《岳武穆传》，借以抒发反清革命思想，并积极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1905年春，革命党人刘静庵借圣公会附设之阅报室——日知会，为革命活动基地。并用日知会名义发展革命党人。陆费逵参加日知会革命活动，曾为日知会起草章程。日知会正式成立时，他任评议员。1905年秋，陆费逵辞去新学界书店经理，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吴研人

创办的《楚报》，任主笔。同年底，该报因著文反对粤汉路借款密约，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被迫逃往上海。在那里任昌明公司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同时参加上海书业商会筹备工作，负责起草章程。该会正式成立，他任评议员兼书记。此后，遂转到教育文化救国的道路，从旁赞助革命^②。

1906年6月，陆费逵在上海书业商会主编《图书月报》，该刊出至三期停刊。同年冬，他到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和书业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在文明书局期间，他着手编辑一套新教科书。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完成。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及讲义部主任。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重实利教育。并对小学堂章程提出改革意见，倡议改革旧教育制度^③。其议论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倾动一时。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并提倡白话文。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陆费逵曾为该会起草章程。同时，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次年秋，武昌起义胜利。他看到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是另创书局的有利时机。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值资金周转不灵，营业一时萎缩。张元济等思想又保守，对教科书亦不作改革。陆费逵即与商务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陈协恭等筹集资金，暗中加紧编写新教科书，并进行新书局的筹设。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办事及编辑人员十余人，陆费逵任经理，沈知方任副经理。最初只经营出版业

务。该局开办后,陆费逵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以商务为竞争对手,在春季开学前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和《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刊五色国旗作封面。中华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夺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营业。1913年,陆费逵将中华书局资本增至十万元,迁编辑所于东百老汇路。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与当地绅商协议,合资设立中华书局分局。总分各局人员增达二百余人。又添办印刷业务,扩充编辑部,聘请范源濂任编辑长,编辑中华初小、高小教科书。他还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出版、印刷业务。回国后大力加强出版,改进营业。他又收买商务编辑人员,并在报上揭发商务与日商合办的内幕,打击它的信誉。由此中华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年营业额达二十余万元。

1914年,中华书局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增设分局,并出版《中华新学制中学教科书》和《中华师范教科书》。次年改组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邀请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和梁启超等任董事,陆费逵任局长。由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杂志界颇具影响。同时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增设发行所,又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④。1916年6月,更将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分局增至四十余处,印刷所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职工千余人。中华书局成了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

中华书局因扩充太快,与商务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以副经理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以致资金周转不灵,1917年6月几至停业。在陆费逵主持下,董事会曾决议将中华书局出

租给商务印书馆。嗣因条件太苛未成。当时，范源濂请他去教育部工作，汪康年请他出任《新闻报》总主笔，他都未应允，决心再把中华书局办好。嗣后，经各方设法，11月得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投资，12月董事会改组，以吴镜渊任驻局办事董事，于右任、孔祥熙、康心如等十一人为董事。陆费逵被董事会撤去局长职务，但仍责成司理业务。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中华书局在他主持下，创办《解放与改造》、《中华英文周报》和《中华书商月报》；出版《新教育国语教科书》；编印《新文化丛书》等。1922年到1926年又创刊了《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和《小朋友》等杂志；刊印《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及《儿童文学丛书》。中华书局在常德、衡阳、梧州、九江、芜湖、徐州、青岛、张家口及兰州等地增设分局，资本增至二百万元。1927年更于香港增设了分局，规模益大。

在中华书局重获发展的同时，沈知方在上海另创了世界书局。1925年出版教科书及政治宣传读物，用种种办法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陆费逵即联合商务在河南路另创公民书店，以跌价倾销与之竞争。后公民书店因资本亏蚀甚巨，由商务盘入而结束。

1927年，南京蒋介石政权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抱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大大发展自己的企业。陆费逵也在这种幻梦的诱惑下，积极扩张中华书局。1929年，他在上海新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仪器兼产桅灯。次年孔祥熙担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为了依靠孔的政治势力，他推举孔祥熙为中华书局董事长。1932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扩充印刷

所，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政府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华书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营业更加发展，年营业额增至四百万元。1934年在九龙新建最新设备印刷厂一座，设备称远东第一，主要承印南京政府钞票和债券。

1936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厂和编辑所，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将中华教育用具厂部分车间分出，在上海创办了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为国防生产橡皮船，防毒面具和桅灯。又于香港设分厂。同年陆费逵担任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三千余人。该局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中华书局发展到它的顶峰。三十余年来，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重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近二万种。随着中华书局的日益发展，陆费逵的声名愈著，成为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他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实业部新闻造纸厂筹备委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同年夏，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抗日战争时期，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同时，本着他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发表过不少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1912年1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提出当务之急有四：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章程；组织高等教育

会议和规定行政权限^⑤，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采纳。又与蒋维乔共拟《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同年1月19日经教育部审定公布。主要内容为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注重手工教育，中学师范改为四年，中学文实不分科及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此外，他还发表《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和《国民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阐述他的教育主张。他自谓是“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的人^⑥。主张效法欧美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提议减少课时，缩短在学年限及注重实利教育。

陆费逵还大力推行国语运动。早在1906年，即曾发表《论设字母学堂》一文，主张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辛亥革命后，他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会后在上海提倡国语运动^⑦。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

陆费逵主张以宗教的学说和精神用于教育工作，“教育人的灵魂”^⑧。1918年秋，他与人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主张“采宗教之学说为精神之训练”，以佛教为“精神教育”^⑨。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月，陆费逵在《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备战》的文章，主张“一致对外”，“长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才，准备作战”^⑩。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把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

香港分厂，将总局迁往昆明。上海中华书局由吴镜渊主持，后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为掩护，维持营业。同时并将保安实业公司迁往香港，加强国防用具生产。是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图谋杀害著名爱国人士。陆费逵获悉，即离开上海去香港。在香港设立中华书局办事处。本人则寓居九龙主持香港分局营业，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生前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养杂谈》和《妇女问题杂谈》等。

注：

- ① 陆费逵：《教育文存》，第5卷第11页。
- ② 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1934年3月，第2卷6期。
- ③ 同①，第1卷第22—30页、72页、105页。
- ④ 国立图书公司原为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等创设的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见《现代出版史料》丁编第400页。
- ⑤ 陆费逵：《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教育杂志》1911年1月，第10期。
- ⑥ 同①，第1卷第72页。
- ⑦ 陆曼炎：《时贤别纪》第二集，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11月版，第77—82页。
- ⑧ 同①，第1卷，第20页。
- ⑨ 同①，第1卷，19—24页；第2卷，24页。
- ⑩ 《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张嘉璈

江绍贞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人。1889年11月13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生。父亲张祖泽当过医生，经过商。二哥张君勱后来是民社党头子。

张嘉璈幼时住在嘉定县，受塾师教育。十三岁随同张君勱到上海“广方言馆”读书，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受名师袁观澜、沈信卿的教导，“对中国性理之学的研究，得益匪浅”^①。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进京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不久得友人帮助到日本，入东京庆应大学习财经学。他悉心研究明治维新后日本财政、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希望回国后在财政金融上有所建树。

1909年张毕业回国，起初在北京帮助《国民公报》翻译路透社电讯，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嘉璈离京到沪，与一部分共和研究会成员发起筹建国民协会。翌年初，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5月，代表国民协会往北京与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协商合并。因与共和党意见分歧，11月底单独与张君勱等人主持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合并，改称民主党，拥梁启超为领袖。

张嘉璈作为浙江代表于1913年4月出席北京政治会议，并经梁启超推荐任参议院秘书长。他因不满袁世凯强制参议

院选举、解散国会等丑行，决心放弃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财政金融事业。适逢北京政府清理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又经梁启超（时任币制局总裁）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中国银行虽有商股，但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等特权。张嘉璈任职后，运用自己所学得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学知识，为建立新式银行制度作了一些努力。

1916年4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继续筹措军饷，以作垂死挣扎。其时梁士诒献策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集中现金；金融界某些人则主张发行不兑换券，因内情外泄，引起京津地区中交两行的挤兑，很快波及全国。5月11日，国务院下令中交两行即日起一律停止兑付所有发行之纸币及应付存款，并封存两行所有现金准备。张嘉璈认为这样作将断送银行的生命，遂与经理宋汉章一起毅然抗命。他们取得金融工商界人士及租界当局英美势力的支持，继续兑现。仅四天时间，风潮平息。这一行动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影响及于苏、浙、皖、赣、鄂各省；同时也提高了张嘉璈在金融工商界的声望。翌年，他被提升为总行副总裁，到京供职。

通过抗拒停兑令，张嘉璈感到银行必须从官府的桎梏下解脱，才能正常发展业务。他到总行上任后即与总裁王克敏计议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充商股，成立股东会，总裁副总裁不随财长进退，由股东会直接选举董监事，财部加委。新则例经梁启超采纳后，呈准总统公布。年底，财政部补足官股五百万元；续招商股达七百二十七万九千八百元，商股超过了官股。1918年2月，召开第一届股东会，张当选为董事，蝉联副

总裁。此后，中国银行经过 1921 和 1922 年两次增加私人投资，资金达一千九百七十六万元。反之，北洋政府却陆续将股票出卖，官股股额只剩下五万元，仅占该行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至此，中国银行基本上成为商办。

这时期，张嘉璈联合银行业在戒备外国新银团垄断中国经济权益，以及支援铁路建设方面，作了一些努力，还协助政府整理公债。1922 年他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全国财政讨论会，翌年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

1926 年 7 月北伐开始后，张嘉璈与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接到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关于北伐形势的报告，又经冯往广东实地考察，认定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为与北伐军方面取得联系和保护中国银行在南方的产业，决定由张嘉璈回沪成立副总裁驻沪办公处。张回沪后，立即与政学系分子黄郛、张群等人密切交往，多次秘密对广东国民政府予以经济上的接济。“四·一二”前夕，又为蒋介石提供反革命政变经费。南京蒋记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亲临张宅致谢。张大为感动，认为蒋“能礼贤下士”，“具有领袖的风范”^②。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继续给蒋政权以经济支持。为了既能给蒋政权提供大量军费，又避免因滥发钞票造成币制混乱和通货膨胀，他与钱新之等人极力怂恿蒋介石大量发行公债。由于政府发行的公债普通年息为六厘，收受价格大大低于票面，银行业从代发公债中大获其利。

中国银行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初便企图予以兼并。财政部长宋子文向张嘉璈提出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增加官股，使之多于商股。这与张多年来努力建

立独立的商业银行的愿望截然相反。他力主由政府另立中央银行，表示愿由中国银行分担其股本，并要求改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根基未固，还需要利用张嘉璈统驭江浙资产阶级供给军费，只好另立中央银行。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重订中国银行条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由财政部加入官股五百万元，董事长由政府委派，改总裁制为总经理制。这个条例，为日后国民党政府兼并打下了一个楔子。

中国银行条例重订后，张嘉璈出任总经理。他以为从此可以放手发展商业银行业务了。1929年5月赴欧美及日本考察近代银行制度；选聘外国银行专家；在伦敦、大阪、纽约等地设立中国银行分支机构，有的地方则委托当地银行代理中国银行国际汇兑。1930年底，中国银行国外直接通汇城市六十二处，特约代理九十六家。张回国后，即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革，每年考选国内外大学经济、银行专业毕业生入行，并给予一定的职位和较好的待遇。他授命留英经济学家刘攻芸负责建立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发行准备金接受公开检查；大力调整机构，先后成立国外部和信托部；又建立经济研究室，聘任英国专家主持，由其弟张嘉铸、弟媳张肖梅协助掌管经济情报，发行《中行月刊》、《金融统计月报》等。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银行业务起了重要作用，营业额在同业中一直领先。1928至1931年，中国银行存放款额均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存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但由于连年内战，财政支绌，公债发行激增，中国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逐年增多，资金运用无法往专业化方向转移，只能从承销政府公债中得到畸形的

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嘉璈正在大连视察行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清查张学良有无银行股本及存款为由，将中国银行沈阳分行封闭。张嘉璈立即赶往沈阳，向日本宪兵司令部疏通，始得启封营业。翌年“一·二八”沪战时，上海市商会为抗议日军侵略，宣告罢市。张嘉璈与李铭策划银行业首先开市。3月，日本导演的伪“满洲国”出笼，国民党政府失掉东北关、盐两税的大宗收入，财政更加支绌。张与李铭等人顺从国民党政府的旨意，制定公债展期还本、减低利息的办法，帮助国民党政府解决财经困难。年底，张赴曼谷、新加坡等地调查侨汇。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张又赴日本作所谓“经济提携”的活动。

虽然张嘉璈致力于发展中国银行业务，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援，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银行覬覦之心从来没有放弃。1935年，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巨额内战经费无法筹措。财政部长孔祥熙组织财政顾问委员会，聘张嘉璈任副主席，想继续借助他率领金融资产阶级给政府垫款。此时，张对蒋介石无止境的内战耗费不愿再冒险给钱了。他一再向孔祥熙要求减少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反对拿银行当国库。孔祥熙见张难以驾驭，遂决定夺取中国银行。3月中，他与宋子文往武汉与蒋介石密谋，决定以“救济金融”为名，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以其中二千万元增加中国银行官股（后改为一千五百万元，连原有官股共二千万元，与商股相等）；改中国银行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调张嘉璈任没有实权的中央银行副总裁。3月28日，财政部训令

下达后，张悲愤交集，立即召开董事会。各董事对国民党政府的卑劣作法强烈不满，要求张向政府提出质问。张以不愿与政府相抗而拒绝，并宣告辞职，要求各董事谅解。由于南京政府的压力，30日董事会被迫通过执行财政部训令。这样，国民党政府以一纸金融公债，就把中国银行攫夺而去。张愤不就中央银行副总裁职，要求出国考察，但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下未能成行，并于年底俯首就任了铁道部长。

张嘉璈任职中国银行时，曾对铁道建设表现过很大的兴趣。上任后，立即作出三年内修筑三千七百多英里新路的计划。1936年1月，修筑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发行二千七百万铁路建设公债。一月后，续发一亿二千万修筑湘黔路株州至贵阳线。他又极力引进外资，与中法工商银行签订成渝路借款，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他得悉英国有大量投资的可能，旋即拟定1937—1941年五年筑路五千英里的计划。迄抗战时止，先后借外债（材料借款在外）约三千多万英镑^③，均以我国重要财政收入作担保，大部分借款规定只能向债权国购买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嘉璈首先拟定修筑湘桂路衡阳至桂林段，越一年完成二百多英里，对抗战运输起了一定的作用。复拟将此路向越南边境展筑，后因日军袭击中止。1938年初，铁道部并属交通部，张任交通部长。他打算修筑西北铁路经新疆达苏联，由于物力财力不足和苏方不予支持，未能实现。修筑滇缅路的计划也由于英国对远东政策举棋不定而屡遭顿挫；后虽得美国租借法案物资兴工，又因缅甸陷落，半途而止。自“七七”至1942年底止，总共完成新路仅一千英里^④。

1943年1月，张以健康不佳辞交通部长职。9月，赴美国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著《中国铁道建设》，在美出版。翌年10月，出席在美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陈光甫、李铭等人同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合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张任董事。该公司1945年8月20日在纽约开业，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东北胜利果实，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后改称东北行辕），下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任命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长路理事长，电令张立即返国。9月中，张回国抵重庆。经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策划后，10月偕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到长春。立即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接收事宜。经四次谈判未得结果。11月，熊返重庆，张负责与苏方继续谈判。他取得苏方同意，派员抢收了中长路沿线各重要城市，将大批伪军收编为警察大队，用以阻挡人民解放军。他抢收东北的工矿企业，建立政学系官僚资本。经委会还设立庞大的机构，留用大批日本侵略者充作顾问。又发行半独立的东北流通券，收回伪币及苏军发行的红军票。他故意不宣布兑换截止期，然后突然停兑，使红军票回流解放区抢购物资。这件事被认为是张嘉璈对共产党经济战的胜利。后来蒋介石扩大内战，军费浩繁，流通券发行激增，东北人民深受其贬值之苦，而张嘉璈则协助与支持张嘉铸所控制的中国植物油公司，乘东北大豆即将实行统购之机，大量抢购大豆外销，获取巨额外汇。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成为主要内战场所，张嘉

璈在东北已无可作为。蒋介石想借助他的理财能力挽救经济危机，11月3日，电召张到南京。此时蒋介石集团正在筹备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拉拢民社、青年两党参加，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张嘉璈立即到沪，力促其兄张君勱背叛“民盟”，参加伪国大。翌年4月，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而张嘉璈则先于3月1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上任时正值“黄金潮”^⑤后，通货膨胀加剧，军事垫款激增，他仍然想用发行公债的办法遏止法币发行量的增加。3月2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民国三十六年短期库券及美金公债条例，库券定额三亿美元，公债定额一亿美元，并为此成立募销委员会。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债信已失，虽以扩大贴放作招徕，除少数较大的行庄被迫认购少量外，中小资产阶级则强烈抵制。至8月，仅售出总额的六分之一，不得不停止发售。国民党政府举内债的目的宣告破产。7月，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国民党政府又寄最大希望于美援。由张嘉璈、王云五等组织专门委员会接待。并由张嘉璈拟定一个币制改革方案，要求美国贷给美元作发行基金。由于美国当时不敢公开给予这笔巨额贷款，使其打算落空。此时法币贬值加速，带来黄金、美钞和物价的狂涨。国民党政府想获取外汇与减少外汇支出，缓和物价，于8月17日公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修正案和进出口贸易办法修正案，设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前者由陈光甫主持，后者由张任主任委员。随后又开征建国特捐，要国人限期申报在外资产，并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等措施。这些措施并不能挽回恶性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物价继续狂涨，货币不断贬值濒临崩溃。这时，CC派

起而攻之。1948年5月，张嘉璈随同张群一同卸职。政学系的“两张财权”宣告结束。张嘉璈辞职前，曾谋求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没有成功。而且连中央信托局也被CC派夺走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欺骗性的和平文告后“引退”。代总统李宗仁邀张嘉璈到南京，以财政部长相委。他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大势已去，没有接受。是年5月逃居澳大利亚悉尼，研究总结中国通货膨胀的教训，着手撰写英文《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一书^⑥。1953年9月，张应美国洛杉矶洛亚拉大学之聘赴美，主讲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史。1961年辞洛亚拉大学教职，参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1974年为美国陆军部撰《中共经济潜力之研究》。另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工业产品价格方面的论文。1979年10月15日病死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

注：

① 《张公权自述往事答客问》，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2、4期。

② 同①。

③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绪言，杨瀚年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7月版。

④ 同③。

⑤ “黄金潮”发生在1947年2月上旬。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失败，纸币发行猛增，大量来自东北、平津的游资集中上海，抢购黄金、外币，引起黄金、外币狂涨。1月底沪市金价尚在四百万（十两）之内，2月1日起突破四百万，随之急剧上升。2月10日，中央银行宣布停止对金号配售黄金，沪市金价最高达七百二十万。11日，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其他物价亦随之狂涨。

⑥ 是书于1955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代为出版。

钱 新 之

江绍贞

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原籍浙江吴兴，188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他幼时入塾，读“四书”“五经”，1897年进上海育才学堂（后改为南洋中学）。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政经济学。1903年得官费赴日本留学，入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续习财经及银行学。1909年回国，参加清政府考察留学生的考试后，因父丧南归。次年，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

辛亥革命后，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被唐绍仪内阁任为工商总长。钱新之由陈派往北京参加接收旧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未及一年辞职回上海。以后受中国实业银行筹备机构之聘，赴东北考察金融实业。又为张謇起草过一些金融商业方面的章则条文，得到张的赏识。1916年4月，袁世凯筹军饷作最后挣扎，有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现金或发行不兑换券之议，致使中、交两行发生挤兑风潮。5月11日，国务院竟下令停止兑现。这道命令，首先遭到上海中国、交通两银行抵制，钱参加宋汉章、张嘉璈等人的抗拒停兑活动。

1917年，钱新之参与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恢复营业，钱经张謇的介绍任该行副经理。由于他采用近代资本主

义国家银行的经营方法，推动与扩大了银行业务，1919年升任该行经理。1920年又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交通银行开办于1907年，兼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等特权，后一直为交通系梁士诒等人所把持。1921年，张作霖支持梁士诒组阁，遭到吴佩孚和直系军阀的反对。1922年春爆发直奉战争，结果奉系失败；梁士诒罢交行总理职。这时，钱新之积极活动，抬出张謇任总理，钱则被张任为协理。张謇挂名而已，行务实由钱新之主持。1925年5月，梁士诒再得张作霖支持，复任交行总理，钱随张謇一道去职。次年，钱转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

1927年春，蒋介石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江浙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到南昌与蒋介石达成交易后，为适应政变的需要，于3月22日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的组织。钱新之作为北方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并担任常务委员。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钱被蒋任为该会委员。这两个所谓一官一民的机构一建立，就立即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介石垫借了三百万元的反革命政变经费。“四·一二”后，又继续为蒋筹款。因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钱被任为财政部次长，时部长古应芬长期在粤，钱实代理部务。

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大量的反革命内战经费，以发行债券为其财政根本方针，钱为此而积极出谋划策。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想废除北洋政府所发行之旧公债，钱力持不可。指出新公债之购主即旧债之持有人，不可废旧债而自毁其债信。这

一主张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使国民党政府所发行之江海关二五库券及续发二五库券近一亿元的巨债，得以在资产阶级特别是银行业中顺利推销。1928年，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邀钱新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是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建立，钱被任为该行理事。11月，交通银行加入官股二百万元，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钱任常务董事。

钱新之虽然在国民党政府里得到一定的职位，但他的主要愿望还是在金融实业方面求得发展。因而于1929年辞掉政界职务，通过国民党政府的门路，当上了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该矿当时因经过军阀混战，资金短缺，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工人生活极端困苦，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钱新之出任总经理后，立即请求陈立夫派遣吴绍澍（原名雨声，1927年叛变共产党，改名绍澍）前往山东枣庄，在该矿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钱新之还凭借他与银行界的关系，取得贷款五百万元，添置设备，使生产得以恢复。该矿原有运煤轮船，经过钱的筹划，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资本一百五十万元，拥有轮船吨位二万八千余吨，由钱任董事长。

当时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五大赌台，又大肆贩运毒品，得到巨额的赃款。钱为他筹划，于1929年创建了中汇银行。自后，杜在金融工商方面的活动，大多由钱帮助谋划，钱也以杜为靠山。是年，钱当选中华职教社董事会主席，直到解放前止，但社务主要是由黄炎培等人主持。

1930年，钱新之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为中法工商银行中方副董事长。当时曾有驻法国公使之任命，钱不愿脱离金融实

业而没有受任。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建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地方协会），钱新之与杜月笙等人充任理事。1934年，会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谋杀后，杜任会长，钱任副会长。

1933年，钱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一起，收购杭州电厂，建立杭州电力公司。又投资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泰山保险公司等企业。

1935年，出现全国性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乘机以救济金融工商为名，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官股，并改组人事，张嘉璈等人均遭排挤，钱仍被派任为这两行的常务董事。同年，他还参加赴日经济考察团，进行所谓“睦交”、“通商”的活动。

西安事变发生时，钱新之为营救蒋介石，与杜月笙等人联名急电张学良，表示“愿赴陕以身为质”。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后，他们马上入京晋谒，慰问祝贺，与蒋介石等所谓“蒙难”要人摄影留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新之与杜月笙、潘公展、王晓籁等人遵国民党政府之意，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用以控制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他随同杜月笙、王晓籁等于11月27日离上海到香港。在港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他们不仅假救济之名，行中饱之实，并用这两个机构作掩护，帮助军统头子戴笠进行情报、联络等活动。

1938年，钱新之受国民党政府聘任为国民参政员。是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乘飞机赴渝途中，遭日机

袭击坠机身死，钱遂接任交行董事长职。当时，钱新之打算以香港作为交行的中心，他将从上海撤出的资金和人员大半都集中到香港。不料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交行和钱个人在港的资财损失惨重。之后，他只好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添设分支行处。

1942 年 3 月，钱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他担任常务董事。该公司得到戴笠在交通、检查等方面提供的方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大发“国难财”。是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统一发行法，将钞票发行权统一集中于中央银行。这对当时握有发行权的交行是一大威胁。同时，钱得悉财政部长孔祥熙有打入交行兼任董事长之意。他为了抗拒孔的威胁，便企图依靠 CC 系的势力与孔抗衡，聘请了 CC 系的赵棣华任交行总经理。结果交行的发行权不仅没有保住，反而从总行到分支行都侵入了 CC 系的势力。钱新之为对付 CC 系的威胁，一方面凭借他多角式的手段，依靠政学系、宋系以及杜月笙的黑势力；一方面紧紧握住实权，因而一直没有动摇他在交行的地位。

1943 年，杜月笙在重庆筹设“通济公司”，钱新之代表交行投资，并担任常务董事。这个公司与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开设的“民华公司”对口，一方面搞物资交换；一方面为蒋介石暗中与日本侵略者作政治交易。抗战胜利前夕，他还用交行资金投资宋系官僚资本开设的孚中公司，由钱担任董事长，但实权掌握在宋子良、宋子安兄弟手里。该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大量套购外汇，从美国输入汽车、无线电设备等禁运物资，牟取暴利，遭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对，钱新之曾极力为之辩解。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钱新之奉蒋介石之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席。政协会后，回到上海。一方面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都市的交行机构，同时在工商企业以及文化事业机构中大肆活动。先后担任了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上海《新闻报》等许多企业事业机构的董事长。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钱新之不仅自己紧紧追随，当选为伪国大代表，而且多次诱劝黄炎培等人参加，遭到严拒。

由于蒋介石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带来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危机。1947年4月建立起政学系的所谓两张财权（行政院长张群，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用发行公债等办法筹措反革命内战经费。钱新之被任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初，他想借江浙资产阶级的捧场，擅自代表金融界承销公债总数的四分之一，结果除部分较大的行庄应酬少数外，中小行庄则强烈抵制。他的承诺不能实现，便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如强令四行二局的职员认购一个月薪金总额的债券，生产贷款搭配债券。甚至开动宣传机器，挨户摊派。但经过四个多月的卖力推销，也只售出总额的六分之一。

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一起筹组了规模较大的复兴航业公司。先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为阻挡日军舰驶入长江，调集了不少民航船只自沉于江西境内马当山下的长江中。抗战胜利后，钱、杜等人出面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得到几万吨船只的补偿。又经过他们向美国借贷美金三千万元，购买美国剩余船只五万吨，组成了这个公司，由钱新之任董事长。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时，杜月笙受美帝国主义的唆使，进行上海“国际化”的阴谋活动。为此，曾组织“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拼凑了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妄图以此迎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以实现其“国际化”阴谋，钱新之参与了这一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钱新之于上海解放前夕，逃往香港。

1950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应台湾蒋帮的要求，将复兴航业公司由港迁往台湾，改由官营。尔后钱因病退休，迁到台湾定居，于1958年6月19日死在台北。

张 振 勋

熊尚厚

张振勋字弼士，号肇燮，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生，广东大埔县人。其父张兰轩为乡村塾师兼业医。他幼年随父读书三年，之后进了一家竹器店学徒。1858年只身飘流海外，赴南洋印尼巴城（今雅加达），在一家华侨纸行充杂工。不久作经纪人。后当上了管账先生，手头逐渐有了些积蓄。数年后，他和纸行老板的女儿结婚。岳父死后，继承遗产自立门户，开设了一爿酒行，销售各国名酒。张振勋竭力结交荷兰殖民当局，获准承包酒税与典当捐，又承包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垄断了当地的鸦片烟买卖。在承包烟税中，他用欺诈手段击败了竞争对手，发了横财。

1866年，张振勋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一家裕和垦殖公司，开始大规模领垦荒地种植。1875年，在苏门答腊开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裕兴垦殖公司。1878年在爪哇日里（今日惹），与华侨张耀轩^①合资创办笠旺垦殖公司，垦荒种植树胶、咖啡和茶叶；先后开辟树胶园七、八所，茶叶加工场一处，拥有职工数千人；并合伙创设了一家日里银行。

张振勋为了解决货物运输问题，于1886年创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有轮船三艘自运货物，航行于檳城、亚齐之间。1898年，有一次他欲从巴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德国邮船公司歧视

中国人，拒绝卖给他头等船票。他非常气愤，表示以后“我的商船一律不给德国佬卖票。”不久，张振勋在巴城创设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在亚齐开办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往返于新加坡、香港等地。他在创办了自己的客运轮船公司后，公开声明为华人服务，与德国邮船公司对抗，迫使德国公司取消了华人不得购买头等船票的歧视性规定。

马来亚的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和彭亨四府州，早年就是华侨开发的盛产锡矿区。1898年，张振勋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亚，在英属彭亨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设置商场；并经营雪兰莪、巴生地区锡矿。1912年，他将其垦殖业更扩展到马来亚，在英属槟榔屿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并组设万裕兴总公司，以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此外，他还经营药材业，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药行，组成一个庞大的药材批发网。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张振勋经营垦植、橡胶、锡矿和航业，三十多年，获得惊人利润，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当时华侨在国外很受歧视，他怀着爱国情怀，打算回国发展祖国的实业，也盼望在国内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

1892年，经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推荐，张振勋被委派为槟榔屿首任领事。1894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1898年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以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总办。1899年又被委为广东佛山铁路总办。1900年再负责督办粤汉铁路。1903年清廷二次召见张振勋，赏给他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他第三次被清廷召见，乃上书建议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增设各省官商合办和商办铁路支线，提倡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

利权等十二条^②。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并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振勋受命回到南洋，为了团结侨胞，促进华侨工商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与戴忻然等在檳城筹设了中华总商会，并往马来亚一带劝导华侨设商会，兴学校。1907年4月，张振勋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张振勋由商而官，功名显赫，但对英、荷殖民政府的封官许爵，却一一婉言谢绝。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为了振兴祖国的实业，他把大量资金转移回国发展实业。

1892年张振勋赴香港时，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电邀他去烟台商办路矿，他立即前往，法国驻印尼巴城领事曾对他说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他到烟台后，立即着手调查与筹办酿酒公司。1894年，他在烟台投资三百万元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自种葡萄七百余亩试酿葡萄酒，以其族侄张应东任总办。次年9月获清政府批准，该公司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专利十五年，免税三年。经过十年的经营，张裕公司的酒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贵州茅台酒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张振勋投资国内，受到清朝洋务派的欢迎。1897年他得李鸿章的保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任该行总董。1904年，他与商部侍郎陈璧，共订兴办广（州）厦（门）铁路计划：拟先募资本八十万银两，建筑广州至黄埔路段，并开辟黄埔商埠，继由黄埔筑至海丰与潮汕路接轨，再由潮州筑至福建厦门。1905年1月，他在广东靖海门设立农工路矿局，并去广西梧州谒见两广总督岑春煊，请其赞助。但因美国合兴公司的

抗阻与岑春煊的刁难，广厦铁路计划遭到失败^③。同年4月，张振勋获准建筑厦门至福州铁路权，又因福建绅商的强烈反对而作罢。1907年，他接办粤人谭日章、陈庆昌合办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公司，增资数十万元改名宝兴公司，聘请外籍矿师勘测矿区，增购机器，并修筑龙山道路，开采三岔银矿。1909年，张振勋任广东总商会总理，与广东劝业公所的伍申三等，组织广东集大公司出品协会。1910年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和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同年11月，中美商团会议在上海召开，张振勋为华商议长。他与美商议长商议筹设中美联合银行，并由两国商会互设物品陈列所。次年5月，他与上海大资本家周金箴、沈仲礼等筹办中美轮船公司，于上海暂设事务所，资本定额一千万银两，他认股一百五十万两。张振勋除经营工商业外，还先后在新加坡、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香港、汕头、潮州、大埔、上海、天津、烟台、广州等处，置有总计千万金的不动产^④。

张振勋在国内的实业投资，都未获得明显的成效。但他仍然再接再厉，在广东省继续大规模投资。他鉴于中国工业设备落后，技术力量缺乏，在坚持“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下，购买外国机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先后聘请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数人，于1910年开始创办了广州亚通机织厂、广东开建金矿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厂、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⑤、平海福裕盐田公司和佛山裕益砂砖公司等企业，图谋振兴广东的实业，继续实践他“为祖国效力”的诺言。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权，张振勋被任为袁

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并被举为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1914年2月,任约法会议议员。次年4月,又被袁世凯选定为参议院参政。但是,张振勋仍将其主要精力从事实业活动。1912年3月,与熊希龄等在上海创办康年人寿保险公司。1914年11月,再任广东总商会总理。1915年4月,与上海资本家聂其杰等,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任团长。自美国回国后,张在上海等地继续进行筹办中美银行和中美物品陈列所的活动。11月他复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又任北京商务联合会总董及美国旧金山中国航业公司督办。并在北京设立中美银行事务所,继续往返于沪宁等地从事招股活动。

张振勋一生热心赈捐社会福利和资办学校,生平所捐款项不下数十万。当他任职清廷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时,曾在槟榔屿捐资八万元创办中华学校^①。又于新加坡创办应新学校。他给香港大学堂捐款十万元,香港英国殖民当局赠他法学博士衔。辛亥革命后,他捐助福建民军七万元。又在汕头购置房屋数十间创办“育善堂”,专为当地居民及嘉应五属办理社会福利与外出学生补助。晚年还遗言捐助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楼。

1916年9月12日,张振勋病逝于印度尼西亚巴城。

注:

- ① 张耀轩原为张振勋手下职工,以善于经营致富,亦为南洋拓殖垦荒业中的著名先驱。
- ② 张振勋撰:张弼上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

- ③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 955—958 页。
- ④ 林博爱等:《南洋名人集传》第 9--10 页。
- ⑤ 该公司以拖拉机耕种,张振勋为中国最早引进农业机械的人。
- ⑥ 该校为当地最早的中文学校。

黄 仲 涵

温广益

黄仲涵，字泰源，祖籍福建同安。1866年11月1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瓏。

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曾参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福建同安发生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清兵的搜捕，于1856年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印尼三宝瓏定居。经过几年的劳动后，黄志信积累了一些资本，于1863年创立了建源公司。开始时以经营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土产贸易为主，从中国贩运咸鱼、茶叶、丝绸和药材等到印尼，然后把印尼的糖与烟草等转贩中国。以后，他兼营典当业、邮信业、林业及鸦片等生意。由于黄志信善于钻营，又敢于聘用专门人才经营管理，该公司的业务一步步扩大，发展成为三宝瓏屈指可数的华侨企业之一，拥有数十万荷盾家产，为以后黄仲涵继承并发展该公司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85年，未满二十岁的黄仲涵开始协助他父亲掌管建源公司的业务，并逐渐成为他父亲的得力助手。1890至1903年期间，黄仲涵利用时机，从事鸦片买卖，赚取了一千八百万荷盾，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打下基础。

黄仲涵经营的企业主要是糖厂。爪哇地区由于土地肥沃，气温适宜，且无台风侵袭，向为甘蔗种植的理想地区，出产

的大晶粒白糖誉满全球。1901年，雄心勃勃的黄仲涵承受了他父亲的大笔遗产，将资金大量投入糖业的经营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建源公司已拥有两家大规模的糖厂，各雇用工人数千，积累的资金达三千余万荷盾。

由于糖业经营业务的扩大，资金流转和糖产品运输的需求增加，使黄仲涵感到需要向银行业和航运业领域扩展。1906年，印尼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黄仲涵银行在三宝瓏和泗水两地成立，资本额为四百万荷盾。不久，黄仲涵又与友人联合经营三宝瓏轮船公司。1912年他承顶了该公司的全部业务，改组为协荣茂轮船公司。开始时有轮船五艘，航行于爪哇与新加坡之间，以后又增购四艘，航行于印尼各地。一时间黄仲涵成了印尼航运业的巨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打仗，许多工厂生产停顿，引起百物腾贵，糖价也暴涨数倍。黄仲涵此时倾全力经营糖业，这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战争结束时，已拥有糖厂九家，资产达四亿荷盾以上，富甲东南亚，是华侨中有数的头面人物。建源公司经营糖业高峰时期，每年糖产量达二十万吨，除了供应印尼国内市场总消费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之外，还供应世界各地白糖市场的需要，分行遍设世界各大城市。黄仲涵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成就，是因为他敢于突破华商因循守旧等陋习，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经营管理。他不惜重金聘用外籍技师以不断改进制糖方法，耗费巨资购买现代化的设备以提高糖产量，同时采用种种办法使公司各级职员忠于职守。

黄仲涵在建源公司所获得的成就以及在华侨社会中的名

望日益提高，使他为荷印殖民政府所器重。早在1885年，即当黄仲涵参加建源公司的经营管理时，他就被荷印当局委任为“雷珍兰”（音译。荷印殖民政府设立的一种职称。协助甲必丹管理华侨内部事务）；1895至1896年，他又担任了两年的“甲必丹”（音译。管理华侨内部事务的华侨领袖）；1901年，他被委任为名义上的“玛腰”（音译。管理华侨事务的最高职务）。黄任三宝瓏华侨的“玛腰”后，代表华侨商界利益的中华商会遇到一些重大事情都得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中华商会自第六届以后索性推举他为名誉会长或特别会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印殖民政府规定对华侨分年收入要课以百分之三十的重税。建源公司获利甚巨，每年需缴三千万盾“收入税”，而且还要追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收入税”。荷印当局对华侨的横征暴敛，对黄仲涵当然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在设法逃避了这笔苛税后，举家迁居新加坡。黄仲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在日本人的诱说下，加入日本籍，以冀借助这个“东亚强国”保住自己偌大的私产。但是，荷印殖民政府并没有因为黄仲涵是“日本籍民”而手软，而日本领事馆也没有对他加以保护。所以，黄仲涵迁居新加坡后便放弃了日本国籍，转入英国籍。

黄仲涵对印尼和新加坡的华侨慈善教育事业都有过一定的支持和赞助。对国内革命也曾有所资助：辛亥革命五万荷盾，云南起义二万五千荷盾。以其四亿荷盾的资财来说，可谓微乎其微。

1924年6月6日，黄仲涵于新加坡病逝。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版。
- ② 爪哇三宝瓏中华总商会编:《三宝瓏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册》,1937年版。
- ③ 崔贵强:《印尼糖业大王黄仲涵先生生平》,香港《地平线》,1979年第3期。
- ④ Leo Suryadinata:《印尼著名华人传略》“黄仲涵”条,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会,1978年版。

鲁 迅

陈漱渝

鲁迅，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县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

鲁迅七岁进本宅私塾就读^①。十二岁转入被称为绍兴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身患重病，鲁迅的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在家庭破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开始体会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鲁迅还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为他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的“新政”彻底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勃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激起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守旧人们的讥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②。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被编入管轮班。11月，鲁迅离开水师学堂，回乡省亲。年底，参加会稽县试。但鲁迅对“博取功名”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府试。次年1月重

返南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所学校，鲁迅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在下矿实习过程中开始接触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1902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接触了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爱读《时务报》、《译学汇编》，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的著作，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等。他读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的深刻刺激，惊怖于亡国的危险，决心奋起图存。《天演论》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他感到了斗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从而初步形成了他早期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

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4月，抵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寿裳。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反清与保皇两大营垒，鲁迅站在反清方面，毅然带头剪了辫子。课余他贪婪地阅读欧洲各国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迫切地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还经常参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种集会。为了抗议弘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苛待与侮辱，鲁迅跟五十多名同学一度退学。这期间，他编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编写了论述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翻译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同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后来在谈到学医的动机说：“我的

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③

然而，鲁迅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一次，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围着看的一群中国人神情麻木。他感到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从此改变了医学救国的思想，转而志向于文学，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告别了教学认真、没有民族偏见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06年3月重返东京，学籍列在东京德语学校，开始文学活动。

1907年夏，鲁迅计划筹办文艺杂志《新生》，作为从事文学活动的第一步，但没有成功。此后，他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大力进行思想启蒙工作。鲁迅还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短篇小说，这是他译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开端。这期间，鲁迅同革命党人陶成章等时有过从，共谈时事，并参加光复会为会员^④。他还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半年多。

1909年夏，鲁迅因家境困难，离日归国。他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化学和生理学，并兼任博物课植物学的日文翻译。因为校长夏震武搞忠君尊孔，鲁迅和其他二十几名进步教师相率罢教，终于迫使这个封建顽固分子辞职。

一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监学，兼教生物学。课余辑录散见于类书中的唐

以前的古小说，后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又辑录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文，后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革命军攻入杭州。绍兴人民欢欣鼓舞。在绍兴开元寺举行的迎接光复大会上，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为了教育群众，稳定局势，戳穿惑乱人心的反革命政治谣言，鲁迅还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组成“武装演说队”，手持刀枪上街宣传。绍兴光复后，鲁迅被绍兴军政分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这年冬天，鲁迅创作了第一篇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曾经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接这次革命的鲁迅，目睹绍兴光复后招牌虽换、骨子依旧的情景，陷入了深沉的失望。为了“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⑤，鲁迅积极支持南社在浙江的分社——越社创办了《越绎日报》。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他往江南图书馆（后称江苏省国学图书楼）辑录唐宋短篇小说，后辑成《唐宋传奇集》。5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往北京。

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组成北洋军阀政府，国家形势日益险恶。鲁迅感到极其痛苦。他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他在孤独中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在尖锐的思想矛盾中探寻着国家和民族的新路。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佾事期间，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

开展通俗教育，筹创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鲁迅“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的战斗热情，发出了勇猛的呐喊。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发表了《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于1923年8月编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与此同时，鲁迅又创作了大量文艺性的论文——杂文，以尖锐、泼辣、生动的战斗风格，批判了“节”、“烈”、“孝”等封建礼教，揭露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尊孔复古主义，表现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保卫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成果。这些杂文，大都收集在《热风》和《坟》里。后来，杂文这种文体成了鲁迅战斗的主要武器，在他一生文学事业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从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公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论述我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至1926年止，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成为广大革命青年景仰的导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群众运动逐渐高涨。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革命形势深入发展，促使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⑥。在这次大分裂中，鲁迅跟以胡适为代

表的买办文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突破进化论观点的局限,曾一度感到“布不成阵”的苦闷和彷徨,但却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一边。坚持战斗,坚持探索,坚持前进,构成了鲁迅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倾向。他陆续写成了后来收集在《彷徨》中的十一篇小说,还写下了散文诗集《野草》等著作。在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鲁迅对宣扬封建复古主义的“甲寅派”和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主体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坚毅的韧战。

为了培育文艺新苗,广泛制造“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进步舆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发起并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和帮助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半月刊,编辑了《莽原》周刊、《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等。

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标志,革命运动在1925、1926年迅猛发展。鲁迅受到鼓舞,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勇于站在斗争前列,“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⑦。他三次为“五卅”惨案捐款,热情参加了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同时,继续写作大量杂文及其他作品,包括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表现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革命精神。

鲁迅的英勇战斗,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忌恨。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名单。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并为新的战斗作准备,鲁迅在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前往福建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开设“小说选及小说史”、“文学史纲要”等课程^⑧。文学史讲稿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公开出版。在厦门大学

期间,他继续写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一束《两地书》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等,共十七万余字。他还把1907年至1925年间写的二十三篇杂文编定为《坟》出版。此外,还鼓励和指导厦门大学学生组织文学团体、出版刊物。同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设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等课程,后又被特聘为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广州期间,中共广东区委派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人跟鲁迅联系,经常将《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赠送给他。鲁迅对代表党团组织跟他联系的革命青年特别热情,多方面对党团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通过在广州的实地观察和跟革命青年的接触交谈,鲁迅了解到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卖活动而造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深刻裂痕,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正在暗暗地加紧进行。1927年4月10日,在北伐军相继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庆锣鼓声中,鲁迅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写出了《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文章整段地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指导,要人们吸取历史教训,警惕革命的精神从浮滑、稀落到消亡、复旧,力戒自高自满,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永远进击,彻底消灭敌人。两天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证实了鲁迅的科学预见。4月15日,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密令,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主任开紧急会议,跟学校反动当局展开斗争,力主营救被捕学生。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继续在广州从

事创作和翻译。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大都收集在《而已集》中。10月，鲁迅离广州赴上海。

鲁迅在广州虽然只度过了八个多月，但这一段斗争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⑥

鲁迅到上海后，与许广平结为终身伴侣。他跟柔石等革命作家和中国济难会等革命团体发生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他决定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在上海定居不久，就跟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鲁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⑦在1928年和1929年，他用很大的精力翻译文艺理论著作，主持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卢那卡爾斯基《文艺与批评》以及俄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都曾编入这套丛书。他除曾一度主编由北京迁往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外，还跟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大力介绍外国的文艺创作和批评，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还帮助柔石等人组织朝花社，

⑥

介绍苏联和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版画艺术，先后出版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编入了《三闲集》。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发起进攻。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纲领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及其他进步作家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共同战斗。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向革命作家提出了战斗的要求，指明了当前战斗的方向。他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亲自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艺研究》等。他率领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派”，对国民党特务策划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将。9月，“左联”在上海为鲁迅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祝贺他在开创和发展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光辉业绩。

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恐惧。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通缉鲁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传闻将搜捕鲁迅。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鲁迅被迫离开寓所去别处暂避。不久，他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在“左联”的秘密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文在国外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这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

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鲁迅撰写了一系列犀利的杂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这两年间三十七篇杂文和一篇译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初，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鲁迅和茅盾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同年，鲁迅会见从苏区来上海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红军反“围剿”和苏区人民的生活及文化建设等情况，很受鼓舞。

1931年至33年期间，鲁迅与瞿秋白从通信、见面到结为知己。瞿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以避敌人的追踪，得到鲁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的许多关照。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并肩战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一道构思和写作了一批批判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杂文。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1933年4月亲自编选《鲁迅杂感选集》，选收鲁迅1918年至1932年间的杂文七十四篇，并撰写序言，深刻论述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向鲁迅学习，我们应当和他一同前进”^①。

1933年1月，鲁迅担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他不顾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种种迫害，参加营救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共产党人的活动；并跟宋庆龄等一道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鲁迅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殓。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

会议，鲁迅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年，鲁迅会见了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并参与发起为被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遗族募捐。

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和反动思潮作斗争中，鲁迅用各种笔名写作了大量战斗的杂文。这期间，鲁迅着重批判了鼓吹“文艺自由”论的“自由人”胡秋原和打着“第三种人”旗号而后来当了国民党书报审查官的苏汶（即杜衡），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在超阶级文艺观幌子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进攻。鲁迅把1932、33年写的杂文，编集在《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蒋介石在1934年疯狂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鼓吹以所谓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逆流。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复古派蠢蠢欲动，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于是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复起，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争，成为当时文化“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一个侧面。鲁迅坚持中国语文的改革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8月作《门外文谈》，对这场论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同时，鲁迅作《答国际文学社问》，先后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和苏联《真理报》，向全世界宣示了自己对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坚强信念。他把这一年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写下的战斗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指出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⑩。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胞书》，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号召。10月，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十分兴奋，请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经巴黎向中共中央拍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还冒着危险，保存了方志敏就义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和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手稿。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由其他同志妥善转交给了中共中央。鲁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掀起的尊孔逆流，对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提倡所谓抒写“性灵”的闲逸小品以麻痹人民意志的行径，继续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这些战斗的杂文连同这一年的其他短文共四十八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出版。

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还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苏联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是他1931年8月译出的，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1935、1936年最后战斗的时刻，还不知疲倦地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果戈里的《死魂灵》等名著。鲁迅寄无限深情和希望于革命文学青年，从各方面热忱关怀、积极培养他们。他到上海后虽然离开了教育岗位，但是仍然关心教育战线的斗争和青年学生的成长，多次应邀在上海、北京的大学讲演并热情接待来访的青年，回答青年们在数以千计的来信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鲁迅的周围，把鲁迅视为自己尊敬的良师益友。鲁迅十分热心提倡战斗的木刻艺术，指导青年组织木刻团体从事创作，1931年8月还曾举办木刻讲习班，请日本美术教员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自己亲自翻译；以后又举办展览、编印画集、介绍外国优

秀的版画艺术作品，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6年，鲁迅虽然身患重病，但仍以“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奋斗精神坚持战斗。2月，他转交了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接关系的信件。4月底，他会见了受党中央之命由陕北来上海的冯雪峰，兴奋地听取冯介绍红军长征经过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6月9日，他抱病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笔录），反击托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诬蔑。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⑩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重申：“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同时，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赋予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一、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二、但在文学问题上仍可以互相批判；三、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⑪。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感情，他还托人将火腿等礼品赠送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

这一年，鲁迅还亲自编辑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选集》等书籍。他满怀深情地将瞿秋白翻译的论文和文学作品，编成《海上述林》，亲自为之作序出版，以此作为对亡友的纪念，并向敌人示威。他本年撰写的三十五篇杂文，后编为《且介亭杂文末编》出版。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

本杂文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组成治丧委员会。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二万余人送殡。鲁迅遗体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战斗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加上日记和书信，约一千万字以上。其中包括杂文集十六本，小说集三本，散文诗集一本，回忆散文一本，辑录、校勘后公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中国古典文学史论著两本，现存书信一千四百余封，以及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从二十世纪初年到三十年代的斗争生活。此外，他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编印成三十三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五十万，促进了中国跟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编印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以及《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出版，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十六卷）也将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全部出齐。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在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研究鲁迅的专门机构。鲁迅的作品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国家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研究论著。

注:

- ① 据《朝花夕拾·五猖会》。
- ② 《呐喊·自序》。
- ③ 同②。
- ④ 据许寿裳:《鲁迅年谱》;林辰:《鲁迅事迹考》。
- ⑤ 《集外集拾遗·〈越铎〉出世辞》。
- ⑥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 ⑦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 ⑧ 据《厦大周刊》第168期,1926年10月23日版。
- ⑨ 《三闲集·序言》。
- ⑩ 转引自李霁野:《纪念鲁迅先生》。
- ⑪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 ⑫ 《且介亭杂文·序言》。
- ⑬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⑭ 据《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闻 一 多

王子光

闻一多原名闻多，字友三，辈名家骅。考入清华学校后，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个“一”字，改为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陈家岭。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造诣，一度参加过维新变革活动。

闻一多六岁入家塾读书，除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外，还学习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1909年，考进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1913年秋，考入清华学校。闻一多在这所学校前后读了九年半。他精力旺盛，读书很多，兴趣极广，观察问题敏锐，被同学公认为“博学之士”。

闻一多刚进入清华，就编演了《革命军》，表现出他对辛亥革命的热烈赞颂。1914年担任《清华周刊》编委，接着又被选为总编辑和学术性的《清华学报》编辑。1916年秋天清华学生成立游艺社，他任副社长。1919年底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又任编演部负责人。他“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①，是校内出名的编导和演员。1920年他和杨廷宝、梁思成等组成美术社，“以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为宗旨，发表《征求艺术专门者的呼声》。他参加了美术教师

组织的“校外写生团”，所作水彩风景画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以“图画冠全级”而得奖。有的作品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得了奖状^②。

年轻的闻一多，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他爱读李白、李义山、陆游等人的诗，在外国诗人中喜欢济慈、雪莱、拜伦，这些诗人的作品对他的诗作有明显的影响。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于《清华周刊》。他开始以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出现在中国的新诗坛上。二十年代他写的新诗集《红烛》和《死水》，在当时的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写了不少诗评。1921年6月他发表了《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音节底研究》报告。1922年3月发表论文《律诗底研究》。接着又在《创造月刊》先后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等具有创见的评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闻一多当天深夜在清华食堂大门的圆柱上贴出岳飞《满江红》词，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反帝爱国热情。当时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文书，负责宣传工作。6月中旬，他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

1921年6月，闻一多念完了高等科四年级，正在迎接毕业考试，准备出国的时候，发生了北京大中小学师生罢教罢课以支援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斗争。闻一多不顾学校当局对罢考学生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坚守学生会决议不参加考试，表示“节义之士不可以刑威胁”，因而留级一年，推迟出国^③。

1922年7月，闻一多读完清华学校，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次年暑假后，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系

主任利明斯女士对他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闻一多是少有的艺术家!”^④推荐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评选极严的一年一度的画展。

闻一多转学到珂罗拉多大学后,逐步由学画改攻文学。他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对于欧美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尤为酷爱,予以极高的评价与赞佩。常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⑤。

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秋季开始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他参加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编辑工作。在创刊号上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表示对“三一八”惨案牺牲者的崇敬。并在文中赞美“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⑥。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是闻一多把文艺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表述。

1927年春,闻一多应邓演达的邀约,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艺术股长。亲自绘制了一幅反军阀的大壁画,悬于武昌黄鹤楼前,唤起群众“打倒列强除军阀”。秋后,他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课程。

1928年秋天,闻一多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自此专攻中国文学。不久武大起学潮,他辞职。1930年

秋至1932年夏，他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在本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外，还在外文系教英诗等课。这时他致力于唐诗的研究，写出《杜甫交游录》。1931年1月《诗刊》创刊，闻一多发表了他最后一首新诗《奇迹》。

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离别十年的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与主持中文系的朱自清共事，交往甚密。他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以及杜甫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接着又先后讲授诗经、楚辞、唐诗和乐府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36年，他还讲授艺术理论和美术史。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带着家眷离北平南下。11月1日清华、北京、南开三大学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也到长沙。1938年1月21日临大决定迁到昆明，他不顾体弱和长途跋涉之苦，兴致勃勃地参加二百多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一路上风餐露宿，和青年学生一道收集研究歌谣、民俗、神话以及苗区的服装、语言，并画了百余幅风景写生画。由于步行途中的匆忙和劳顿，他蓄起一把丰茂的胡须，誓言要等抗战胜利了才剃掉。由于深入民间，他开始了解到人民的痛苦。4月28日，旅行团走完三千五百里到达昆明。5月4日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中文系任教。1940年兼代中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整理《易经》、《诗经》、《楚辞》等著作，并指导研究

生。1942年3月，他的《楚辞校补》印行。新学年起，他讲授周易、乐府诗、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春，周新民、李文宜、华岗（化名林少侯）等在昆明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也参加了。每两周在唐家花园集会一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敌后战场》等著作，他都是在这个时期看到的。

抗日战争后期，闻一多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拍案而起，走出书斋，喊出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⑦。他赞美解放区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赞美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表示：“鲁迅对，我们错了”，要坚决学习鲁迅的榜样。年底，他严肃而沉重地在护国战争纪念大会上说：“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袁世凯还没有死，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⑧大游行完毕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激动地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无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闻一多的这些言行，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尊敬，而反动派则视他为眼中钉。日本投降后，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呼喊：“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我们第一是要民主，第二是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他写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参加了大规模的时事晚会、讲演会、新诗朗诵会、文艺座谈会、营火会、几千人几万人的大游行。这时候，正如他自己

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所说的，“非现身说法不可”了。他要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放射出光和热来”。

闻一多于1944年参加了民主同盟。12月被选为民盟云南支部委员、《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悲愤异常，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凶残的程度“简直是黑色恐怖！”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同张奚若、吴晗、潘光旦等一道为青年人辩护，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闻一多走在四五万人游行队伍的前列，愤怒地向反动派示威抗议。

同年5月，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分批复员北上。闻一多为了工作，留下来晚走一步。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以北方的青年还需要他，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因而谢绝了。

6月，蒋介石发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加剧白色恐怖，迫害爱国民主活动。在昆明的特务、暴徒对闻一多不断进行造谣、威胁、恐吓和监视，但他毫不畏惧。

为了争取民盟的活动公开，和当地各界联系开展工作，并粉碎反动派对民盟和民主人士的造谣诬蔑，6月26日至29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在商务酒家举行招待会，说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事，反对暴力。

7月11日晚，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无比悲愤，赶到云大医院，抱住李公朴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

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他坚定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他不顾疲劳和危险，仍然按计划作好善后工作。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追悼会。虽经亲友多方劝阻，闻一多仍毅然出席大会，作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盟在府甬道《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5时半左右，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在离宿舍大门才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被特务用机枪射死，时年四十八岁。闻立鹤为了保护父亲，也身中数弹。

闻一多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外的强烈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赞：“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致电悼唁，并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罪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愤慨万端，莫可名言”。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各地人民以及加拿大、美国的爱好和平人士，都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

闻一多的遗著由朱自清、郭沫若、吴晗、潘光旦、叶圣陶等负责编成《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为纪念闻一多八十诞辰，1980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

注:

- ① 《闻一多全集·年谱》，开明书店 1948 年版，第 34 页。
- ② 《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446 页。
- ③ 同②，第 402、455 页。
- ④ 同①，第 43 页。
- ⑤ 同②，第 72 页。
- ⑥ 《闻一多全集》(三)，第 240 页。
- ⑦ 同①，第 75 页。
- ⑧ 同⑥。

严 复

罗耀九

严复，字几道，初名传初，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籍后始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生于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严复七岁进私塾。十一岁跟从本乡一位老教师黄宗彝读书，通读了“四书”、“五经”，并熟悉宋、明理学家的掌故典籍。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贫无力继续从师求学，入洋务派新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1871年毕业，被派在建威、扬武等兵船上实习了五年。曾先后去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许多地方，初步了解那里的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1877年被派去英国抱穆士德大学院学习，不久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海军两年。两年之中除读书外，还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他由一个受封建传统教育熏陶的青年，变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西方的文明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对比，优劣之势如泾渭分明，使他不能不为之倾心。因而对海军的课程渐渐不感兴趣，将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富强的原因，摸索可使中国复兴、强盛的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直接接触和观察，为他后来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准备了条件。

1879年6月，严复毕业回国。这时，两江总督沈葆楨为了扩充南洋海军，极力收罗人才，把严复留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不久，沈葆楨病死。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总教习，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吴不懂业务，挂名而已，担负学堂的行政与教学实际责任的是严复。1889年，严复报捐了同知衔，经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学堂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总办。

严复入水师学堂之初，很想发挥他的才干，为救国图强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在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下，“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①，难以按自己的理想办事。反之，留英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等人归国后都受重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日益富强，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清朝的藩属琉球群岛。严复对清政府的昏庸颓废大为忧虑，常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缚我如老牯牛耳。”^②1884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③。从此，一直不受重用。显然，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洋务派的妥协卖国路线格格不入。

严复怀才不遇，在李鸿章部下不能实现自己的宏远理想，便想另谋出路。他曾投资数千元与王绶云（慈劭）合股创办河南修武县的煤矿，以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他又慕湖广总督张之洞“好贤”之名，想投入张的幕中，“冀或乘时建树”^④，大展鸿图。他还去参加科举考试，想循正途博取官爵，挤入统治集

团的行列。可是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发起变法维新运动。此时的严复，经济地位已经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上更是资产阶级的前导。他一方面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非常愤慨，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本国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这样，严复便走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1897年他与夏曾佑、王修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维新派言论在北方的重要宣传阵地。戊戌政变前不久，他还写了上皇帝万言书，并且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由于他没有离开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岗位，他的活动范围也没有超出天津。虽然去过北京几次，但没有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个时期，他始终只限于在舆论上与康、梁相呼应。严复除了水师学堂本职工作之外，早于1896年接受了创办俄文馆的任务，兼任总办，主持培育俄文翻译人才。同年他又支持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培育西学的人才。但这些社会活动还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主要是集中精力于介绍西学，即“致力于译述以警世”^⑤。他的翻译工作十分严谨，要求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词能达意，还要文字优美。因此他的翻译工作是很艰辛的，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中文译词，往往十天半月不能决断，反复斟酌，屡易其稿。他的第一部译本是赫胥黎著的《天演论》。初版约在1895年问世。后来《天演论》的主要论点“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成为激励中国人自强保种的理论。严复在译文中常常加入自己的按语，联系中国的实际，大发议论。这本书受到普遍的重视，起了指导舆论

的作用，影响颇为深远。

严复是个非常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有几篇战斗性很强烈，充满了爱国激情。如《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猛烈抨击禁锢思想的儒家“旧学”，提倡新学，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开展制造舆论。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要求变革，批判“君权神授”思想，提出“尊民贬君”的观点，反对科举，提倡学堂。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入手^⑥。他输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这些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起了启蒙作用。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在严复身上表现得颇为突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他虽然反对封建专制，但不愿提倡民主共和；他要求变革，但反对革命。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参与创办的《国闻报》被封闭了，通艺学堂停办了。严复慑于西太后等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感到“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⑦。从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间，他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耶方斯《名学浅说》、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介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逻辑学。这些著作在西方已经是陈旧了，有的甚至是反动的了，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基本上还是新鲜的。严复一方面希望通过输入西学以达到“疗贫起弱”^⑧，挽救国家危亡的作用，但同时也介

绍了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以反对革命。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匆促离开天津，迁居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初到上海时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任副会长，实际上是个名誉职务，并未参与唐才常的秘密活动。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以严复为译局总办。严复干了两年，即辞职回到上海。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马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担任了几个月校长便辞职了。1906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往安徽师范学堂任监督，也只有几个月时间，至1907年又离了职。1908年严复应学部之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清廷覆亡为止。1909年清政府为了笼络社会名人，曾赐给他文科进士出身。严复还兼了其他职务。如1910年海军部特授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这些虽然都是虚衔与闲官，然而可以看出严复在清末的政治地位已经显著提高。严复的大儿子严璩也由四品京堂、道员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严复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因此他更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以后，他对于被推翻的清王朝时怀眷念之情，常常发表言论，诋毁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⑩。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聘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不及一年，辞去。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任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曾著《民约平议》一文批评卢梭的《民约论》，表明他是民主制度的反对者。

袁世凯蓄谋称帝，1915年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为复

辟封建帝制造舆论，强邀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严复虽无活动，但不置可否，因此名声一落千丈。

后来，严复不但提倡读经，还否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反对白话文运动，完全成了一个与历史潮流相背逆的复古派。

袁世凯死后，严复不再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职务。晚年常在病中度日，除与友人通讯及赋诗填词之外，无所作为。1921年10月27日病卒于福州故里。

注：

- ① 严群家藏书札。
- ②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8页。
- ③ 同②第9页。
- ④ 严群家藏书札。
- ⑤ 同②第14页。
- ⑥ 周振甫：《严复诗文选》第32页。
- ⑦ 严复致张元济函，第一，1899年，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 ⑧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外交报》1902年，第9、10期。
- ⑨ 陈宝琛：《严君几道墓志铭》。

许 广 平

张小曼

许广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她的父亲许炳瑶是庶出，在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一生没干过什么有作为的事。母亲是一个澳门华侨的女儿。许广平生下刚三天，就被父亲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

许广平性格倔强，八岁那年，母亲要给她缠足，她大哭反抗，终于迫使母亲妥协。她上家塾时，父亲只让老师教她用土话读书，她的哥哥则可用官话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她进行了反抗，父亲只好应允她和哥哥一样用官话读书。她十二、三岁时，就明确向家人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1911年9月，许广平的母亲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的全家搬到澳门，许广平由大哥许崇禧照顾。许崇禧是留日学生，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他的影响下，许广平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东主办的《平民报》，产生了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愿望。她还购阅宣传妇女解放的周刊《妇女报》，深受其影响。许广平在《两地书》中曾追忆道：“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又好读“扶弱图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

1917年，许广平的父亲病故，她二哥从北京回广州奔丧，

帮助她解除了包办婚约。她随即同二哥到北京。后又投奔在天津的姑母，考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天津，许广平立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0月10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遣保安总队的大批武装警察、马队，驱散在南开广场举行市民大会的一万名群众，许广平和女同学们用旗杆做武器，站在与军警搏斗的最前列，并勇敢地包围了警察厅，愤怒声讨杨以德的罪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

1920年5月7日，许广平又与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校方竟将她们全部开除。许广平和同学们团结一致，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星期，终于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1922年，许广平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11月，为了反抗校长杨荫榆推行的奴化教育，北京女师大^①学生爆发了驱杨运动。开始许广平因不明真象，唯恐被人利用，没有直接参与。次年3月11日，她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请求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②。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希望她用“壕堑战”的方式，跟旧社会进行战斗。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当女师大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

下，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当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残酷迫害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时，鲁迅挺身而出，支持和保护了学生。这一切，使得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产生了爱情。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灿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③。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2月18、19两日，许广平曾随鲁迅到香港。鲁迅在港做《无声之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深刻地阐述了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广平为他把绍兴官话翻译成广东话，增强了这两次讲演的效果。4月15日，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迹未干，广州的反动派又进行了反革命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10月3日，与许广平抵达上海。

鲁迅这时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许广平也

希望能独立地服务于社会。鲁迅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④这话深深打动了许广平。她认识到，在残酷、艰苦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毅然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此后十年中，许广平伴随着鲁迅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过着半地下状态的生活。为了使鲁迅能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她不但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要替鲁迅购买书籍，抄写稿件，查找有关资料，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也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由于得到许广平这样的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⑤。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他还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⑥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燹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在一起，共同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1931年，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屠杀后，鲁迅的处境也很危险。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战争，鲁迅的寓所处于枪弹的威胁之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之后，又散布将暗杀鲁迅的风声。同年8月，作为鲁迅公开联络点的内山书店，有两名中国职员突然被警察局拘留。鲁迅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些危急的时刻，许广平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跟鲁迅步步相随。“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的这首诗，反

映了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1937年1月，她发出了《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呼吁收藏鲁迅书信的国内外人士捐赠或借录鲁迅的书信手稿，以便“整理成册，公布大众”。她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十三篇编成《夜记》，于同年4月出版。6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7月，她编辑出版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上海未走，并投入了紧张的出版工作。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6月，她按《壁下译丛》体例，辑成《译丛补》。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的“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其中收入了不少鲁迅的未刊稿和业已绝版的译著。全集编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错字比当时出版的任何书籍都少，创造了当时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这套全集，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战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还节衣缩食买了一百支手电筒，托人带给跟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此外，许广平还热情地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鲁迅风》、《中苏文化》、《文艺新潮》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等报刊杂志撰稿，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

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许广平借款刊印了《鲁迅三十年集》，内收鲁迅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二十九种，计三十册，分三大函（不包括译作），售价比《鲁迅全集》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上海的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妄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敌人对她采用了拷打、电刑等种种手段进行逼供。面对这些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广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革命团体和无数的朋友。日军一无所获，1942年3月1日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郑振铎在《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一文中写道：“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拼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⑦

1944年秋，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好后，分藏数处，于194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并会见了中共驻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许广平请律师将鲁迅的书籍加封加锁，使之完整地保存到解放。

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她在《我的呼喊》一文

中，愤然质问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许多军队，在对日寇的抗战中望风而逃的，这回反而非常勇敢地在打自己的同胞了。难道养精蓄锐，为的是今天一役？国家亡在异族手里不要紧，让自己兄弟亲戚、朋友来共管国事倒不愿意？”^⑧

1948年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盛情接待。

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许广平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

解放后不久，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⑨。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宿愿。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病在北京逝世。

注：

- ①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5月1日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 ② 鲁迅、景宋著，《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北京重印第一版第15页。
- ③ 陈漱渝：《携手共艰危》，《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1、2期，转引自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734页。
- ④ 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80

页。

- ⑤ 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引起的话旧》，《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6 月版。
- ⑥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1938 年 10 月 16 日，转引自《许广平忆鲁迅》第 254 页。
- ⑦ 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发行，1951 年 5 月铅印本《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
- ⑧ 许广平：《我的呼喊》，《民主》第六期，1945 年 11 月 17 日。
- ⑨ 陈漱渝：《鲁迅的夫人和战友——纪念许广平同志》，《中国妇女》1980 年第 10 期。

李 仪 祉

姜献阁

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后以仪祉通行于世。1882年2月20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三）生于陕西蒲城县。祖业农，父亲桐轩是个廪生，曾任陕西咨议局副议长，伯父仲特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为关中有名学者。

李仪祉自幼在家课读，1889年入塾。以后数年，除在塾读四书五经等儒书外，还从父亲和伯父学作文和数学等。1898年赴同州府院考，中第一名秀才。得督学叶尔闾赏识，被拨入崇实书院读书，和于右任同学。

崇实书院提倡新学，李在该院读过《天演论》等书，并撰写了《论权》、《神道设教辟》、《女子不缠足歌》等文。1902年崇实书院并入宏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新任督学沈卫令学堂加重科举文字，李认为无裨实际，尤反对教师令学生背书，打手心等，因而托词祖母有病退学。

1904年于右任为高州中学堂总教习，荐李仪祉任教。当时清廷因于右任所作《半哭半笑楼诗草》有讽时政，下令捉拿。于闻讯避往上海，不久李亦辞职。

同年秋，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班，1908年毕业。

1909年李仪祉由西潼铁路局资遣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

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他在校勤奋好学，深得同学好评。辛亥革命发生后，李闻讯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抵沪时，南北和议已成。1912年返回陕西，与友人倡办三秦公学。翌年复往德国留学，进但泽工业大学专攻水利。李早年即以献身水利事业自矢，这时得与德国水利学家、德莱斯登大学教授恩格尔斯交游，恩格尔斯常为李质难析疑，使李的学业更加猛进。

1915年李仪祉由德回国。时值张謇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聘李任该校教授，主讲河工学、水文学、大坝设计等，后任校长。李在该校从事教育七年余，造就出一批水利工程人才。他对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对学生说：“水利事业，关于国计民生，至深且巨，……愿诸君努力奋进，抱人溺己溺之怀。有所疑，必尽所问，毋稍讳！余必尽我之职，倾我所知，莫隐乎尔。”^①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对黄河长江间水土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1922年秋，李仪祉自南京返陕，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他一方面着手计划和测量泾惠渠工程，另一方面提倡民间开修小渠，同时还创立了水利道路专门学校，亲自授课。1923年李得陕西省长刘镇华同意，筹了少许工程款，开始淘浚渭北泾阳之龙洞渠。1924年又派人到汉南办汉江水利工程。不久西北军阀战起，经费无着，渭北、汉南工程均停。他对此深有感慨，但寄希望于未来，继续为所属人员讲授河工原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以待时机。

当时，李还先后兼任陕西教育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为筹措引泾工程和扩充学校经费，1925年他曾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虽多方设法，但毫无所获。1926年李一度任

北京大学教授，入冬仍回陕任水利局长。曾勘察无定河水利，但因兵荒战乱，水利事业发展无望，遂辞职。1927年秋，李再至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不久赴川，应刘湘聘请，任重庆市政府工程顾问，设计成渝公路老鹰岩工程，构思精妙，后被誉为巧夺天工之杰作。

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任该会委员长。同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全国表面上暂时统一。国民党政府为标榜重视建设和治水事宜，于翌年初组织导淮委员会，以蒋介石为挂名委员长，派李仪祉任委员兼工务处长及总工程师。李率队至江、淮、运、沂、沭、汶各处进行勘测，拟定了十七条导淮工程计划纲要。这时受聘来华协助李工作的德国水利专家方修斯，对李的品德学问也很佩服。

1929年上半年开始的新军阀战争，到1930年发展为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导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同年李仪祉辞去导淮工作，回陕任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此前陕西连年大旱。他面对灾民死亡流离，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叹曰：“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②。于是决心兴修泾惠渠，重审计划，奔走呼号，合陕省各方之力，又得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等方面的资助，终于开始兴工。泾惠渠工程以恢复郑国渠旧观为目标，在泾阳张家山谷口筑坝拦河，引泾水以灌溉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数县土地，但工程进度颇缓慢。

1931年夏，运河泛滥，苏浙皖等省受灾。李仪祉曾赴上海参加救灾工作。同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李被推为会长。1932年夏，李亲往汉南考察水利。秋间大病，辞建设厅

长职，专主水利局事。为培养水利人材，曾呈准由西安高级中学代办水利专修班。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仍兼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8月黄河决口，有五省五十余县被淹，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李奔赴各处，求见权要，急谋救济，不只一次遭到冷遇。9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兼总工程师，负责堵口工程。任职期间，曾视察黄河上游三省，并提出根治黄河的意见。在忙于治黄的同时，李仍时时关心陕西水利工程的进展。1934年曾组织引洛工程处，开始实测和兴建洛惠渠工程。同年夏，西安高中代办的水利专修班并入陕西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改名水利组，由他兼主任。1935年初，李进一步拟就《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期此十年内，使农田水利，普及全省成一模范农田水利区，以为他省之倡，而后及航运、水力等他项水利工程之设施”^③。接着李又指导渭惠渠兴工，同年4月经惠渠也完成了。秋，李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局长，着手筹划梅惠渠工程，翌年秋兴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李对形势的发展极为忧虑，曾以和平解决方案上书南京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事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称“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净内毒之日”，表示“吾人更当振起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④。

1937年春，李仪祉作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顾问，曾到江汉巴蜀作短期调查，对长江的整治有所建言。同年夏参加庐山谈话会，为庐山暑期训练团讲农田水利之真义。又被聘

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七七事变后回陕，领先参加了陕西抗敌后援会，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着信心，同时也有“作十年二十年长期抗战之准备”^⑤。曾积极从事西安市的防空建设和募集救国捐款等工作，还经常写文章作演说，宣传抗日思想。同年10月，李在一次对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同学的讲话中说道：“抗战期间，前方将士用枪炮去和敌人拼；后方人民的责任，就在尽量的供给粮食”，“旱灾水灾，学水利的更应设法防止”^⑥。从此，他更抓紧水利事业的进行，迅速筹划并实施的有织女渠及怀宁河等灌溉工程，到本年底渭惠、梅惠两渠大部完工。

1938年2月，李病重躺在床上，仍不忘水利工程的进行，且手书“土坝”二字问渭惠渠土坝打桩情况。此后病势日危，至3月8日与世长辞。临终遗嘱有：愿国人“共赴国难，求最后之胜利”。和“切望后起同仁，对于江河治导，本余之素志，继续致力”^⑦等语。李把毕生精力用于治水，尤其对陕西水利做出了大的贡献；他生前亲自筹划修建的有五渠，其中已完成的三渠灌溉面积共有七十八万多亩。3月15日李被安葬在社树泾惠渠上的两仪闸畔，附近各县群众纷纷赶来吊唁。

注：

① 宋希尚：《李仪祉传》，第5页。

② 同注①第33页。

③ 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陕西水利月刊》第三卷第1期，第11页。

④ 胡步川：《良杏忆麟》，《李仪祉先生纪念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8年印行，第四（五）页。

- ⑤ 李仪祉：《勸水利組同學》，《李儀祉先生紀念刊》，國立西北农林专科学
校 1938 年印行，第 32 页。
- ⑥ 同注⑤第 32 页。
- ⑦ 同注①第 44 页、45 页。

黄 乃 裳

陈 民

黄乃裳，名黻臣，以字行，别号慕华。福建闽清县人。生于1849年7月（清道光二十九年六月）。父亲是木工。黄乃裳童年在家乡半耕半读。1866年十八岁时与族叔一同受洗入基督教，第二年开始实习传道。1869年后进福州年议会，被派在福音堂传教。1875年，与人合著革除缠足论五篇，除登报外，并印单张万余，广为散发。在传道过程中，他深感教会中因缺少文人学士受人蔑视，便于二十八岁那年（1876年），励志学习八股文。一年后，即以第二名考入县学。后曾协助牧师薛承恩等翻译《天文图说》、《美国史略》等书。1888年中举人，这时他已四十岁了。

1897年，黄乃裳带领大儿子黄景岱进京参加会试，他自己被举为拔贡。第二年，遇上“戊戌变法”，维新谕旨一天一道，举国上下精神为之一振。黄乃裳留住北京，与康有为及“六君子”交往，讨论变法新政，也曾八次上书，痛陈兴革。不久，变法失败，西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六君子”被捕，黄乃裳因参与维新而入案，幸得友人关照，逃避出京，返回福建。

维新失败，黄乃裳嗒然若失。为避清廷暴政，1899年秋，他携带家眷南渡新加坡。经女婿林文庆推荐，任《星报》总编辑。他遍游英、荷属东南亚各地。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拉让河

流域诗巫附近，找到适合垦殖的土地一处，改名新福州。由林文庆与邱菽园担保，同沙捞越土王订立农垦条约，主要条款有：“待吾农人与英人一例（意即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华人），所垦之地享有九十九年之权利。……王家如需吾农已开垦之地，须按时价估买。吾农有往来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设立公司商业自由，购买枪械自由，航业自由等权利。无纳丁税，无服公役，无当兵义务。凡违犯民事在五元以下罚金之件，港主有自治之权。”^①1900年6月底，黄乃裳从福建招募农民到新福州，进行大规模垦殖。经过三年惨淡经营，农产品逐年丰收。1903年1月，沙捞越英文报纸登载有关新福州的报导说：“拉让河流域之新福州垦场，继续发展之情形甚佳，其田园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于世之中华农人之手。”^②当时南洋通例，称大农场为“港门”，称农场主为“港主”。凡是港主，都有包卖烟（鸦片）酒、开设赌场等特权，以牟厚利。黄乃裳是基督教徒，他认为贩卖鸦片及饮酒、聚赌，都有伤道德，违背垦场初衷。因此，毅然放弃此项特权。但沙捞越政府一向依靠上述专利作为主要财政收入，对黄乃裳在新福州抵制烟酒，禁止聚赌，大为不满，警告再三。由于黄乃裳不为所动，终于在1904年初下逐客令。垦场功败垂成，黄乃裳亏蚀了新币四万多元，郁郁离开了新福州，深感寄人篱下之苦。

同年7月，黄乃裳携眷去新加坡。当时该地《图南日报》创办人陈楚楠、张永福，因报纸销路不佳，乃约请黄乃裳切磋文字，进而议论国事，倡言革命。不久，《图南日报》翻印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黄乃裳自告奋勇，携带五千册回国宣传，并于1904年10月回到潮州，假托办学，遍游潮州及

福建漳州所属十余县，联络革命志士。潮州黄冈起义，黄乃裳就是发动者与组织者之一^③。

早在1900年初，黄乃裳任《星报》总编辑时，孙中山从澳洲到新加坡，黄乃裳曾前往拜访，受到革命启发，遂引为同志。1905年，孙中山又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邀请黄乃裳参加。黄即成为南洋方面早期的同盟会员。

1911年，黄乃裳任福建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并着手组编三院学生炸弹队，为光复福建作准备。同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当天清晨，黄乃裳亲举国旗，率领学生军进城，将国旗升在武备大学堂旗杆上。事后，他写信告诉南洋的同志说：“裳生平最得意之事，实此十九日以后迄今，为最踴躍滿志之时，虽死无憾矣！”^④福建光复后，他出任福建军政府交通司长兼筹饷局总办等职。因清廷积欠福建兵饷三个月，光复那个月又需发双饷，共积欠军饷五个月，财政极其困难。黄乃裳便以个人名义，通电南洋各埠，请求捐助，得华侨汇款七十多万元。由于“事务綦繁，擘画颇苦”，仅仅两个月，便鬓发皓白如雪。但黄乃裳年逾迈，益精勤。1918年元旦，他已七十岁了，听鞭炮声，有感于怀，自书一对联，“问以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之外，再度余生。”^⑤见到这副对联的亲友，无不赞叹说，此老倔强，一如往昔。

1920年10月，七十二岁高龄的黄乃裳，欣然接受孙中山邀请，到广州出任元帅府高等顾问。1921年6月，因病回福建休养。

1924年9月22日，黄乃裳病故。

马来亚人民为纪念其垦殖功绩，特将诗巫市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黄乃裳路”，用以发扬中马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并肩战斗的精神。

注：

- ①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
- ② 转引自黄仁琮：《黄公乃裳年谱》。
- ③ 冯自由关于潮州黄冈起义事曾提到：“1907年春许雪湫、陈宏生等在潮州二度起义，乃裳与有力焉，……乃裳认识总理在丙午年，时雪湫等均在新加坡，曾对将来举事地点进行讨论，乃裳力主在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总理深惬其议。其后雪湫之军事进行，即奉行此计划。”见冯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75页。
- ④ 黄乃裳：《致陈楚楠、张永福函》，《檳城新报》1911年12月4日。
- ⑤ 同①。

林 白 水

钟碧容

林白水原名懋，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省闽侯县人。生于1874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祖先在贵州为吏，父剑泉是纨绔子弟。林白水少年从母读十三经及古诗文，十四岁随从舅家私塾读书，爱好古文，擅长写作，惟不屑于科举功名。他受塾师高啸桐及其友人影响，向往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恨清廷腐败，力求改革。

林白水二十岁时离福建到杭州，在林伯颖家教家馆。同时阅读新书，博览报刊，眼界更加开阔。1898年，杭州知府林迪臣创办蚕桑学堂，聘林白水执教。知府幕府的知名之士，有林纾、高啸桐、高梦旦兄弟等，常与林白水交往，他们都很尊重他。林年假回闽，与表兄黄翼云、表弟黄展云创办福州蒙学堂，后又返回杭州。1901年任求是书院总教席，经常夜间召集学生一二十人，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进行革命宣传。

同年6月，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任主笔，撰写《论看报的好处》为发刊词，署名宣樊子。他说：“现在各省是什么风气，有了报看，自然一目了然”，“农工商三等的人，能多看报，都有好处”^①。他倡导用白话文写社论和中外新闻，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使大家都看得明白。他在报上撰文，鼓吹民族主

义，提倡办学校、立报社。这年冬天，林白水到了上海。1902年春，与蔡元培、蒋观云等成立中国教育会，以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为己任，并推动各地兴办教育。11月，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风潮，林与蔡元培、吴敬恒、黄宗仰等人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集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爱国青年于一堂。并出版《学生世界》杂志，鼓吹反清革命。

1903年初，林白水东渡日本。不久，俄国胁迫清政府允其独占东北。留日学生大愤，五百余人集合商讨应付方法，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公举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②。5月2日，义勇队定名为学生军，分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分为四个分队，林白水任丙二分队队长。不久，拒俄义勇队被迫解散，他们随即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③为宗旨，进行革命活动。林白水为会员，曾捐款。后因清使馆出面干涉，林白水愤而返国。

同年12月，林白水与蔡元培、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反对帝俄侵略中国东北，宣传俄国虚无主义。翌年改为《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林白水又创办《中国白话报》，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白话报》分论说、历史、传记、实业、教育、新闻、小说等栏，以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宗旨，抨击清政府的专制政治，并鼓吹暗杀。林以“白话道人”署名，发表《论刺客的教育》一文，说可以把暗杀作为革命的过渡手段。1904年11月，上海发生万福华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案件，万被逮捕。林白水、蔡元培、刘师培等奔走营救，延请律师为万福华出庭辩护。

林白水因此受清政府注视，离沪返闽。不久，他自费再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兼习新闻。

1905年12月，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强烈抗议，八千人实行总罢课，二百余人离日回国。林白水也返回福建，与表弟黄展云共同编写《高等小学修身课本》八册。后来他去上海，以译著投稿度日。1908年翻译出版了《日本明治教育史》。

辛亥武昌起义后，11月9日福建独立，设军政府。林白水回闽，任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并任共和党福建支部长。1913年初，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林到北京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宣布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籍。林白水奉命回闽，帮办军务善后。不久，因与督办意见不和，辞职入京。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林白水的友人刘师培是“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公开鼓吹帝制。另几位朋友薛大可、梁鸿志等亦为帝制活动积极奔走。林白水受他们的影响，也随声附和，撰表劝进，成为帝制派。10月，林白水被袁世凯委任为参议院参政。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死去。8月，国会复会。林白水辞去议席，从事新闻工作。9月1日，与王士澂、黄秋岳、梁鸿志等创办《公言报》，充当安福系的言论机关，鼓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林任主笔。

1919年2月，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开幕的当天，林白水主持的《平和日刊》在上海创刊。该报代表北京政府，紧密配合会议的进行，积极鼓吹“和平”。当时有人评论林

白水：“昔日白水，极力主张武力解决”，“今则一变而主张和平……朝三暮四，覆雨翻云，志在觅食耳”^④。由于北京政府并无诚意，5月，和平会议宣告破裂。林主办的《平和日刊》，也就成了昙花一现的刊物。他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仍主持《公言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一败涂地，段祺瑞被迫下野。《公言报》于21日发表紧要启事，借口印刷机器损坏，暂行停刊，其实是“合肥败，公言报亦为战胜者所毁”^⑤。

1921年春，林白水在财政总长周自齐的支持下，与胡政之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报》，林任社长，胡为总编辑。该报宣称愿“树改造报业之风声，作革新社会之前马”^⑥。翌年2月10日，《新社会报》因刊登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北京政府警察厅勒令停刊三个月。5月1日复刊，改为《社会日报》。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撰文攻击议员受贿，报馆又遭封闭，林被禁三月余。待曹锟坐稳了总统宝座以后，始准《社会日报》继续出版。

《社会日报》的要闻、时评都是林白水撰述，每隔一日必有署名“白水”的文章。他写作的范围很广，文章“尖刻突兀，易于动人”，“喜议论个人长短，甚或揭人隐事”^⑦，“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⑧。他特别注意刊登社会新闻，该报的许多内容，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谈话资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林白水在《社会日报》连续发表《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白水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在《社会日报》发表特别启事，拒绝刊登英日两国的广

告。

同年夏，林白水为《社会日报》增印副刊《生春红》，自称“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⑧，“专以提倡风雅，导扬文化，发挥艺术为宗旨”^⑨。副刊分有社会新评、人物月旦、都市新闻、近代艺文、金石见闻、白水读书日札等十二门类，每三日发行一小张，每刊必登《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要求社会人士资助。

1926年4月初，奉鲁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15日，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林白水对国民军寄予深切同情，在报道中赞扬国民军“秩序井井”，“态度从容”，几个钟头之内全行撤退，北京全城未受惊扰。这个报道遭到奉直军阀的忌恨，成了他们日后杀害林白水的“罪证”。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宣布下台。4月21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略述他与安福系的始末，宣布与段祺瑞决裂。此时，林白水对军阀的反动本质，已有初步认识。他在《社会日报》撰文说：“军阀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⑩。还说，凡有天良的记者，应该替老百姓说话，那有去献媚军阀的道理。在《代小百姓哀告》一文中，他指责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讨赤”为名，行向革命人民进攻之实。他说：“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⑪。他抨击奉直军阀的倒行逆施，言语激烈，毫无顾忌。有的亲友劝告他，不要以言论招祸。他回答说：“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为文字贾祸，也很值得”^⑫。

奉鲁军阀张宗昌等人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钳制舆论，封闭报社，“立言稍不徇其意者，必扑杀之而后快”^④。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下，新闻界人人自危。林白水没有惧怕，他用犀利的笔锋，揭露奉鲁军阀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

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讽刺一心想当财政总长的潘复和张宗昌。潘张原是赌场中的朋友，由于潘复的介绍，张宗昌投奔了张作霖，从此才飞黄腾达起来。林白水在文中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肾囊之于睾丸”。潘复恼羞成怒，恨之入骨，要求张宗昌把林白水处死。

6日凌晨一时许，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带副官、弁兵数人，去《社会日报》社找林白水。诡称张邀请叙谈，由副官挟林上了汽车，直接开往宪兵第二营。并立即审讯，以“通敌有证”之罪名判处死刑。林挥笔遗书：“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必佑我家也”^⑤。清晨四时许，林白水在北京天桥被杀害，时年五十二岁。

注：

- ① 《杭州白话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
-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4页。
- ③ 同上，第111页。
- ④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页。
- ⑤ 《社会日报》，1924年5月6日。
- ⑥ 《新社会报》，1921年3月1日。
- ⑦ 《民国日报》，1926年8月8日。
- ⑧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年版，第98页。

- ⑨ 《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1925年7月3日。
- ⑩ 同上，1925年7月12日。
- ⑪ 《社会日报》，1926年4月26日。
- ⑫ 同上，1926年5月17日。
- ⑬ 同上，1925年12月20日。
- ⑭ 《民国日报》，1926年8月10日。
- ⑮ 同上，1926年8月11日。

李 叔 同

熊尚厚

李叔同名广侯，字叔同，号漱筒，以字行。别署甚多，可靠的即有七十余个^①。他家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居天津经营盐业，是天津的著名富商。父亲名筱楼，是进士，在清政府吏部做官，晚年笃信佛教。李叔同 1880 年 10 月 23 日（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五岁那年父亲去世。六岁跟着兄长受启蒙教育。七、八岁起从师学千家诗、唐诗和说文解字，习石鼓文篆字，打下了文学和书法的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愈趋深重。康有为等一再要求维新变法，联络同党在各地组织团体，开办学校、报馆，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李叔同积极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他认为“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②，自己刻了个图章，文曰“南海康君是吾师”^③。

1898 年 9 月，康、梁戊戌变法失败，京津有人怀疑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10 月，他随同母亲离津南下至上海。11 月，他加入许幻园、袁希濂等组织的城南文社，研讨宋儒理学与诗赋。许幻园是上海当时新学界的领袖，创办学会设奖征文。李叔同撰文应征，三次都得了第一名。许十分钦佩他的文才。次年春，许邀请他把家迁入城南草堂。李叔同遂与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常在一起吟歌赋、作诗

词，结下金兰盟谊，成为文坛好友。

1900年3月，李叔同与常熟乌目山僧黄宗仰、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一张书画报。同年，李叔同将其所藏名刻与自己刻的印章，编辑出版一本《李庐印谱》。冬天，又编辑出版了他的诗作集《李庐诗钟》。他的诗画金石出众一时，颇负声誉。

1901年，李叔同遵从母命入南洋公学肄业，改名成蹊，读经济特科，是蔡元培门下的得意门生；课余并任一家报社编辑。1904年，李叔同毕业后，与穆恕斋等在上海南市组设“沪学会”，宣传讲究卫生和移风易俗、广开风气等，并提倡办学堂，培养人才，想以此使国家独立富强。

1905年秋，李叔同奉母携家眷回到天津，不久母亲病故。李叔同返回上海后以自费留日。至东京，进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欧油画，并去音乐学校兼习钢琴；又主编出版《音乐小杂志》，寄回上海发行。他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优秀。对音乐用功最勤，认为“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炼修，无由适度”^④。

李叔同目击日本政治进步和国家复兴，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心投入革命，1906年加入了同盟会。同年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帮助和指导下，他与曾孝谷、李道衡、吴我尊等，发起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据法国小仲马小说改编的话剧《茶花女》，李叔同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接着又演出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也是扮演女主角。他还扮演过一些独幕剧中的角色，名噪一时。《春柳社》的艺术作风十分严肃，开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新风。然而不久，他对戏剧的

兴趣逐渐淡薄,不再参加《春柳社》的活动,而专心致力于钢琴与油画,尤善作图案画。

1910年,李叔同从日本毕业回国,在天津任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次年因家产为票号所倒,几乎破产。乃于春天至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3月,他加入“南社”,参加愚园雅集。与柳亚子、苏曼殊等用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举起反清革命文学的旗帜,提倡民族气节,以文学鼓吹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叔同填《满江红》词:“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从今看,一担好山河,英雄造”^⑤。对中国的未来抱着无限希望。

1912年春,陈其美、叶楚傖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李叔同任文艺广告编辑,兼主编副刊画报。与此同时,他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在内部传观。数月后,《太平洋报》社因负债停刊,文美社及杂志也随即解体。

《太平洋报》停刊后,李叔同于同年秋转至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与夏丐尊、姜丹书、马叙伦等同事。他在该校特设的图画手工专修科任教七年,对学生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批美术、音乐人才。他的画讲究整体,水彩画简笔雄健,油画擅长西欧奏比亚诺画,略带印象派色彩。他的音乐创作以作词配曲为主,歌词典雅,作有《春游》、《送别》等数十首。同时热情介绍西欧音乐,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洋音乐的人。对中国近代音乐、美术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⑥。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又于1915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名

东南大学)兼图画教师,假日组设“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

李叔同的家庭信奉佛教,家里常作佛事,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七、八岁时,他跟着家里的人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常唱“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⑦之句。成年后,他又叹息自己“堕地苦晚,又撙尘劳”,“言属心声,乃多哀怨”^⑧。其母逝世后,“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⑨,曾谓“眼界大千皆泪海”^⑩。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他更加苦闷,十分悲观。1915年开始阅读宋元理学和道家的书,信仰道教,从此更加多愁伤感,产生了“众生无常”的思想。

1916年冬,李叔同经夏丐尊介绍,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断食修养法”,就于寒假去杭州虎跑大慈寺试验断食三星期。这时,李叔同受理学家马一浮的启发,舍道信佛。次年1月,李叔同入虎跑大慈寺拜老和尚了悟为在家弟子,受居士戒。回到学校后他开始素食,带念珠,供佛像,读佛经。1918年8月,正式入虎跑大慈寺削发出家。从此结束了他前半生文艺家的生涯。他皈依法师了悟和尚为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马一浮赠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李叔同发愿学戒,9月,在灵隐寺受戒。

李叔同出家后,抛却了他爱好的文学艺术,常在杭州、永嘉、上虞等地佛寺学律,逢人赠法语,劝人念佛经。他自己一心学佛,崇奉佛教净土宗。1920年他居住新城贝山(新城一名新登,今属浙江富阳),借到《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得《南山戒疏》和《羯磨疏》等,便开始改修南山律宗,将其摘要列表编纂,1924年在永宁下寮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杭州。有人谣传革命政府要封闭寺院，驱逐僧众。正在杭州的李叔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请当时在北伐军中的他的学生宣中华、徐白民等，交谈关于保护寺庙的问题。共产党员宣中华讲了革命政府对宗教的保护政策后，他的疑虑顿时冰释。事后，他还写信给蔡元培等，提出对佛教的改革建议。

1928年秋，李叔同由温州至上海，与丰子恺等商订《护生画集》的编辑工作。事后闻尤惜阴、谢国梁欲往暹罗（今泰国），遂结伴前往。行至福建厦门，为道俗所阻，当即留居南普陀寺，常往来于泉州南安小雪峰。次年4月，他经福州云游杭州，在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疏论纂要》，到杭州后加以整理翻印。10月重返厦门南普陀。1930年4月，李叔同再去浙江上虞白马湖，圈点《南山钞记》和致力于华严宗的研究。1931年2月，他在白马湖法界寺发愿专学南山律。1932年11月，他重返厦门妙积寺。此后即芒鞋藜杖，游方于厦门、泉州各地讲律。1933年秋，他在泉州继续圈点《南山钞记》，编撰《南山道宣律祖略谱》，续编《戒本羯磨随讲别录》^①。次年，他在南普陀创办佛教养正院，并在那里任教，培养青年佛徒。

1937年初夏，李叔同应邀去青岛湛山讲律。7月，芦沟桥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支狗子”^②。回到厦门后，他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③送入，勉励佛徒对宗教和国家二者应有同样深的爱护热忱。并表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在所居处题“殉教堂”三字，决心以流血殉^④。1938年5月厦门沦陷

之后,他拒绝了朋友劝他去大后方的劝告,仍在泉州、惠安、漳州等地讲经说法。他的好友柳亚子针对他的消极态度赠诗道:“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⑩。李不以为忤,但仍然继续讲经辑律,或闭关潜息。

李叔同出家后埋名遁世,专心从事佛学南山律的编撰和宣讲活动。编撰有《寒茄集》、《四分律比丘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南山律宗传承史》及《南山律文集》等佛学著作十余种。在佛门宗下属净土兼律宗,对佛学律宗的贡献很大,为中国近代佛教律宗的代表人物。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1942年10月13日,李叔同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

注:

- ① 李叔同因为害怕为名所累,出家后便随手签署,故此别署很多。
- ② 上海弘一大师周年纪念会:《弘一大师咏怀录》第8页。
- ③ 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第10页。
- ④ 夏丏尊:《清凉歌集序》,《清凉歌集》,开明书店1936年版。
- ⑤ 同②第39页。
- ⑥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天津日报》1956年10月6日。
- ⑦ 同②第23—24页、94页。
- ⑧ 同③第13页。
- ⑨ 容天圻:《弘一法师李叔同》,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卷五期第59页。
- ⑩ 同③第18页。
- ⑪ 王洪涛:《弘一法师在泉州》。
- ⑫ 同②第251页。
- ⑬ 同②第53—54页。
- ⑭ 同③第166页。
- ⑮ 同③第139页。

陈 三 立

杨天石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53年（清咸丰三年）生。1882年在参加乡试时被陈宝琛从落第卷中选拔中举。1886年中进士，任吏部主事。其父陈宝箴，历官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等职，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是旧官僚中推行“新政”较积极的一个。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的过程中，陈三立曾尽过一些力量。因此，赢得了一定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被合称为“四公子”。但在当时，陈三立的思想就比改良派落后。他不喜欢梁启超等津津乐道的“民权”说，认为它会带来“后灾余患”^①。变法失败，陈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和他父亲一起革职^②。于是回到江西南昌，筑室西山。一年后，迁居南京。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③。1900年以后，清政府开复了陈三立的原职，但他不肯出来任事，专力于诗、古文辞的写作。1904年起，与罢职官僚李有棻共同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兴建南浔铁路，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1908年，与汤寿潜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④。同年，鼓吹“提倡佛教，当视凡百事业为尤急”^⑤，和沈曾植等倡立祇垣精舍，捐金给佛教居士杨仁山，计划选送人员赴印度学

习大乘佛教。

1909年，陈三立以诗稿交给郑孝胥，请他删定。晚清诗坛，有所谓“同光体”。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不专宗盛唐，而以模仿宋诗为主。陈三立是其重要代表。“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⑧。他的诗模仿唐代的韩愈、孟郊和宋代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以生涩硬拗的风格写枯寂萧瑟的感伤情怀。表达上，要求隐晦深微，象橄榄似的耐于咀嚼；用词上，则避熟悉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⑨，有较严重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对于陈三立的诗，郑孝胥大为捧场，说是：“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奭之意态，非可列之西江社里。”^⑩当时，革命派中也有人誉之为“吏部诗名满海内”^⑪。

辛亥革命后，陈三立迁居上海，曾列名于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他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一帮遗老组织超社、逸社，经常在作品中攻击革命，倾吐对清王朝的留恋之情，因此，受到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的抨击。

1915年，陈三立迁还南京。1923年至1924年一度住在杭州，此后住在南京或庐山，长期过着隐逸生活。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忧愤时事，日夜不安，曾于梦中大呼杀敌。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不赴。1933年迁居北平，时已年过八十，白发盈头，在见到年轻时的座师、同为遗老的陈宝琛时，却仍然坚持行三跪九叩礼。其后，郑孝胥、罗振玉曾拉他到伪满洲国去当汉奸，被拒绝。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再次派人拉他，多方游说，他都不理睬；侦探每天在门前窥伺，气得他让仆人拿着扫帚驱赶^⑫。同年9月14

日，尿闭症复发，陈三立拒不服药，绝食五日死。

著有《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文集》。

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历史学家。

注：

- ① 《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散原精舍文集》卷5。
- ② 《湘报》第174号，1898年10月12日。
- ③ 梁启超：《诗中八贤歌》注引。
- ④ 《神州日报》，1908年7月14日。
- ⑤ 同上，1908年8月5日。
- ⑥ 《为溪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散原精舍诗集》。
- ⑦ 陈衍：《石遗室诗话》。
- ⑧ 《散原精舍诗序》。
- ⑨ 《无生诗话》，《民呼报》，1909年6月7日。
- ⑩ 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王 光 祈

李义彬

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始人王光祈，字润珩，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祖父王泽山是清季四川著名诗人，有诗集刊行于世；父亲早卒。王光祈出生时，他家在温江城外开设一个锅厂。后来家境衰落，生计日艰。

王光祈童年依靠寡母劳动生活。九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后由于得到四川总督赵尔巽（赵曾是王泽山的受业弟子）的资助，十三岁时入成都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李劫人、周太玄、曾琦等同学。他在这里学习了五年，1912年毕业。1913年，他离别家乡，先到泸州，1914年由泸州出川到达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对“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尤感兴趣；课余时间则在清史馆任书记工作，以其所得作为学费和生活费。1918年6月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

“五四”前后，王光祈生活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又从事新闻工作，因之广泛接触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并受了较深的影响。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十分庞杂，既有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又接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1918年6月30日，他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在北京发起筹

备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学会的宗旨，经他提议，开始定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宗旨又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①。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时，他被选举为执行部主任，一直到1920年3月他赴欧留学，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主要由他主持。他仿效蔡元培长北京大学的经验，在学会里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因为“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②。因之，会员的成份复杂，信仰也不一致。

“五四”前，王光祈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积极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欢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8年12月22日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中说：“俄德革命，社会党的骤然兴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差强人意的事情”。他在这篇文章中还主张用“打破国界人种”的办法，“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1919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认为新生的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其“国家权力甚大”，“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

的主张。”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③。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幻想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超越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世外桃源。王光祈在五四时期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报刊，进行了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的宣传。他作为《川报》驻京记者，在这家报纸上及时报道了巴黎和会的消息和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形，对四川五四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1919年初王光祈曾说：他“因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④。但是，他接受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克鲁泡特金提倡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他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上写道：“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攻击国家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道：有了国家，便有了强权。又采行集产制度，便免不了交易。有了交易，就免不了嫉妒竞争的心。有了嫉妒竞争的心，那社会上又要闹得不安宁了。并且人的能力，虽然是有差等，但是所需要的，同是一样。今若以所得报酬，以工作的多寡为比例，是强者智者所得常常有余，弱者愚者所得常常不足，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区别？故不如各取所需的方法完善了。”^⑤实际上这也是王光祈当时的思想和主张。

王光祈不只是鼓吹无政府主义，而且积极地去实践。开始，他曾设想在农村建立一个“新生活的组织”，并异想天开地描绘了一幅蓝图：在城市近郊，建立一个菜园。这个菜园不大不小，适宜十来人种植便可。菜园中间建筑十来间房子，楼上作为书房、阅报室、藏书室等，楼下则作为卧室和饭厅。会员

每日在这里种菜两小时，读书三小时，翻译书籍三小时，其余时间可游戏、阅报。会员的生活除靠种菜收入外，还靠译书的稿酬。稿酬的一半作为译者的津贴，另一半则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王光祈十分向往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他说“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是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⑥。可惜，这个“自由世界”只是座海市蜃楼，根本不能实现。它反映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急欲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追求自由、平等新生活的强烈愿望。王光祈的这个设想虽未实现，1919年末他却个城市里搞起“新生活”实验来了。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他参与发起并直接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个工读互助团分为三组：第一组十三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第二组十一人，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附近；第三组十余人（全是妇女），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几十名青年为了改造社会，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集体生活，一面从事炊事、洗衣、印刷、装订等项体力劳动，一面在北京大学等校旁听。他们劳动所得归公共所有，“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幻想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以这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来“创造新社会”^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企图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也如此。北京工读互助团虽名噪一时，影响颇广，但其生命极其短暂，只存在了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封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裂，少年中国学会内部

发生了分化。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会员；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成了信仰国家主义的右翼分子；王光祈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学会中的中间派会员。五四后，他逐渐摒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走上了妥协改良的道路。左翼会员极力要改变学会那种宗旨笼统、组织涣散的状况，想使它成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革命团体。王光祈不同意这种主张，认为改造社会可以不触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从“教育实业下手”。他解释说：“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还说，从事教育和实业，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活动的方向”^⑥。他反对李大钊等关于学会要确定主义信仰的主张。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人民根本没有信仰和实施主义的能力，充其量只能做些确定主义的“预备工夫”；再则，他反对“抄袭”现成的主义，主张重新“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⑦。

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到达德国后，先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同时兼任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的驻德记者，以稿费维持生活。起初他不懂德文，由魏时珍阅德报口译，他笔记整理成文。两年后，他迁居柏林，改习音乐，走上了“音乐救国”的道路。此时的王光祈不仅没有跟上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反而踏上了倒退、复古的道路。他把“少年中国运动”倒退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他认为中国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进行革命，夺取

政权；而是从事“自反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的根本途径，就是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的礼乐，“用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⑩。他在1924年写的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⑪。

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高潮。这时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更为深刻和激烈，左右两派势同水火，互不相容。学会分裂已成定局。长期远离祖国的王光祈无视这一客观现实，仍想维持这个名存实亡的学会。同年10月15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中表示，“倘会中国家、共产两派不能合作，则主张将学会分为：（甲）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乙）少年中国学会共产主义派；（丙）少年中国学会民族主义派”^⑫。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从1925年下半年起，这个学会就停止了活动，无形中宣告解散了。

1926年王光祈从柏林大学转到波恩大学继续研习音乐，先后出版了《西洋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和《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作。从1932年11月1日起，他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艺。1934年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论文，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其后，经左舜生推荐，蒋介石曾通过驻德使馆参赞谭伯羽劝王归国，未果。

九·一八事变后，王光祈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在国外参与了一些爱国活动。“他做了不少攻击日

本替中国辩护的文章，发布于柏林及法兰克福各大报”^③。1934年2月19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记述了他在波恩与留学生们一道抵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御用文人讲演的爱国行动。他写道：“本月15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讲《满洲国与日本》，并附以有声电影。此间同学，交涉阻止无效，乃与东方语言学院院长接洽，于讲演之前，由该院院长说明吾辈反对经过之情形，并朗诵吾辈拟就之抗议书一遍，读毕，吾辈全体同学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④。

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其骨灰由友人运回国内，营葬于成都东门之牛市口。

注：

① 《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印。

②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1919年3月1日。

③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1919年6月1日。

④ 同③。

⑤ 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4月20日。

⑥ 《少年中国》一卷二期，1919年8月15日。

⑦ 王光祈：《北京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一卷七期，1920年1月15日。

⑧ 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一卷六期，1919年12月15日。

⑨ 《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1921年5月15日。

⑩ 转引自《五四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一集，261页。

⑪ 《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⑫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15页。

⑬ 陈剑修：《与王若愚先生同赴欧的追忆》，《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⑭ 魏嗣奎：《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刘 半 农

姜献阁

刘半农，原名寿彭，改名复，字半农，号曲庵，后以字行。1891年5月27日（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江阴县。父宝珊是个秀才，曾教书多年。

刘半农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1904年入本城翰墨林小学，1907年入常州府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闭辍学。

刘离开学校后，江阴已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有人发起组织青年团抗清，其弟天华入团进行革命活动，刘半农亦“北走靖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①，旋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

1912年刘去上海，先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1913至1916年又任中华书局编辑员。居沪期间他专心从事翻译和创作，发表了《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他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也有人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人物，但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1917年刘应陈独秀之邀赴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此时陈和胡适等发起了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运动，刘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夏，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之文学改良观》及《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文，阐述了对改革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意见。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注意分段、采用标点符号等主张，尤其强调“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②。刘认为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脑，做小说要有“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或“就所见世界为绘一维妙维肖之小影”的本领；写诗“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③。他斥责那些专讲声调格律、拘执平仄的诗为假诗，为虚伪文学，与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在社会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1918年春，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好地同旧派作战，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起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轮流编辑，由钱化名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旧派的种种谬论，再由刘写《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从正面逐条驳斥守旧顽固派的观点，尖锐地指名批判了林纾。另外，刘还创造了“她”、“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称赞。鲁迅肯定刘的这种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④。

当时刘在北大教授应用文，讲中国文法等课，颇重视实用及反对八股程式，发表有《应用文之教授》，又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一书。他还努力创作新诗和进行征集歌谣的工作。他的白话诗、无韵诗写得很好，颇受群众的欢迎，如《学徒苦》、《卖

罗卜人》和《叫我如何不想她》等，语言明快，内容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度广为流传，后大部分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里。在征集歌谣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年内收到了几千首，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一百四十多首，开创了研究民间文艺的先河，颇为人们所注意，其后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主编的《歌谣周刊》上发表过许多首。

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活跃的，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局限性，1918年9月写作的《作揖主义》一文，就暴露出不抵抗，听其自然的消极倾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快便离开运动转向专搞学术方面去了。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为北大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会员。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该案提出改国文为国语及编纂辞典等。1920年5月国语会开第二次大会时，组织了一个国语辞典委员会，他是该会委员之一。

会后不久，刘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初至英国，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出国前他本想同时研习文学和语言学，但到了国外，觉得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再三考虑后选定了实验语音学。由于他能刻苦攻读和钻研，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21年10月，刘写了《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文。那时国语学界有“国音”、“京音”两派，他主张“国音乡调”，即希望“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⑥。他不同意以北京音调作统一的标准，认为只要达意，字调可以不

管，任其带有家乡口音。

1922年冬，巴黎大学准许刘应法国国家文学博士试。1923年刘撰《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和《实验P与ㄆ四母之结果》两文。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除介绍有关语音知识和实验方法外，主要记录了他邀约侨居国外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二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并对四声的本质做了探讨。1925年春，刘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略史》两书当作论文提出；另外他还发明有“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即所谓刘氏尺）等测算语音乐律的仪器，获得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又获法兰西研究院之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同年秋，起程回国。

到北京后，刘担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除在校讲授语音学外，同时更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与魏建功商定了一个调查方言同音字的计划，着手收蓄方音等工作，并发起“数人会”研究国语罗马字。

1926年刘任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又兼任师范大学讲师。他曾拟定了一个精细周到的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提交北大研究所，但由于经费短绌，根本无法实现。6月起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约半年时间。11月撰《打雅》一文，节录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此为他编写辞典的最初尝试。同年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来华，同中国学术团体订约，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刘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所译《茶花女》剧本也于这年出版。

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为表示对教育部长

刘哲的不满，刘半农辞掉了国立各校讲席。10月北新书局被反动当局封闭，《语丝》也被迫停刊。刘半农、周作人因与北新书局、《语丝》杂志有密切关系，曾一度避难于友人家。

1928年春，东方考古协会在日本东京开会，刘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出席。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刘为特约著述员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是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年底，原国语会改组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刘与黎锦熙、钱玄同等都是该会委员。翌年，刘又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编纂员。

1929年春，刘半农再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同年夏，兼任辅仁大学教务长。1930年5月，又兼任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由于他渐据要津，“五四”时期的那种热情也已经消失。他对女院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不同意学生参加群众运动，反对学生互称“密斯”，并布告禁止学生入公共舞场，颇引起了社会上的非议，鲁迅也很反感，“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⑥。

1929至1930年间，刘利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在北大布置起了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白涤洲等协助下，用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做材料，记录了七十多方言。1930年夏，他们又借河北民众教育人员养成所开办之便，记下了河北各地的读音。他们先后调查方音达二、三百种，在此基础上由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一册。同年还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刘又着手鉴定故宫所藏乐器的音律，并进一步把“刘氏音鼓甲种”和“声调推断尺”改良为“刘氏音鼓乙种”与“最简音高推断尺”，使研究测算大大节省时间，

也更加准确。

1931年夏，刘辞去兼职，专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主管研究院文史部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刘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一文，顺着官方意思，表示赞成反日救国，抵制日货，但反对游行示威呼口号，要人们照常进行所谓的正业，并说“所谓不抵抗，实在只是不能抵抗”^⑦，主张暂时忍辱求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去和敌人拼死活。至“一·二八”抗战之后，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在《与张溥泉》一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行为有所批评。

在这前后，刘主要是搞语音学等研究和大辞典编纂工作，陆续发表了《释吃》、《释来去》诸文，1932年写成的《“一”字稿本》达三百多页。此外又撰《北平方音析数表》一文，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用六位数字表示一个字的切音，这可说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

1933年5月，刘编成了一部《中小字典》，并附有他自己创造的“点直曲检字法”，后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暑假，他曾走访河南、上海，亲测古乐器音律，并在巩县石窟市及洛阳龙门发现北朝和唐代乐舞造像。同年冬，刘立意给名妓赛金花作传，与商鸿逵一起邀赛聚谈十数夕，草稿写成一半，后经商续编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与此同时他还常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致使鲁迅为之长叹。

1934年刘发表有《西汉时代的日晷》等文章。同年瑞典地理学会为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岁生日，向刘征文，刘准备写一自己专门研究的东西来纪念他，遂利用暑假时间，沿平绥线去调

查西北地区方言。刘与白涤洲等一行五人，自6月19日从北平出发，先往包头，中经归绥、百灵庙、大同，最后到张家口，7月10日回抵北平。他们在短短二十余日内，跑遍数十县，除记录方音，还收集了不少民歌，成绩很大。但刘不幸染上了回归热，医治无效，于7月14日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刘在世时，曾自编《半农杂文》集，他的主要著作大部分收在里面。

注：

- ① 刘半农：《书亡弟天华遗影后》，《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第300页。
- ②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 ③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 ④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75页。
- ⑤ 刘半农：《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半农杂文》第一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版，第139至140页。
- ⑥ 同注④第76页。
- ⑦ 刘半农：《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第248页。

欧 阳 予 倩

张小曼 杨光莹

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1889年5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二）生。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官至广西巡抚。唐才常、谭嗣同都是他的学生。

欧阳从六岁到十二岁在家塾读书，唐才常是他的蒙师。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杀，欧阳颇受刺激。1901年随祖父到北京读书。次年入湖南长沙经正中学堂。经正中学堂的教员中有几个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劝欧阳到日本去。1903年欧阳到日本东京进成城中学。1906年奉母命回乡结婚。1907年再次赴日入明治大学商科。同年他在东京参加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了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黑奴吁天录》，目的是为了惊醒国人，奋发图强。此后，又演出了法国浪漫派作家萨都的《热血》。这是一出歌颂革命党人，鼓舞革命斗志的戏剧。看了“春柳社”的演出之后，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参加了同盟会。这使欧阳意识到戏剧艺术的教育作用，决心一生从事戏剧事业。1908年改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

辛亥革命后欧阳从日本回国。1913年他在湖南长沙组织“文社”剧团。演《运动力》一剧时，因剧中结尾是农民焚烧地主的楼房，触动了统治阶级，“文社”为湖南都督汤芗铭逼迫解散。1914年春节后，欧阳从长沙回到上海，和陆镜若等组织

“新剧同志会”，用“春柳社”名义演出《猛回头》、《社会钟》等话剧，宣传民主革命，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

欧阳予倩在从事话剧的同时，刻苦地向陈祥云、江梦花等学习京剧，向薛瑶卿学习昆曲。1916年终于正式成为职业京剧演员。此后十五年中，欧阳对京剧加以革新和创造，编演了二十多个新的京剧剧目，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妇女形象，自成一派，获得“南欧北梅”的赞誉。

为了发展话剧运动，1918年欧阳再次去日本调查戏剧情况。同年回国后，得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支持，到南通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想借此培养一批有知识的演员，以便组织剧团，改革戏剧。但欧阳在南通三年，收获不大。于1921年离开南通回到上海。同年12月，与汪优游、谷剑尘、应云卫等人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体——上海戏剧协社，并结识了田汉。1922年洪深回国后，经欧阳介绍也加入了戏剧协社。由洪深导演，协社连续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汪优游的《好儿子》和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娜拉》等剧，在社会上获得很大的反响。

1926年，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兴起，欧阳参加了民新影业公司。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玉洁冰清》，后来又拍了《三年以后》、《天涯歌女》。

1927年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田汉参加了政治部的工作。欧阳接受田汉的邀约，到南京担任政治部艺术指导员，因此认识了陈铭枢。不久龙潭战役发生，南京一片混乱，欧阳便与田汉、唐槐秋一起回到上海。

1928年1月，欧阳参加了田汉所组织的南国社，并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冬，陈铭枢邀欧阳到广东去搞戏剧运动，他便随陈到了广州。1929年2月在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附设有戏剧学校、音乐学校、管弦乐队，并办了一个《戏剧》杂志。当时广东政变频繁，内战不断，戏剧研究所也时办时停，三年中就停办了三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欧阳在广东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广东分盟。10月，离开广州经香港转回上海。

同年11月，欧阳在上海组织“现代剧团”，参加的有应云卫、唐槐秋等。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现代剧团”解散。欧阳写了《不要忘了》和《同住的三家人》两个剧本。《不要忘了》以活报剧的形式，反映了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后，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的无理态度，以及工人阶级对此事的示威抗议。独幕剧《同住的三家人》真实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巧立名目掠夺老百姓的黑暗统治。

1932年秋，欧阳与陈铭枢同赴欧洲考察戏剧。欧阳在法国住了半年，曾和冼星海一起多次参加留法华工组织的晚会活动。1933年夏，欧阳到苏联参加第一届戏剧节。10月回到福州，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拟定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国旗、国歌。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欧阳被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4年冬通缉令取消后，回到上海，为新华影业公司编导了电影《新桃花扇》。1935年欧阳参加明星影片公司，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等片。1936年冬他加入联华影片公司，编导了《如此繁华》，没有拍完，“八·一三”战事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欧阳负责组织电影界救

亡协会。后来，他加入戏剧界和京剧界救亡协会，并被选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积极组织救亡演剧队，往各地演出。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欧阳在上海租界内组织了一个中华京剧团。上演的第一个戏是欧阳自编的《梁红玉》，接着又演出了《渔夫恨》和《桃花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奸特务逼他和日本侵略者见面，他设法秘密离开上海到了香港。随即应马君武电邀到桂林帮忙改进桂剧，于1938年5月到了桂林。

由于马君武不赞成欧阳的剧本，欧阳在桂林勉强排完了一出《梁红玉》，就和徐悲鸿一同到了香港。这时，正值唐槐秋带了中国旅行团在港演出，欧阳为他们排了《流寇队长》、《日出》、《钦差大臣》等戏。欧阳还为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写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后来这部影片打破了当时国产片的卖座纪录。1939年，欧阳应何香凝邀请，曾在香港为《救亡日报》募捐，并与廖承志、夏衍取得联系。从那以后，欧阳与党经常保持联系。

1939年8月欧阳又接到马君武和原北大教授白经天的信，劝他仍回桂林。于是再次回到桂林。马君武便将桂剧团全部交欧阳经管。1940年广西省政府又把徐悲鸿走后留下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移交给欧阳，由他担任艺术馆馆长兼桂剧团团长。从此，直到1944年桂林沦陷，欧阳一直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和桂系的矛盾，运用戏剧艺术武器，大力进行宣传活动。这期间由欧阳导演的多幕剧有老舍的《国家至上》、夏衍的《愁城记》、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和他自己的《忠王李秀成》等戏。

与此同时，欧阳还编导了不少桂剧，培养了一批桂剧演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欧阳和田汉在桂林组织了有八个省包括几十个剧团参加演出的“西南戏剧展览会”，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戏剧力量的大会师和大检阅。

1944年7月，桂林因受日军进逼紧急疏散，欧阳和广西艺术馆的一部分人退到桂东昭平县。这时欧阳和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张锡昌等经常接触。以陈劭先为主，在昭平办了《广西日报》昭平版。昭平吃紧后，他们疏散到深山中的黄姚村继续办报，后来该报改为欧阳负责。由于这个报纸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消息，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桂东十几县的人都看这份报纸。1945年夏，欧阳正式加入民盟。日本投降后，欧阳从昭平回到桂林。

1946年纪念五四时，欧阳在讲话中批评美国前总统胡佛利用粮食为诱饵，破坏东欧国家的团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愤然辞去艺术馆馆长职，于同年秋离开桂林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生活相当困难，一度在上海市立剧专讲课。冬天，新中国剧社因在上海找不到演戏的地盘，约欧阳领队去台湾演出。1947年1月欧阳和他们到台湾后，为他们导演了《郑成功》、《桃花扇》、《日出》等戏，深受欢迎。

1947年冬欧阳接受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聘约到了香港。不久，与顾而已、舒绣文等另组大光明影业公司，拍了《野火春风》等两部影片后，于1949年3月来到北平。

7月，欧阳参加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1953年10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4月9日，欧阳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

欧阳予倩在担任中国戏剧学院院长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期间，辛勤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人材，同时从事戏剧艺术理论和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整理出版了《自我演戏以来》、《一得余抄》、《话剧、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欧阳予倩选集》、《电影半路出家记》、《唐代舞蹈》等著作，并主编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 ② 欧阳予倩：《欧阳予倩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③ 欧阳予倩：《电影半路出家记》，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
- ④ 欧阳予倩：《一得余抄》，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许 地 山

徐斯年

许地山，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①。1893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台湾省南府城一个爱国者的家庭。他的父亲许南英，号蕴白，进士出身，当时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许地山两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日军来犯，许南英随刘永福扼守台南，坚持民族大义，投入抗日斗争。失败后，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迁回大陆，在福建龙溪落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许地山的父亲回大陆后，在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幼年的许地山从1897年至1910年，大部分时间随家住在广州。他四岁发蒙入私塾。十三岁入广东韶舞讲习所。十四岁改入随宦中学堂，1910年10月毕业。其父从亲身经历中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转而同情革命。大哥许赞书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些，都对许地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积极的影响。加以往来华侨的熏染和革命党的宣传，早在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就剪了辫子。他父亲虽以为“文明不能专从外表上讲”，然而不久自己也学儿子的样，剪去了辫子，以至当他们搬到乡下居住时，都被当地人称为“剪辫仔”和“革命仔”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许地山，从小接触到较多的民族主义、民

主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在学习方面,他除了正课之外,酷爱音乐,熟悉音律,善弹琵琶。广东的民间歌曲“粤讴”他不仅会唱,而且能编。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诗歌创作,都有影响。

1911年,由于父亲赋闲,家道更加贫困。十九岁的许地山开始自谋生活,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教员。1913年赴缅甸仰光,任华侨所办中华学校教员。1915年底归国,次年任教于福建漳州华英中学。1917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并兼附小主理。同年暑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在北京,他迎来了“五四”革命风暴,形成了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投身于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毕业,得文学士学位,转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同时,与好友瞿秋白、郑振铎等合力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又与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遵循该会“文艺为人生”的宗旨,开始创作一些短篇小说。1921年1月,许地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发表处女作《命命鸟》。它的反封建的主题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当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年,他还创作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

1922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留任该校助理并在平民大学兼课。同年出版散文集《空山灵雨》,共收散文四十四篇。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192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在英国结识老舍,鼓励老舍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并介绍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来二人成

为挚友。1926年10月得牛津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途经印度，留在罗奈城印度大学研习梵文及佛学。1927年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助教。这几年间，他创作了《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醢髓天女》、《枯杨生花》、《海世问》、《慕》等小说、散文。许地山的前期创作，大都充满异域情调，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脱离现实。它们较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不满，顽强地探究人生的价值及其根本目的。但是，它们又笼罩着相当浓厚的宗教哲学气息，情调比较低回，反映出一种怀疑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思想。

《缀网劳蛛》是许地山的前期代表作。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不幸遭遇，却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然而她又对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幸与不幸，一概采取容忍的态度。她自比为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吐出生命之丝，不断补缀着残破的命运之网。这种人生观，对于当时青年中存在的悲观绝望、烦闷轻生的思想有着一定的针砭作用，然而又包含着宿命论的、“独善其身”思想的消极因素。茅盾曾经指出，《缀网劳蛛》“是‘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寻到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折中主义的思想的反映。”^②许地山的所有作品，都贯串着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但是他前期作品中的“人生理想”是朦胧的，矛盾的。这反映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愤激和苦闷。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人民推进了血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肃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提到了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爱祖

国、关心民族命运的作家，许地山通过他后来的作品，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1928年，他被擢升为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副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兼授印度哲学和人类学。1930年，升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特意与夫人周俟松绕道台湾，探望久别的故乡和亲友。台湾山水的明丽秀媚和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都给许地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亲友介绍大陆人民中正在形成的抗日形势，表达了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信念和期望。在中山大学讲学时，他极力反对某些人提倡“中学读经”的主张，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同年12月赴印度，在印度大学继续研究印度宗教及梵文。次年年底回到北京。这一时期，许地山除了潜心于宗教史、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云笈七籤校异》、《中国道教史》上卷等学术著作外，同时写作了《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女儿心》、《归途》、《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春桃》等短篇小说。与前期创作相比，这些作品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鲜明的倾向性。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剖析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构思和哲理问题的探索，语言更加通俗、冷峭。《在费总理底客厅里》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揭穿了国民党右派所标榜的“民生主义”的虚伪。《三博士》讽刺留学生中的败类，暴露了教育界和官场的腐败。《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尖锐地触及时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的斗争和牺牲。

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许

地山。他于是应香港大学聘，南下香港，就任该校中文学院主任教授。当时的香港大学，曾被鲁迅称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③，直到1934年，它的国文课还是只讲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古文。许地山到任后，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革新了教学的内容。他还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担任过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字会理事及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委员等职务。瞿秋白于1935年被捕时，他曾邀集友好，多方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投身于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他奔波于香港、九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庆日所立底愿望》、《七七感言》、《中国思想中对于战争底态度》等杂文，宣传抗战、民主，反对投降、独裁，还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救亡青年上补习课。

在文艺思想方面，这时的许地山明确地批判了以“我”为中心的“怡情文学”，提倡坚实的“群众文学”。他指出，处在“正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势中，富翁贵人可以不要祖国，而人民群众则一旦亡国必成马牛。所以，大众需要的，不是那“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的文艺，而是那“对于人生间种种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即“带汗臭”、“带弹腥”的“群众文艺”。它的任务在于“切实地描写群众”，陶冶出我们民族“坚如金刚底民族性”^④。

这一时期，他写有短篇小说《铁鱼底鳃》，书信体散文《无法投递之邮件》、《危巢坠简》，剧本《女国土》等。《铁鱼底鳃》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兵工专家,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献身无路,救国无门,终于在离乱中丢失了兵工新发明的资料和成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地山通过主人公的口,喊出了人民要求坚持抗战的意志,表达了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越逃,灾难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⑤ 许地山认清了争民主和反侵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坚信中华民族只有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只有在这个斗争的熔炉中才能锻炼出全新的民族性格。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终于和革命斗争的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民党反动势力曾想笼络许地山。抗战前期,他们的驻港官员请他赴会、撰文,均遭拒绝。反动派于是扬言要加害于他,许地山大义凛然地对家人说:“我偏要活,活得还要更好些。”^⑥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他当即与张一磨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抗战到底。然而他竟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祖国的新生。1941年8月4日,疾病夺去了许地山的生命,终年四十九岁。

许地山的作品,生前汇集出版的有小说散文集《缀网劳蛛》、《解放者》、《无法投递之邮件》,散文集《空山灵雨》。逝世后,他的夫人周俟松搜集遗作,编辑出版了《杂感集》和《危巢坠简》。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卷本《许地山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卷本《许地山选集》。

注:

- ① 许地山祖籍广东揭阳,明代即迁居台湾,至其父许南英已历九世。许南英回到大陆后,因清朝政府不准内渡官吏保留台湾籍贯,所以才落籍于福建龙溪。
- ② 茅盾:《落华生论》,《文学》月刊第3卷第4期1934年10月。
-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两封通信(复魏猛克)》,《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9页。
- ④ 许地山:《〈硬汉〉序》,《杂感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0、61页。
- ⑤ 许地山:《铁鱼底鳃》,《许地山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 ⑥ 周俟松:《许地山传略》,《许地山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8页。

徐 志 摩

孙玉石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字櫟森，小字又申。1897年1月15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浙江海宁县。父徐申如，清候选中书科中书，与南通张謇友善，曾因兴办实业，蜚声浙江。

徐志摩四岁入家塾读书。1907年，十岁时进海宁县硖石镇开智学堂读小学，1909年冬毕业。第二年春，入杭州府中学堂求学，与郁达夫为同班学友。1913年，学校更名为杭州一中，徐志摩继续在该校就学，并在校刊《友声》上先后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15年夏，徐志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辍学，改入上海沪江大学，12月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16年秋天，重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1918年8月，赴美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此时始更名为徐志摩。出国时，他曾于太平洋舟中撰文，分致亲友，慷慨陈词，表示在此“内忧外患，志士赍兴”之时，要“益自奋勉”，以负起青年人“拨乱反正，雪耻振威”^①的责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甚为关切，后来曾回忆说，当时得到消息后，“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己’过”，“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

国热”^②。6月，他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获一等荣誉奖。9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政治，于第二年9月获硕士学位。此时，他热心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在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③。

1920年9月，徐志摩为从罗素就学，“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④，离美赴英，入伦敦剑桥大学为研究生，仍习政治学。剑桥大学两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和生活，留给他很深的影响。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⑤这时，他的“求学兴味益深”，“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⑥。两年内他先后结识拜访了文学家威尔斯、狄更生、曼殊斐尔等人。在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他西洋文学的熏陶下，他从1921年起开始了新诗创作。1922年10月，他离开英国回到上海。12月底，开始在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新诗。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对教育总长彭允彝“蹂躏人权献媚军阀”不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发表宣言，主张对北洋军阀政府取“不合作主义”，因而酿成学生要求驱逐彭总长的风潮。月底，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谴责“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对蔡元培“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态度表示赞助，说谣传和政府“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理想的火星”，“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⑦1922年底到1923年初，徐志摩与胡适、陈西滢、丁西林等人在北京组织了早期的新月社。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代表北方学界前往上海欢迎，然后陪同北上。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曾撰文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是因为泰戈尔“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纠正现在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把人们引导入“完全的梦境”^⑥，表现了徐志摩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泰戈尔哲学之间的默契和一致。6月，他随泰戈尔赴日本，暑期中返国。1924年夏，徐志摩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12月，他与胡适、陈西滢、高一涵、王世杰、唐有壬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等爱国反帝斗争中，表现了与进步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反动倾向，被称为“现代评论派”。

1924年底，徐志摩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这时候的徐志摩，不满军阀混战以及民生涂炭的黑暗现实，向往和追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散文诗《婴儿》中，他用“在生产床上受罪”的产妇象征苦难的中华民族，用“美丽的婴儿”象征他理想中的“新政治”。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婴儿出世！”^⑦诗集中有些作品流露出他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的对城市下层人民生活境遇的同情，有些诗篇表现了他对“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光明”^⑧的黑暗现实的怨诉；更多的作品是在对自然与爱情的吟咏中坦露了他的资产阶级诗人的情怀。

徐志摩的世界观驱使他向反动的泥潭里沉溺，但他的感情又常容易“无关闸的泛滥”，很不稳定，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1924年10月，苏联大使馆举行升旗典礼，徐志摩参加

后曾在一次演说中说，那旗帜的“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不仅表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⑩1925年3月，他经西伯利亚往欧洲，到德、意、法诸国漫游，7月返国。出国途经苏联时，听《伏尔加船夫曲》“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有感，作《庐山石工歌》。他看到苏联国内战后的困难状况，又产生了对苏联革命的误解和恐惧。

同年10月1日起，《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担任主编。这一年里，他写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一年是他创作收获最多的一年。

1926年1月，徐志摩看到陈毅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所作《纪念列宁》报告的油印稿之后，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鼓动青年“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⑪充分说明徐志摩向往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他见了工农民主政权是连影子都怕的。”^⑫

同年4月1日，徐志摩与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等人创办《晨报副刊》的《诗镌》，由徐志摩主编。第一期“三月十八血案专号”，载有闻一多的论文《文艺

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和徐志摩的诗《梅雪争春》。徐志摩在这首诗以及同时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文章中，反对军阀制造的“空前的血案”，断言只要实行他“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④《诗镌》对提倡格律诗起过积极影响，但有不少作品流于形式主义。6月10日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1927年春，徐志摩在沪与胡适、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5月，散文集《自剖》由新月书店出版。6月，开始筹办《新月》月刊。秋天，徐志摩应聘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并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9月，新月书店印行了他的第二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他称这部诗集是自己“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⑤。随着他思想上的趋向消极和反动，使他这部诗集除少数几篇以外，“几乎完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⑥。这些诗篇和他的散文一起，确实可以说是“中国布尔乔亚心境最忠实的反映”^⑦。

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号出版。这时，围绕《新月》杂志，形成了一个代表右翼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社团——“新月派”。徐志摩在他执笔的代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艺的“荒歉”和“混乱”，提出了“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新月》月刊先后发表了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等文章，表明新月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反动倾向，因而受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阵营的揭露和批判。

1929年，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授课，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5月，小说集《轮盘》由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秋天，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授课事。12月，辞光华大学教职，应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1931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出版。3月，参加创立笔会中国分会，并被推选为理事。8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印行。其中收集了他1927年到1930年的作品。他这时已经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的诗人，不仅生活“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⑧。其中有些诗表现了明显的颓废绝望情绪，甚至反动的倾向。如在《秋虫》里，他攻击包括革命理论在内的“主义”说：“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在《西窗》里更加露骨地咒骂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是“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青年们“滚沸过的心血”；他反复低吟着“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这样绝望的调子。他还在邵洵美编的《声色》杂志上发表庸俗下流的诗，因而被瞿秋白斥之为“吃租阶级”的“猫样的诗人”^⑨。政治上的绝望和反动使徐志摩在艺术上走向枯竭和没落。

1931年起，徐志摩的思想稍有转机。他看到了“劳苦社会的光与影”，“千百万人”在水灾和饥饿中“叫救命”^⑩，曾表示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翻译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国独幕剧《墨梭林尼的中饭》；发表了同情“左联”烈士的小说《珙女士》^⑪，并在“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诗作。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而死。

徐志摩的著作还有：诗集《云游》、散文《秋》、剧本《卞昆冈》（与陆小曼合作）、《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翻译《涡堤孩》、《曼殊斐尔短篇小说集》、《赣第德》、《玛丽玛丽》（与沈性仁合译）等。

注：

- ①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第11页。
- ② 1928年5月3日日记，《徐志摩年谱》第73页。
- ③⑤⑩②③ 《猛虎集》序文，新月书店1931年8月初版。
- ④ 《我所知道的康桥》，《晨报副刊》1926年1月16日。
- ⑤ 《吸烟与文化》，《晨报副刊》1926年1月14日。
- ⑥ 徐志摩家书，《徐志摩年谱》第19页。
- ⑦ 《努力周报》第39期。
- ⑧ 《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太戈尔号（上）》。
- ⑨⑪ 《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版，第18、19页。
- ⑫ 《毒药》一诗，《志摩的诗》。
- ⑬ 《晨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 ⑭⑮⑯ 茅盾：《徐志摩论》，《现代》2卷4期。
- ⑰ 《自剖》，《晨报副刊》1926年4月3日。
- ⑱ 《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第270页。
- ⑳ 《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

林 砺 儒

郭 烙

林砺儒，原名林绳直，广东信宜人。1889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成人。其叔教家馆，他童年随叔父读书。1905年至1911年在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学习。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3月回国。1919年4月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此后终其一生，一直坚守教育岗位，被誉为“最有恒心”^①的教育家。

五四运动时，他支持学生运动，曾指导北京高师学生举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活动。1921年，他积极参加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罢课索薪斗争。

林砺儒对德国威玛宪法编列了教育章十分欣赏。北洋军阀时期，他于1922年和1925年两次向当时的国会提出教育章草案，想为教育事业争得宪法上的保障，都没有得到结果。

我国学制从清末开始基本上是抄袭日本的。1922年，教育界提倡仿照欧美学制进行改革。改小学七年、中学四年为小学中学各六年。一时学制改革成为教育界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一年，林砺儒开始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决定立即试行新学制。林砺儒组织各科优秀教师自编新教材，当年秋季即按新学制招生。许多中学纷纷向高师附中索取试

行新学制的教材及经验。高师附中还在教育杂志上介绍试行新学制的情况,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学制改革开始后,关于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大学教育是目的地,普通教育不过是过渡到目的地的一道桥梁。林砺儒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以学生生活的环境为中心,而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他说:“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动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乃是要引导人格的活动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譬如一株树,要他十分发育,就要让他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他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中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② 林砺儒的教育思想,注重联系中国教育实践,博采众长,颇有独到之处。

1931年7月,林砺儒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邀请,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其后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广东当局为纪念已故的国民党监委古应芬(字勳勤),创办勳勤大学,林砺儒参加筹办工作。勳勤大学成立后,他担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高涨。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企图用繁重的功课、严格而频繁的考试来束缚学生。林砺儒发表《从批评中学新法令说到未来的改造》^③一

文，对教育法令提出异议，主张废除中学毕业生的会考制度。1935年国民党提倡尊孔读经，他又提出反对。说办教育应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民众化，二是现代化，读经不符合这两个原则。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废除中学的军训课程。

抗日战争前，两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勳勤大学是这个时期广东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产物。抗战爆发后，勳勤大学改组，其教育学院于1937年9月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林砺儒任院长。该院先迁广西梧州。继迁藤县、融县和广东乳源县。1939年9月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再迁连县。历经五度搬迁，图书仪器均完整无损地转移至粤北。而当时广东其他院校图书仪器在搬迁中损失惨重。对比之下，该院声誉更高。林砺儒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利用两广特殊的政治环境，担任院长达八年之久。他拒绝国民党特务插手学院。曾对学生说：“国民党顺来，应付他，硬来，就对付他！”^④国民党政府规定高等院校要设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1939年至1940年，他便在校内物色人选担任训导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的牌子，以便“挡风”，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校。

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是“兼容并包”。教员只要学有专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都请来任教。郭大力、张栗原、尚仲衣、高觉敷、李平心等教授都曾先后到文理学院执教。皖南事变后，搬迁到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解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林砺儒欢迎他们到文理学院来任教和学习。在文理学院，教师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学生可以研究各种学术问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进

行抗日救亡活动。

文理学院的进步自由风气，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嫉恨。张栗原教授讲课时，特务学生竟将左轮枪摆在课桌上，进行威胁。特务对林砺儒更视为眼中钉。说文理学院是“红色学院”、“小延安”，要求改组。并以停发经费相威胁，迫使林砺儒不得不于1941年5月提出辞职，前往曲江。此时以地下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全院师生展开挽留林砺儒的斗争。他们召开全院“挽林”大会，发通电，派出师生请愿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使拟取代林砺儒的国民党CC派不敢上任。学生们还高唱林砺儒撰写的校歌寄托对他的怀念。一时，不少学生被捕、被开除，一些进步教师也被迫离校。林砺儒愤慨地写了一首诗：“黄石出任乘小骥，闯入榴园杀桃李，三人贯耳七人鞭，园公闻讯心惘然。”^⑤心情极为沉痛。

1941年10月，林砺儒到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担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那时国民党特务也插手该院，他深为烦恼。在家门口写上一副对联：“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此后他写了许多辛辣的文章，讽刺教育界的黑暗面。5月，他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精神剃须论》一文，讽刺国民党对青年的训练和控制，轰动一时，导致该杂志被迫停刊。

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桂林师范学院于6月撤退到柳州。其后又沿桂黔边境转移到贵州省平越，继续上课。林砺儒随校转移，坚持讲课。并初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教育哲学》一书。抗战胜利后，他随桂师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民主活动。1946年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收到不少匿名信。国民党

特务恐吓他说：“李公朴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后来CC派要把桂林师院迁往南宁，而他又患肾炎，遂提出辞职，回广州治病，因而脱离民盟。在广州时生活贫困，用不起盘尼西林，桂师教授张毕来等汇了一笔款给他。他回信说：“庄子有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诸君盛情可感，亦复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有人将这封信贴在桂师布告栏上，引出不少师生的热泪。

1947年8月，林砺儒到厦门大学担任教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国民教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之他学识渊博，立即成为该校教育系最受欢迎的教授。他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罢课、罢教、罢工的斗争。

1949年4月，林砺儒离开厦门，经香港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副部长等职。

林砺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要领》、《教育哲学》、《教育危言》。他有一百多篇论文，散见于《教育杂志》、《教育丛刊》、《中华教育界》、《教育新时代》、《文理月刊》以及《新华月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

1977年1月20日，林砺儒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注:

- ① 《林砺儒》:《我们的特约撰述》,《教育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四号,1934年12月。
- ②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教育丛刊》第三卷第五集,1922年9月。
- ③ 《教育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四号,1934年12月。
- ④ 当时广东文理学院学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林敬文的回忆。
- ⑤ 新任院长为教育厅长黄麟书兼任,训导主任为徐家骏,第一句指此二人。勸勤大学抗战前校址在广州郊区石榴岗,故称“榴园”。

汤 用 彤

宗志文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生于1893年6月21日（清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日）。他的父亲汤霖是光绪十九年间的进士，当过甘肃渭源知县，以后在兰州和北京教馆。汤用彤出生于渭源。少年时代在父亲的塾馆中读书，勤奋刻苦。他说自己“幼承庭训，早览乙部”^①，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2年他入北京顺天学校，1914年入清华学堂。1916年在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公费留美，因治疗沙眼未成行。在清华学堂教国文，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1918年到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两年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哲学，并习梵文、巴利文。

汤用彤1922年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暑假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后又在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0年起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没有离开过北大。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他也迁到昆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除任教外，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青年时代的汤用彤一心钻研哲学，对国家大事以至新文化运动都不大关心。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正在美国。当时

有一部分留美学生联名撰文支持五四爱国运动，他曾上面签名。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并不怎么了解。1922年回国后，在提倡封建文学的《学衡》杂志上发表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摘新文化运动，说：“今日中国固有之精神湮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聚议纷纷，莫衷一是。所谓文化之研究，实亦衰象之一。”^②

汤用彤从二十年代起就研究中国佛教史。同时研究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以加深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在大学里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英国经验主义（洛克、巴克莱、休谟）。他研究历史很注意掌握充分而可靠的材料，长于考证。“由于他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有较深的理解，他就有条件利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比起那些只用封建的含混不清的叙述，用佛经解佛经的中世纪办法提高了一个阶段”^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汤用彤思想上有所震动。这时，虽然他还是埋头治学，不问政治，但思想上也有矛盾。暑假南下至庐山，在佛教圣地大林寺左近写《大林书评》，序言中带着自责的口气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大林书评》共六篇，其中五篇是批评日本人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谬误。他自称是借此抒发抗日救国的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独裁加剧，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很激烈。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日趋高涨，许多教授也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汤用彤的心情是沉闷的：既不愿与

反动的国民党同流合污；又不愿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所走的还是那条为学术而学术，在学术中寻求安身立命的道路。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时，他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曾经参加悼念牺牲烈士的追悼会。当时梁漱溟到昆明做调处工作，对民主运动和反革命镇压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汤用彤与梁漱溟虽是多年的朋友，但他公开反对梁的这种態度。

随后，汤用彤回到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建校工作。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常常不在学校，有些工作就落在担任文学院院长

的汤用彤身上。他感到难以应付，十分苦恼。1947年暑假，美国加里福利亚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就乘机到美国去了。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请他讲学，他没有同意。1948年9月回到北平。不久解放平津的战役打响。胡适动员他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飞机票，他拒绝了。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56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54年冬，汤用彤患脑溢血症，经过多方治疗，才逐渐痊愈。他经常对人说：“若不是解放了，若不是党和人民的关怀，我这个病是不可能治好的。”^④病愈后的十年中，身体一直不好。但仍然指导青年教师，带研究生，从事佛教史研究，孜孜不倦。这时期，他积累了十几本读书札记，其中有关于佛教史的，有关于印度哲学史的，还有一部分是翻阅《道藏》的摘录。

他写成九篇论文，概名之曰《康复札记》。他校点了梁慧皎的《高僧传》，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曾改杜甫诗两句：“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用以表达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因心脏病逝世。

汤用彤已出版的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谈》。尚待整理完成的著述有：《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讲义》、《汤用彤论文集》。

注：

-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 ② 《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 ③ 任继愈：《悼念汤用彤先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 ④ 同③。

马 约 翰

王维屏 黄延复

马约翰，1882年10月10日（清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与其兄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在亲友资助下，十三岁进私塾读书，十八岁到上海读中学，二十二岁考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于1911年毕业。

马约翰从小喜爱活动，进私塾读书以前，整天和同伴们爬山、游泳，身体很健壮。在大学读书期间，酷爱体育运动。运动成绩优异，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等各种代表队的主力队员。尤长于中、短距离赛跑，曾获全校冠军，并多次在校外比赛中取得优胜。1905年，他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一英里竞赛。在落后于日本选手十码的情况下开始冲刺，最后以领先五十码的距离取得优胜。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约翰，中国！”的欢呼声，赞扬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从此，他成为上海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

由于马约翰具有出色的运动才能，1914年被清华学校选聘为体育帮教。从这时起，到1966年逝世时止，他一直在清华工作了五十二年，由助教而教授而体育部主任，终生为体育教育事业服务。

他在清华致力于体育普及工作。除上体育课外，还说服

学生参加学校规定的每天下午4时到5时的体育锻炼。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每天下午走上操场,到学生中间去,以身作则和学生一起锻炼,并在锻炼方法上随时给予指导。他在清华坚持实行“体格检查”和“体能测验”等项措施和制度。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上广泛深入的说服动员,使清华的体育运动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他还倡导正确的竞赛思想。提出:“球可输,体育道德不能输”。“对外比赛不必先把输赢放在心上,只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全部施展出去”。1928年底,他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冬季球类比赛。在争夺冠军的决赛中,清华主力中锋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昏,全场哗然。许多队员主张“罢踢”;马约翰力息风波,换人续踢;结果虽然输了这场球,却赢得全场观众的赞扬。

马约翰十分关心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师资的培养。1928年前后,他和郝更生、徐国祥等一起,利用清华较完善的体育设备和器材,几次创办“暑期体育学校”。自任主任,聘请国内体育界名流张汇兰、董守义、高梓、许明辉等任教。为提高我国早期体育师资业务水平和祖国体育事业的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马约翰学习和总结了外国的经验,根据田径和球类等项运动的训练特点,创造出徒手操的编组方法和拉力器的训练方法。早期的清华学校先后成立了足球、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田径、滑冰、拳击等十多种代表队。在他担任教练或指导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校外的比赛中,也多次名列前茅。

1919至1920年,马约翰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到美国春

田大学进修体育。结束时用英文写了《我对西方体育的十四年经验》一文。概述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发展情况。1925—1926年，他再次利用休假时间到春田大学进修。结业时用英文写了《体育的迁移价值》的硕士论文。论述体育对全面培养人的教育作用，是该校1926年度主要硕士论文之一。

马约翰经常参加全国和国际性体育竞赛的指导和组织工作。1919年第四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他是奥林匹克代表队选拔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27年的第八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他任田径委员会的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会的委员。1930年，他担任参加预定于193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九次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他担任中国田径代表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十二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他在欧洲一些国家和苏联进行考察，并作了考察记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他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犹积极设法开展体育活动。

在旧中国，马约翰虽怀有“谁能发展体育事业我就拥护谁”的“超政治”观点，但他不趋炎附势。在西南联大时，国民党曾在名教授中进行“突击入党”运动，他拒绝加入。1943年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聘请他担任政治色彩很浓厚的“江津体育专科学校”校长，他也严辞拒绝。

马约翰对体育理论研究也很重视。早在1926年，他就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系统地探索了体育不但对于人的肌

体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价值”，而且能“迁移”到人们的心理、道德、品格以及精神等方面去，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他于1950年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技能的训练方法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

“运动是健康的泉源”，这是他早在二十年代就提出来的论断。1954年，他发表了《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一文，用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

早在四十年代初，马约翰就打破常规，主张用运动来治疗某些在当时被认为只能“卧床静养”的慢性病。是“体育疗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1952年，他主动和校医院大夫配合，对校内一大批患各种结核病的师生进行“体育疗法”，取得了成效。

马约翰身体力行，终生坚持锻炼，身体非常健康。酷暑，他在烈日下连续活动几个小时不头晕，不中暑。冬天，他从不穿棉衣。他六十岁时，还和青年教师进行激烈的室内手球比赛。七十六岁时，和一位中年教师合作争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是七十六老人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的第一人。年逾八十时，鹤发童颜，仍然生气勃勃地照常工作。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

马约翰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任、主任和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任。1957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率代表团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体育运动会，任团

长。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都由他担任总裁判。1964年,清华师生曾聚会祝贺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周年。

1966年10月31日,马约翰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马约翰:《我的健康是怎样得来的》,体育出版社1954年版。
- ② John Ma:《My Fourteen Years Experience of Western Physical Education》Thesis F 1920.
- ③ John Ma:《The Transfer Value of Athletics》Major Thesis for M. P. E'26.
International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llege,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 ④ 马约翰:《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新体育》1950年创刊号。
- ⑤ 《清华周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等。
- ⑥ 访问记录和信件。

萧 龙 友

寿祝衡

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又改号“不息翁”。四川三台县人。1870年2月13日（清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四川雅安。他的父亲萧端澍是清光绪戊子年（1888年）举人。萧龙友幼年受父教，用心攻读经史诸子及名家诗赋。少年时，因母多病，乃留心于医药，经常去族人所设药铺请教，逐渐能识药物、辨药味，识别药物真伪。学习之暇，曾阅读我国古代医学名著。

1890年，萧龙友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在校博览群籍，除深研经史词章以外，又涉猎许多医学古籍。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多人，街头一片凄凉。许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病人。萧龙友不顾危险，用中草药救治了不少病人。

1897年，萧龙友二十七岁，中丁酉科拔贡，入京任八旗教习。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他离京去鲁，曾先后任淄川、枣阳知县。1901年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设学堂，山东省会设立高等学堂，萧龙友曾为该学堂制定章程，并充任教习。

辛亥革命后萧龙友移居济南。1914年奉调北京，先后任农商部秘书、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

总办等职。并被内务部聘为中医顾问。这时萧龙友虽日理公务，但从未间断研习医学，常于公余之暇，以医道问世。

1928年，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署名“医隐”，号“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上，以述其志。

萧龙友自行医后，集中力量研究医学，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他不泥古非今，不仅攻读中医古书，并阅读当时新译的西医药书籍，随时参照研究。治病疗效甚高，治好很多疑难大症。当时北京有的西医院，因闻萧龙友的盛名，经常约请他会诊一些疑难重症。

萧龙友非常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对望闻问切，常深究其辩证关系，主张四诊合参。他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它方法于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①对于四诊，他认为，临症时应结合病人的体格、性情、籍贯、职业、平素生活习惯等加以考虑。

萧龙友十分重视医德，曾作医范十条，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②。萧龙友也很重视医史。他说：“治医学史，必先将历代典章学术，搜讨无遗，然后可以言史，否则医自医、学自学、史自史耳，何益之有哉。”^③

对药学的见解，他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者不但应识药，而且须能亲自采药，且能临症自为配合（炮灸、切制等工艺过程）。

在临床方面，他擅长治虚劳病。主张老少治法应有所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措施，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萧龙友十分关心祖国中医事业的发展。1934年与名中医孔伯华创办“北京国医学院”，以造就国医人才。萧龙友任院

长,苦心经营十五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挽救和促进作用。解放前历任北平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和北平国医分馆董事等职。

全国解放时,萧龙友已八十高龄,仍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49年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任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同年1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萧龙友被聘为华北区特约代表。1951年被政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1954年起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届代表,中医研究院顾问、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人民医院中医顾问等职。

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他的临症方案及遗稿很丰富。他珍藏的数千册医书,全部捐献给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

注:

① 谢海洲:《北京四大名医》。

② 同①。

③ 同①。

施 今 墨

寿祝衡

施今墨，浙江肖山县人，生于1881年3月28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原名施毓黔，行医后，改名施今墨。表示他要向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学习，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同时，在医术上要勇于革新，使自己成为当代的医学绳墨。

施今墨幼年时期，其母多病，遂立志学医，曾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学中医。1902年，因其父在山西为官，进入山西大学堂就读。由于他参与反对该校西斋创办人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而被学校开除，于1903年转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转入北京京师法政学堂学习。他在校虽然攻读法律，但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医。

施今墨于1911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不久，便追随黄兴奔走革命。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施今墨以山西代表的资格参与活动，为陆军编纂了三种法令：《陆军刑法》、《陆军审判章程》、《陆军惩罚令》。1913年，他返回山西。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社会活动，与范源廉、汤化龙等在北京和山西创办尚志学会和尚志学院。1917年，他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不到一年即辞职引退，弃政从医，并决心以行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21年他协助顺直

水利督办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负责该院孤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

192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废弃中医。施今墨到处奔走，组成“华北中医请愿团”，南下联合各省医家，多次请愿。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

南京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焦易堂任馆长，施今墨任副馆长。为了发展中医事业，施今墨一方面行医，一方面从事中医教育改革。1932年，他在北平以自己行医的收入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任院长。学院除开设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外，还设有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内科、外科及日、德文等课程。这在当时的医学界，还是一个创举。该学院一、二年级为中西医基础课，三、四年级为临床课，学生毕业时还须进行临床实习。施今墨亲自授课，并指导学生实习。该院在成立后十年期间，共培养出学员六、七百人。

施今墨于1941年担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并在北平、上海、山西、察哈尔等地协助创办中医院校、讲习所及研究班。数十年以来，他除办学外，还收有门生数百人，培养训练了很多中医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施今墨曾“代表”华北医药界出任伪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任职期间，多次提出发展和改革中医的建议及方案，均未被采纳。事实教育了他。北平解放前夕，他坚决抵制了国民党诱使他赴台湾或国外的阴谋。并于1949年9月和其他一些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虔诚接受中共领导》的声明。解放后，他加入农工民主党，被

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平安医院、协和医院、儿童医院、铁路医院等北京各大医院中医门诊部工作，并担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及北京医学院顾问等职。

施今墨擅长医治胃肠病及妇科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也有独到之处。晚年对于冠心病和防老法也颇有研究。

他在医学上勇于革新，五十年前即提倡中西医结合。他常说：“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他主张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律，取得古人理论的精华。他的医案，常附中西医两论，中西并举，融会贯通。

施今墨不仅在疾病的诊断上勇于革新，对于中药的剂型和配制，也力图改进。曾创办“中药制药厂”，以实现自己的革新愿望。他处方配制的丸药，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高血压速降丸等，也是在打破常规和旧传统的基础上制成的。

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因病逝世。他嘱咐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

太 虚

韩廷杰

太虚和尚，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生于1890年1月8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五岁丧父，六岁丧母，幼时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虔信佛教，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九岁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十三岁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从此萌发出世思想。十六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当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同受戒者数百人，太虚年龄最小，但答问戒律名列第一。

清朝末年，革命思潮日盛。与太虚同寺的华山法师教育他以革新之路求佛教的复兴，让他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谭嗣同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太虚十分欣赏谭嗣同的“仁学”，用以自励，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

1909年冬，太虚随寄禅参加江苏僧教育会，这是他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1911年，太虚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他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因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而招忌，潜返上海。

为了加强各佛教寺院的联系，复兴并发展佛教势力，太虚于1912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当时寄禅和尚领导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协进会”即合并于“总会”，由寄禅任会长。

不久，寄禅死于北京。上海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他所说的“教理革命”，是反对探讨死后问题，主张用佛教解决现实问题；他的“教制革命”，主张设“佛法僧园”，统管全国僧务；其“教产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宗派继承教产、私有私占，主张寺院财产属全体僧众所共有。

中华佛教总会 1913 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太虚任该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了《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这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他的佛教观点基本上是承袭古人的，用“宗下”和“教下”说明佛法的全部内容。他所说的“宗下”是指不用语言文字，只求自悟自证的禅宗；他所说的“教下”是指由语言文字所建立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家，也可以包括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在上述几篇论文中，也反映在他撰写的《佛法与调整》这本小册子里。

1914 年，太虚在普陀山锡林禅院闭关治学，钻研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等，旁及古今东西之学，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论》、《成大乘论》、《法界论》等。这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他的佛学观点基本形成。他认为：小乘可附属于大乘，即所谓“附小于大”，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至于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禅、律、净土、密这大乘八宗，它们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极果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八宗平等”。但实际上，他更倾向于禅宗。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大乘宗地图》中。

太虚于 1917 年春漫游我国台湾省和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佛教。他与蒋作宾、黄葆仑、陈元白、章炳麟、张謇、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觉社”,由他主编《觉社丛书》。1919 年初,改名为《海潮音》月刊,移杭州净梵院,继续担任主编。不久,太虚应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请,到长沙讲学,并成立长沙佛教正信会。冬天回杭州,途中写成《新的唯识论》。他把“新的唯识论”看成是真唯识论的应化身,用新近的学术思想予以阐明,以适应现代思潮,结果遭到以圆瑛为首的一派佛教徒的反对。

1923 年以后,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三时期。与前两期迥然不同,“不为旧来宗派所拘束,而欲将释尊流传到现代的佛法,作圆满的判摄罢了。这期可分‘教’、‘理’、‘行’三者来讲……”^①。他所说的“教”是对释迦牟尼等佛教导师遗教的研究;所谓“理”是对佛教理论的探求;所谓“行”是指佛教修练,如持戒、坐禅、念咒、念佛等。

太虚为了复兴庐山大林寺的佛教,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曾先后邀李隐尘、张仲如、黄季刚、汤用彤等开暑假讲演,使沉寂数百年的庐山佛教复活。来听讲者多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外人士。太虚由此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他于 1924 年夏天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德国、美国、芬兰等佛学家都赶来参加。太虚在讲话中,结合大乘佛教“利他”教义,阐明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主题。

为了改革佛教、培养骨干,太虚热心于筹办僧侣教育机关。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都是他一手筹办

的。他还在上海创设佛化教育社，出《心灯》旬刊，进行佛教宣传。他在武昌佛学院讲《志行自述》，提出“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②的口号。武昌佛学院采用日本佛教大学教材，管理制度参用丛林约规，早晚诵《弥勒上生经》。

太虚于1924年在《海潮音》第五卷第二期发表《新僧》一文，主张僧尼都应当受教育，接受新思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后来兴起的新佛教运动，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僧众把太虚拥戴为新佛教运动领袖。

1927年太虚受转逢、常惺、会泉等之请，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秋天，应蒋介石之请，在雪窦寺为他讲《心经》。从此深受蒋介石器重。这一年，他还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

太虚于1928年6月8日发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对唯物辩证法极端仇视。把努力“俗化”犯“幼稚病”的僧人说成是“恰犹国民革命中杂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一般危险，此则非速加以清除不可！”^③他在《训词》中仿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三佛主义”的口号：（一）佛僧主义。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僧团”^④，坚持寺产属僧众所共有，严守戒律，对违犯者要规劝，以致于勒令还俗。（二）佛化主义。大力发展佛教徒，只有僧侣组织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居士组织。（三）佛国主义。即用佛教影响国家，以致于全世界。他提倡由僧众信众联合组成“中国佛教信徒会”或“国际佛教信徒会”，以加强中国和世界佛教徒的联系，扩大佛教影响。春天，蒋介石过访于杭州灵隐寺，邀请太虚进京讲《佛陀学纲》。为了健全佛教组织，推进佛教文化运动，太虚得蔡元培、戴季

陶等贊助，以李子寬、黃忏華、謝铸陳為骨干，在南京創設中國佛學會，同時發動籌組中國佛教會。

太虛於1926年遍訪南洋群島，並於1928年秋天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宣講佛學。他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回國後，寫成《環遊記》。太虛是中國僧侶去歐美傳播佛教的第一人。他的傳教活動受到反动頭目的贊賞。希特勒在接見他時指出：“歐洲青年需要東方宗教了（專指佛教）。是的，東方宗教豈止東方而已。”^⑤ 蔣介石在致譚延闓的信中也吹捧說：“沙門太虛，著作等身，苦學潛修，垂三十年，此番赴歐美弘法，為國宣勞，玄奘以還，斯為第一。”^⑥

1929年中國佛教會成立，太虛任常務委員。1932年應蔣介石之請，一度任雪竇寺住持。

1937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以後，太虛多次電告日本佛教徒，本着佛陀“大悲兼利”的精神，佛教徒聯合起來向日本政府抗議，促使它停止對中國的侵略。太虛歷游四川、雲南、貴州等省講學，號召佛教徒參加抗戰救國事業，指導籌組訓練僧眾救護隊，分發各戰區服務。1939年，太虛受聘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秋，率中國佛教代表團訪問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新加坡等國，闡明中國抗日救國的政策，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太虛和蔣介石的關係比較密切。1946年元旦，國民黨政府授以宗教領袖勝利勳章。在《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太虛發表《青年知識僧的出路》一文。認為“若要中國能夠好起來，無論如何要由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公正的知識分子產業分子聯合教導資助着大多數貧苦勞動工

农,共同警觉着土劣贪恶的毒害,……然后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政治才能实际施行,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太虚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蒋介石。他抄录旧作一首登载于《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对蒋介石大肆吹嘘。说什么:“党国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岂贴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并在注释中称:“民十六年秋,蒋主席倦勤,邀余雪窦晤谈,曾赠此诗。日本海稀今已缚,喜而书之。”年底,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社会部在重庆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太虚被推为主任委员。

1947年5月7日太虚患脑溢血症死于上海玉佛寺。遗著有《太虚大师全书》等。

注:

- ① 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海潮音》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 ② 《海潮音社》:《太虚大师行略》,《太虚大师纪念集》第8页。
- ③ 太虚:《人生佛教》第2页。
- ④ 同上书,第4页。
- ⑤ 成德:《太虚大师的思想体系》,《太虚大师纪念集》第65页。
- ⑥ 续清:《太虚大师救国救教救世之真精神》,《太虚大师纪念集》第11页。

林 文 庆

陈 民

林文庆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1869年9月5日（清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林天尧，当时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林文庆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读“四书”“五经”，后改入官立英文学校，不久升入莱福士学院学习。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以后，香港大学又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这对他开展社会活动，是很有帮助的。

1893年至1921年，林文庆在新加坡挂牌行医，并一度担任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讲师。这期间，他还积极热情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1897年与新加坡著名律师宋旺相合作创办了《海峡华人杂志》，与《天南新报》创办人邱菽园组织“好学会”等社团，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林文庆热心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人教育的改革。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排除众议，劝说一些友好剪掉辫子。1899年，他又是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夫人黄端琼在女校任教。为了在华侨中推广汉语普通话，林文庆首先在自己

的家里开办华裔普通话学习班。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创办新加坡华人商业银行和华侨保险有限公司，垦植马来亚的橡胶园。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市政局委员、立法院华人议员、内务部顾问，以及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等职务。鉴于他对这一英属殖民地的贡献，1918年，英皇特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

林文庆早年在英国就结识了孙中山。1900年6月，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为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合作进行活动，被当地政府拘捕。孙中山特由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也遭逮捕，经林文庆等代向英当局疏通，使孙与宫崎很快获释出境。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搬出德皇威廉二世捏造的所谓“黄祸”论，作为侵略中国的口实。林文庆在《新加坡自由报》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白祸”，并以资本主义列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灾难，说明“白祸”比“黄祸”更为可怕。他援引英人托玛斯·杰克逊的话：“条约只有平等，才能持久。”指出当外来者（指教会与洋行）终止享有特权，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也就随之过去，从而也就不会再有排外的暴动^①。

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林文庆欣然入会。

1911年，林文庆到欧洲游历考察了九个月，对几个主要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并作为中国代表，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卫生会议。在伦敦时，一度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

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

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1921年4月,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聘请林文庆当校长。厦大开学后,林文庆亲自对学生进行英语口语试,并通报全省各公私中学,对推动福建省外语教学起了积极作用。一直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才辞职回新加坡。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丘的生日被列为重要节日,全校放假,“以示恭祝”。他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认为学生不应“为爱国运动而抛弃自己的职务。”^②正如当时在厦大任教的鲁迅所指出的,“校长是尊孔的”,“这里是死气沉沉的,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数年前闹过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学了。”^③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④。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它多方面的著述活动。1929年,完成屈原《离骚》的英译。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认为,该书是外国人研究汉学的佳作;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曾为之作序推荐。1930年,林文庆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⑤和《新的中国》等。

林文庆又是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林文庆已退休在新加坡。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年逾古稀的林文庆被迫出面组织

了“维持会”——“华侨协会”，但他并不积极开展活动，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由于晚节欠佳，林文庆孤寂落寞地度过余年，于1957年1月1日在新加坡病故。

注：

- ① 林文庆：《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第294页。
- ② 林文庆1926年4月6日在厦大五周年校庆会上讲话。转引自《福建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第54页。
- ③ 《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6页、245页。
- ④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第7页。
- ⑤ 《民族周刊》(THE CHINESE NATION)，1930年1月创刊，1931年12月停刊。创刊时曾标副题：“致力于中国进步的刊物”。《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是林文庆于1900年先后发表在英文《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文章汇集，由里思(G.M.Reith)编辑并作序。文集分三部分，主要是介绍中国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发生的改良运动；揭露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的反动性；阐述著者对中国今后对外关系的主张。《东方生活的悲剧》(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是林文庆1927年在上海发表的一部介绍社会心理学问题的中篇小说。

劳 乃 宣

朱宗震

劳乃宣，字季瑄，号玉初，1843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其先世籍贯山东。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江苏做过小官。他的祖父寓居苏州时，入籍浙江桐乡。

劳乃宣青少年时，随父母旅居苏州、南京一带。他的父亲劳勛成曾任江宁布政司仓大使，太平军进军江南一带后，于1856年在镇江投入清军刘存厚营。是年6月，劳勛成因清军溃败，投水自杀遇救，但不久即患病死去。劳乃宣因此得承廕监生。1863年，他到曲阜与孔悦庭之女结婚，成了孔门的乘龙快婿。

1871年，劳乃宣考中进士。1873年李鸿章主持编纂《畿辅通志》，延请劳乃宣入局。他在志局多年，深受总纂黄彭年的影响，笃信程朱理学。1879—1900年间，劳乃宣先后在河北临榆、南皮、完县、蠡县、吴桥、清苑等县做知县。他在任内极力强化封建礼教，镇压人民反抗斗争，曾三次考绩被上司评为“卓异”。在这二十多年间，劳乃宣还写下了《变法论》、《谈瀛漫录》等一系列文章，抵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鼓吹“古胜于今”的儒家复古思想^①。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劳乃宣正在吴桥县任知县。他

写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文，宣称义和团“实系邪教，久奉明禁”。^②他颁发告示，严禁义和团在吴桥活动。劳乃宣深深地预感到义和团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因而大声疾呼，要求清朝当局把义和团扼杀在萌芽阶段。为此，他刊刻了《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奉禁义和拳汇录》等书，广为散发。是年底，袁世凯在出任山东巡抚的途中，召见了，对他提出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办法十分赞赏。1900年1月5日，义和团在吴桥县的辛集活动。劳立即派兵镇压，当场杀死了九名团员，逮捕了义和团骨干节小廷。节被严刑拷打后处死。八国联军入侵后，劳乃宣在给袁世凯的禀文中，公然无耻地为帝国主义辩护，胡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迫于不得不然”，极力主张“剿拳和洋”^③。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后，劳又向袁建议，“封疆诸帅似宜于将顺之中，隐寓匡救之意，在在预留转圜地步。”^④这种以镇压人民来讨好帝国主义的卑劣伎俩，充分暴露了这个儒家卫道士的卖国贼嘴脸。

1900年6月，清廷按常例调劳乃宣进京引见。他看到清廷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对时局十分恐慌，因而乘机辞卸了吴桥知县的职务。他又以请修墓假为名，没有进京就跑到曲阜去了。是年秋，又跑到江浙一带。

1901年间，劳乃宣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三个月。是年底至1903年，他又在杭州主持由求是书院改成的浙江求是大学堂。1904到1908年间，他连续充任三任两江总督（李兴锐、周馥、端方）的幕僚。

1908年初，清廷正在“筹备立宪”。劳乃宣经两江总督的推荐，前往北京。是年5月23日，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他向那

拉氏建议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当时称简字)。他认为,这样做后,可以使“中国旧学更要昌明”^⑤。他被召见后,晋升为四品京堂,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的参议。1910年,又被清廷挑选为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他是资政院中顽固派分子组成的宪政实进会的骨干。是年,清廷在立宪的骗局中草拟了新刑律。劳乃宣对这个新刑律很不满意。他扬言“新刑律有妨于父子之伦、长幼之序、男女之别者,吾不敢曲徇也。”^⑥他坚决反对新刑律中违背封建礼教的无夫奸非罪等的规定,在资政院中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修改无夫奸非罪的提案以多数通过。从此,他自号“初叟”,表示要为维护封建礼教顽固到底。

1911年,劳乃宣到南京任江宁提学使。不久即卸任回京。武昌起义后,他在《民视报》上发表了《共和正解》一文,污蔑武昌起义是“为少数无知妄人所煽动,不轨军队所劫持”^⑦;主张仿效周召“共和”故事,实行君主立宪,企图挽救即将灭亡的清朝。11月26日,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任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又兼署学部副大臣。1912年1月,他见大势已去,辞职携家跑到河北涞水居住,以清朝遗老自命。

1912——1913年间,时刻梦想复辟的清朝遗老劳乃宣,三次到易县朝拜光绪的坟墓。为了复辟,他不断鼓吹孔孟之道,宣扬“道则古胜于今”的复古滥调^⑧。1913年7月,根据孔教会头目陈焕章的要求,他让正在身边的外孙孔祥珂回曲阜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他自己也替“衍圣公”孔令貽起草了一个演说词。是年秋,德国人尉礼贤在青岛纠集遗老搞了个尊孔文社,让周馥函招劳乃宣前来主持。劳应招移居青岛。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解散国会,设置参政院,极力

网罗前清遗老。1914年5、6月间，袁世凯函电交驰，请劳乃宣出任参政，又复派人敦促。劳复书辞谢不赴。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这个帝国主义卵翼下的遗老们的“桃源”，也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的战场。劳乃宣为避战乱，于是年8月22日迁居济南，不久迁居曲阜。当时，袁世凯正在进行帝制自为的阴谋活动，劳乃宣以为有机可乘。他认为“目前至要之计，在转移当世之耳目，鼓动大众之心思”^⑧。因此，他在是年7—9月间，先后写下了《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两文，与前著《共和正解》一起刊印。他异想天开地要袁世凯制定宪法，十年后“还政”于“宣统皇帝”^⑨。又分别写信给徐世昌、赵尔巽等人，要他们将他的著作转交给袁。劳乃宣的反动谬论，在当时的影响，正如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指出的那样：“大抵复辟邪说，惟劳乃宣正续共和解一书为之厉阶。”^⑩因而，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劳乃宣又蠢蠢欲动。清朝前期学者陈东塾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长白山》，是为满族统治中华服务的。这时，劳乃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重弹“使旧朝复兴”的老调^⑪。1917年7月，张勋复辟，授劳乃宣为法部尚书。但这个狡猾的老官僚，因为“传闻纷杂”，不明“局中真像”^⑫，没有敢贸然进京就职。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命令逮捕劳乃宣。劳又从曲阜逃到青岛。并再次和尉礼贤一起，主办礼贤书院，并协助尉礼贤将《论语》译成德文。

1918年间，劳乃宣看到北洋政府不再追查复辟分子的罪行，又猖狂起来。他扬言：“我辈于是年之事（指张勋复辟），当

视为天经地义之举”^④。他甚至置备了当时的迁秩品服，准备“存为身后殓殓之用”^⑤。他动员遗老们“勿拘小节，期成大业”^⑥，主张“出山”。也就是用到北洋政府里做官的办法，来逐步达到复辟的目的。当然，劳乃宣的种种倒行逆施，不过如当时的报纸所讥评的那样，“劳而无功”而已。

劳乃宣曾长期从事古代数学的研究，他对汉语拼音文字的提倡和推广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学术上是有成绩的。

1921年7月21日，劳乃宣在青岛死去。

注：

- ①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二，《古筹算考释续编序》。
- ② 同上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 ③ 同上书，《拳案杂存》卷下，《聚山东抚冤袁》。
- ④ 同上书，《拳案杂存》卷下，又《聚山东抚冤袁》。
- ⑤ 《劳京堂乃宣召对笔记》，未刊手稿。
- ⑥ 《桐乡劳先生遗稿》，《诰授光禄大夫劳公墓志铭》。
- ⑦ 同上书，卷一，《共和正解》。
- ⑧ 同上书，卷一，《论古今新旧》。
- ⑨ 同上书，卷四，《致刘潜楼书》。
- ⑩ 同上书，卷一《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
- ⑪ 《黄远生遗著》，卷四，第104页。
- ⑫ 《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三，《书陈东塾先生说长白山篇后》。
- ⑬ 《致章一山函》，未刊手稿。
- ⑭ 《致柯凤荪、沈子封函》，未刊手稿。
- ⑮ 同⑭。
- ⑯ 《复章一山函》，未刊手稿。

附录:

《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 《民国人物传》选录草案

《中华民国人物志》分三部分:其一为《民国人物传》;其二为《人名辞典》;其三为《人物表》。这个草案是《人物传记》暂订的选录标准。

一、 传记选录人物限于:自1905年同盟会创立起,至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灭亡止,这四十五年间的著名人物。

二、 传记选录的人物,暂定范围如下:

(一) 清末(1905年后)反动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二) 1905年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著名烈士。

(三) 1905年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四) 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五)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动分子。

(六) 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七) 北洋军阀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长最重要者列入, 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八) 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 南方各届政府中的首脑, 以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九)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十) 国民党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十一)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十二) 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十三) 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重要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十四) 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十五) 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

(十六) 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知名人士等。

(十七) 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三、著名人物中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有相当影响者, 以党史记载为宜, 此处不列入。

四、只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现在还在世的, 一律不写传, 只积累材料。

五、 目前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一律按笔画顺序排列。

（一九八〇年五月修改）